傳記文學叢刊

蔣廷黻回憶錄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口述歷史譯稿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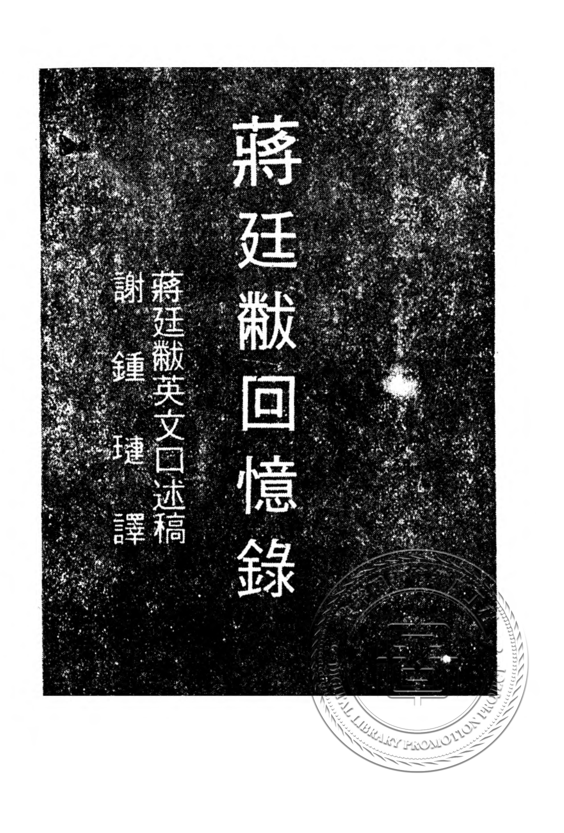
蔣廷黻英文口述稿
謝鍾璉 譯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傳記文學叢刊之四十八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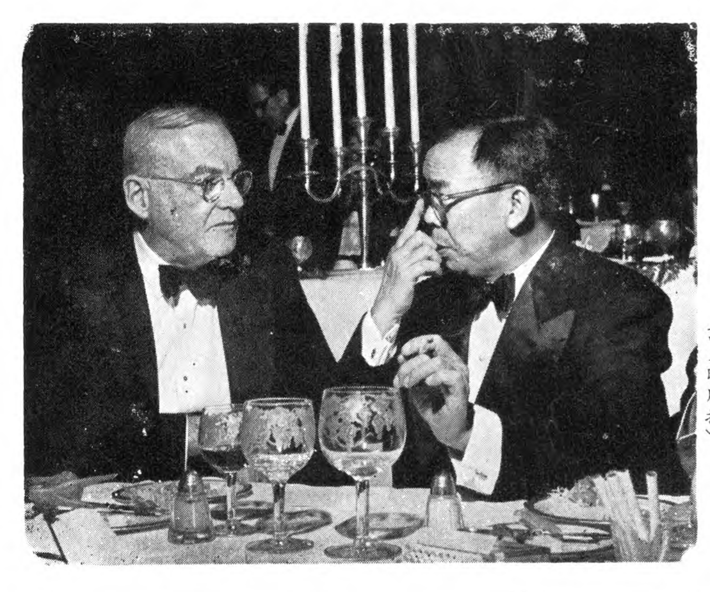


蔣廷黻博士遺影





蔣廷黻博士在聯合國攝影（上圖為聯合國秘書長哈馬紹於會議休息時與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安理會常任代表蔣廷黻博士談話時攝　下圖為蔣氏參加聯合國大會時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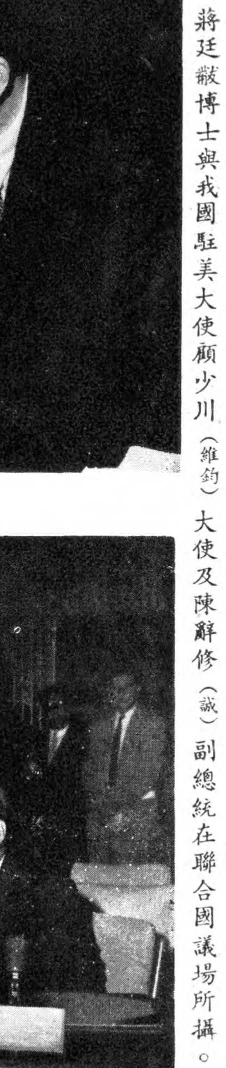




蔣廷黻博士與杜勒斯

（左兩圖為中華民國駐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代表蔣廷黻博士與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小吃與談天時所攝）







蔣廷黻博士與我國駐美大使顧少川（維鈞）大使及陳辭修（誠）副總統在聯合國議場所攝。

蔣廷黻回憶錄 目錄

譯者序

蔣廷黻先生早歲留美，歸國後從事中國近代史之研究與教學，與胡適之、傅斯年、丁文江等創辦「獨立評論」，介紹西洋新思想、新觀念，評論中國時政與積弊，爲早期提倡中國現代化功臣之一。其後從政，出任外交官及中國駐聯合國首席代表等職，是民國以來學者從政中最有成就的一位，譽爲「國士無雙」實不爲過。

一九六五年春，他從駐美大使任內退休，原計劃重回學術生涯。首先應哥倫比亞大學之邀，口述其一生治學從政經過，以便編印回憶錄；然後擬回國定居南港，從事其中國近代史之撰寫。惟在哥大口述回憶錄僅完成三分之二時，即患癌症逝世。其已完成之回憶錄，共分十七章，計自家世、童年、求學、留美、隨勞工團赴法、哥大讀書、南開及清華大學任敎、「獨立評論」種種、赴莫斯科考察、從政任行政院政務處長、任駐蘇大使及抗戰期間重任行政院政務處長等章，娓娓道來，親切可讀，無一不與中國近代史有關。惟最感遺憾者，卽蔣氏戰後出任救濟總署署長、在聯合國十五年之奮戰以及晚年駐美大使任內之成就，則付闕如。所幸其好友陳之邁先生在所著「蔣廷黻的志事與平生

」（傳記文學社出版）一書中叙述頗詳，如與本回憶錄同讀，勉可補此缺憾。本書付梓前，陳先生自駐羅馬敎廷大使退休歸國，原允撰一序文，而擬對本書未完成部分略加補述，不幸在排印期間，陳先生亦突患心臟病逝世。天道如此，非人力所及！謹記此事，以表對陳先生哀悼之意。

回憶錄中部分人名地名，譯音未必正確，且以蔣氏亦已作古，無從查詢。故凡譯者認爲存疑者，均於譯文後加註原文，讀者如有指正，當於再版時修正。

譯事本難，兼以才非，舛誤難免，尚望讀者先進不吝指敎爲幸。

譯者　謝鍾璉　謹識

六十八年元月十五日

第一章　我的先人和老家

我的先人和他們的家庭是屬於古老的、傳統的中國。就我兒時所知，他們—人和房子—沒有受到任何現代化和外國的影響。他們生存的天地是中國式的。但他們是否能夠代表整個古老的中國，我却不敢說。因爲中國（古老的和現代的）畢竟是一個大國；地區遼濶，風俗各異。

我於一八九五年十二月七日，也就是光緒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降生。我家住在湖南寶慶府邵陽以北三十里的地方，那兒是有名的漁米之鄉。

我家門前有一條小路，人稱小官道。小官道可以經過邵陽到楮塘舖（Chu-Tang-Pu）；楮塘舖是個鎮，鎮北三里通大官道。循大官道可至湘鄉和湘潭，最後可抵長沙。據我估計：從邵陽到長沙大約有一百四十里。路上都舖着青石板。小官道寬約四尺。如果有兩乘轎子在路上相遇，其中一乘必須要躱在路旁，靜待其他一乘過去，然後再走，以免被擠落田間或水塘。大官道寬約八尺；轎子可以並排通過。

我家東、南、西三面都是水田。北面有兩個水塘，塘水用於灌溉和養魚。四周既不是平原也不是山谷。房西是一帶丘陵，最高處不到二十五尺，房後是一座小山，高約五十尺，孤立在那裏，南、北兩方視線受阻，看不出去。這塊地方實在太小，小得簡直不能稱爲一塊平地，同時西面的丘陵又太矮，無法形成一條山谷。

房西約二百尺處是一條小河，寬約二十尺。雨後，上流的水流下來，水深可達十尺。過幾天，水位

下降，可以看見奇形怪狀的石子。河上有一座木橋，是用六根松木架成的，下面是石頭橋墩。有一次，我建議把木橋改成石橋，但是我的長輩們不贊成，他們說石橋建在大門前會破壞風水，帶來惡運。

小河和木橋爲我們族中兄弟們帶來很多快樂。有時水淺，我們可以嬉水，並可尋找五光十彩的小石子；有時我們可以用各種方法去捕魚。我們捕到的都是小魚，從來沒有超過四寸長的。小河南岸有古樹，樹中間又生着矮小的灌木。我們在樹蔭下遊戲。小鳥在灌木中築巢。

這座房子住了我們五代。它本是我太爺替他的兩個兒子建造的。起初，房子的建造是左右耳房各一棟，中間是一棟寬敞的祖先堂。堂內設有祖先的供桌，每遇婚喪大典都在那兒舉行。祖先堂是全家人的公產。我祖父和他的子女住南耳房，叔祖和他的子女住北耳房。雖然我在這棟房子裏一直住到十二歲，後來我又回去過好幾次，但我一直不知道它到底有多少間。那是一棟大而不規則的房子。

我太爺和我祖父在我出生前就已過世。我祖母自己住一套房間。我父親和他的兩兄弟也各住一套房間。我們可以說，那簡直是一棟大公寓，每個成婚的人都會分到一小棟。只是，每棟都不是分開的。後來，當我這一代的人口增多時，我們的先人就再增建房屋，於是，我們也能分到一套房間。

從遠處看，我家房子酷似兩座並列的帳篷。每座帳篷有兩條雕琢精美的屋簷。這兩座帳篷由一條平行的屋脊串連到一起。那條平行屋脊的下面就是祖先堂。這座房子外表很有氣勢。前面的牆壁下面四尺是磚，上面是土坯。房子的結構非常堅固，家人從不擔心它會倒塌。磚牆上面勾着石灰的混合物，這種混合物在古老的中國等於現在的水泥。不但可以防風雨的浸蝕，而且可以使外表美觀。

房子的門窗都是木製的，上面沒有玻璃，窗子上面糊着窗紙，不僅可以防風雨，又可掩蔽隱私。因爲是紙，所以不堅固，要時常更換。屋中的地是乾土舖的，經人常年踐踏，早已堅硬如石。當然，那兒是沒有自來水的。房後是女厠所，男厠所設在屋角。所有的屋子都很暗。因爲老一輩人都喜歡講鬼，所

以當我回憶到童年時，就越發感到那些屋子的陰森。

有些鄰居的房子比我家的富麗堂皇。北面距我家兩里是趙家（Chaos）。正南約兩里是趙姓的另一族。東面山後也有一排房子，那是鄧家（Teng Chan）。這些房子都比我家的有氣勢。外型美，用的磚也多。他們房前大多數都有一片磚舖的庭院。孩子們可以在院裏玩，客人們也可以在那裏下轎子。

我家西面是一片茅草屋，有的祇有一間屋子。緊鄰我們的房子，在水塘的那一邊，住着我太爺的另一支後人。他們的房子比我們的大，但不如我們的好，至少在外表上不如我們。在那棟房子裏，住着我祖父的堂兄弟—我的六叔祖、七叔祖和八叔祖。

我十歲時，祖父這一支的人口就已經超過了二十人。大伯父夫婦生三子三女。二伯父夫婦生一子四女。家父在兄弟三人中最年幼，有一女三子。因此，我祖母膝下有三子，三個媳婦和十四個孫輩。

我應該再補充說明一下，我的祖父母有一個女兒，她生兩男一女。住在距我家約三里處，她丈夫姓劉（Liu）。所以她的孩子我們當作「外系」，因爲他們不姓蔣。不過，我祖母對那些「外系」的晚輩和我們這些「內系」的晚輩都一樣寵愛。

我的叔祖和叔祖母有四男二女，住在北耳房。他們有多少孫輩，我不太清楚。

在所有長輩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祖母。我出生時她還不到六十歲。她活到九十歲，是一位意志堅强的女性。她對兒孫輩具有無上權威。家父和二伯做生意從城裏回家時，總要給她帶一些禮品。最常帶的是人參，因爲人參是被人們認爲最有滋補的。在我們懂事以前，她把這些禮品大部分轉贈給她的獨生女。每遇這種情形，家父和二伯就埋怨她：「早知你老人家把人參送給姊姊，我們就不買了。」這時，祖母就會說：「你們送給我就是我的東西，我願意送給誰就送給誰。」於是，大家也就不再講話。這種情形發生過好幾次。

家母在我六歲時就去世了。祖母立即把我哥哥、姊姊和我本人移到她的房裏。她照顧我們衣食，將近兩年，直到我們有了繼母為止。因此，我當時認為她是最寵愛我們的。可是，事後回想起來，我又不敢肯定，因為她對所有的孫輩都是如此的。

家父和他的兩個哥哥都崇奉儒家思想，換句話說就是對釋、道兩家不太有興趣。可是我祖母却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前面說過，在我們祖先堂中有一張供桌，桌上供着一個神龕，但却沒有供任何佛像。祖母在供桌下面秘密供了一張佛像。每逢陰曆初一、十五她都到佛像前去燒香。她常要我陪她去禮拜。要我跟着她三叩首。並且對我說千萬不可褻瀆神明，絕對不能觸弄佛像。那時，在信仰上一方面是我的父親和伯伯，另一方面是我的祖母，使我左右為難。父親他們雖然不積極反對信佛，但往往斥信佛為迷信。因此，我祇有徘徊在信與不信之間了。據我所知，祖母並不想要他的兒子們也信佛。另一方面，家父和伯伯們在她面前也從不對佛表示不敬。他們的行徑，實在是信仰自由的最佳榜樣。至於崇拜祖先，祖母和他的孩子們却是看法一致的。

我應該再補充一點，祖母是個文盲，腿也有點兒毛病。中等身材，有點兒胖，她常趦趄着在房子周圍散步。據我所知，她從未走到距房子三里以外的地方。祇有一次是例外，一八六〇年，她還年輕，為了避太平天國之亂，她曾隨大人到過山中。她對那段慌亂的歲月已經記憶不清，但我還記得，她曾以不屑的口氣說過「長毛匪」。

如前所述，家母於我六歲時去世。我對她印像不深。外祖父是個秀才，但是家境貧寒。就我所知，家母時常患病，但她得的是什麼病我却不知道。中醫經常到我家來。我記得他騎的是匹白馬，常常小心翼翼的討論我家門前那座木橋。我家爐子上經常坐着一把藥壺，煑着醫師所開的藥。家母吐血；我想她可能是患肺病。

家父受的是舊式教育，程度等於現在的小學。他很早就輟學，隨祖父到靖港去做生意。家父和二伯輪流照看生意。

我鄉盛產煤、鐵。祖父早年就經營鐵器生意。他爲什麼要幹這一行，我一直不清楚。我們在靖港的店舖就賣鐵釘、鐵犁、鐵錘等。後來，我家又在距上述店舖約二十里的地方開了一座鐵工廠，鑄造各種鐵器。船夫們從下流乘船到我家來買鐵器，再把鄰省江西販來的瓷器賣給我們。家父和二伯二人輪流看店，每年輪換一次。

家父和二伯，於往返老家和店舖時，多數乘船。從我家先到三十里外的永豐，這段路要起早，或徒步或乘轎。從永豐再到湘潭，這四十里有小船可乘。因爲是順水，很少有超過兩天的，沿途風景也很美。到湘潭後溈水 (Wei Shui) 入湘江，湘江是長江的支流。從湘潭經長沙到靖港，全長五十里，人們大多數都乘船。

家父很有經商的天才，而且是一位民間領袖。他晚年做過靖港的商會會長。在家鄉常爲鄰居排難解紛。有好幾次爲人排難解紛的事，至今我還記得。他所用的方法是：把爭執的雙方和他們的朋友約到我家吃便飯。然後請雙方說明爭點所在。接着他再請雙方的朋友們發表意見。最後，他把爭端總結一下。於是他勸雙方和解，但也有時他會站在某一方面。據我所知，爭執雙方大多數都會接受他的調停。不論他們雙方是否高興，但家父最後總是解決了雙方的爭端。如果爭執雙方或是其中的一方願意的話，也可以去打官司，但這種情形就從未發生過。

家父也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他認爲經商是一種很好的職業，因爲經商可以過正經而快樂的生活。如果他說話能算數的話，他就會要我哥哥和我到店裏去當學徒，將來做個生意人。在這方面，二伯和他完全不同。

二伯的年歲較家父大，比家父受的教育也多，他想參加考試求取功名。我們蔣家沒有一個有功名的人。伯父銳意於此，但是考試落第，最後才打消求學念頭，改而經商。因此，他決心寄望於下一代，希望他的子侄，能够努力讀書求取功名。

大伯父爲人很文弱。他早年就吸鴉片煙。我常看到他一榻橫陳，噴雲吐霧。吸鴉片煙的用具對小孩子們頗具吸引力，鴉片煙的味道也很香。有時我也看他熬鴉片，把煙土熬成像果醬似的東西。大伯母對大伯父的煙癮甚感不懌。因爲她曉得吸鴉片是很浪費的嗜好，能够敗家。

我們住的房子在稻田和水塘之間，我和堂兄弟們也就在這片空間中玩耍。玩耍時可以說沒有玩具。新年時我們自己做毽子。有時我們用竹子做一根魚竿去釣魚。有時跟在牛群後面，聽牛背上牧童們唱歌。有些牧童唱的歌至今我還記得。牧童們時常比賽唱歌。由一個牧童先開始，他唱完後，另一個牧童立刻接唱。他們比賽誰唱的多，唱的好。

週末和星期假日在古老的中國是沒有的。虔誠的佛教徒是於陰曆初一、十五在自己家裏或到廟上祭拜，但𨚫和平時一樣也要工作。在中國，較大的節日都是關於人的節日。第一個節是新年，從正月初一直到十五。這是中國最大的節日。

正月初一，因爲我們要祭天地，儘管除夕大家睡的很遲，但還是要起早。長輩們率領我們魚貫走到小官道。我們向天祭拜，每人三叩首，同時燃放鞭炮。然後再到祖先堂去祭拜祖先。祭過祖先後，住在北耳房的人要給我叔祖和叔祖母拜年，同時我們住在南耳房的人也要給祖母拜年。接下來，我和兄弟們再給大伯父和大伯母拜年，最後再給二伯父和二伯母拜年。祖母、伯伯和伯母都要給我們年糕。第一次參加拜年的男孩子會比別人多得一個紅包，表示長輩對他的喜愛。

南耳房拜完年後，我們都到北耳房去給叔祖父和叔祖母去拜年，我們這一輩的也要給叔嬸們拜年。

北耳房的人們，同樣也到南耳房給我祖母拜年。

在中國舊社會中，輩份和年齡是決定禮儀的基本條件。我要給父執輩拜年，同時也要給祖父輩的人拜年。在平輩人中，我要給比我年歲大的人拜年。以拜年論，不分貧富，不論社會地位，不論主僕都是如此的。我們僱用的長工，如果他是家父一輩的—往往是如此的—我們也要對他們說些恭維話。如果我對年長的僱用人有疾言厲色，家父和家母一定要責備。任何不敬老的事都被認爲是不良行爲。這種禮俗在拜年時要嚴格遵守。

正月初二，我們住在大房子的人要到水塘對面的房子去給叔祖父、叔祖母、叔嬸們去拜年。他們也要到我們家給祖母、叔祖父、叔祖母、叔嬸們拜年。拜年時，要互送禮物，大多數都送年糕。

正月初三，我和兄弟們要給外公、外婆和表兄們去拜年。大人們要到左鄰右舍朋友們家中去拜年。過新年，有鷄、鴨、魚、肉和年糕，我們可以大快朵頤。

初五開始舞龍和耍獅。舞龍和耍獅的隊伍多半由某一族人自己組成。傍晚，舞龍的隊伍帶着鑼鼓出發，一群人跟在後面，每人打着紙燈籠。看起來非常好看。在我五歲以前，母親不准我跟着去看。五歲以後，她曉得已經管不住我，祇好把我交給一個年長的人照顧，才准我跟去看。舞龍的隊伍要到鄰家，特別是同族的鄰家去舞。在舞龍時有些自命不凡粗通文字的人還要來幾句散文詩，說幾句過年的應景吉祥話。接着是拳擊和摔角表演。表演後群衆安靜下來，主人獻茶，把年糕分給小孩子們吃。

正月初八，附近的廟宇白天要演戲，引來很多觀衆。開鑼前，各種小販麕集，賣吃食，賣玩具，樣樣都有。廟外常有耍猴子和耍白老鼠的。兒時，我對小販和猴戲比廟內的戲要有興趣得多。

正月十五，年過完了。人們都要重新開始工作，生活恢復正常。新年過去，人們都有一種悵然若失的感覺。

五月初五，也是一個節日。這個節祇有一天。每家要在門上掛艾草，表示驅邪，並且要吃粽子。臨河的城鎮有龍船競賽。或以行業，或以地區組隊參加。

五月節過後是中秋節，日期是八月十五。人們都認爲八月十五的月亮最圓最亮，中秋節祇有一個晚上，大家吃月餅。

最後的節日是九月九。九月九在中國稱重陽節，人們用登高來慶祝。如果無山可登，就登上一座較高的建築物來意思意思。重陽節是慶祝豐收，因而要打牙祭。

除了上述的節日外，春天大家還要上坟祭奠祖先。我在過節時都會感到高興，都會有好東西吃。除了玩和吃之外我不想其他的東西，因爲我除此以外也不知道其他東西。

每逢過年節，長輩們對我們的管束就放鬆了。父母對我們更放任。如果我犯錯父親會告誡我：「如果不是過年，我非打你不成。因爲過年，今天饒了你。」平時，父母對我們管的很嚴。他們自己也自律甚嚴，以身作則，示意我們將來要好好過日子，好好做人。

第二章　家人和鄰居

我出生那年，適逢中日戰爭。中國戰敗，簽訂馬關條約，被迫將臺灣割給日本。後來我從族人那兒獲悉，邵陽鄉下的老百姓若干年後才知道中日之間發生了戰爭。這並不稀奇。因爲當時邵陽沒有報紙，也沒有郵政電信設施。

一九〇一年以前，湖南省連一個外商、傳教士、使領人員都沒有。我童年時從未看見或使用過外國貨。連最普通的外國貨洋油、洋煙、洋布……等，都一概沒有。唯一可能有的外國貨是針。有一個小販，不會說本地話，常常到我家來兜售東西。長輩們告訴我說那個小販是廣東人。至於他如何從沿海廣東來到內地湖南，我就不清楚了。在他售賣的東西裏有光亮、大小一致的針。廣東當時已經開放對外貿易，因此，這些針就經廣東到了湖南。當時，湖南是抵制外貨最久的省份之一，因此，仍然繼續它的孤立生活。但是後來，湖南也終於無法逃出和外界接觸的命運。很不幸，正當湖南要面對此一巨大而複雜的變化時，本身也是問題重重。在這方面，湖南和其他各省一樣：整個中國在過去一百年間都處在內憂外患之中。

我家是從鄰省江西吉安遷到邵陽的，時間可能是在十七世紀的後期。似乎是陸續遷移而不是舉族遷移的。我們族人有一份族譜，每十五至二十年修訂一次。爲了修訂族譜，族人曾派代表到吉安去蒐集資料。我應再補充一句，我的族人有一部分遷到老遠的四川，定居在戰時首都重慶附近。

當我的祖先抵邵陽時，當地一定還是一個未開發的邊區，和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北滿差不多。對此問題我沒有作過有系統的研究，但是某些事實使我相信當時的情形是如此的。

當我年幼在小官道上散步時，常見有些人穿着奇裝異服。人們告訴我說那是「苗子」或土人。他們自願與漢人隔離居住。他們固守自己生活習慣和宗敎信仰。他們的家距我家不遠，可能就在五里以外。在湖南西南部苗子的人數比邵陽還多。

長輩們最喜歡講的傳奇就是本族祖先生活的情形。據說我們的祖先很富有，有一、二八〇畝以上的土地。他的土地一天都走不完。這種傳奇對我影響極深。我在美國受完大學教育曾不辭辛勞，調查此事。我家附近的許多廟宇、寺塔、橋都有石碑，碑上刻着捐款建造人的姓名，我祖先的名字往往列在最前。距我家三里的地方，有一座精美而獨立的房子，迄今可能仍然存在，那就是我祖先在十九世紀初所建築的。那所房子已經落到外族手裏，但是二伯爲了盡孝又買回一半。如果說當年這裏不是邊區，一個人怎麼會有一千多畝的田產。

十九世紀末我族才有祠堂。這說明在此以前蔣家族人稀少，無此必要。

邵陽人均以勇武自負。我和哥哥年幼時，父親就爲我們請了一位拳師，敎我們防身術。很多武林故事在鄉間流傳。其情節酷似電影中美國西部武打片。

到我成年，邊區的情況已不存在，但在某些方面，邊區的遺風猶存。

鄉間各族彼此不和是常有的事。在我年幼時，李劉兩姓時常械鬬。一個劉家的人兩個李家的人因械鬬喪生。我問二伯：爲什麼劉李兩家要彼此仇殺？他說：因爲他們的先人曾經有爭執，所以他們要打下去。

二伯有一個佃戶，對於耕種不甚勤勞。他似乎染有煙酒嗜好。二伯認爲他已不能再容忍，應該通知

佃戶退佃。佃戶竟因退佃而自殺。他是河對岸李姓的同族。即刻就有人告訴我家，說李姓族人要武力報復，把死屍抬到我們祖先堂來。一般認爲這對蔣家是最大汚辱。二伯動員蔣家的男丁，各操刀棍，輪番守夜，他們計畫的戰略是先守住木橋。正對橋頭駐守一小隊人。另外的人派到北方一里半路的地方把守那兒的石橋。氣氛非常緊張，但雙方未發生衝突。次日晨，鄰居一位長者來會二伯，勸雙方和解。中人說：如果蔣家肯出喪葬費，械鬪可以避免。二伯接受了他的調解。

祖父去世時，留下一家店舖和十二畝左右田地。祖母分到三畝，三個兒子各分三畝。家父的三畝田，一畝與人合種，對方出勞力，我們出種籽、牛、肥料。每年收成三分之一歸勞方，三分之二歸地主。另外的兩畝租給佃農。每年收成雙方各半。我們是地主，是所謂的上中階級。附近最大的地主有一百二十畝地。他有十子，每人可分到約十二畝。多數大地主都有十至三十畝田地。

我家的稻田每畝年產約三十擔（每百斤一擔）糙米。三畝可產九十擔。與佃戶及合耕人分成後，我家每年約可分到五十擔，約值一百五十銀元。

在我童年中，一九〇〇年是最重要的一年。有一天，大約是春季，家母替我洗好手臉，換上新衣服，因爲他認爲有一個重要客人要來了。我堂兄們比我懂事，知道的比我多，悄悄對我說，客人是一個媒婆，是來給我作媒的。以我那時的年齡論，這件事對我是無所謂的。但是，靜靜等在那兒還是很煩人的。媒婆按時抵達。她和家母互相耳語了一陣，再從上下左右端詳了我一番。據媒婆說，距我家約四里有個賀（HO）家，有一個很漂亮的女孩子，年齡和我相仿。她認爲我和那女孩是天造地設的一對。不到幾個星期，經合婚後，正式交換訂婚證書，我和小賀小姐訂婚了。

一九〇〇年苦旱。門前的小河都乾涸了。水塘也沒有水，我們不得不把塘裏的魚撈起來。塘底在烈日照晒下，土地龜裂。田中禾苗，均已枯焦。飲水成了嚴重問題。

那年家父正好在家。我記得他提着水桶帶一把鏟子到小河去。我跟在他身後，看他到處去挖。挖了好幾個小時終於給他找到一處水源。家父挖開泥土，打了一個小洞，漸漸的，有水滲進小洞。家父提了一桶水回家。四鄰聞訊，都去提水。

小販們到我家來賣一種所謂觀音土的東西。那是一種灰色的泥土。據說在荒年可以充飢。它被認爲是上帝的恩物。二伯也弄了一些回來，用水煮過後要我們嗜。我吃了一小碗，很難下嚥。幸好我們有前年的餘糧，不必靠觀音土維生，得度荒年。但鄉下有很多人却飽受災難。哀鴻遍野，草根樹皮挖掘殆盡。

一九〇〇年也是拳匪在北方倡亂的一年。彼時張之洞任兩湖總督，拳匪在兩湖的宣傳活動爲張所敉平。但是，有一個姓賀（據趙士介先生提供資料：其人名賀奎聲——譯者謹註）的單身漢成立了一支救國敢死隊，想要沿江而下，去殺洋人。敢死隊到了大官道上的青樹坪，距我家僅僅八里路。他們遇上了官兵。雙方打起來。敢死隊非死即逃。姓賀的被梟首。官兵把他的首級裝在木匣子裏。沿小官道從青樹坪運往邵陽。正好經過我們家門前。家父供給他們茶水，請他們准許我們看看賀某的首級。官兵答應了。我還記得，我拉着家父的手走到木匣子旁邊，去看那個死人。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我的長輩和我都把那個姓賀的當作大英雄。正好他是我未婚妻賀小姐的一個叔輩。

賀某的事蹟鄉人一直講了好多年。似乎人們都認爲中國人很神聖，外國人很野蠻。兩相對照也就非常清楚了。這件幼年的經歷使我永遠不能忘記。在以後的若干年月中，我一直想着與那件事有關的許多事情。無疑的，那是因爲我同情那個姓賀的英雄和他的部下的原故。

念了許多年書，包括在美國留學，我還是不能忘却那位姓賀的英雄。一九二三年冬，我回到家鄉，有一次去探望族中長輩，途中在一家小店吃茶休息，猛然看見牆壁上貼着一張緣起，上面說附近的善士

們正在募款給一位新神修廟，新神姓賀，很多城鎭中也貼着相同的緣起。我回家問繼母那位新神是誰。她說，卽使她說出來我也不會相信，所以她也不願意告訴我。經我再三懇求，她才告訴我，那位神仙就是一九〇〇年率領救國敢死隊去殺洋人的那位姓賀的英雄。她告訴我那位英雄就是一度做過我未婚妻的賀小姐的叔輩。她說姓賀的英靈未泯仍然活在那一帶人們的心中。群醫束人的病人，久婚不育的婦女，祇要許願爲他修廟，無不有求必應。我於一九二三年間就知道繼母很迷信，而且我也知道她是個虔誠的迷信者。我親眼看見一種新的宗教讚禮。這完全起於人們的無知和對洋人的仇恨。

邵陽縣從過去到現在，一直是中國最大的縣份之一。二次大戰時，爲了抽壯丁，國民政府估計它有一百二十萬縣民。行政大權和責任落到縣長一個人肩上。他的地位高但行政組織不够。在廣袤的轄區中很少有下級機構。就以我的四鄉論，我們從未看到過縣府人員，甚至連一個警察都沒見到過。地方事務都是由親族組織、鄰里組織來處理。

在鄉間，每族都有他們自己的祠堂和族長，族長在家族中具有無上權威。大多數的祠堂都有祠堂公產，公產收入用於修繕、祭祀、救濟族人，補助同族子弟，特別是聰明而貧苦的學生學費。族人間的爭執大都由族長們出面排解。

我常聽人說，某某因爲行爲不檢，族長要開家祠懲罰他。有時也聽人說，爭執的一方要開家祠評理。這種威脅方法常被使用，但往往是空話一句，威脅對方一下而已。

我從未看過開家祠審判族人的事，但，我聽族長們說族中頑劣子弟可開家祠杖罰或是出宗。

鄰居之間，也有他們自己的組織，在他們中心設立一個辦公處。如有事端，如匪警等，鄰里組織的自衞隊就穿上制服，執干戈以衞桑梓。遇有重大刑案，鄰里組織可以報告縣府，要求派警察來。有些刑案，於捕獲犯人後，可以送到縣府。縣長充檢察官，在鄰里組織人員面前審訊犯人。犯人可以接受某些

法律指導。我說「某些」，是因爲我國當時沒有律師，在鄉間祇有些粗通法律可以寫狀子的人，於是犯人就成了他們的好主顧。

就我記憶所及，大體上說，鄉間的治安是很好的。我家祇被毛賊偷過一次。乞丐倒是很傷腦筋的，尤其是辦紅白喜事時更甚。有一年大旱，爲了誰家先從水塘汲水的問題發生爭執。依照習慣和傳統，憑地契決定先後次序而非根據法律。也沒有書面契約。借貸、利息等也都依照習慣和傳統。債權人如迫於不得已，可訴之於族長或鄰里組織，請求幫助收回貸款。

我年八歲以後，繼母常派我去看佃戶收割稻子。根據習慣，佃戶要把收割的日期通知地主。我要到田裏去看佃戶和工人們收割。佃戶往往給我準備熱茶、西瓜或葵瓜子，幫助我打發時間。如果要收割一整天，佃戶就會請我到他家吃午飯，菜肴往往很好。稻子收割好了，佃戶把他分作兩堆，旁邊再留一小部分。他要我來選其中一堆，當作地主的一份，然後求我把旁邊所留的一小部份也送給他。我如果認爲留的太多，也可以不給他。選完後，我家工人把我選的一堆搬回家去。我家長輩似乎從未擔心過佃戶會欺騙我。地主與佃戶之間很能互信。

就鄉村經濟而論，租地、分穀和借貸是最重要的幾件事。在我家鄉有一位和我祖母同輩的老太婆，我稱他葉（yeh）奶奶。我聽說她是家父的奶媽。他在我家給我母親和繼母做女用人。她積了一點兒錢，放出去吃利息。她出去收債時常要我伴着她；以花生瓜子作酬勞。她向債務人收回她應得的錢。就我所知，利錢是三分。貸出的數目很小，一個人從不超過三塊銀元。

後來我核算一下，才知道在鄉間放款吃利是最有利可圖的。可慮的是放款不太安全。土地的收入不及放利息好。地主要納稅，稅款約等於總收穫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二。據我若干年後核算，投資土地每年純益率約爲百分之九。但人們還是願意投資土地，因爲比較安全。賊不能偷地，戰爭也毀不了地。

每個鄉下人都願意買地。

很明顯，鄉間人們貧富不均。有些大地主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因之，田地一天天多起來。所幸，中國對土地有一條不成文法：地主死後，他的兒子要平分他的土地。這種不成文法卽使死者有遺囑不許分也無濟於事，因爲法律和傳統都沒有遺囑的規定。

次於大地主的是富農。他們自己耕種自己的田，藉以糊口。再其次是半自耕農，他們有一部分田地，但不足以維生。他們要從大地主那兒租田來種。最差的是貧農，他們家無寸土，靠勞力或耕種人家的地維生。鄉間也有手藝人，如石匠、木匠、裁縫等。但鄉間大多數是普通工人，他們沒有手藝，靠勞力賺生活。

回想起來，可以說大多數鄉下人都是工作苦，生活儉樸。他們既不感到滿足也不感到不滿足，都過着和他們前輩相類似的生活。大地主們雖然在鄉間爲人所嫉，但他們的生活標準和情趣也不太令人羨慕，至少對現在這一代人說是如此。由於分家，很容易使大財主家道中落，甚至饔飧不繼，但，另一方面，欲想發財却是難上加難。對鄉下人說，沒有太大的發財機會。

第三章　啓蒙時期（一九〇一—一九〇五）

一九〇一年，也就是光緒二十七年，輪到二伯看家。他悄悄的計畫辦一所私塾。他徵得叔祖的同意，把北耳房的客廳當教室。那是一間寬大的空房，長寬各約二十尺。他請了一位王先生任教。又鼓勵族人、親戚們把子弟送來上學。

有一天，二伯對家母說，家兄（按卽蔣嶁，）和我明天應該去上學。要她替我們修飾一下，穿得潔淨些，同時應該準備一個紅包當學費。次日清晨，二伯領我和哥哥去上學。老師已經候在那兒迎接我們。他站在孔夫子供桌前。我和哥哥站在他身後。大家向孔聖人三叩首。二伯把紅包遞給王老師。我和哥哥坐在桌旁，打開書，展開仿紙，預備好筆墨。一切準備停當。二伯囑咐我們要服從老師，努力向學。說完離去。從此開始了我的讀書生活。

私塾中除我和哥哥外，還有其他五名學生，都是我的堂兄弟。他們上學比我稍早幾天。我們行過入學禮後，他們開始背書。

這個一間房子的私塾，各方面都是傳統式的。所教的課程和教授法全是傳統式的，我想多少個世紀以來都沒有變過。像我那樣年齡的人能受到那樣古老式的教育的還不太多。

開始學的是三字經。我把書交給老師，他念一遍，我跟着念一遍。他看我已經會念，就命我回到自己桌子，高聲朗誦，直至記牢爲止。因爲三字經有韻律，句子短，每句都是三個字，所以記起來並不困難

。雖然我不懂每個字的意思，更不懂每句的意思，但我發現念起來還相當有趣。每句念若干次，我認爲可以丟掉書本背得出來時，再拿書到老師那裏，背朝着老師和書本，背誦書中的原文。老師認爲我眞能背誦了，於是他再教我四句新的。爲了變換花樣，他又教我習字。

在舊式教育中，書法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寫得一手好字是念書人的門面。字寫得不好，立刻會顯出書讀的也不好。在習字前，我要磨墨。這件工作相當煩人。磨墨往往會弄髒桌子和仿紙。再者，我缺乏經驗，不知磨到什麼時候才算濃淡合度。習字用的紙上有經緯線，格成約一寸見方的格子。我有一本字帖，要照帖練習。我把字帖放在下面，仿紙蓋在上面，照帖描寫，老師不時到我桌旁，教我如何執筆和運筆。這種練習既有趣又刺激。我喜歡臨摹得和原帖一樣。

午餐過後，我再回學堂，和早晨一樣，讀書習字。老師聽我念完第二個四句三字經後，再測驗我頭四句，看我是否忘記。因此，我對已經會背的部分還要不斷的複習。

運動和遊戲是沒有的。因爲老師一直都在教室裏，所以我們也不能互相交談。但教室裏却是非常嘈雜的，裏面充滿三字經的聲音。凡是從小官道上經過的人，聽到孩子們的書聲，就知道那裏是一所私塾。

三字經是一本很好的書。其中包括儒家倫理思想的基本原則。指出修身、睦鄰、齊家的準則。總而言之。，它爲青年人提供了儒家思想的輪廓。

三字經的頭四句是：

人之初、

性本善、

性相近、

習相遠。

這四句「經」文，顯然地指出習慣對人的重要性，要人們特別留意，勿染惡習。

除了教導人如何行爲外，三字經對我國的史地也予概略的說明，並且提供一些動植物的基本常識。書中文字相當古典，但並不太生硬古板。在那段時日中，我們已可做到不用老師逐字講解，就能明白每句的大意。我認爲：背誦也有助於文句的了解。

若干年後，有一次我在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社會研究所聽福克斯教授 (Dixon Ryan Fox) 演講，講題是哥大歷史。演講時他首先對我們說，過去曾有某教授在哥大前身的金氏學院開過一門課程，這門課程人們稱之爲「上下古今談」，內容無所不包。自從那門課程開過後，終金氏學院時代，哥大就沒有再開新課。至此，我才了解三字經也和哥大早期所開的「上下古今談」的毛病一樣，內容泛而不專。

我的姊妹和堂姊妹都沒有進學堂。在當時，女孩子應否進學校讀書的問題還沒有人去注意。大多數人認爲：女孩子不必上學。

我和哥哥入學約一個月，家母病逝。我們小孩子，雖然年幼，也要遵守古禮。我們要陪和尚念經，參加葬禮。坟邊搭一個棚子，我們在那裏休息睡眠，直至喪禮完畢。喪事過後，哥哥和我與祖母住在一起。又開始上學。

二伯時常到學校去察考學生們的進步情形，特別是對哥哥和我察考的更勤。我們在三字經和書法兩方面的進步都超過他預期的理想。當時我成了天才兒童。

初級教育受過後並不是人人都升學的。並不是每個家長都希望他的子弟升入較高的學堂。大家都認爲，事實亦復如此，有些人在若干年後一定會輟學的。一般人認爲念書習字雖然很好，但也有人認爲超過相當限度會浪費金錢和時間。但是我的情形不同，我的進步情形激起了我全家人，特別是二伯的雄心

。我家老少都說我將來會有出息。有時他們打趣我，說我將來會入翰林院。但對我來說，進步快却增加了我的負擔。

由於長輩們都把我看成是一塊讀書的材料，所以我的行爲就必須比別人好。他們說，我不能和其他的孩子們一樣，成天玩耍；我的衣服要比別的孩子清潔；我要對長輩更有禮貌；說話要更文雅。那些涉世已深的長輩悄悄對我說，我應該努力用功，時機到來，我可以高中，做大官。他們把中國歷史上的成名人物拿來給我做榜樣，來鼓勵我。但我覺得，這全是小題大作庸人自擾。

但，這對我的長輩們說却是合理的。在古老的中國中，大家祇有一條出路，祇有一個努力方向。一個人必須要學而優則仕。除此之外，簡直沒有進身之階。當然，也有人循其他途徑得到地位和財富的，但畢竟是少之又少。事後回想起來，我才了解、才感謝長輩們對我的勸告和鼓勵。但在當時，我認爲他們太多事；我希望能和其他的孩子們一樣。

二伯認爲我的私塾和老師都不够好，他說服附近一個姓趙的大地主撥出幾間房子，成立一個較大好的私塾。請我舅舅來作老師。他本身雖無功名，但他的父親却是一個有功名的人，而且大家都認爲他很有學問。一九〇二年我和哥哥都轉到趙家的學堂。

趙先生是位大地主，大約有二十五畝田。他的房子美侖美奐。是他父親當年給他蓋的，希望將來有一天他的後代能够住滿那棟房子，因此，撥出七間耳房來辦私塾毫不困難。

全私塾共十多個學生，他們來自不同的家庭，趙家子弟優先。在這所私塾裏我開始念四書和一些其它的詩文，同時繼續練字。

老師姓熊（yung）（家母也姓熊），他用另一種方法來敎我們。他不朗誦課文要我們死記。他要我們指出書中不認識的字。他把指出的字高聲念給我們聽。然後他再把新功課講給我們聽。此種方法似

乎比過去那位老師的方法好，因爲先明白意思比較好記。但是我不得不承認有時老師講的很不清楚，和沒講一樣，可是我也不敢說出來。

我和哥哥讀的書較其他學生的淺。熊先生要我們跟年長的學生們一塊兒聽他講。他讓我和哥哥坐在那兒聽，但不考問我們。

私塾距我家雖然不到兩里，但我們仍然住校，吃大伙。家裏有時送來小菜和臘肉。每隔五六天佣人會送來新鮮蔬菜。

老師也住在校內。其實他家離學校祇有一里路。趙先生和熊老師是多年的朋友。他們二人不僅是近鄰，而且有些我不懂的關係。趙很富有，熊很貧窮，但多年來他們都處得很好。

我大舅（熊老師）和趙先生是同窗好友。他們有個相同嗜好，都喜歡喝兩杯。大舅常去看趙先生。每次趙先生一定會拿出一小瓶四十度的白乾。佐以一小碟臘肉，二人就喝起來，他們邊喝邊談，能够喝上幾個小時。究竟談了些什麼我不知道。但據我所知趙先生就從未請我大舅正正式式的吃過一頓飯。

趙家雖是大地主，但是小氣得出了名。如今忽然在他家的房子裏辦私塾，讓別家子弟去上學，這眞是一件大新聞。趙家從不穿絲綢或皮毛的衣服，一向穿棉衣。出門從不坐轎，永遠步行。如果有人爲慈善事向他捐款，他一定捐得最少。對他們的佃戶，刻薄到極點。因此，附近的人都稱他「守財奴」。

我家的情形與趙家迥然不同。我的家人常穿絲綢和皮毛。出門有時步行有時坐轎。可能我家是受了都市的影響，因爲我家在城裏做生意。在教育方面，蔣、趙兩家尤其不同。趙家和蔣家一樣也沒有出過一個有功名的人。但趙家有錢，人們認爲趙家應該讓他們的子弟上學，俾使其社會地位提高，但事實並未如此。就以辦私塾的趙先生論，也祇讀了兩年書。趙家有一個孩子對我說，他爹認爲花錢念書沒有意

義。他自己也不喜歡念書。

以上所述並不代表趙家無意爭取社會地位，祇是他們爭取的方法不同而已。他們的房舍在附近是最漂亮的。房子蓋好後又花了很多錢修了一個祖先堂，畫棟雕樑，美侖美奐。整個房子用風火墻圍起來。墻與房子中間是一片大院子，地上鋪着灰磚。在中國的鄉間，無論是當時或是以後，我都沒有見過像趙家那樣濶氣的房子。

趙、蔣兩家雖然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懸殊，但是後來却成了親家，因爲辦私塾的那位趙先生的女兒嫁給我的哥哥。這段姻緣以後我再敍述。

我和哥哥在趙家私塾讀了兩年，二伯又把我們轉到我家東方約二里處的鄧家私塾。那裡的老師是我們蔣家的族人。盡管他屢試不第，但却文名藉藉。二伯爲什麼給我們換私塾，沒有告訴我們，但我想是因爲蔣老師比熊老師好的原故。

鄧家私塾的主人也很有錢。他的家財既非來自繼承也非出自田地，而是來自他家附近的煤礦。盡管他有礦產，但他却沒有什麼社會地位，因爲當時人們看不起工商界，特別是開採煤礦的。但鄧先生却有他的想法，他認爲可以把開礦和種田兩者混在一起，這樣就可以提高他的社會地位了。他把錢盡量買地，給後人建了一棟大房子。當我到鄧家時，我發現祇有鄧先生夫婦和幾名長工住在那兒。據我所知，他是沒有兒子的。他是否有女兒，我就不清楚了。卽使有我也從未見過，事實上我也不應該看見。房多人少，因此，他的房子一半做了私塾。

其他學生是從老遠地方來的，年齡也比我和哥哥大。蔣老師認爲對二伯要特別負責。第一，因爲我們都姓蔣，是同族；第二，他是二伯推薦的；第三，我和哥哥是學堂中最年幼的。蔣老師不僅是我們授業的嚴師，也是嚴厲管束我們行爲的監護人。他把我們安置在隔壁，我們進出一定都要路過他的房子。

趙家私塾兩年加上鄧家私塾的兩年，我已能背誦五經中的四種，祇有易經還不曾讀。另外還要背一些其他詩文。我讀過宋人司馬光的資治通鑑。進而我要自己作文甚至作詩。二伯不時到私塾來，對我進步情形至感欣慰。他越發相信我能求得功名成爲一個大人物。

在鄧家私塾我大部分時間都用在背誦經書上。雖然老師逐字予以講解，但以我當時的年齡來說，實在無法明瞭其中眞意。然而，背誦並不太難，每種經書都有它特殊的格調和字彙，我可以一個一個去記。除了新課，舊書也要不斷溫習。有時下午我要拿着書到老師那裏，他可以隨意選出一段要我背。

另一門功課是作文。爲了作文，我要背很多前人的文章。我的作文題都與四書和歷史有關。如果題目是與四書有關的，我就要闡明聖人的原意。如果是與歷史有關的，我就要闡明我對那位歷史人物的觀點。這兩種作文方式我都作得不錯。老師有時會把我的作文讀給年長的學生們聽，要他們向我學習。

第三種功課是習字。蔣老師在這方面不太行，因爲他自己的字寫得不太好。但二伯的字在附近却是素負盛名的。每次他到學堂都要看我練字，並指出某處運筆錯誤。他對握管運筆之道解說甚詳。有時也選些過去老師所寫的字給我當字帖。他把這些字帖裱糊得很精美。至於他的解釋，我覺得很不切實際。

鄧家私塾與其他私塾一樣，沒有運動和遊戲。人們認爲遊戲有害於讀書。換句話說，遊戲和讀書二者是不能並存的。某日有位客人來拜訪蔣老師，晤談甚久，我和哥哥就私下下起棋來。我們教室有一扇窗子正好對着竹林。竹林與窗子之間是一條小道，老師常從那兒過。我和哥哥把窗子用紙擋起來，窗角留個小洞，俾能看到窗外。出人意料的，客人還在房裏，蔣老師竟到我們的窗下，他發現我們正在走棋。他回到房裏立刻把我們叫去。他一問不問就說：「你們是要挨板子還是要罰跪；」我哥哥比我勇敢；他選擇挨板子。可能他認爲短時痛苦比長期受罪好。我自願罰跪。老師打哥哥時幾乎把板子都打斷了才罷手，我在地上不曉得跪了多久。我在鄧家私塾念了兩年，祇受過這一次罰。

有時老師回家，期間往往是兩天。這兩天我們可以盡情的玩。遇此情形，我大部分時間都消磨在別的孩子們的房間裏。聽他們講故事。故事內容大致如下：

有一次，有一個和我們一樣的私塾，老師不在，學生們決定報復私塾主人一下。因爲學生們希望有錢的主人常供給他們一些鷄鴨魚肉之類的好菜，但是主人却從不大方的供給他們。於是，學生們決定自己想辦法。到夜間，他們把老師的蚊帳當網，到塘裏去撈魚。他們撈到很多肥美的鮮魚，飽餐一頓。自此以後，他們就經常的來這一手。

另外一個故事也和上述的差不多。老師不在，學生們決定偸附近地主的一隻羊。這個計畫執行的非常成功。他們把羊牽到私塾宰掉。正好這時候羊的主人來了。爲首者立刻把羊藏在洗澡盆裏。盆裏盛上水，由一個學生坐在上面假裝洗澡。然後，爲首的學生很有禮貌的把羊主人請進來，對他說，很不巧，老師不在，問他有什麼事。羊主人說他丢了一隻羊，懷疑是學生們惡作劇。爲首學生立刻表示這是一種誣蔑，要陪他到各處去搜。待搜到浴室時，爲首的學生抱歉說有一個同學正洗澡，不便進去，但可以從窗子看看。羊主人碍於禮貌，祇好不看走了。

這些故事代表鄉間私塾中學生們的幻想。

在鄉村，有一批人我們稱之爲「寒生」，事實上他們就是叫花子。他們受過一些教育，本可當老師。但是因爲教書的人供過於求，人浮於事，因而他們失業，於是就揩那些已有職業的讀書人的油。當這種寒生到我們私塾時，蔣老師要殷勤獻茶。但他們希望至少能吃一餐飯，如果可能，還要再弄幾文錢。對付這些寒生，要不失禮義，這倒成了一種專門藝術。憑經驗，每個老師都有他們自己的一套對付方法。以蔣老師說，如果他自己已窮於應付，就叫學生幫忙。學生不必像老師那樣拘謹有禮。他們可以在古書中找一句冷僻的句子去考問寒生，或者出一副對聯要寒生對下聯。如果對方講不出或對不上，就代表

對方酗酊不文，不值敬佩，更談不到幫忙了。遇此情形，寒生只好羞憤而去。反之，如果寒生能證明他確實有眞才實學，蔣老師就要招待他飯，還可能送他一塊銀元當程儀。

像蔣老師那樣的人，每年可收入三十元學費。此數約等於鄉間普通工人五倍的收入。如果學生考中秀才，老師還可能得到十至二十元的謝禮。另一方面，他的聲望也可因此提高，不愁將來沒人請他當老師。

在鄧家私塾那段時日中，我和哥哥每年都放約二十天年假和一個半月暑假。回到家中，繼母照看我們。她在未嫁父親之前是個寡婦。出人意料的，她對我們照顧的無微不至。她雖嚴厲，但從未責罵過我們；她用說服的方法使我們改過。有時我們不聽話，她使我們自慚行穢。

我前面已經談到繼母對那位姓賀的英雄的看法。姓賀的英雄若干年後變成了神仙。我在鄉村讀書時，她對宗教並無偏愛。她祇是一個好主婦、好母親。

我還記得有一年過年，她所安排的拜年次序。先是到我生母家然後再到她自已家。她頗懂先後大小。她訓示我和哥哥要尊敬我母家的人。每年都送禮，禮也很重。每年拜年我和哥哥都坐轎，這並不是因爲我們走不動，目的是表示外婆家和我們蔣家的崇高社會地位。每次繼母都對轎伕仔細叮嚀。有一次，轎伕把我們送到熊家，告訴熊家下午再來接我們，然後又回家去。這種舉措都是深具含義的。因爲轎伕如果等在熊家，熊家就要備飯款待他們。如果他們當天不去接我們回來，熊家又要準備我們的食宿。在繼母的安排下我們依禮到母親娘家拜了年，但又沒有增加他們的負擔。

可是當我們到繼母娘家拜年時情形就不同了。我們坐轎去，轎伕整個下午都等在那裏。她曉得她家有錢招待我們和轎伕。湖南人的親切和體貼，繼母可以說表現得無遺了。

繼母與他的先夫沒有孩子，嫁過來後生了一個女兒，不幸於三歲時夭折。這可能是她日後篤信宗教

的原因。女兒夭折是她人生中的一場悲劇，改變了她的人生觀。

在鄉下念書只有一個目的：考中後去做官。這種考試沒有其它用途。它祇給青年人指出一條路：學而優則仕。教育的目的是作古文。鄉村私塾讀了五年，我仍然不會寫一封報告起居的家信，但我却能作詞藻豐富的文章。至於古文的內容，不論是哲學的、倫理的或是歷史的，我都是一知半解。鄉村的老師對於古文的內容並不計較。

中國舊社會使很多讀書人成名。這並不是舊社會的教育制度所使然，相反的，這正是不重視教育制度的結果。中國舊社會的讀書人利用考試求取功名，再以功名換取官位。為官期間，他們在坎坷旅途上體驗人生，吸取經驗。另一方面視環境許可及個人的興趣，再去讀書思考。到了晚年，他們的書讀通了，閱歷深了，思考成熟了。有的適時成為名副其實的飽學之士，有的成為眞正偉大的政治家。

第四章　新學校、新世界（一九〇五—一九〇六）

一九〇四到一九〇五年爆發了日俄戰爭。彼時住在邵陽鄉下的我們對戰爭毫無所知，至於戰爭的結果，就更不必提了。一九〇五年春，二伯從城裏回來，外表很嚴肅，好像發生了什麼大事似的。後來，有一天他對我和哥哥說：「皇上已經決定廢科舉，再繼續讀舊式學堂已經沒用了。以後你們一定要進城裏的新學校」

十九世紀末和廿世紀初期日本的崛起使中國政府和人民大感吃驚。在此以前中國人稱日本人是「小日本」，話中含有不屑之意。何以如此，至今我仍不解。有些中國讀書人稱日本人爲「倭寇」，因爲過去日本人曾經結夥刼掠過我國的沿海各地。一八九五年日本戰勝中國，全國震驚。知識份子開始自問：日本何以能够如此？大部分人（雖然也有少數例外）都認爲是明治維新的結果。

因此，一八九五年後，在中國產生一種維新的潮流和政治運動。一九〇〇年的拳匪之亂，是維新運動的一股逆流，欲將沒有主見的執政者拖到最保守的一方而已。待一九〇五年日本戰勝俄國，維新之議已成不爭之事實。中國必須循着日本的成功之路去維新，去改革。其中一項最具體的措施是建立新教育制度。卽使是最反對改革的慈禧太后也同意廢除一向爲人嚮往的科學。

二伯深爲這些事煩惱。他在返家之前在城中獲悉此事，我敢說，他實在是煞費考慮。他決心採取步驟來應付這種新情況。他認爲：不管中國怎麼變，他的侄輩欲求發展祇有讀書一途。

二伯急於要我和哥哥繼續讀書，即使到距家若干里外的城裏去上學也在所不惜。因爲他的獨生子（我們稱他三堂弟）沒有念書興趣。不論他父親如何懲罰他，他仍逃學。有一次，我記得二伯把他綁在梯子上要佣人把他丢進水塘去。他放聲大哭，聲震屋宇。祖母看見他的三孫子被綁在梯子上，責問是誰幹的，要把他怎麼樣。佣人們祇好羞怯地說他們是奉二先生的命令，二先生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祖母也不再問，吩咐他們把三堂弟拉上來。釋放後，牽着他的手帶他到自己的屋子裏。對於讀書問題祖母和二伯他們的態度是一致的，都訓戒三堂弟要用功。但，他們的訓戒和懲罰都沒有用，三堂弟就是不念。

一九〇五年多，二伯回城裏。他請一位遠房表兄於第二年春天把我和哥哥送到省城長沙。這位先生我叫他「藍（Lang）三伯」，但他與我家究竟是什麼關係我却不知道。他比二伯年紀大，在我家店舖裏做過賬房，爲人非常可靠。

一九〇六年後不久，也就是光緒三十二年，家兄和我跟藍三伯去長沙。雖然我對祖母等家人依依不捨，但也願意到大都市去見識見識。都市對我們並不太生疏，因爲二伯和家父常去城裏買些東西回來。

我們徒步赴長沙。因爲我沒有出過遠門，所以走起來感到很吃力。藍三伯比我們走得快些。他不時把糕餅放在路邊引我們到前面去拾取。從小官道開始，不久就上了大官道。大官道上行人很多，還有些轎子，這種情景我們過去從未見過。路邊許多大建築也令我感到驚異。有一個地方，一片廣濶的稻田裏有一叢小樹。野鳥飛進飛出。藍三伯告訴我們那叢樹林裏有神。如果有人去傷害林中的鳥，就會觸怒了神，神會懲罰他，所以沒有人敢去林中捉鳥。就這件事論，迷信比警察的力量還大。

沿大官道，每隔三四里就有一個市集。其中有旅社、藥舖和雜貨舖。我們每天平均走二十里。每到有店舖的地方就停下來休息吃茶。中午吃飯晚上住宿。

當我們到湘鄉時，我以爲是到了外國，因爲那裏的人說話我不太懂。湘鄉的風景很美。

有一段路我們沿着一條小河行走，看見河邊有個大輪盤，運水灌田。又經過一座很好看的橋，橋有九孔。藍三伯說在未建橋前行人是用渡船過河。因爲水流湍急，渡船常生意外，人常被淹死。一位貧窮的大善士立志要修一座橋。他募了許多年的款，橋才修成。橋邊有座石碑，上面刻着修橋經過及善士們的大名。若干年後，大官道成了行駛汽車的公路，橋上也改行汽車了。

過了湘鄉，我們看到曾國藩故居。曾是湖南傑出的人物，也是中國十九世紀最負盛名的政治家。他的故居雖然距離大道有一段距離，但却可以淸楚看到。房子雖然很大，但並非是沿途最大的。

過湘鄉抵湘潭。湘潭的語言我認爲和邵陽的差不多。在湘潭有一家邵陽人開的鐵器店，我家和它有過生意上的來往。藍三伯帶我們到那家鐵器店做禮貌上拜會。店主奉茶並給我們每人一包檳榔。檳榔是用紅紙包裹，我感到很新鮮，於是打開來吃，誰知又辣又熱，把嘴弄得非常難過。湘潭人對嚼檳榔很感興趣，長沙人亦復如此。若干年後，我發現越南人也好此道。可能湘潭長沙兩地的人在某個時期與越南人有某種關係。

在長沙我們住旅館。這裏的旅館和邵陽的完全不同。二伯已來長沙接我們。第二天他帶我和哥哥去明德小學，該校分小學和中學兩部分。由於鄉下學堂和都市學校的功課不同，所以我們過去學的都不算數，重新從小學的最低年級開始。

明德與鄧家學堂和趙家學堂之不同，有如老虎與貓。小學部約有四百人，建築現代化，木板鋪地，還有玻璃窗。我那班有三十多名學生。我們着制服。進敎室、宿舍須先排成像士兵的行列。我們有體操課。此外，還有遊戲的時間。

所學的科目是國文、數學、修身、圖畫和自然。禮拜六只有上午有課。星期日全天放假，我們可以到城裏去遊玩。我們逛公園、逛廟、爬城牆、到河邊逛碼頭。有時我們過河去爬有名的嶽麓山，山上有

歷史上有名的嶽麓書院。

晚間下課後，我們仍要排隊到禮堂聽代校長訓話。訓話的內容都是要我們愛國。他强調中國是文明大國，但被東西列强壓迫。所以他要年輕的一代努力讀書，吸收新知識，俾使中國富强。我認爲他的話又新又刺激。有時他也會念一封校長的來信。彼時校長正奔波於平滬之間爲學校募款。校長的信同樣的也是鼓勵我們愛國。

後來，我獲悉這所學校和國父孫逸仙先生所領導的革命有關係。明德是一所充滿革命氣息的學校。中學部學生很少。有人背地告訴我，那不是一所眞正學校，是革命份子的秘密機構。但是，却有好幾個皇上任命的湖南高級官員和地方紳耆都愛護那所學校。

星期天我們體操老師或課外活動老師有時命我們穿上漂亮的制服整隊穿過大街。我覺得我好像是一名小兵上戰場。同學們在校內有時會談到自由、平等，有時也攻擊傳統的管敎方式。不曉得是什麼原故，有一次有些學生示威，反對課外活動指導老師。爲了鎭壓那些參加者，代校長把爲首的人開除了。

長沙和明德使我進入一個新世界。革命令人感到迷惑、浪漫、興奮。我沒有聽人談論過國父的具體革命計畫，我祇對未來的理想世界有個基本的想法。祇有一件事我是肯定的：所有中國靑年都應該努力用功，以備將來爲國犧牲。

在年長一些的學生們中，特別是在當時毛澤東就讀的省立師範中，流行一句口號：「中國若是德意志，湖南定爲普魯士。」普魯士主義的眞意何在沒有人能够眞正了然。那句口號的意思祇是表示在新中國建立的過程中，湖南人一定要擔任重要角色。極端的保守主義轉變成極端的激進主義。

省會長沙是湖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一九〇六年，受外國影響已經很深。城內許多商店陳列着五光十色的外國貨，大部分是日本貨。店主不以出售敵貨爲恥，反而用巨大廣告牌標明他們有頭等的外

國貨。陳列貨物的橱窗令人目眩。其中陳列各式鐘錶、煤油燈、玻璃器皿和膠鞋。膠鞋可以穿在中國鞋外面，有時也可代替拖鞋使用。光亮、柔軟、舒適而且絕對防水。當時的年輕人幾乎每人一雙。其他的商店出售瓶裝飲料。無論老少，都對汽水感到神奇而可口。

人們開始帶懷錶，錶上綴着一條金錶鍊。某些開風氣之先的人甚至抽起紙烟。小店用桐油燈，但大商店已改用煤油燈以廣招來。

我看到長沙已有好幾所教堂；天主教的、基督教的。教士們所到之處，定然引起人們的側目。他們的服飾、頭髮皮膚和身材均能引起人們的好奇心。

大型汽輪從上海漢口開來長沙。看起來好似水上行宮。

我和哥哥在靖港我家的店舖中度過一九〇六年暑假。靖港在長沙北二十里，是一個商鎭，並非縣府所在地，但却相當大。靖港位於一條小河和湘江滙合處。湘江是長江一條巨大支流。那條小河的名字叫什麼我不知道，鎭上人都直叫它「河」。靖港鎭較低的一頭有座大廟，供着河神。每屆新年都要唱戲。沿河有一條一里長的街，街上有商店。街後是民房和倉庫。

我和家兄抵靖港時，出乎意料的，發現我家原來的一家店舖已經變成兩家了。一家在老地方，另一家設在鎭上的新地區。祖父開設了老店，二伯和家父又開設了新店。店中主要營業項目是鐵器。在許多的貨物中我看到有很多光亮機製釘子和鐵絲。外商的勢力也已滲入靖港，只是不及長沙顯著而已。

有一爿店的後面堆着大批鐵器，備批發之用。從江西湖北來的船，往返不斷。他們並非全來買外國貨，因爲外國貨他們可以在鄰近的九江、漢口去買。家父和二伯殷勤招待那些船主，和他們做生意。每次生意可能達到二三百元銀元。一次批發生意可以抵得十或二十天的零售生意。

小河的上游，我家族人開了一家鐵工廠，鑄造水壺等厨房用具。我沒有去過鐵工廠，但別人告訴我

說，廠是設在小河邊上，因而廠中所用材料運輸很便利。鐵工廠由一位遠房叔叔替我們經營。

除了鐵器外，我家的兩個店舖還經營鴉片生意。一九〇六年和民國初年，當袁世凱執政時，鴉片可以公開買賣。據說鴉片較鐵器的利錢厚得多。惟一的壞處就是稅太重。

二伯和家父是店東。大伯兒子，我的二堂兄有時也到店裏，他是少東家。商店是家父和兩位伯父的公產。獲利由三股均分。我和哥哥的學費由店中供給。就我所知，大伯和二伯對我們的學費就從未抱怨過。不過，若干年後，二伯母倒是發過牢騷，說我們這一股多沾了利益，用店中的錢供自己的孩子們讀書。家父聽到後，反應很堅決：他要我們輟學到店裏去當學徒學。二伯的反應也很堅決：他要二伯母對此不要妄議。如果必要，他甚至會把他的私田賣掉，供兩個侄子讀書。我和哥哥很幸運，因爲二伯的決定終於爲大家所接受。

雖然我沒有做學徒，但對做生意的事却蠻有興趣。我家每個店都有店東和少東，另外還有六七個夥計。地位最高的是帳房先生，最低的是新學徒。我看店員們做生意，每天傍晚打烊後我幫他們數錢算賬。我對算盤很感興趣。當時各家商店都用算盤算賬。經過一個暑假，我已把珠算練得很熟，居然可以和那些年輕學徒們比賽。加減很容易學，乘除則需較長時間練習。

我們住在店中時，父親和二伯都不給我們零用錢，店中年齡較大的夥計爲了滿足我們的慾望，有時公開給我們幾枚銅板，讓我們上街去買零食。

在店中大家在一起吃飯。店中所有的人圍坐一桌吃同樣的飯菜。伙食比我們鄉間的要好些。城裏賺錢比鄉間容易。中國人一向很儉樸，鄉下農家較城中商人尤甚。

宗湘（Chung. Hsiang）叔叔常從他所經營的鐵工廠到靖港來。他比二伯和家父年輕，外表也很帥。有一天他帶我們去看他的朋友。他的朋友是一家茶館的女老板。可能就是個妓女。她的房舍很華麗，

陳設也很雅緻。我們進去後，她殷勤招待，奉茶拿瓜子。她問我多大年紀，又問我念書情形。

過一會兒，她女兒回來了。她年約十歲，穿着彩色鮮艷的繡花衣服。在家鄉，這是我第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和女孩子坐在一起。我手足無措，說不出話來。那個女孩子也侷促不安。午飯時，我們兩人都沒有開口。飯後大人到別的地方去，房中祇賸下我們兩個人。這更令人尷尬。我希望我能擁抱她，但却一動也不敢動。

長沙和靖港顯然有些不同。長沙大，有許多學校，有護衛森嚴的大官，有很多廟宇。政治對人們的影響如何我無從知道，從表面看，他們唯一有興趣的似乎就是做生意。但自從革命份子震驚了地方紳耆和官員後，一般百姓也不能完全漠不關心了。再看靖港，它祇是一個鎭，沒有政府機構，祇有一座廟。鎭上是否有學校，我記不得了，因爲我從未見到過。如果有，二伯們也許可能把我們留在靖港上學了。不論長沙人對政治如何，但靖港的商人是漠不關心的。

至於談到外國影響，靖港遠不及長沙。全部售外國貨的店舖在靖港是沒有的。靖港人不像長沙人那樣愛用外國貨。靖港教堂沒有外國人，是由中國人主持的。我還記得某次有一個年青外國人，帶着一個工人，背着一個大口袋，沿途拋擲香烟，好奇的人拾起烟盒，彼此爭論烟中是否有毒。有些人打開烟盒試抽其中的香烟。靖港吸烟的人倒不少，但都是吸水烟沒有吸香烟的。

當時幣制不統一，所用通貨種類很多。最主要的是傳統用的制錢。銅製，中間有方孔，上面刻着鑄造時期皇帝的名字和「通寶」二字（意爲法定貨幣）。制錢中間的方孔，可以穿一根繩子，把許多制錢串在一起。平常都是每千個一串，中間加個標籤，注明數目。較新的錢幣是銅板，當中沒有方孔，較制錢重，每枚價值可當制錢十枚。

另外還有許多銀幣，一角，兩角和一元的。使用銀元時，對方要把銀元摔到桌子上，看看是否啞板

。（銀幣中間如有破綻或成份不足，摔時所發聲音不清脆，俗稱「啞板」，其價值低於同類之銀幣。——譯者。）這種銀幣是在廣東、江蘇、湖北等地鑄造的。雖然上面鑄着一角、兩角和一元的字樣以代表它的價值，但在使用時其市場價值却與幣面所標的價值時有出入。

另一種通行的貨幣是純銀，有時鑄成馬蹄形，有的鑄成銀條。此種貨幣於使用時要仔細秤它的重量。

到後來，才使用紙幣。紙幣是兩湖總督指定漢口一家銀號發行的。長沙有兩家民營銀號也發行小額紙幣。年輕學徒在店中祇可收制錢和銅板，有經驗的生意人才能收銀幣和銀子，值得注意的是：盡管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但却沒有良好的貨幣制度。

一九〇六年夏，二伯對我們又改變了教育計畫。他認爲明德虛有其表。他不喜歡大班制。他認爲明德的英、術兩科不够。他不知從什麼地方聽來，湘潭長老教會學校辦的很好。對他說，所謂新學校，主要的就是英術兩科。因爲這兩科都起源於西方，所以他以爲西方人辦的學校一定較國人辦的學校好。我想這是二伯改變計畫的主因。一九〇六年秋，我們進了湘潭長老教會學校（益智中學），不再返長沙的明德。

第五章　教會學校時期（一九〇六——一九一一）

基督教、天主教、美國人和歐洲人對中國近代發展的影響如何，祇有歷史學家經過仔細研究後才能定論。十六世紀，天主教神父對中國當時知識份子影響極深，特別是在數學、天文、地理、造兵等方面。他們認爲中國知識份子是統治階級，所以他們很聰明的把知識份子當作傳教的基本對象。教士們得到許多有學問的人支持，傳教工作進行得很順利。直至十七世紀末滿淸政府和梵蒂岡間在觀念上有了衝突爲止。自此，教會和西方人在中國的影響力漸走下坡。到了二十世紀初，中國知識份子幾乎將過去傳教士對中國的貢獻完全忘記。

我和哥哥於一九〇六年秋入湘潭長老會學校，當時根本沒有注意到歷史背景和未來的結果。二伯送我們進教會學校的想法很簡單，主要是要我們學英語、數學和一些其它的課程。他認爲這些課程可以在未來的新中國謀生。他已預見新中國即將降生，雖然好壞尙不可預知。他囑咐我們努力讀書，但對教士所講的上帝和耶穌要留心。他對教會並未表示激烈反對，但他却使我們感到傳教在中國是沒有必要的，因爲教義實在比不上中國文化。

林格爾（William H. Lingle）夫婦在會客室內接待我們三人。（因爲二伯護送我們）林格爾先生有六尺多高，絡腮鬍子，相貌很怪。由於我自覺沒有什麼錯，所以也不怕他。林格爾夫人頭髮棕色，面部紅潤，面帶笑容。雖然他們的中國話講的不太高明，但我們還是說中國話。會客室中陳設一些中國木

器，使我不禁以為這些美國人已經有一部分被中國同化了。

林格爾夫人問了我們一些問題。他給我一本精美的書，上面印着圖畫。有樹、有花也有鳥，還有很大的字。書上印着一個英文字 "Apple" 字旁邊有一株蘋果樹。我不用看圖就能識字。尤其「A」字更引起我的興趣，因為「A」字就像一個村婦肩上背着兩根長木棍一樣。我和她談了些什麼如今已經記不得了。最後，林格爾夫人說我和哥哥可以入學。

長老會在湘潭當時有一所男校，一所女校，一所教堂和一家醫院。男校名「益智」，是一所二樓建築，有地板和玻璃窗子。教室、宿舍和禮堂都擠在一個樓裏。在當時，有三至四十名學生。

林格爾夫婦於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停止後不久被長老會派到山東，後來又轉往廣東，再從廣東轉到湖南。林格爾先生回憶他初到湖南時還有老百姓向他扔垃圾，表示仇恨。

益智教數學的老師是中國人，他從山東長老會辦的基督書院畢業。在他的教導下我在益智學了五年算術、代數和幾何。這些科目我感到又容易又有趣。

英語開始是林格爾先生教，後來改由林格爾夫人教。開始時我和另外四五個學生一起學。第一個字我學的是「Book」，念起來並不困難。可是當時林格爾先生說：「一本書我們說 One book，兩本書我們就要說 Two books。」我問他為什麼後者 Book 要加個 s。他說：「那代表複數。」我感到我們說兩本書時已經在 Book 上加了一個 Two 字，那已代表複數，所以我認為實在沒有再加 s 來表示多數的必要。他說：「加 s 是規定和習慣，是無法變更的。」後來我又發現並非複數都加「s」，有些字後面附加其他字尾，也有的名詞和中國字一樣，在表示複數時根本不附加字尾。

動詞比名詞更難。"I go" "You go" 不用說很合理。"He goes" 就顯得不合理。此外，我又讀到 "I went" "I have gone" "I shall go" "I will go" "I am going" "I was going" 等。

我當時想，如果英語的結構和中國話一樣，那該多好。但，經過努力學習，也就不感困難了。不論懂不懂，我都像背古文一樣，把單字和文法牢牢記住。

林格爾先生也教我們聖經。這門課給我帶來最大災難。主要的是中文譯得不好。我想聖經怎麼能用這種粗鄙的文字？因此我對創世紀中所說的以及耶穌生死的記載也都大打折扣。對聖經課，我從不發問，也從不請老師講解。我認爲：不論我喜歡不喜歡我必須努力用功使考試及格。聖經課與英語數學不同，後兩者我必須要弄明白，要精通。

星期天上主日學和進教堂比上聖經課還令我討厭。在教堂坐在硬板凳上身體精神均感痛苦。我能在益智的五年漫長歲月中在教堂裏保持安靜，實在是家庭教育和鄉村教育訓練我尊敬老師和長輩的結果。

我們國文老師是中國人，教我們國語、作文和歷史。他的教授法和明德國文老師類似。這些課程我既不討厭也不喜歡。這裏沒有强迫記憶的課程。

益智的生活和鄉村學堂及明德的生活迥不相同。益智每班祇有五至六人，不像明德每班有三十多人。我們不穿制服，也沒有軍訓。固定的課外活動也沒有。學校前有一片廣場，下課後我們可以去遊戲。至於做什麼遊戲，如何遊戲，林格爾夫婦是不管的。後來，我們弄到一個足球，大家亂踢一通。

週六和星期天下午我們可以去湘潭。湘潭的商業區在城外，商店設在湘江左岸的一條長街上。縣政府在城裏，是一座龐大的建築。湘潭是個商業都市，較靖港大，但不及長沙。就政治和文化的重要性說，湘潭似乎介於靖港和長沙之間。城內可看的東西很少。我們沿大街漫步，在人群中擠來擠去，張望店舖和他們的招牌。有時我們也到小店去吃麵。我和哥哥常到我們家鄉人開的鐵器舖，在那裏可以吃到檳榔。

離學校不遠有一片菓樹園，我們可以給園主幾個銅板吃上一個够。有時我們還買幾口袋水菓帶回學

校來吃。

明德熱衷於愛國主義，益智沒有政治氣氛，但林格爾夫婦在學生壓迫下，也祇好從上海訂了兩份報紙。林格爾夫婦不知道那兩份報紙正是國民黨的宣傳品。國文老師對社論非常推崇。他把其中精彩部分用紅筆圈點起來。其中有一些我讀過，但我委實不解其中含義。這些報紙是在租界地印的，也就是說是在外國統治的領土上印刷的。它們雖不是在大清帝國的領土內印刷，但是大清郵局却把它們按時送到學校來。滿清帝國，在理論上雖然是專制的，但却未學會近代獨裁制度的某些統治方法。儘管老師們不批評朝政，但革命的政治理論却經過報紙傳進學校。

益智也不能獨自置身於學生騷亂之外。國文老師住在學生宿舍附近，人們一向以為他熄燈後按時就寢。有一天他向林格爾夫人報告，說他在樓頂上抓到一批賭博的學生。林格爾夫人很生氣。她把學生們集合到大教室。首先請王老師報告經過。接着她問學生：「你們自己怎麼解釋？」一個參與其事的學生站起來回答，他的音調措詞非常客氣而有禮貌，他說：「這件事完全是王老師虛構的。」依他的說法，是王老師和一些學生同賭，王老師詐賭，學生們不服，才鬧出這場是非。另外一些學生也出來作證。林格爾夫人感到迷惑、吃驚。她不知信那一方面好。她把學生開除，宣佈此事完結。我當時並未親睹那幕鬧劇，事後才聽人說王老師曾經道出事實眞象。

學生們輪流擔任勤務。有一次，正當我輪值時，有些學生抱怨說飯未煮熟。我到廚房要廚子們重新再煮，廚子們到飯廳把飯端走。不一會兒，他們又把飯端出來，有些學生說，廚子根本沒有重煮。他們說，廚子是欺侮小孩子們年輕，大家絕不能饒他們。學生們不約而同的把碗碟摔到地上，弄得滿地一塌糊塗。

林格爾夫人要學生們賠。他們不賠，雙方僵持起來，校中一位老師出來打圓場，建議全體老師代賠

，衝突才算解決。

當時湘潭和長沙的學校常起各種風潮。我們的都很小，但省會長沙的風潮往往是很嚴重的。回想當時的情形，我敢說各校學潮一校比一校鬧的兇。

一九〇七年，長老會在舊校舍附近的廣場上，爲益智建了一棟新樓，比舊的大得多，新校舍可容六至七十名學生。湘潭長老會在其他方面也很有成就。一位名叫凱卜勒（Dr. Kepler）的新牧師被派到敎會來。醫院裏有兩位美國醫生負責診斷，他們是杜克爾（Tooker）和溫德堡（Vanderburgh）。星期日林格爾先生到遠在二十里外的湘鄉去傳敎，午餐後再回湘潭。我敢說林格爾夫婦對於傳敎實在是不遺餘力的。

賭博滑稽劇過後，林格爾夫人認爲王老師已在學生面前失盡面子，無法再繼續爲人師表。當時適逢二伯到學校去，她請二伯爲她推薦一位中文老師。二伯立刻提出鄧家學堂的蔣老師。從某方面看，益智是新舊兼容的，因爲蔣老師本人無論從那方面看都是舊時代的人物。

不久，林格爾夫人敎我英語。她敎了三年，文法採用的是納氏文法。這本文法係英國人在印度學校使用的課本。在讀本方面，她選用「伊爾文見聞錄」。她對我進步神速至感愉快，我對她的耐心敎導也感高興。

有一次，林格爾夫人對我說：「我希望桃樂絲的記憶能和你一樣就好了」。桃樂絲是她的女兒，年齡與我相若。

英語之外，她也敎我們西洋史。採用課本是麥爾斯（Myers）所著「通史」的中譯本，是山西基督書院一批學者譯的。該書除了使我感到興趣外，更爲我開闢了一個新天地。我從書中學到希臘、羅馬、中世紀、文藝復興、宗教革命、以及法國和美國的大革命等等。在當時，我們中國還沒有像麥氏通史那

樣的歷史課本。雖然我花了很多時間去讀中國歷史，但我所知的祇是星星點點，不能窺其全豹。讀了麥氏通史之後，我認爲我應該研究整個西方世界的進步情形。美國和法國革命也深深引起我的興趣。其中祇有一件事令我困惑不解：爲什麼革命進行了那麼久，遇到那麼多困難？革命潮流似乎是不可抗的，無論美法，都是如此。

念書之外，同學和我常作白日夢，其中最重要的一種是救中國。我們幻想許多使中國富强的方法。爲了神聖的救國使命我們還把工作分配好。就回憶所及，我常任軍事領袖，目的是訓練軍隊打敗入侵的外國人。其他同學有的從事教育，有的從事財政，有的從事農業。

我的寒假有時是在靖港店舖中度過，但大部分是在校中度過。至於暑假，我要隔年返鄉村老家，隔年住在店中。

在鄉間我發現了某些變化。在我離家前，繼母已替較我小一歲的妹妹裹脚。裹脚時祖母在旁監督，要繼母盡量裹緊。她總是對妹妹說：「脚裹不好，嫁不出去。」後來，當我回家過暑假時，我發現繼母對此工作已經馬虎。實際上，她已完全不管了。比我妹妹年紀小的堂妹們一個都沒有開始裹。兩個年紀比我大的堂姐她們在此變化未來之前已經裹脚，爲此她們終身受苦。我家因爲有人時常往來城市，所以較其他鄉人變化得早，但是，不到幾年整個鄉村也都改變了。這種變化並非基於皇帝的法令，而是時代風氣所使然。

當我在鄉村度假時，我看到有一個人穿一身白制服，戴一頂新式草帽，騎馬到我家來。他的外表令鄉人側目，羨慕不止。他是二伯母的堂兄弟，剛從日本留學回來。當時我家的人不管日本叫「日本」，稱日本爲「東洋」。那時我常自問：「東洋」之外是否還有「西洋」？後來我獲悉眞有一個「西洋」，距我們很遠很遠。當時我就發誓：如果在「東洋」念書就能受到如此的尊敬，將來我一定要到「西洋」

去念書。

一九○七年秋某日，正當我們遊戲時，凱卜勒先生告訴我們：「慈禧和光緒皇帝都已去世了。」我自言自語的說：「這是重大消息。」但它究竟重大到什麼程度我却不知道。

一九○八或是一九○九年夏，我在靖港和家人及一些學徒把辮子剪掉了。辮子是滿州人逼着漢人留的。留辮子就代表忠於滿族。滿清末年，它一變而成為奴隸的象徵。我必須說明，在當時我對辮子的種種實在無甚了解。我剪辮子祇是想表示要做個自由人而已。

一九一一年春，我在益智染病，好幾個星期後才康復。患病時，林格爾夫人像護士一樣照看我。她每天來給我量體溫，送湯，送易消化的食品。雖然我在夏季到來前早已痊癒，她仍要我給二伯寫信，告訴他我應該陪她到長江中游的牯嶺去避暑，藉以休養。她說為了恢復健康我應該到天氣較涼的地方去過夏。二伯答應了。

在當時，牯嶺是教士們在長江沿岸的避暑勝地。那裏有許多教會活動，如青年會、救世軍等。當時最負盛名的牧師是丁麗美（Ting Li-mei），山東人，極有口才。林格爾夫人安排我和丁牧師單獨會晤。在青年會的各項聚會中，有很多人去傳教。我特別記得布克曼（Brockman）和羅勃森（Robetson）兩先生。他們聯合證道。我當時感到很大壓力，但我却沒有受洗。

是年夏，我和馬丁（Martin）小姐交換課程。她和林格爾夫人住在同一房子裏，是一位教會工作者。她教我英語，我幫助他學中文。事實上，我們並沒有研究什麼。我們祇是討論一些普通事物。討論時，我們不時談到革命問題。林格爾夫人對此也極有興趣，往往和我們在一起談。她認為革命很危險，往往建設少破壞多。她曉得中國南方的革命風氣比北方重，但她大膽的說：「在中國歷史上，南方從未戰勝過北方。」我無法反對她的見解。但我們對她和馬丁小姐說，中國實在需要革命，而且革命就要來

到，同時結果一定會成功。這僅是一個武斷的說法，當時我是否提出合理的論證，如今已記不得了。我和她倆雖然辯論過這個問題但並不認眞。可能我祇是爲辯論而辯論。是年夏季我令林格爾夫人很失望，因爲我始終拒絕受洗成爲一個基督徒。

一九一一年秋學校開學不久，我們聽說兩湖總督衙門所在地的武昌已經發生革命。我們獲悉滿淸官吏逃走，革命份子兵不刃血而輕取了武昌和漢口。我們在湘潭所聽到的實在是過份簡單了。事實上，革命份子雖然勝利，但也付出了代價。

約一週後，長沙也起了一次騷動。接着，校中謠傳革命將波及到湘潭。益智的學生有時也談革命，但我們承認我們不了解革命是什麼東西。我們要到城裏親眼去看看革命的眞象。當我們要到大街時，正好看到一群暴民從城南縣府所在地衝到城北的大街。滿街都是人，從南向北衝。不到十分鐘，人群經過我們站的地方。我們決心跟在人群的後面，隨他們到城北去。正當此時，我們發現四週的人越來越少了，不久，就祇賸我們自己了。路不遠處，我們看到一匹死馬，我們大家上前圍觀，彼此互問：「這就是革命嗎？」我們問商店老板革命群衆怎麼樣了。他們聳聳肩表示和我們一樣也不知道。我們回到學校感到非常困惑和失望。

約一個禮拜後，林格爾夫人對學生們說，恐怕革命後要有一段混亂期間，爲了安全，他決定關閉學校。她要我們暫時回家，她也要暫返美國。這些話對我們實在是一個大打擊。當時我才十六歲，如果說參加革命，又太年輕，如果說靜止不動，又嫌太大。我當時回憶麥爾斯通史中所述的法國和美國革命。我想：難道說要我枯等七年或者甚至二十五年，靜待革命過去再讀書嗎？不，這樣不行。我想：最好的主意是隨林格爾夫人到美國去讀書，待革命過後再回中國。我認爲我的想法妙極了。

當我告訴林格爾夫人我的想法時，她問我：「你家人同意你隨我到美國去嗎？他們能供給你必需的

費用嗎？」我非常高興她這一問，因爲這說明她同意我的計畫。祇是有些支節問題尙待解決而已。我對她說，首先我要到靖港去徵求家人的同意，然後準備必需的款項，隨她赴上海。

一九一一年秋，碰巧我伯父和父親都不在店中，二堂兄主持店務。我向他提出請求，他問我需要多少錢。他的反應我也感到很高興，這無異是說明大原則他不反對。我請求他給我三百銀元。他說他將爲我設法，祇是當時店中稍有困難。四五天後，二堂兄告訴我他已籌到一百九十元，當時約合一百二十美元。我帶着一百九十元返湘潭，幾天後，我隨林格爾夫人順流而下赴上海。

抵上海後，又做赴美準備，如出國護照、衣服、船票等等。不意，這時林格爾夫人突然宣佈她改變計畫，中止返美，她要回湘潭繼續辦學校。她說她過去的看法是錯誤的，中國革命已經過去了，中國革命不會像美法革命那樣久。她對我說：「你最好跟我一起回湘潭。」

我當時想：就赴美留學的路程說，走到上海已經是一大半了。我不能回去。不論林格爾夫人回不回湘潭，我都要去美國。林格爾夫人並不想勸阻我，但她指出我帶的錢太少。不過她又說：「如果我能找到朋友借錢給你，你想你家人能還給他們嗎？」我沒有理由懷疑家人不償還這種債務。在我整個讀書過程中，家人都是盡量幫助我鼓勵我的。終於，林格爾夫人請湘潭醫院的杜克爾博士借給我大約八十美元。她又請青年會的幹事在旅途中照顧我，並在初抵美國時幫助我。於是，一九一二年元月中旬，我買了一張三等票搭乘「波斯」（Persia）輪前往美國舊金山。

我應該再補充一下在湘潭美國教會學校念書時的最後一段生活。信基督教的問題我是從未考慮過的。我當時十六歲，對基督教的教義知道的很少，而且成爲基督徒的傾向也很小。但我在湘潭參加長老會的聚會已有五年之久。凱卜勒博士、杜克爾博士、溫德堡博士，特別是林格爾夫婦，他們的熱心以及對社會福利事業的關懷，使我深受感動。於是我想一個對人類深具影響力，又能使很多教士熱心公益的宗

教必然是一種好宗教。經過這一番推理，我最後終於答應林格爾夫人受洗，這就是我做基督徒的經過。

第六章　留美初期（一九一二—一九一四）

我所乘的船，即使是在一九一二年代也是很小很舊的。三等艙內空氣齷齪，令人深感不耐。離開上海不久，我們就遇上一塲暴風雨，至少對我說那是一塲暴風雨。我暈過去，昏了多久我也不知道。鄰舖的人把我弄醒，並且給我一個橘子。橘子味很美，正好能解我的頭暈病。我發現同船的人都是廣東人。有些人和我一樣躺在床位上，有些閒逛，還有些在賭博。因爲我不懂廣東話，因此無法交談，但他們都知道我是赴美留學的，所以對我都還客氣。有一天，送給我橘子的那個人拿一張紙要我念。我告訴他那是一張滙票，數目是多少。他很高興，認爲銀行沒有騙他。

船過日本後，天氣轉好，太平洋風平浪靜，碧波萬頃。我常到三等艙艙面上去看海浪和水鳥。頭二等艙的客人從上面看下來，對三等艙的客人表示一種可憐和不屑的神情。我對他們的態度至感厭惡。

我在檀香山過了快樂的一天，首次嚐到鳳梨和蔻蔻牛奶的味道。當地人民活潑、友善、進取。所着衣服彩色很鮮艷。街道和建築都很偉大。對我說，夏威夷實在是一片樂土。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一日船抵舊金山。他們要我在三等艙裡等。不久我被招呼到甲板上面房間中去。移民局官員問我一連串的問題，話說的很快，一時聽不懂。我很着急吃驚，因爲我知道通過移民局官員的盤問與否，是我留學成敗的關鍵所在。我記得，我謹愼的考慮把名詞和動詞都置於我認爲最適當的位置，然後我對移民局官員說：「如果閣下說得慢一點，我就能夠懂。」他大笑說：「你回去吧。」

我回到大艙，等「苦力」拿行李。等了很久不見到來。最後一個廣東籍服務生對我說：「美國沒有苦力，每人都必須自己扛行李。」他的意思是說大艙中不會有挑夫來。他建議我提箱子他替我拿舖蓋。他把我從船上領到岸上，把行李放在碼頭上，說聲「再見」，他走了。

我不知道下一步應該怎麼辦，我該去什麼地方。我坐在行李上，自言自語的說：用不着着急，反正已經到美國啦！此一想法予我極大的安慰和鼓勵。尤有進者，當天正是一個晴朗的星期天。往來碼頭的人似乎都很友善。欣賞一陣風景後，一位廣東紳士走過來。他是否認識我，我不敢確定。他提起我的箱子，叫我提起行李跟他走。我們走向一輛電車。我對電車並不害怕，因爲我已在上海見過。不久，我們到了一座教堂，一位廣東牧師和我談話。經過一番不太清楚的談話，他把我帶到青年會。

在青年會，我把一切告訴一位極富同情心的幹事。我告訴他我是到美國來念書的，我沒有多少錢，我必須要找一所半工半讀的學校，以資挹注。我又說：「據林格爾夫人告訴我密蘇里派克維爾(Parkville)就有這種學校。」幹事說他曉得這所學校，他要給學校當局拍一通電報，替我請求入校許可。同時，他又命我暫時住在青年會。於是他叫一個人把我領到樓上一間屋子裡。

我被領到一個外面看起來好像鐵籠子的東西。我並未害怕，因爲我看見還有其他的人被裝在裡面。事實上，那是一架電梯。工人把我帶到一間屋子裡，對我說，他希望我能感到滿意。他又指給我洗手間的位置。

憑窗遠眺，我看到許多房子、天井、烟囪、大街、小巷。我的屋中有一桌、一椅、一床，非常簡單。我仔細檢查了屋內每件東西。床上氈子、枕頭、床單都很潔淨。我實在不曉得我應該睡在床上的那一層裡。因爲沒有人看我如何睡法，不會有人恥笑我，所以我也就釋然了。

翌日淸晨，在我下樓時我想我用不着冒不必要的危險去乘電梯。於是我從樓梯走下去。我發現我住

的房子祇是在五樓。

幹事告訴我吃早飯的地方，也告訴我閱覽室。早餐後我到街上逛逛，我照直行走，決不轉彎，以防迷路。回到青年會，到閱覽室，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看到美國報紙和雜誌。我有些看不懂，但因無事可作，也祇好看下去。

下午，第一次接待我的那位幹事告訴我，密蘇里派克維爾派克學堂已經允許我入學，如果我願意，他可以代我買車票。他實在太好，不僅幫我買票而且把我送到車上。使我大吃一驚的是他竟給我買的是頭等票。

沿途情形如何我已不記得，祇是感到風景很美。火車爬上山再下來，然後又經過一片大平原。最後車到堪薩斯城。我要在此改乘當地火車赴派克維爾。

從堪薩斯城到派克維爾很方便，只有八哩路。

到派克維爾車站，有一名高大的黑人接我。他拿起我的行李要我跟他走。他把我帶到辦公大樓，辦完註册及其他手續。我發現我還賸下十塊錢。

在派克學堂的最初幾天，都是上一些日常最簡單的課程。眞正使我吃不消的是那兒的吃飯和勞作。住校的男生要到女生飯廳去吃飯。女生的言談和擧措都使我不習慣。其他男生與女生間，均能談笑自若。我却感到很尷尬。爲了不出錯，我吃飯時從不說話。我也不敢勞駕鄰坐的女生遞給我麵包。

我的工作都是我從未做過的。我去看工作監督，他讓我午餐後去見他。午後我去見他，他似乎對我看都沒看就說：「你去騾棚，去拉一群騾子，把火車站的煤運到發電廠。」其他學生告訴我騾棚的位置。我到那裡，看到騾子。牠們又高又大，過去我從未見過。我不知道應該怎樣對付牠們，從何處下手。我繞着牠們看，但不敢碰牠們。最後有一個男生問我：「你怎麼啦？你不會趕車嗎？我來教你。」他給

我上了第一課，告訴我如何套車。

車套好了，我仍遲疑。那個男生跳上車去教我怎樣握韁繩，如何指揮騾子。我筆直的坐在車上，整個一下午，那位男同學都陪着我。我笨手笨脚的搞一陣後，他替我趕車。一點困難都沒有，我們到了火車站，靠近車廂把煤裝好。

首先是把煤從車廂中用鍬裝進騾車裡，這並不難。我決心盡快的裝。後來我發現我的手打泡了。我當時還不曉得有工作手套這種東西可以保護手。當我休息時，我才發現二月天氣很冷。工作三小時，最後終於收工了，我感到非常高興。

在工人大會堂洗個澡，我赴女生宿舍去吃晚餐。飯後我立即趕回男生宿舍。我自言自語：「作了三小時的工作賺了兩小時的書讀，我非好好利用這寶貴時間不可。」

當時我所上的課，予我印像最深的是英語和數學。後者我並不感到困難。課外作業祇要幾分鐘即可完成。難的是英語課。我還記得當時採用的課本是史考特（Walter Scott）的「薩克遜刼後英雄略」。每次指定讀十頁。我利用一本英漢字典，查出每個生字，把它寫在一本小册子上，同時標上中文解釋。我發現在十頁指定的課文中竟有三百多生字。生字查完後，我簡直不知史考特在說些什麼。課文對我簡直是一片糢糊。次日上英語課時，費根（Fagen）老師對我似乎很和藹。我未學手發問他也沒問我問題。英文課對我說是一堆生字。

在派克學堂的最初幾天，我所過的生活是一連串聽不懂的課程，吃飯時受窘，以及難以忍受的工作。我無處訴苦。我的痛苦堅持不讓人知道。有些同學要幫助我，但我都婉拒。我想：他們不能替我上課、吃飯、做苦工。我絕不能逃避，不論這些事多麼麻煩，我非自己幹不可。

四月間我突然生病。醫院中男女學生住了十幾個，大家都患一樣的病。是一種流行性的傷寒症。我

昏昏的。醫生和護士照顧我無微不至，好像我自己的父母一般。有一天醫生檢查過後，護士小姐對我說，她要把我移到樓上一間小病房去，那兒比較安靜些。也就是說我要搬出大病房到單人病房。她同時把紙筆拿給我對我說，因爲我病的很重，應該寫信告訴遠在中國的父母。我看看她並設法揣度她的意思。最後我對她說：「我知道你認爲我快要死了，我告訴你，我決不會死。」這句話令她破顏而笑。他說她從不擔心我的康復，但是把病情報告給父母總是好的。她接着說：「我很奇怪，你怎麼知道你一定不會死？」我回答說：「我從幾千里以外的中國老遠到美國來求學，現在還未開始，我怎麼能够死。」我以爲我當時的答覆很妙。她深以爲然，並安慰我說我一定會好。

過了一個時期我漸漸好起來，又回到大病房。我要在養病期間讀書，以使我的英語迅速進步。護士小姐問我喜歡讀什麼？我想起「伊爾文見聞錄」。這本書我在益智曾經讀過，但並未全懂。我想我應該復習一遍。她居然給我找來一册。

這本書在當時我讀得很感興趣。我已不用再查生字。可以一直讀下去，體會故事大意。我念完這本書，我又要她給我找類似的書籍。我一連讀了好幾本伊爾文的小說。

奇蹟出現了。英語的門突然被我打開了。我開始對英語感興趣了。我和護士小姐及其他同房的患者談話也感到清楚有趣。這次患病使我在病房中學會很多英文成語。至於文法和字彙，我在益智受敎於林格爾夫人時已經有些基礎。眞正令我感到困難的是發音問題，經過十週住院我已能窺其梗概。

當我逐漸康復時，他們允許我在病房中散步並隨他們去學習量體溫。有時他們就讓我代他們擔任這項工作。我成了見習護士。

我的主治醫師安伍德（Underwood）先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人。我康復後，對於他的醫藥費非常擔心。我告訴他我是工讀生，眞不知道應該怎樣付他醫療費。他的回答令我畢生難忘，他說：「不要擔

心。健康恢復後什麼時候有錢什麼時候給我。」

我出院時，學期已經終了。暑期雖然我的病好了，我仍不能從事體力勞動。因此，我隨心所欲，幹一些自己喜歡幹的事。

當時派克學堂要讀四年拉丁文。我春季入學為二年級生。我很擔心學校要我重讀整個二年級課程。果真如此，我還要讀三年預科。我想我絕不能這樣。於是我第一步先學拉丁文，因為拉丁文我在中國沒有學過。我弄到一本拉丁文文法。每課約有十至二十個生字，一些文法。練習是將拉丁文譯成英文和將英文譯成拉丁文。出我意料，我發現我可以無師自通。生字可以記。文法既簡單又合邏輯。至於練習，我前一天將拉丁文譯成英文，第二天再將英文譯回拉丁文，兩相對照，看看有什麼錯誤。一個暑期過去，我對拉丁文已經不感困難。

秋季學期開始，我堅請註册組答應我註册三年級。負責人說如果我要入三年級須請示拉丁文老師。蓓蒂（Cora Pickett）小姐考試一下我一年級的拉丁文課程，認為暑期自修的成績很好。她說既然如此，她同意我修二年級拉丁文課。二年級拉丁文課講的是凱撒。我以為我祇上二年級拉丁文課，仍較同級的其他人少修一年。我問她：「你為什麼不讓我上三年級拉丁文課，也就是說凱撒和西塞羅一起學。」她對我的請求首肯，她表示我應該先從凱撒開始，如果成績好，她同意我也學西塞羅。我反對說，如果這樣西塞羅部分就會躐等，學不好。我認為一開始凱撒和西塞羅兩部分就一起學，比較好些。如果我讀得不好，我再放棄西塞羅部分，專讀凱撒。她熟思之後，同意我二三年級拉丁文課同時修，但成績一定要好。

事實上，自從我英文進步神速產生奇蹟後，我對二年級課程已經絲毫不感困難。凱撒和西塞羅兩部分我都讀得不錯，考試分數很高。教室功課之外我又對其他的課外活動發生興趣。

派克學堂在當時沒有體育課，社交也很少。課外活動祇有演說和辯論。我在三年級時參加朗誦比賽。費根教授給我選了一個小故事，碰巧故事內容很富羅曼蒂克。他校正我的發音。男教室後面是一片樹林。一大早，我就前往樹林背誦那段故事，把樹當作聽衆。比賽結果我得第二，心中非常高興。校中人和鎭上人都大吃一驚，稱贊不已。這一小小勝利在同學及鎭民間給我帶來相當的地位。從那時開始，無論是學校或是鎭上都對我有了認識。

在派克學堂體力勞動的收入是充膳宿費的。其它的開銷要另想辦法才行。朗誦的勝利使校方當局和一些鎭民介紹我到附近敎堂和民間團體去演講。每次演講收入二至五元。我的演講內容極簡單，大部分都講的是我的家庭和我在中國讀書的情形。

有一次，他們邀請我到堪薩斯城長老敎會主日學去演講。事後有一位老者到青年會宿舍來看我，我正在那兒度週末。他說敎會牧師突然患病，因此敎堂很感束手，他請我在主日學以外，早晚多爲敎堂盡些義務。這種突如其來的大任使我深感意外。我對他說，我不能接受。因爲我深恐不能稱職。他堅持要我試一下。最後我同意，但在祈禱和唱詩時由別人幫忙，那位長者答應他可以幫忙。當晚，我修改一下我準備在主日學時用的演講大綱，一改爲二，每個加上一段祈禱和一個結論。出人意料的，我能掌握住聽衆。他們極欲從一個剛到美國一年的中國孩子那裡去了解中國。那天我賺了二十元美金。

我抵派克維爾的前幾年，該校曾有一名中國學生，他後來名聞世界，他就是董顯光博士，是一位名記者並曾任駐美大使。我至派克維爾時，他已離開那兒前往米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深造。但他爲自己和中國都留下良好印象。起初當地祇有我一個中國人，當地人對我極客氣，全是一本至誠。

學校生活一直過得很好。上幾何課時我常幫助老師講解難題。我又新修一門課，德文。德文老師威廉斯（Blanche Williams）小姐係一奇特人物，是一位良師，也是一位益友。她和蓓蒂同樣受我尊敬

，我想我不能令她們中任何一個人感到失望。

時間一天天過去，勞動監督指派我擔任各種校區內工作。我常和薩姆一起幹，他是一個身體魁梧的黑人，曾到車站接過我的。他眞是力大如牛，簡直沒有什麼東西扛不起的。我們把路上的巨石抬到路邊。在花園、菓園，我們共同修理道路，我感到筋肉和背部很疼痛。卽使是在現代的中國也很少有知識份子從事體力勞動的。我的經驗非同小可。盡管以後我對許多理論問題感到興趣，但我相信，體力勞動的經驗，幫助我站穩了脚跟。

一九一三年初，二伯寫信告訴我可以向湖南省長申請奬學金。我請校方給我一份成績單，並請所有敎過我的老師都替我寫推薦函。我將所有資料封入信封，附上申請函，寄給省長。我以爲這實在是一個大膽的嘗試，因爲貴爲省長的大人先生，如何會注意到一封遠從美國寄上的小孩子的申請函。但，反過來一想，我又覺得此舉不會有什麼損害，不寫白不寫。一九一三年四或五月間，我得到覆函，得到一份奬學金，數目十分可觀，每月八十美金。我感到突然成了富翁。

接信後我決定告訴哥哥。說明我可以不用家庭供給或奬學金，自己賺錢讀書，每月八十元足够我倆在美求學之用，要他也來美國。特別令我感到幸運的是我的奬學金從一九一三年元月份卽已開始，還要追補。中國留美學生監督第一次就寄給我四百美金。我可以負擔我哥哥的路費。是年夏，他也到了派克維爾。秋季開學，我倆同在派克學堂求學。

接到錢後我決定做一套新衣服。到一家裁縫舖選了一段料子。我想這套衣服一定很帥。但當我穿上時，我的好朋友，無分男女，都說不够好，認爲我應該選更好一點的料子。

一九一三年，我和朋友決定組織一個俱樂部。學校撥出一間房子，我們稍加修飾，用來開會與社交活動。我們一致認爲應該有一架鋼琴，我立刻決定捐一架。

派克維爾當時可能有一千人，包括派克專科和派克學堂的四百名學生在內。那裡沒有電影院和酒吧。有兩家冷飲店，一家附設在安伍德醫生的藥房裡，另一家也是由鎮上一位醫生經營的。我沒有見過乞丐，也沒聽過有什麼犯罪。貧富並不懸殊。大部分人都步行，少數人坐馬車。每個人都守法、信教。大家都努力工作。

鎮是座落在米蘇里河畔。米蘇里河與中國的河一樣多泥沙。但與中國不同的是該河沒有舟船。祇有一個黑人——但不是薩姆——利用那條河。他在河與公路中間修了一間木屋。我去看過他幾次，每次他都請我飲咖啡吃肉餅。我們彼此往來得很親密。他可能以捕魚和捉螃蟹爲生。

一九一三年，我們男生聽說威爾遜(Woodrow Wilson）要到堪薩斯城國會大厦來演講。他們告訴我威氏曾任普林斯頓大學教授和校長。他的一切令我景仰，同時也令我對美國更感到尊敬。我衷心以爲：一個國家如果能尊敬學者，則在文化方面必定是進步的，爲了聽這位偉大學者兼政治家的演講，我和其他同學徒步到八里以外的堪薩斯城。當晚威氏在競選演說中講些什麼我已不復記憶，但我至今對他仍然尊敬。

派克專校和派克學堂在同級學校中水準平平。我甚至可以說它在一般水平之下。但該校篤信宗教。我們必須作禮拜及參加教會活動。此外，我們每天還要做祈禱，米勒牧師的祈禱詞很長，就我記憶，也非常神學化。因爲別人都不抱怨，我也祇好跟着祈禱。重視宗教的結果，使大部分畢業生進了教會，有些到國外任教職，有些作了青年會幹事。

一九一四年夏，我突然興起一個念頭，認爲我和哥哥應該轉到別的學校。哥哥對學農有興趣，他認爲應該獻身農業爲國家効力。因此，他決心到南方大學，因爲南方盛產稻米。我已不記得當時的眞正情況，一九一四年秋他終於進了亞拉巴馬工藝專科。

至於我本人，我曾就商於蓓蒂小姐，我說我要進哈佛。她說那是最大錯誤，因為哈佛太大，對我無益。她建議我進一所小一點的學校，她認為我可以從老師那裡獲得額外的照顧。她推薦歐柏林(Oberlin)學院，那是她的母校。

夏季到來，我和哥哥離開派克維爾。他前往亞拉巴馬奧邦（Auburn），我到俄亥俄歐柏林。離別朋友我和哥哥非常憂傷，但我想：如果在美國要完成學業就必須離開。我們在美國開始時的生活是實實在在的。派克維爾兩年半是否學到什麼東西我不敢說，但我確信那裡的工作使我身體健壯，意志堅强。

第七章　四年美國自由教育（一九一四——一九一八）

歐柏林學院的四年正好趕上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我記憶所及，戰爭一開始我對協約國和同盟國雙方均無偏見。時間一天天過去，我漸漸同情英、法、比。記得在二年級時我在歐柏林加入後備軍官訓練團。我還記得，當時曾就商於院中體育指導薩維吉（Savage）先生，看看我能否入美國軍事訓練營。他仔細檢閱我的體格紀錄表，並且打量一下我的身體，他說他認爲我最好不要去當兵，他認爲我的視力不適於當兵。此一建議我極感失望。一九一六和一九一七年，我的同學有些前往歐洲，大部分都在法國擔任醫護工作，我非常羨慕他們。

薩維吉的建議令我失望的另一個原因是：因爲我還沒有忘情於我的「救中國」夢想，我要作個軍人。我請駐美公使施肇基推薦我進西點軍校。當他要我提出體格紀錄表時，我祇好作罷，因爲我確知：薩維吉先生一定在紀錄表上，對我身體不會給予好評。

然而，救中國的念頭一直潛伏在我的意識裏，時隱時現。歐柏林對於我實現此一理想已沒有什麼作用。它在過去和現在一直是一個純粹自由的學堂，目的是訓練美國青年能够生活於美國社會。當然，它也吸收了大批外國人，特別是中國學生。尤有進者，它在中國山西設有一所分校。在校園中還立一個碑，是紀念一九〇〇年山西拳匪之亂所犧牲的歐柏林人的。其課程宗教氣氛太重，對於外國學生的特殊需要不甚考慮。

我在歐柏林讀書時所產生的救國思想是溫和的，目標是針對個人和全世界的。歐柏林的生活是每天忙着上課、進圖書館、上實驗室、運動、交女朋友。是什麼把這些串連在一起呢？第一、是因爲要應付考試，要畢業；第二、是基於一種模糊的意識，認爲健全的思想應該育於健全的體魄；最後，是人類內在的好奇心。學校生活本身也能產生一種動力。

時間一天天過去了，我的救國思想也一天天淡了，也可以說是擴大了。偶爾想一想，我的救國觀念未免太簡單了。有時我認爲：我之所以有這種觀念，實在是一種自我陶醉，這是不健全的。在我追尋內在思想之前，不妨先敘述一下校外的環境和重要大事。

一九一四年，湖南發生一個政治風暴。袁世凱總統免掉湖南省長譚延闓的職務，因爲譚是國民黨革命份子。他任命他的親信湯薌銘擔任省長。因爲譚曾予留美湖南學生獎學金，所以湯認爲留美湖南學生都是革命份子，於是他停發獎學金。

我和哥哥失去了獎學金，又回到自力更生的情況。林格爾夫人和另一位住在紐約邁亞克(Myack)哈德遜河畔的慈祥太太柯爾畢夫人供給我學費。我在歐柏林一個中國學生俱樂部工作，賺取食宿。當時在歐柏林求學的中國學生有二十人，學校小而中國學生最多。我們共同組織一個俱樂部，俱樂部有一所房子，大約有十個人住在那裏。由工讀生擔任清潔、烹飪等工作，其他有家庭支援的學生，負擔俱樂部的其他開支。

到暑假我要另覓其它工作。克利夫蘭報上登出一則求才廣告，我前往應徵，獲得錄取。一九一五年夏我到水牛城去學習售貨術。學習如何推銷一本叫做「萬寶全書」（The Dictionary of Facts）的書籍。該書係由福克（Funk）和瓦格納斯（Wagnalls）二位出版。售貨指導員教我如何進入假想買主的屋子，如何引起他們的購買興趣。他指定我一些俄亥俄的市鎮，大部都在歐柏林附近，要我去推銷。

我想這份工作我可能賺到幾百元。

售貨的第一個城鎭叫什麼名字，我已不復記憶。他們告訴我：每到一處應該先拜訪當地督學。因爲他們認爲如果能够推給督學先生一册，則在以後的推銷中就可以多一番說詞。我遵囑前往。督學先生很文雅，他耐心的聽我推銷，並看樣本。待我說完，他說：「小夥子！你講的很好，我曉得這本書，因爲我也推銷過。但我現在並不需要它，因爲我所需要的字典和百科全書一類的書籍，我全都有了。很抱歉，再見。」我認爲這位仁兄拒購的理由很充份，也就不想再向他推銷。

第二個推銷對象是一個女教員。我順利進入她的寓所。她正收拾房子，屋內還有另外一個中年婦人，我認識她，她也在本地學校教書。她倆對我這位中國推銷員大感興趣，於是坐下來聽我的說詞。出我意料之外，他們聽起來很用心。臨了，其中一位說：她和她的朋友賺錢很少，爲了收支平衡，她們自己還要操持勞務。在此情形下實在無力購買這本書，眞是對不起。她們外表極誠懇，回答也很堅決，我想我實在沒有辦法再要她們購買。

經過上述兩次失敗後，我認爲在水牛城傳授我銷貨術的那位先生一定是錯了。我應該放棄學校中的推銷對象，到濶氣的住宅中去找主顧。他們有錢，會購我的書。於是，我找到高級住宅區，決心要在區內找到合適的買主。

我敲一家相當濶氣的大門，裏面出來一位中年婦人，她也很客氣，立即請我進去。我向她推銷，她很感興趣，她說她正有個孩子在唸書，一定會用得到我推銷的書。於是我又詳細介紹書中的內容，特別是說明部分。正當此刻，我聞到有一股燒焦的味道，她趕到厨房，又盛怒的衝出來說：「小子！爲了你，我把餅都烤焦了，滾！」又是一次失敗。

幾次失敗後，我不想再做售貨員了。我回到歐柏林，要求學校人事部門給我一份工作。事有湊巧，

一位赴遠處渡假的教授，正好需要一個人照看他的房子和花園。工作很容易，但是待遇卻不高。

有時我在歐柏林附近演講。講的最多的地方是俄亥俄州艾克倫（Akrons）的一個俱樂部。我相信在那裏我賺到二十元。

對學生們說，最普通的自力更生辦法是去端盤子。歐柏林學堂有一個小旅館，很多到歐柏林和歐柏林學堂的人都去光顧過。我在小旅館餐廳中找到一份工作，令我十分高興。中餐晚餐時我去工作，可以賺到兩餐飯。此外並可得到一些小費。工作很簡單。

我在「歐柏林旅館」工作最初的幾天，有一次我招待六位同來的顧客。我記下他們點的湯、魚、肉、沙拉、咖啡和點心，回到厨房，我一口氣背出來。厨房領班是一個身材魁梧的黑人，名字叫薩姆，他對我一言不發，兩眼瞪着我，好像要把我吞下去似的。很快的，他把我所要的東西一股腦兒做好，放在檯子上，要我端出去。我開始先端湯，待上魚時，已經有點冷了，當上肉時，肉已太冷，顧客抱怨。我把客人的反應告訴薩姆。他對我大肆咆哮，好像我犯了什麼滔天大罪似的。他說我應該按順序報出菜單。我說這是他的責任，因爲他應該知道每道菜所需的時間。我們爭論的很兇，其他侍者出面勸解，但他們都站在領班的一方，要我以後報菜單時把時間算好。

不打不成交，我和薩姆經此爭吵，反而變成朋友。事實上，我對端盤子藝術很有一手。我不僅能仔細調配時間，更能牢記每位客人所點的菜。我成了端盤子明星。

有些教授到餐廳來，我侍候他們。他們同情我，多給小費。我感到很不安，因爲在中國，學生對老師習慣上總是免費招待的。我對心理學系主任史塔生說：「我是你的學生，不能收小費，因爲中國習慣是『有事弟子服其勞』的。」他聽後大笑不止。他說在美國給小費是很普遍的。

有一天，是在畢業典禮那一週，我的女友凱塞琳和她母親到餐廳來。另一個端盤子的，也是個學生

，有意捉弄我，故意避開。我被迫祇好硬着頭皮去招待這兩位女客。我女朋友的母親給我五元小費。我感到很尷尬，因爲我想；將來我約會凱塞琳，她一定會以爲我用的是她媽媽的錢。另一位侍者要我把錢收起來，不必耿耿於懷。

兩年以後，我從清華得到部分獎學金。清華是用羅斯福退回的庚子賠款創辦的。我哥哥因爲不滿亞拉巴馬專科，也轉到歐柏林來。我倆都半工半讀。

歐柏林學堂的水準在一般的同級學校之上。學堂本身有一千名學生。此外，音樂學院有四百名學生，神學院有兩百名學生。學生人數佔全鎮人口一半。如果再加上老師和他們的家屬，可能佔鎮上人口的三分之二。校區和校舍都很精美。教室、圖書館、實驗室都很合乎我們的理想。

歐柏林學堂的理想是自由教育。說明白一點，就是要使其學生成爲一個品行好、學問棒的基督徒。因爲學校注意宗教，所以我們每天都有宗教活動。校區內不准吸烟和跳舞。金 (Henry Churchill King) 校長，波士委 (Bosworth) 教務長，哈琴斯 (Hutchins) 教授，都是闡明基督教義的名家，他們口才便給，雄辯滔滔。哈琴斯的兒子後來做了芝加哥大學校長，聲名藉藉，我對這些人都極仰慕。當時的美國大學，希望每個學生都是基督徒，至於學問還在其次。但歐柏林却是二者並重的。

在歐柏林學堂，我首次開始學自然科學。霍莫茲(Holmes)教我化學，布丁頓(Budaington) 教我生物學，葛威爾 (Grover) 教我樹木學和進化學。他們三位都是傑出的教授。

歐柏林的老師不再要我死記課文，不再要我使用演繹法和孔夫子的格言，他要我多用眼睛多用手。要我在顯微鏡下研究試管中的微點。要我觀察我所能看到的東西，不要忽略所觀察到的事實。訓練我觀察要仔細，提出報告要客觀。經過這一番訓練，物質對我又有了新意義。科學方法也成了一個新發現。

我對這種新方法的反應如何呢？雖然科學研究在開始時困難，但我很快上了道。我衷心羨慕這種教

育方法。這些課程我都學得不錯，甚至霍莫玆教授勸我主修化學，布丁頓教授勸我主修生物學，葛威爾教授勸我主修植物。

在歐柏林的其他中國學生，大部份均較我年長，中文也較我好，但對自然科學不感興趣。原因很簡單，因爲他們認爲實驗室工作困難。然而，在當時的美國大學中，却有許多中國學生，學自然科學或是學機械工程。他們有些是因爲興趣所在，有些則是依靠意志去克復困難。他們認爲：中國目前最需要的是西方科學和技術。有些人甚至以爲：中國祇需要科學和技術。因此，中國知識份子間，對於文化改革也形成了一連串辯論。

我曾力主科學和技術。我必須說明，我的主張並不是人人贊同的。當時在康奈爾和哥倫比亞大學就讀的胡適博士就是其中一個。他主張：中國人應該研究科學和技術，但西方文學和社會科學對新中國的進步也很重要。他對西方文明和唯物主義不作等量齊視。他終身在中國提倡科學與技術，經常演講，闡揚西方在精神方面的成就。

事實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一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由於自然科學和技術受人重視，致令許多中國人對社會科學和文學都裹足不前。

葛威爾教授的「樹木學」使我認識了歐柏林四週的樹木。我盡量研究，辨別它們冬季和夏季的特點。我成了葛威爾實驗室中的助理。我很高興，能指給其他美國學生認識楓、楊……。但當他們隨着樹木長大時，那些美國學生對楓、楊的枝葉也就不再關心了。

最麻煩的課程是葛威爾教授的「進化論」。我們研究達爾文和達爾文以後的理論，實驗孟德爾遺傳定律。由於葛威爾認爲他的孟德爾定律損害了基督教教義，以致令我稍感困惑。霍莫玆教授和布丁頓教授認爲科學和宗教是並行不背的。我眞不了解，究竟是科學增加了他們對宗教的信心；還是宗教增强了

他們對大自然刺探的決心。但有一件事却是眞的，宗教和科學統一了他們的心靈和意志。

在歐柏林，又有一門新課引起我的興趣。那就是「心理學」。我認爲我對心理學的興趣是威爾斯（Wells）教授在暑期教我的課程中啓發的。他在講課時講解人性中的狂妄。他不用任何教條式的理論，就能使我們深入研究和分析。那年夏季我讀了詹姆斯（Williams James）的「心理學大綱」，該書令我深感興趣。詹姆斯的書有令人感到不忍釋手的魔力。威爾斯教授使我在大學中專攻心理學。不幸，他在我四年級時離開歐柏林。接替他的是達雪爾（Dashiell）教授。他祇能在「動物心理學」試驗方面令我稍感興趣。

我在歐柏林對文學也感興趣。莫雪爾（Mosher）教授除教我德文外，並引起我對哥德和希拉的興趣。我認爲德文很容易學，而且我進步的也很快。最後幾年，我又學法文。我認爲：將來讀法國學者所寫的偉大歷史著作時，法文會有用處。

我在歐柏林時，最傑出的文學教授是瓦格爾（Wager），他教我們「英國文學」。我選他的課是維多利亞時代散文和名著翻譯。前者，我讀卡拉爾、雷斯堪、安諾德、紐曼和派特等的作品。我喜歡安諾德的詩。我對他那科學前期對宗教信仰問題所作的詩章中的音韻極感興趣，如果我想像的不錯，我認爲瓦格爾教授最喜歡的是紐曼。因爲他們信仰相同。他們追求的是精神快樂和平安。我對紐曼作品雖不盡理解，但我想紐曼神異的動機，的確是找到了最後的精神安慰，我可能不太重視最後的安慰，因爲我不喜歡隔絕的、一元化的世界。

在英國文學系教授們鼓勵下，歐柏林學堂學生掀起一片文學熱潮。他們出版了「歐柏林文學雜誌」。貢獻最大的是魏爾德（Wilder）。我和魏爾德合作，將一些中國詩翻譯成英文。

我對歐柏林的歷史課很失望。上課時很枯燥。但我自己私下却讀了許多德國史和意大利史。我對俾

斯麥很崇敬，對意大利加富爾、馬志尼、伽里波等三位偉大的政治家也同樣景仰。

當我留學時，我發現祖國正面臨統一問題。一九一一年，從表面看，革命似已成功，但却正如後來事實所顯示的，革命結果造成軍閥割據。內戰所引起的各項問題深深的刺激了我。不幸，那時歐柏林歷史系的課程不能有助於我將來在中國從事政治工作。

在歐柏林有一位偉大的經濟學教授，名叫魯玆（H. H. Lutz）他教我時採用的本子是陶星（Taussing）的「經濟學大綱」。魯玆教授爲我詳細講解複雜的供求問題、邊際效用和價值等問題。他非常認眞，而且能以身作則，無論對學生或對自己都不馬虎。

在我上魯玆教授課時，有一次青年會國際會議總幹事穆特（John R. Matt）來校佈道，學校當局停兩堂課，以便學生聽傳道。但是魯玆教授宣佈他的課要照常上。兩者相較我還是上了他的經濟學課。我發現歐柏林的宗教氣氛太濃，除了校長金氏、教務長波士委及哈琴斯教授對教會活動大力支持外，另一個有形的象徵就是：校區中爲紀念在中國山西傳敎而被拳匪慘殺的敎士，建立一個紀念碑。此外，我的同學中也有好幾個人他們的父母在中國傳敎。在鎭上，威廉斯夫人和戴維斯夫人也都是退休的牧師，對中國學生特別有興趣。

美國敎會，爲了籌集所需費用，往往談到中國的窮人，損及中國人的尊嚴，此舉使在歐柏林讀書的中國學生大起反感。這是他們傷了我們的自尊心。然而這種自尊可能是不對的，因爲他們所說的多半是事實。但我們却不希望他們在美國公開這些醜事。其實在中國學生中，談到自己國家的種種，有時所用措詞，比敎會牧師所用的更粗魯、更尖苛。但是同樣一件事，經牧師們一說，我們就大感不快，感到有失尊嚴。

離國數年後，我們又把祖國理想化了。凡是在國外的人都較爲愛國，這可能是一條不易的眞理。這

條眞理於歐柏林的學生身上更得到了明證。我對整個教會活動都感到懷疑。第一、我認爲中國不會變成一個基督教國家。第二、我認爲中國道德精神價值高於西方。歐柏林過份的教會活動遭到反對，至少大多數中國學生是反對的。

回顧一下中國學生和我自己對國內教會活動的態度，我願對我年青時代的憎恨作一個相當合理的解釋。總之，人民的信仰，是傳統中最內層的部分。的確，宗教信仰是傳統的。沒有傳統，特別是反傳統，就得不到精神安慰。大多數美國人都是基督徒，其所以如此，並非基於邏輯上的理由，純粹是因爲他們的家庭和國家的傳統使然。爲求精神健康，每個人都應該有某種程度的宗教信仰。任何破壞這種共同認識的企圖，都是一種精神上的損害。傳教可以視爲十足的精神侵略。近年來我曾注意觀察，發現美國有些教派，對傳教已不似昔日那樣熱衷。目前，似乎越是守舊的教派（如原教旨主義教派）越喜歡向教外人士傳教。

歐柏林過去和現在都是一所好學校。我不敢說我在那裏四年有什麼成就，獲得什麼堅定的信仰。但我敢說：對於過去一些不明白的事物，我已能去觀察，我的智識水準的確是提高了。雖然離開歐柏林後我仍舊沒有成熟，但我却邁向成熟之路。

第八章　赴法插曲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特別是威爾遜總統領導各國反對同盟國和同情中國學生時，我很親西方。一九一七年上半年，中國對於是否參戰問題，軍政兩界爭論甚烈。就我回憶所及，大部分人是主張參加協約國的。極少數人主張中立。沒有人主張加入同盟國。我個人是完全站在協約國一方的。威爾遜總統所說的每一個字，我都信以爲眞。

中國後來決定參加協約國。決定後不久，中國政府即和協約國方面達成一項協議。依據該協議，中國應對協約國提出人力支援。中國招募十五萬勞工前往法國。有些在兵工廠工作，有些配屬盟軍擔任兵工。其中隸屬於英軍的有十萬人，法軍的有四萬人(其中部分爲軍需工人)，美軍的有一萬人。美國本身也有隨軍志願組織，目的是鼓舞前線士氣，志願組織中最傑出的是紅十字會和哥倫比亞騎士隊。他們代表天主教和青年會。後者一向是具有中國意味的。要組織一個隊伍到法國戰地中國勞工營中去鼓勵士氣。邱安 (James Chuan) 先生，中國學生青年會幹事，也是我的朋友，於一九一八年春到歐柏林去物色人參加騎士隊。我接受了他的約請。

歐柏林學堂一九一八年班是在戰雲籠罩下舉行畢業典禮的。盡管我們畢業班的人都曉得畢業是我們生平一件大事，但也興奮不起來。不過我還記得金校長在他的寓所招待我們的情形。一向矜持的校長那天也對我們笑起來，這是稀有的事。他用一種追懷往事的口吻，談到他自己過去在歐柏林的情形，他對

我們說：當他要從歐柏林學堂畢業時，他和他的同學們都擔心：認爲歐柏林學堂沒有他們的領導，將來一定不成樣子。「嗨！」他哈哈大笑說：「大出我們的意料，我們離開後，學校反倒進步了。」他又繼續告訴我們，他知道學生們中普遍的存在一個問題就是：懷疑他是否笑過。他告訴我們，他有時也的確會大笑，祇是機會不多而已。我很高興金校長告訴我們他的往事，因爲當時我和我的同學也正有那種憂慮，認爲歐柏林不能缺少我們。此後，無論何時只要我自我陶醉的過了火，我就回想那段往事。

在我敍述法國生活之前，我認爲應該插入一段個人生活的插曲。當我哥哥來美留學前，就告訴過我，他在祖母和家父的堅持下，赴美之前曾先回老家一次。抵家後，使他大吃一驚，他發現原來是要他回去結婚的，對方姓趙，就是過去我在他們家私塾上學的趙家女兒。盡管他非常不願意這件婚事，但也祇好服從長輩的命令。

家兄當時對結婚經過，不願多說。我感到這是一個悲劇，但我知道我對此事無能爲力。他的婚姻經過，觸使我考慮到我自己未來的婚姻問題。我是否應該像家兄一樣，俯從長輩的意思，與我五歲時訂婚的賀小姐結婚呢？我決心不幹。於是我立刻寫信告訴父親，請他解除婚約。家父的回信可以總括爲兩句話：「荒謬絕倫，不可能。」當他發現我的意志堅決時，他開始用說服方法，要我不要使他失信，讓親友看他敎子無方，丟他的面子。我無法向他解釋我對婚姻的觀點，我祇說我要自己選擇對象，除非和賀小姐解除婚約，我決不回中國。

這樣一威脅，親戚們的信函雪片飛來。這都是家父發動的。要他們幫助說服我。有些人說家父對我的主張很震驚，甚至爲此而生病。另一批人說賀小姐旣溫柔又漂亮。我的三弟，當時正急於赴美留學，寫信告訴我，說家父已經後悔當年讓他的兩個兒子赴美留學，因此，他絕不讓他的三兒子赴美，以免受美國不良思想的薰陶。對這些說詞，我堅不低頭。我請父親盡速解除婚約，因爲任何遲延都會影響賀小

姐的終身大事。大約是我在歐柏林畢業時，終於接到家父的通知，告訴我與賀小姐的婚約已經　除，我如釋重負。

畢業後，我前往紐約接受一星期青年會戰地工作訓練。七月間，我渡大西洋赴法國。途中第四天，我們勞連（Lorraine）輪上的乘客發現有一個龐大艦隊與我們同行。其中有些是商船，有些是驅逐艦。我看到這些小而快的艦艇在我們四週護航，俾免遭到德國潛艇襲擊。危險當前，我們反而感到興奮。上岸的前一天，有一個老婦跳海，有人告訴我她是德國間諜，恐怕上岸時要被捕所以跳海。上岸那天，護送艦隊離去，我們的船平安進了布勒斯特（Brest）港。

巴黎一九一八年的夏季是陰霾沉沉的。雖然沒有實行澈底燈火管制，但路燈也是暗淡無光的。芳斯畢格爾斯（Follies Bergeres）的演員正在使出混身解數，使人們狂歡。但普通的法國人，因爲節約，自然沒有什麼興緻。人和房子都顯得無精打采。大部分婦女都穿着黑色衣裳。

抵法第一次工作是在里昂附近聖芳斯(Saint Fons）的軍需廠。那裏大約有七百名工人，多半來自山東，我爲他們成立了一個類似茶館的俱樂部。我辦了幾個補習班，教法文和中文，介紹一些簡單遊戲，放留聲機。替他們寫家信，寄錢回家。吃苦耐勞的山東人住在法國非常習慣，好像在家中一樣。他們都能說幾個法文字，常常出入鄉間的小咖啡館，和工廠及農場的法國工人相處的很融洽。事實上，這裏實在沒有什麼士氣不士氣的問題，用不到去鼓舞。

十月末的一個夜裏，屋子裏擠滿了工人，突然一聲巨響，山搖地動，把留聲機上的唱針震出了唱盤。窗框震碎散落到地上。有些人大喊：「德國人來啦！」我雖然感到吃驚，但我却不信德軍能够穿過瑞士進入萊茵河地區。我力持鎮靜，要大家循序到外面去。我把俱樂部門關好，我認爲應該親自去查明一下眞象。剛出門，又是一聲巨響。當我到大街時，人潮奔馳，其中有中國人、希臘人、阿拉伯人和法國

人。有一名法國警察要我站在他身邊，他用不純熟的中國話高呼，要工人們安靜下來，要守秩序。我自己很想盡速逃跑，但我恐怕警察笑我膽小。

當我站在警察身邊時，一股濃烟直衝霄漢，接着火焰衝天，風助火勢，烈焰騰空，工人們個個驚恐。我站在那裏機械式的重複那幾個字：「不要跑，不要跑。」大約半小時後，羣衆已經衝過我站的地方。我們看到遠處一片火光，並且聞到一股火藥味，還聽到一陣辟辟拍拍的聲音，好像中國過年放爆竹似的。我決定循着羣衆們跑的路走下去。等我追上他們時，有一名中國工人，他認識我，對大家說：「我們跟他走！」雖然我告訴他們跟我走也沒用，因爲我自己也不知道那兒好，但他們還是堅持要跟我走。我沒有別的法子，祇能給他們找隱蔽的地方。最後，我們跑到一座小村落，我看到教堂的頂上有一個紅十字，斜對着天空。我直奔教堂。還好，門是開着的，我要大家在長櫈上安靜的坐下來，等待天明。

次日晨，我才曉得當晚並不是德軍進攻，而是軍火工廠的彈藥庫爆炸。一連三天，爆炸不停，法國派了大批警察包圍軍火廠。後來我發覺，法國其他地方的人，根本不知道發生這件事。

一九一八年十月間，有一天巴黎青年會總部要我去述職。我所乘的火車規定於午後十時到達，但誤了幾個小時。同車有一位上了年紀的法國人，我們坐在一起雖有幾小時，但彼此並未交談。到了午夜，他突然問我：是否已在巴黎訂了旅館。我告訴他還沒有，因爲我想在青年會總部過夜，所以認爲沒有訂旅館的必要。他很和靄的約我到他家，他說住在他家比較舒服些，次日淸晨辦事也較方便。我有些不好意思，但最後還是答應了。抵他家時，他的太太身穿黑衫正等着他。她立刻給我們冲熱巧克力。我們宵夜時，他太太悠閒的談到西貢和河內的來信。我推測他家是從事化學工業的。第二天早晨，女主人爲我準備一餐豐富的早餐。席間她告訴我：他的兄弟和獨生子都在戰爭中犧牲了。現在她和丈夫除了對人施予溫情外，已經沒有什麼好幹的了。早餐後，老者帶我去看他的化工廠和辦公室。那是一個偉大的事業

，與全世界都有關係。

我在巴黎公畢後前往聖芳斯。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一天中午，我到里昂中央郵局。我很驚訝，整個郵局大厦的人都跑光了。當我在一個窗口買郵票時，一個法國女孩子突然抓住我說：「我們來跳舞。」我想她一定是發狂，因爲郵局在中午怎麼能讓人隨便跳舞。她非要我和她跳不行，我堅持不肯。她抓住我的膀子，把我推到大街上去。這時我看到有許多旗幟飄揚在窗子上。不到幾分鐘，很多人麕集在大街上，高呼，狂吻，跳舞。戰爭停止了。

當天下午我回到聖芳斯。沿途看到很多法國兵都喝得醺醺大醉。有些倒在地上，東倒西歪，嘴裏不斷嘟囔着：「這是平時，這是平時」。據我想像，法國爲了爭取最後勝利，已經悉索敝賦竭其所能了。

法國人和其它國家的人一樣，也渴望戰後能早日回家過太平日子。但事與願違，令他們深感失望。隨便發個信號，就能令士兵停火；隨便簽署一個文件，就可使外交官宣佈和平；隨便發一個簡單宣言，就可使一個政府承認和平；但是眞正的和平却沒有那麼簡單，慢而又慢。迨至歐戰最後的幾個月，法國人都用「這是戰時，這是戰時」來說明他們的艱苦。停戰以後，當我看到他們那失望的樣子時，我眞不知道，他們又會用什麼諷刺的字眼來形容他們的失望。果然，不久他們又都說：「這是平時，這是平時」了。

我有一輛美造自行車，是青年會供給的。我常與里昂的工作夥伴徐義宣（Hsi I-Hsuan）先生沿萊茵河乘騎，我們到過萊茵區的許多市鎮，並且遠及南部的亞威農（Avignon）。我們發現法國人相當刻苦耐勞，勤儉自持。這與外國人想像的很有出入。有時我們住在法國小旅館中過夜。老板和老板娘都拿我們當家人一樣看待。吃過飯後，我就和他們坐在一起談家常。女老板爲了表示對我們的關懷，常問

我們是否有扣子掉了，她可以代縫。

一九一九年初，青年會派我到勒克列索(Le Creusat) 龐大的斯耐達 (Schnecder) 兵工廠去爲中國工人再開一個俱樂部。當地差不多有一千五百名山東工人，住在營房中，當我首次向負責人要房子開俱樂部時，他聳聳肩說，實在沒有空房子。在那段日子中，我常帶着美國香烟，不過我自己却不吸。當時我遞給他一枝烟，他很高興。後來我把一整盒都送給他。他要我過三四天再去看他。我們下次會面時，我乾脆送給他一整盒香烟。他說他找到一間房子，這間房子現在正堆東西，如果我認爲合用，可以撥給我。徐先生和我看過房子，很滿意，認爲可以利用它做很多事，有了地方，我們第一個計畫是放電影給工人們看，我們從青年會總部領到一部放映機和一些影片。但房子中沒有電源，我們又到負責人家，送給他小孩子一些巧克力糖。於是他爲我們裝了一條專線。下一步就是放映機的操作問題。我們找不到一個會使用放映機的人。徐先生是哈佛經濟系的學生，和我一樣也是一竅不通。但，我們不斷試驗，一天下來，終於搞通了。第一次在營區中放映電影，眞是一件大事。

在聖芳斯和勒克列索兩地，我發現中法兩國人很易相處。不服勤務的官長，有時甚至是上中尉，都不時到中國工人的營房來，聊上幾個小時。有時法國人會帶着他們自己的留聲機，到營房放給工人們聽。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俱樂部中工作，一個法國女孩子跑進來。她要和我單獨談談，於是我把她帶到我的小辦公室。她問我，她是否可以和一個姓楊 (Yang) 的工人結婚。我告訴她，我不認識這個人，所以無法提供意見。我問她是否曾經考慮過中國生活習慣有許多地方與法國不同的問題。她說她已經考慮過了。我又問他是否考慮到後果。她說：「如果我呆在法國，我可能永遠也結不了婚，即使我能幸運的嫁了人，對方也可能是個莫名其妙的傢伙，把賺來的錢都喝了酒，醉後發脾氣打我罵我。我認識楊某

已經一年。他從未喝過酒，我認爲他永遠也不會打我。我想嫁給他一定很好。」

後來，有一次我到法國北部配屬英軍的勞工營去，發現英法兩國對中國工人的管理方式有許多不同之點。英國軍官呆板而嚴格。除了公務，官長與工人間簡直沒來往。英國營區較法國淸潔，工人照規定領餉領配給。他們可以寫信寄錢，甚至接到家信。法國官員和工人們往來多，甚至和工人們開玩笑，給他們講故事，有時與他們共食，但是營區管理却相當馬虎。工人們都抱怨不能和中國家中定時通信，他們不知家人是否收到他們從法國寄回去的安家費和不定期的寄款。

我在法國的時候，祇要不躭誤公事，盡量旅行。我從靑年會領到的香烟和巧克力幫了我很大忙，使我搭車方便。我到過：畢亞里玆（Biarritz）、盧德（Laurdes）、坡（Pau）和馬賽（Marseilles）等地。在盧德，我參觀山上的大教堂和雕像，這些建築物都顯示耶穌從前受難的情形。大教堂的旁邊有個小洞，有一股泉水從洞中流出。人們告訴我這股泉水有一股神秘力量，可以醫治百病。小洞上面的岩石上掛着許多拐杖，都是腿患痊癒後的人們留在那裏的。有一位曾在雲南傳過教的法國天主教神父用流利的中國話告訴我那兒曾出現過奇蹟。另一個美軍上尉也說那裏的確有過奇蹟。我眞奇怪，爲什麼現代人會如此迷信。若干年後，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好萊塢把盧德的傳奇拍成電影。片名是「伯納特之歌」。（The Song of Bernadette）

在馬賽，我住在一家海濱旅社。我想地中海的景色一定特別美。旅社的房間都配以各國地名，如威尼斯、法蘭西、雅典、北平等等。房間都空着，任我選擇。於是我選了北平。房間有個走廊面對大海，我躺在床上可以看見滔天白浪，從海上一波一波的掠過。我自言自語的說：「這眞羅曼蒂克。」但到晚上睡眠時，我聽到怒吼的風聲，令人感到悲愴、恐怖。我感到非常孤獨。自己獨處一室，全旅社也祇有我一個客人，我好像遺世獨立，要羽化登仙了。

和會召開期間，我數度赴巴黎。除了閱報外，我從參加和會的中國朋友處，又得到一些有關會議的報告。會中決議：將德國以往在山東的權利轉讓給日本，令我感到十分吃驚。我對一向主張全世界人民自決的威爾遜，實在不解，何以他竟違背了他自己的原則。不過，我想威氏此舉必有不便公之於世的充份理由，也說不定。處在這種環境，每天和中國代表團的人談，分擔他們的憂慮和失望，我對事實眞象因爲太明瞭，因而簡直不敢想像，中國代表團反對巴黎和會對山東問題的決定，於拒絕簽署和約後，會對中國學運、中國政府危機、新文化運動產生如何的影響。詹姆斯說得對：世界充滿了意外事故，全能的神不按五年計畫管理人類。

我要離開法國之前，青年會召集所有在軍中服務的青年會人員開會。討論的主題是：法國工作經驗與未來中國工人福利問題。討論結果，產生一個集體教育運動。運動的領導人是晏陽初，他曾就讀於耶魯大學。他在軍中教授中文時，突然觸發一個靈機，他認爲教育家首先應該找出一千個最習用的中國字。我們在國外研究的學生，都認爲學中文太浪費時間，除非我們能簡化教授方法，文盲是難掃除的。事實上。中國教育的中心問題是國語問題。中國字念起來很困難，寫起來更困難。把不同筆劃配合在一起，本身就很困難。晏先生認爲：經過相當選擇，可以找出一千個字，能使工人在三個月之內學會，足供他們日常生活使用。晏先生所倡議的基本中國字彙和集體教授法是此次會議中的主要成就。

晏先生回國試驗一年以後，他發現掃除文盲工作，直接從掃除文盲工作本身下手是不够的，因爲文盲問題背後，還存在着貧窮和疾病等等問題。因之，他所領導的集體教育運動，又牽涉到健康和改良生產等等問題。易言之，掃除文盲工作之外，還要對現代科學和技術工作多多努力，才能湊效。

第九章　哥大研究與華盛頓會議

依我想，現在留學的觀念應該與我一九一九年夏季進哥大時一樣。哥大是我留「西洋」的最後目標。當時在哥大的中國學生約有一百五十名。他們也都是留學生。

當我在哥大研究時，有一天，校長布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先生非正式招待哥大中國學生。我想他這次例外的對中國學生表示客氣，可能是受師範學院院長孟祿(Monroe)教授的影響。孟祿教授多年來對中國教育有興趣，而且對哥大中國學生花費過很多心血。他認為：從留美學生中，可以看出一種歷史動向，此種動向會形成當時令人無法相信的發展。在招待會中，布勒校長先致簡短的歡迎詞。接着他又訓了四十分鐘話。大意是談歷來的美國留學生問題。他指出：在不同的時期，美國的偉大學府和著名學者如何能從外國吸引來大批學生。他說，這些偉大學府幫助我們了解文化的動向。他的口才很好，並對出席的中國學生大加讚許。那次招待會增加了我們對留學和對歷史使命的認識。

當我一九一九年夏入哥大時，我有一個很奇怪的想法，認為我應該專攻新聞。我想如果我能成為中國報界大亨，我就能左右中國政治。我曾閱讀英美兩國許多報紙。也曾閱讀許多對美國輿論具有廣大影響力的主筆們所寫的社論。我夢想在自己國家政壇上，能扮演一個像他們那樣的角色。為此，我進了新聞學院。但我在新聞學院讀書期間，有一年夏季，突然感到新聞人員對一國政治的了解僅是表面的，無法深入，所以他們祇能隨波逐流，迎合時代。我認為：為了左右政治，就必須懂得政治，欲想懂得政治

，就必須專攻政治科學。因此，乃於一九一九年秋放棄新聞改修政治。但是不久我又覺得，政治也有它的限度。首先，政治科學講的是抽象理論和計畫。我相信偉大的政治家絕不會固守任何固定的原則。因為政治科學中所講的政治，是理論的而非實際的。那麼我要從那裏去獲得眞正實際的政治知識呢？我的結論是：欲想獲得眞正的政治知識祇有從歷史方面下手。我已經由新聞轉政治，現在我又從政治轉攻歷史。在我過去的人生歷程中，我曾改行很多次，從教歷史到公務員，再到新聞記者，換來換去。直至最後，我還無法確定究竟那一行能使人對政治有最佳、最正確、最深入的了解。

留學生往往是羨慕有關大學中著名學者的名氣才進那所大學的。中國學生進哥大更是如此。我們未入哥大之前，就聽到許多哥大教授的大名。如果不是為了上這些被認為有名、傑出的老師的課，我們就不會進哥大。但問題是：一個人欲想聞名全國就需要很長時間，欲想聞名世界需要更長的時間。待一個人馳譽國際時，往往已經過了他人生的顚峯。當外國學生前往受敎時，他們已經落伍了。本國學生因為能够跟上時代發展，所以對敎授的聲望本身不甚注意。另一個理由也可證明敎授聲望不足以當作選擇學校的標準。有時一個人選擇一所國外的大學後，他才發現校中有許多偉大學者，他們的名字在國內時從未聽到過。我們認為這是可喜而偶然的發現。

我在哥大時，從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三，凡是政治研究所的學生沒有不選穆爾(John Bassett Moore)敎授「國際公法」課的。他是一位著名學者，也是國務院的官員，的確是馳譽全球的。他對中國留學生很客氣。每年至少要到我們俱樂部來演講一次。他來演講時日期往往是選在我們的雙十節國慶日。他最器重的中國學生是顧維鈞。他常對我們講顧氏在哥大讀書時，有一次去找他，請他幫忙在哥大「旁觀者」“Spectator”上發表文章，他對這位年輕爽直的學生印象甚好。後來顧氏當選「旁觀者」編輯。穆爾敎授又說，自從顧氏擔任編輯後，「旁觀者」的可讀性就更高了。

他講課很少有變化。每年開學時他發一份授課大綱，附帶一份參考書書目。每次上課他的開場白總是：「我們今天討論的是某卷某頁到某頁的問題。」他問：「是否有人對指定閱讀的課程有困難，如果有，是否有人要發問？」十之八九是沒有人提出問題的，因爲大部分學生對指定的課程都還沒有準備過。但是，如果某個聰明的學生能提出一個有興趣的問題，他就會從各方面加以解釋。這種解釋可能很廣泛，令人很愛聽，很感興趣。有時他會說：「嗯，說實在的，你沒有準備我指定的課程。但我指定的課程的確很有內容，希望你能用心去讀。」於是他把書翻到那一頁開始念一下。然後他再講一段他自己出席國際會議的經歷。我必須指出，常年這樣坐着聽講實在是很乏味的。但是，許多寫國際法論文的學生告訴我說穆爾教授對他們很有幫助。

我也曾從吉丁斯教授（Franklin H. Giddings）研究「社會學」。他授課可以說是一篇經過充份準備的演講詞，從不偷工減料。他除了教課外還擔任教會職務。有時我們想找個機會向他發問，或是反對他對歷史和文化發展的觀點。但他從不給我們機會。

有一次，吉丁斯教授從墨西哥渡假歸來，第一次上課就告訴我們，他在墨西哥過了一個很好的假期，他的精神已經恢復。接着他又說，這次旅行，他的基本學說之一——文明是從下層開始的——被證實了。他說：「當他站在墨西哥大街上時，他看到那裏的女人穿着各式各樣的衣服。但是，她們的襪子都是相同的，大多數都穿絲襪子。這足證文明是從下層開始的。」這是吉丁斯教書生涯中僅有的一次跡近幽默的說詞。

在財政方面，哥大有赫赫有名的塞爾曼（Edwin R.A. Seligman）教授。他的「公共財政」在哥大是最叫座的課程之一。我看得出他是公共財政的權威，是口才便給的演講人。但他何以致此，我却不知道。上課時他能自始至終控制住聽課人的情緒。第二學期他因病不能繼續再教，於是校方從其他大學

請來一位教授，來繼續講他未完成的課程。於是出席率大減，學生聽課的情形也不似過去。

哥大教「政治學原理」的教授鄧寧（William A. Dunning）年高德劭。他已完成他的傑作「政治思想史」第三卷。鄧寧任教哥大的同時，還有一位年輕的教授，名叫拉斯基（Harold J. Laski）也在哥大教授同一門課程。他在城中新設立的社會研究所授課。我上午去聽鄧寧的課，下午去上拉斯基的課。他們二人不僅在理論上針鋒相對，教法也截然不同。鄧寧不獨斷、不大重視教條。他僅僅提出對問題的看法，他認爲：如果學生肯考慮他所提出的看法，加以深思的話，他們一定會了解政治學說的最終問題是政權的性質問題，政治家的最終目的是保護政權。在政權穩定的時候，大學教授們似乎用不着强調穩定政權的困難。但從那時起，我就感到有些國家的人民，連最低限度的穩定都做不到，而穩定政權、建立秩序乃是一國政治的基點。若干年後，我越發認爲鄧寧教授的見解是高明的。

與鄧寧正相反，拉斯基教授以其雄辯滔滔的口才慴服了我們。他具有驚人的記憶力。授課時他會引證柏拉圖、亞里斯多德、奧斯丁、聖・阿奎那以及法國大革命前各家的著述。授課時，他從不停止。我們常被他的言語帶開。我認爲有許多次他自己也如脫韁野馬，易放難收。在過去的五十年中，無疑的，拉斯基在世界很多地方發生極大的影響，風靡了英國、亞洲、尤其是印度。

在哥大，有兩件令我高興的事，必須在此敘述一下。第一是沙費爾德（William R. Shepherd）教授，他教我們「歐洲發展史」，他的觀念使我終生感到不安，他的理論是無法否認的。但我們對歐洲發展的倫理價值却是懷疑的。由於十六、十七、十八世紀歐洲人向外擴展的結果，大家不禁會問：「究竟西班牙人佔領南美，英國人統治印度，以及十九世紀末歐洲人瓜分非洲，是對還是錯？」歐洲發展的背後沒有什麼哲學基礎，也沒有什麼計畫。歐洲人向外擴展的原動力是利益、政治力量、傳教、昔日的英雄主義。在發展過程中，歐洲國家把他們的文明（從政治、經濟、到宗教），帶到新發展的地區去。另

一方面，歐洲人也從佔領地區學到一些事物，開始更了解歐洲人在歐洲以外土地上接觸到新動物、新植物和新社會；這些社會都有他們自己的傳統、自己的生活方式，有些雖然不如歐洲，有些的確很好。因此歐洲人在知識方面能够有機會和歐洲以外地區比較，並能對整個人類生活和物質實體及現象有所了解。如果說歐洲人不向外發展，科學的新生幾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法國的革命哲學，如果不是因爲歐洲人進入其他社會（有些是原始的、有些是古老的）也不會發生。

就我記憶所及，沙費爾德教授從未用過「帝國主義」一詞，對於歐洲人的擴展，他的倫理觀念如何？我不得而知。但他却不停的討論此一問題。他對世界性、持續性的發展本身就極有興趣。

因爲沙費爾德教授從來沒有討論過帝國主義問題，所以他的課自然而然引起我對此一問題的好奇心。因爲中國是歐洲帝國主義者的犧牲品，所以，在不問歐洲對外發展究竟對歐洲以外地區是福是禍之前，我是不能聽他的課和讀他所介紹的書籍的。我也不能不問是否能有較好的方法來解決此一問題。當然，有一件事是確定的，自十五世紀葡萄牙人開始活動起，至十九世紀末瓜分非洲爲止，從未有人提出像國際聯盟所具有的「代管制度」（Mandate System）和像聯合國憲章中所包括的「託管制度」（Trusteeship System）的想法。歐洲拓殖祇是一種臨時現象，或是一種管訓工作的想法。

當時霍布森（John A. Hobson）有一本書名叫「帝國主義研究」（Imperialism, A Study），深獲我心，使我對帝國主義得以明瞭。後來我又發現：這本書對印度的尼赫魯也產生重大影響。「帝國主義」一詞過去沒有人給它下個定義，也無法下個定義，它是一個和人性一樣難以界定的偉大名詞。自然，我們所談的是實質絕非字面。現在我們先不談帝國主義，讓我們先回頭討論一個比較古老的名詞——「殖民地化」。殖民地化是怎樣的形式呢？所謂殖民地化是一種力量的發揮，此種力量無以名之，你可以稱其爲「組織力量」。說得更清楚些，它是居住在一個地區的人們向住在另一個地區的人們發揮這

種力量。如果兩個地區，殖民地區與被殖民地區之間的力量相同，就不會發生所謂殖民地化的問題。在不同的力量間予以調和能解決殖民問題嗎？澈底消除殖民對人類能產生絕對好處嗎？當然，我們認爲：歐洲過去的殖民方法可以更好一些。但這不過是事後聰明。在過去歐洲人認爲：他們的殖民方法已經很好、很實際。

作爲一個中國人，我對殖民或帝國主義並不深恨，因爲我感到中國如果願意，同樣有資格能產生與歐洲相同的組織力、相同的政治、相同的經濟水準以及資源。改良中國生活方式，根除無效率、渙散的習性，就能建立有效率的生活方式。我不敢肯定的說，目前所行的拓殖是有害而無利的。歐洲人在殖民到各洲時做了很多事，有些他們有意作好，有些他們有意作壞。那些日以繼夜終年高喊打倒帝國主義，而不能提高自己生活水準的人，我認爲他們是自戕、是怯懦。易言之，帝國主義或拓殖主義下的犧牲者，他們可以改善他們自己的處境，至少，可以用平等或互惠的關係來代替一方統治另一方的關係。

當我離美返國時，我仔細回想沙費爾德教授的授課內容。當時，中國反帝國主義和不平等條約甚囂塵上，但我一直不能像其他的國人那樣仇恨帝國主義。

另一個重大發現是海斯（Carlton J. H. Hayes）教授，他事實上是我博士論文的指導教授。海斯教授使我明瞭工業革命發生使社會本身起了巨大的變化。工業革命前的社會和工業革命後的社會是截然不同的。工業革命前的放任主義在工業革命後已經全不適用。國家必須干涉。他淸楚指出：德國俾斯麥和後來英國的勞合喬治有關社會的立法，是順應時代潮流而且是非常高明的。我敢說：海斯在哥大授課的當時，他的立場是左傾的，儘管當時左傾一詞還未被使用。我很奇怪，人們也沒有說他是社會主義者。事實上，他也不是社會主義者，不過他對社會立法極有興趣而已。若干年後，當我再赴美國時，許多對社會安全措施的批評，令我大感吃驚。如果說，羅斯福總統不能或不應該從事俾斯麥於一八八〇

年在德國，以及勞合喬治於二十世紀初期十年在英國所從事的社會工作，那是十分荒謬的。

根據海斯和沙費爾德兩位所授課程的啓示，我決定了我的博士論文，題目是「勞工與帝國」。內容是討論英國工黨的國內外政策。我發現英國工黨，在高度工業化和純帝國主義的國家中，能鼓吹一種新方法以建立國際組織，令我深感愉快。英國工黨以爲：新時代的英國，如果放棄統治的觀念而代之以合作的觀念，必能保持其原有之偉大和光榮。我並不是說，英國工黨創出一種新帝國主義哲學，事實上亦不可能如此。因爲在工黨提出上述主張之前，自由黨和保守黨早已提出過類似主張。帝國和英國其它事物一樣，有其傳統性，該傳統是持續不斷的，很多人都對它有過貢獻。英國對所有參預建立大英帝國的人，包括我們中國人在內，都用不着抱歉，因爲帝國主義的種種是混雜的，但總說起來，都是有價值、仁慈的。

在談到國際問題以前，海斯教授出版一本論述民族主義的短論——「族國主義論叢」。就我記憶所及，該書最先並非與授課內容或筆記內容一樣。不過，它的確令作者花了很大的心血，作者似乎將他所有的見解都注入書中。我一直沒有放過那本書，一讀再讀。它令我感到困惑、茫然，但也感到够刺激。我決心一俟回到中國，儘速將那本書譯成中文。

無疑的，我們當代的中國人都是民族主義者。拋開精神方面問題不談，中國已因鄉土觀念和氏族觀念而積弱。如果實行高度的民族主義，對中國人一定是有好處的。以當前政治而論，民族主義幾乎成了教育界的宗教。海斯教授所主張的我不能全部接受。我認爲：他書中有些地方離題太遠，不適於我國。中國是一個半專制半民主的國家，自然，它下一步是應該建立一個民主國家。目前精神基礎已經建立了；只是組織架構尚待完成而已。另一方面，我認爲海斯對民族主義的論文，如果能在中國開出第一朵民族主義的花朵，則可使中國民主組織架構順利而自然的趨於完成，否則，就建立不起來。就中國人說，

他們沒有理由認為中國是神聖的，也沒有理由認為祇有他們才是愛國的，靠他們自己就可以救中國。由於中國人認為他們自己的愛國主義是公正的，於是他們就忽略了別人的愛國，忽略了別人也有理由去愛國，這是不對的。

當中國人熱衷於救國主義和中國文化時，他們往往犯錯誤，往往從偏狹的角度去接觸問題。中國人的過去，正如多年來所努力的一樣，的確有許多偉大的成就。但同時也有許多缺點。是否中國後代人應該繼續維持中國的傳統呢？即使是如此，他們也可因研究其他民族的精神遺產而得到極大的好處。我們越是對其他民族的歷史有了解，越能尊崇我們自己的歷史。我們越對西方哲學有了解，我們就越能推崇、了解中國自己的哲學。同樣的，如果我們能用比較的方法來研究中國文學，我們就越能重視中國文學。總之，欲想建立新中國，中國人就必須吸收全世界的資源，精神方面的和物質方面的。

在這方面，世界的注意力應該集中於中國的物質建設，是項建設計劃，已於一次大戰期中由國父提出。國父是一位民族主義者，但他在計劃發展中國經濟時，却提出中國要盡量利用外國資本及技術的主張。他稱他發展中國的計劃是「國際開發中國」。此一工作的名稱曾經引起批評。我認為這是國父思想太新的原故，他不僅比中國人、甚至比許多世界上其他人也新了幾十年。

因為我有了以上的意念，因此我想把海斯教授的書譯成中文。出我意料的，該書譯本相當暢銷。

一九二一年，我擔任美國東部各大學中國學生夏令會主席。我們的會址設在康內克提州派克維爾豪克斯（Hotchkirs）學校可愛的校園裏。有兩百多名學生聚會在一起。碰巧在聚會開始時，華盛頓美國政府宣佈召開裁軍及有關遠東問題的會議。這樣的大事，我們學生豈能輕易放過。一年間，所有留美學生都為華盛頓會議而激動。

當我們在派克維爾聚會時，我看到前期畢業同學，他們有些已經在中國自封為學生領袖。也有些

生埋首於特殊研究工作，他們前來聚會是為了多認識幾個人、休息一下以及和他們的同行專家們交換意見。此外，還有一些出生在美國，在美國長大的年輕人，他們也願意參加那個團體，參加團體中的愛國活動。

我們所遭遇的第一個問題是語言問題。來自國內的學生堅持聚會時要用國語，禁止用英語。此一嚴格規定，無異將至少百分之三十的人關在門外。我認為這樣很糟糕，損失很大。在美國出生長大的中國人，他們沒有機會精通中國語言，至少，無法精通到可以公開表達的程度。對此問題，大家爭論的很厲害，使我感到吃驚。我對此問題沒有作成決議，我提議：每人都可以說他自己認為最能表達意思的語言，主席可以翻譯他的發言大略。盡管我的提議雙方都不滿意，但他們還是接受了。

華盛頓會議原意在裁減海軍，這和中國幾乎是沒有關係的，中國事實上等於沒有海軍，列強之間對海軍的限制對中國是沒有影響的。但會議中也要討論一些有關中國的問題，譬如：中國境內的租借地問題、關稅自主問題、領事裁判權問題以及山東權利，包括以前德國在山東的鐵路和在青島的權益問題。有關上述各項問題，中國人的看法是一致的，我們都希望中國能和其他國家一樣享有自主權。我們希望關稅能够完全自主，我們希望收回租界地，每方寸土地都由中國人自己治理。我們希望廢除領事裁判權，所有居住於中國土地上的居民，無論是那一國的，都要服從同一種法律，隸屬同一法院。站在中國立場，我們自然認為德國以前在中國所享的特權，於戰後自然而然的應該交回中國，絕不應該轉移給日本。在這方面，大家沒有什麼歧見。大家所爭論的是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方式問題，有人主張採取漸進的辦法，有人主張即刻廢除。

引起派克維爾夏令會與會人員們注意的是出席華盛頓會議的代表，他們是北京政府任命的。國父已經在廣東成立一個與北京對立的新政府，他宣稱：他的政府才是中國惟一的合法政府。他和他在美國的

代表，要求美國撤回對北京政府的承認，改而承認廣東的政府。我們學生們認爲他的主張不切實際。我們指出：如果美國果眞撤銷它對北京政府的承認，其結果，在華盛頓會議中就沒有中國的代表了。果爾，我們認爲中國一定會受到損失。尤有進者，我們認爲：北京政府所任命的代表也同樣是愛國的，代表中有：駐美公使施肇基博士、駐英公使顧維鈞博士，他們均是夙有機智的愛國者，堪稱一時之選，必可稱職。如果南方政府派代表，其才華及愛國程度也不會超過他們。我們在派克維爾聚會的學生淸楚指出：我們要恢復中國的權利，至於誰應該在華盛頓會議中代表中國，乃是次要的問題。

儘管我們設法很禮貌的表明了我們的觀點，但到最後我們還是不能兩全其美，我們對此很感困擾。我們對北方軍閥是沒有用處的，我們也不願在當時與擁護國父的人爲敵。

國父在美國的首席代表當時是一位名叫馬素 (Ma Soo) 的紳士，有時他設法表現他極有才學，他能引用許多拉丁古典字，簡直能把我嚇倒。但和他談到政治却無法深入，他是一個盲信者。我們之間如果不談政治問題，他就恢復了人性，變得幽默、有理性、有節制。漸漸的，我認爲他是在演戲。以他在美國代表國父的身份，除了攻擊施肇基所率的代表團外，可以說什麼工作也沒有作。因此，我們學生認爲設法使雙方達成協議是沒有用的，因爲正式協議是不可能的。

夏令會結束時，我們成立一個學生委員會，我也是委員之一，委員會的主要任務是監視華盛頓會議進行情形。當我從派克維爾返紐約時，聽說馬某已經煽動中國城的人民用暴力反對我們學生。羅家倫（Lo Chia-lun）—我在派克維爾的一位密友，他認爲我們最好立卽趕往中國城，面對羣衆。我們到中國城最大的中國報館編輯室，和那裏的人辯論。爭論了幾個小時，報館編輯要我們寫一篇聲明，表明我們的立場。羅先生用毛筆寫好聲明，並且爲報館製版。聲明發表了，我雖不敢說聲明說服了馬某的羣衆，但却使他們冷靜下來。從那時起，我們與中國城的同胞卽不再有芥蒂，學生們中間也沒有困難了。因爲

羅是位有名的書法家，聲明是用毛筆寫的，所以那份聲明後來也成了著名的墨寶了。

華盛頓會議開始時，中國官方代表團都出席，另外，還有兩位民間代表。事實上，我們早已開風氣之先，開始所謂民間外交活動。民間代表之一是北大教務長蔣夢麟，另一位是青年會總幹事余日章。他們的才華和愛國熱忱，爲國人所深知。他們出席會議似乎保證中國人在華盛頓必定愛國。事實上，蔣博士和余先生以及官方的代表，他們都是愛國之士。

會議進行期間，我們學生委員會的委員也到了華盛頓，我臨時兼任余先生的秘書，因而有機會看到會議進行的情形。我敢說，中國代表在華盛頓會議中所表現的非常傑出。在恢復主權方面，也略有進展。例如：在關稅方面，中國雖未能恢復關稅自主權，但列强却同意中國可以適度的調整稅率。華盛頓會議同意中國於改善法院和司法行政後，列强考慮廢除領事裁判權。還有，山東由日本交還中國。因此，於評估會議最後結果時，我們可以說：偏頗的威爾遜總統在巴黎對中國的承諾，在華盛頓會議中根本未予兌現。儘管中國在關稅、租界、治外法權等方面收穫不大，但在恢復主權方面，華盛頓會議却是重要的一步。

因爲我們中國學生在開會前後，都曾遊行示威，所以知名度相當高。當代表們出席大會重要會議時，我們利用口號和標語，使各國出席代表清楚知道，中國要在國際家庭中完全平等。

有一點，我們認爲相當滑稽。有一次召開一個討論中國關稅問題的預備會。美方出席會議的代表是亞拉巴馬參議員恩伍德（Underwood），他是個民主黨份子，我們當時感到很奇怪，華盛頓共和黨的政府居然派一個民主黨份子出席會議，討論外國關稅問題。有關美國關稅問題，是共和黨說了算，但是中國關稅問題，却是恩伍德說了算。

在這段時期中，我沒有上課，但是却開始寫論文。爲了盡量參預華盛頓會議事務，以致論文停止了

一學期沒有動筆。我以研究生的身份出席會議，主要目的是要學習一些東西。我學到許多外交禮節。當時聚在華盛頓的人很多，他們都被認爲是專家；其中有福開森博士（Dr. John Farguson）他是著名的中國藝術權威，當時他擔任中國總統徐世昌的顧問。他替徐世昌監視會議有關事務。此外尚有霍普金斯大學政治學教授韋羅璧（W. W. Willoughby），他爲中國代表團做了許多文書準備工作。還有芮恩施（Paul S. Reinsch），他在威爾遜執政之初曾任美國駐中國公使，華盛頓會議時，他已退休。他以前是威斯康辛大學政治系主任。芮恩施是美國總統從教授羣中擢升爲外交官最早的一個，我對國父發展中國經濟的主張發生興趣，就是受他的影響。他曾盡量使西方政府對國父計劃發生興趣。當世人對國父的民生主義不感興趣時，他深感失望，這是我永難忘記的。

此外還有辛普森（Berlram L. Simpson），他曾寫過許多有關遠東的新聞報導。我在宴會、茶會等各種場合見到他們及一些其他的人們，我聽他們談到他們的經歷。華盛頓會議使我這個研究生獲益非淺。

第十章　革命仍須努力

一九一一年〔辛亥〕秋天革命發生時，我曾根據教科書中有關法國和美國革命的記載，估計中國革命所需的時間大約要十年左右。如果我留學十年，回國後正好參加革命後的重建工作。但當我拿到護照和船票準備放洋時，我發現事實與我估計的頗有距離。革命已經過去了，南北和議已成，袁世凱繼孫中山先生之後出任總統，似乎天下大定了。但我已經箭在弦上不能不赴美國，否則，豈非半途而廢，前功盡棄了。

不久，我發現我的估計並沒有錯。事實上，我的估計還相當保守。中國革命持續的時間比美國革命的時間還長。迨我一九二三年春返國時，我甚至擔心中國革命的時間比法國還要長。即使離國十一年（美國十年，法國一年）中國分崩離析如舊。而我也祇能在這種情形下工作。

回國後，上海予我的印象並不太好。上海給我的印象是太亂與不調和。街上有現代化的汽車、摩托車、電車；也有落伍的黃包車、牛車和手推車。我們可以看到婦女穿着巴黎、紐約人都嫉羨的服裝溜街漫步，也可以看到婦女穿着最不合時尚的大口袋褲子。

我在上海未作長期逗留，我感到當時留在上海對我實在沒有好處。這種五花八門的現象以及這種現象所予我的感受實在無法形容。

正好在我離美返國前我接到一份聘書，聘我到天津南開大學敎西洋史。與我同時接到聘書的還有一位

孫倫 (Sun Lun) 先生，他也剛在美國完成研究工作，準備到南開去教商業經濟，我們從上海搭車赴天津。

南開大學是由南開中學發展來的，南開中學係由張伯苓博士創辦。南開就是張伯苓，張伯苓就是南開。張氏曾任北洋政府海軍軍官。一八九四年張氏脫離海軍，不久即在天津一位遜清官吏家中任家教。這位官吏不是別人，他就是遜清學部侍郎嚴修（範蓀）。因爲海軍軍官有相當敎育水準，不僅對中國傳統的學識，甚至對新知識如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學等也有相當根基，於是張氏就成爲嚴家的全科敎師。後來學生人數日增，嚴家的私塾就從嚴家搬出來，遷到他家一所獨立的房子裏，漸漸變成了張伯苓學校而不再是嚴修私塾了。

南開，就我一九二三年所知，有一所男中，學生約有一千人。大學部設在一所舊中學中，有兩百名學生，十九位先生。後來，南開又設立一所女中。

南大的房子原是一所中學。但在我到南大以前，張博士即決定遷校。他在天津郊區找到一大片空地，其中部分是沼澤，部分是農田。他和總務人員想出一套高明的辦法，在那片華路藍縷的荒地上開闢了一個校區。他們挖了一條水溝，用挖出來的土塡平了坑坑窪窪的地，再在平地上建起房子。每一棟大樓旁邊都有一個水池，因爲是用水池的土塡補了樓基的關係。爲求美化起見，池中再種上荷花。此一設計非但解決了建築上的困難，而且也極方便，可以免掉許多土方工程。隨着時間的推移，天津郊區竟出現了一所廣濶的校區。此擧相當了不起。了不起儘管了不起，但却一直無法除掉沼澤地區的霉味和附近猪、驢的騷臭氣味。張博士對此情形毫不在意。事實上，在新舊交替的中國，南開當時的情形正是一個典型。

欲想道出南開的精神實在是很困難的。首先，張校長認爲敎育的主要目的是樹立學生們的品格。他自己言行一致，向此目標邁進。無可懷疑的，南開學生的品格是負責、值得信任的。

其次，南開教育是求實的。在我返國時，大多數學校都發不出薪水。國家稅收都用於十年內戰了。因爲學校不能按時照規定發薪，於是老師也就無心授課。大多數老師都盡量兼課，因爲薪水是按鐘點計算的。某些老師成了兼課專家。一位精於此道的教員他可以算出合法缺課的時數，並且上課時又可遲到若干分鐘。結果，每週竟有人兼課四十小時的。易言之，教育完全成了破壞道德的東西。這種情形在南開是沒有的。張校長很嚴格。他按規定付酬，也要老師全力授課。南開老師大部分都守規矩，學校名氣雖不算大，但學生和老師的出席率却是極高的。

第三，張博士在辦南開時，他又回到了中國的舊倫理。以中國舊道德來辦學校，張博士終身致力於教育，人們對他這一點無不推崇，很多人都捐款給該校興學。

第四，張氏是一位傑出的實幹教育家。他雖身爲大學校長，但我認爲他對學生智力方面似乎不太注重。他所採用的教育原理和方法，雖然以現代眼光看是不够的，但當時却是可以爲中國社會接受的。

他所採取的實際作法很簡單，遇有問題他就向同事及新從美國回國的博士們請教。例如：我記得某次經濟學家何廉（淬廉）博士出席教授會議，會中極力强調統計數字的功用，張氏問他：「你用這些數字幹什麼？你想發見什麼？」何回答說：「我的統計研究可以幫助我們用科學方法復興中國。」張氏說：「你的方法常使像我這樣的人用顯微鏡找象。如果你要想知道我們能在中國做什麼，我覺得所有的事我們都可以做，而無需去精研這些數字。例如：我們欲想從城裏修一條公路到校區，難道也需要統計調查嗎？」

有一天，張氏問另一位學者李濟（濟之）博士，李在美國是個傑出的人類學研究生，他一直想對全國人做頭部測量。張問他：「告訴我，人類學的好處是什麼？」李感到不快，斷然回答說：「人類學什麼好處都沒有。」次年，李氏離開南開。

張氏的眞正目的是予青年人以他所理想的敎育。他要年青人成爲一個負責的人，要社會把他當個大學畢業生看待。根據此種想法，張設法替他所有的畢業生找工作。的確，如果他的學生畢業後找不到工作，他會感到極大痛苦。

另一件重要事是張氏本人生活樸實，卽使依照中國的標準，也是很了不起的。他和太太住在一棟舊式中國房子裏。他私下從不飲酒，公開場合也祇是象徵性的。他出門乘黃包車，從不坐汽車。他的樸實生活得到了很大的報償。中國人和印度人都希望他們的領導人是一個聖者，必須過一種類似貧民的生活。任何人生活奢侈，就代表他的道德水準不高。但中國的苦行不似印度那樣澈底。張是中國人，因此，他的儉樸也和印度甘地不同。

我在南開敎了六年，對張的種種已經深知。由於明瞭他的爲人，所以就更崇敬他。他的偉大並非因爲他是校長或是聖人，而是因爲他很有人情味。他身材高大，超過六尺。很喜歡北方飲食，愛吃大蒜。他是一個吃家，但不喝酒。我們常談政治和內戰的罪惡。某次他問我：「你知道在中國選擇領導人的方法嗎？如果知道就可以免掉內戰了。」我回答：「是的，我能想出一種方法，但糟糕的是不論我提出什麼方法，總是能够接受的人很少。我的方法不過是紙上談兵。校長先生，你一定想出一些可行的方法了。」他說：「不錯，我對此問題曾經熟思至再，我認爲解決領導人問題最簡單的方法是選個個子最高的人擔任總統。」我告訴他我一定支持，但恐怕其他的人贊成的很少。

雖然人們爭權奪利，但張的爲人仍爲各派人士所敬仰。他是超黨派的。他從不支持任何不正當的活動。同時，他也絕不無故去侵犯人，因爲他認爲任何冒犯人的行爲都會影響到學校，都會影響外界對學校的經濟支援。一旦需要，他就設法去找有錢的大亨或是天津、上海的大商人捐錢，他們都能慷慨解囊。歹人特別尊敬正直人，這眞是既滑稽又重要的事。

我是一個新從美國回來的年輕博士，每一想到哥大教授們教給我的偉大理論和當時南開的情形我就不耐，有好幾次要發火。我認爲張本人和南開太土、太保守。其他一些年輕人也和我有相同的看法。經過深思，特別是若干年後，我對張氏反倒越來越崇敬了。事實很簡單，因爲中國沒有高度的知識水準。我想卽使張伯苓改換了他的生活方式也不會給中國帶來任何好處。張認爲如果他從事政治，他可能做了很大的官。但官位是不穩的東西，他要花很多時間和精力去保持，於是就沒有太多的時間從事建設事業。他如果從海軍轉到陸軍也可能成爲中國攫奪大權的軍人之一。但是他同樣要花很多時間和精力去保持官位。因此，他才集中畢生精力，致力於辦學。他終生不倦，信守他的原則。他爲教育才去交接各方面的朋友，並非因爲他自己的光榮和事業。

中國有些偉大事，卽使是在那個貧窮、落伍、分裂的年代也是偉大的。在貧窮、殘酷鬬爭的中國社會中，中國人還很講面子，對正人君子大公無私的人還很尊重，對於慈善事業願意伸出援手。這是中國歷來的遺風，它使中國能在所有的災難中屹立不搖。

中國政治，從一九二〇年開始，發展的很快。先是國民黨革命軍打倒了北方軍閥。接着是對日戰爭。再接着是國共之間的衝突。在此紛爭時期，張氏的學校一直受到各方面的支持。共黨竊據大陸北方時曾函請張氏繼續辦他的南開，保證絕對不會干擾他。卽使是共黨對他都很尊敬。在這段動亂期間，換過好多軍事領袖。有些是胸無點墨的，有些是出身草莽的；但是不論他們的教育背景如何，政治哲學如何，幾乎都是崇拜張伯苓的。對他是一種尊敬，對中國文化是一種貢獻。

當我返國時，我已離開祖國有十一年了。顯然的，我有義務去探望我的家人。我本該直接從上海到湖南探視我的祖母、雙親、叔嬸、兄弟姊妹和一些親戚的，但我要趕上南開的第一學期上課，所以未能如願。後來，我想回家過舊曆年比較好。因此，一直延到一九二三年十二月才回到我一別十一年的老家。

我由天津搭車到北平，再從北平到漢口。從漢口乘船到長沙。在長沙我探望了我昔日的教會學校老師林格爾夫人和我的弟弟，彼時他正輔佐林格爾夫人從事教會工作。他較我先兩年回國，留美時他在芝加哥大學研究教育。我抵長沙時，彼時大家談的都是拆除城牆的事。城牆拆後修了很新很寬的大馬路，拆下來的廢磚修了許多學校教室，大批學生到省城去求學。煤油燈代替了舊時的桐油燈，人們的衣着也改穿機織布。然而，就我記憶所及，長沙在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大部分還是很古老的都市。沒有一家現代化的旅社。街上不見一輛汽車，到處都是轎子、黃包車和手推車。街上的女人比過去多了，學校中的女孩子年紀都很小。

我從長沙乘車至湘潭，從湘潭我要坐轎子。湖南當時正值荒歉過後，萬國紅十字會發起用以工代賑的方式修築公路。我坐在轎中，可以看到新公路正在修築中。我急於要在舊年前趕回老家，於是我多僱一名轎伕趕路。我答應他們如果四天內走完八十公里送我到家每人另加賞錢。爲了幫轎伕們的忙，我每天儘早出發。下午十一時左右我就下轎步行最後的幾公里。儘管如此，我到家時已經是舊年的大年三十中午了。

轎子大部分是沿舊官道走，舊官道像條蛇似的伴着公路蜿蜒前進。公路很直，而舊官道是按照鄉村情況修築的。舊官道上每隔三、四里就有一個市集，每個市集都有小客棧和商店。因爲公路在市集旁經過，我可以看出房地產價值降落了。商業已經遠離舊官道，那些靠小客棧維生的人不久將失業。時代進步爲某些人帶來了災難，這是促使進步的人們始料所不及的，同時也沒有預謀補救之道。

路上走了四天，途經八十公里，三個轎伕輪流抬轎子，我坐在上面，一個轎伕背行李，此行我花了約三十元銀元，約合美金八元。若干年後，我又回一次家，改乘汽車，路途遠近相同，又有我的堂兄夫婦兩個搭便車，再加上我們三個人的行李。午後二時從長沙動身，傍晚五時就到家了，所費不過八塊多

錢（美金兩元多）。現代化的交通工具不僅節省了時間，也節省了金錢，總之用人力是最浪費的。

在我抵家前，我聽說族人要出廓三里來歡迎我。有樂隊還有旗幟。他們的意思是表示族人中出了一個留美博士。不論從那方面說這都和古時慶賀進士、翰林榮歸一樣。他們要以迎接翰林的儀式來接待他們的族人。我趕緊帶信給伯父，他正在家主持此一迎接大典，告訴他我不希望這樣舖張。事實上，我也估不準抵達的時間，他們這樣費心實在沒有用處。於是歡迎大典算是取銷了，但其它的傳統習慣還是不能免的。

舊年，族人要在家祠中爲我舉行一個宴會，我婉拒無效。我帶兄弟前往，請他權充我的「禮賓司長」。因爲誰老誰少，誰是我的什麼人我都搞不清楚。在家祠中對每位族人我要怎樣表示才能恰如其份？我敢說，我進家祠實在有些恐懼。簡直比我在哥大得博士學位還緊張。宴會一開始是大家敍禮。這個項目對我說沒有多大困難。接着族中長輩宣佈盛宴齊備，讓我就坐。按規定我要坐在第一桌的首席。我舉目整個家祠，覺得我實在不能坐在那個坐位上，否則就違反了中國長幼有序的傳統，於是我辭不就坐。但長輩們說：「這個宴會是請你的，如果你不就那個位置，別人都不能坐。」我告訴他們：「我不能坐在那裏，因爲，擧例說吧，我的伯父在這裏，他和家父同輩。還有叔祖某某，他們都是我祖父同輩。在家祠中我怎麼可以坐在這些人的上面？」他們似乎認爲我說的有理。最後，我說：「我提一個建議，我坐在第二桌的首席，大家可以請一位在坐的眞正族長坐在第一桌首席。」我走到第二桌，把第一桌首席位置空出來，我站在那裏看看究竟誰會坐那個位置。大家都拒坐那個位置。最後還是我的伯父就了第一桌第二個位置，把首席空起來。解決禮俗問題這倒不失爲一種聰明辦法。宴會終了，族人爲了學時髦要我來一段演講。在舊時代，並非每個人都能在家祠中演說的。但當時他們堅持如此。於是我站起來，談了一些留美的情形，以及中國需要教育等等。如此這般，我完成了那次中國鄉間的宴會大典。

這次回老家又惹出了一些其他的麻煩。我哥哥的內弟趙先生舊年來家拜年。我們招待他食宿，藉機我又約了一些族人作陪。飯後，趙先生開講了。他講的要點是：蔣、趙兩家門當戶對，且爲多年世交，他姐姐明媒正娶嫁給蔣家，但是始終沒有圓房。他姐姐沒有別的希望，祇求能圓房生個孩子。此外別無奢望。如果我哥哥要娶小老婆也無所謂，但是圓房是必要的。所以，趙先生請我幫忙，促成他們願望。這件事事先我就料到了，但當我仔細想一下，我實在拿不出什麼解決的辦法。家兄的婚姻是他的事。尤有進者，按照我國習俗我是弟弟，我不能命令他圓房。再者，我實在不知對家兄從何說起。他曾反對這個婚姻，但是族人硬迫着他完婚，他祇是表面服從，一直沒有把對方當作太太。他早就告訴過我的父母，在婚姻問題未解決前他絕不回家。我哥哥倒有一個聰明的解決方法：他希望我繼母能收對方作女兒，她可以以女兒身份住在我家，或是以修女身份住在我家。我既已知道家兄的想法如此，所以無法肯定答覆趙先生。更不用說答應他的請求了。我祇能告訴他此事無能爲力。實在無法幫他姐姐的忙。費了許多唇舌，我祇能把當天晚上的情形報告給家兄。至於他對此事的反應如何我不得而知，因爲我認爲實在不該强其所難。我必須再補充一句，我的家人——繼母、祖母、伯母——都認爲趙家的女孩子是對的，我哥哥理屈。但我不能干預其事。問題祇有拖下去。若干年後，那個悲劇性的女孩子死了，悲劇才算落幕。因爲當時我們是生在新舊交替的社會中，所以似上述的事情——解除婚姻——實在不是一件小事。人們往往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訂婚甚至結婚，而自己却不贊成這種婚姻。

當然，在舊年中，我還要給長輩拜年，同時也要接受晚輩給我拜年。我要弟弟列一張名單，上面寫上要給我拜年晚輩的名字。名單的次序是按年齡和關係排列的，以便事先我能準備一點小禮送給他們。中國習俗晚輩第一次拜見長輩，長輩應該給一份禮物，一般的都給一個紅包。於是我把紅包準備好，上面標上名字。如果有晚輩來，我弟弟就把應送的紅包交給我。照這樣我想一定沒錯。

那年祖母已經八十歲，出人意料的她仍精神健旺，身體健康，只是不及我一九一一年赴美時的情形而已。

鄉間大部分和過去一樣。我雖然可以看出某些變化，但並不太大。一九一一年我離家時，鄉下人沒有抽香烟的。一九二三年我返鄉時，我自己是吸烟的，鄉間也有好多人吸香烟了。我弟弟當家，他甚至能從附近買到香烟。點煤油燈的人家已經有一半，衣着全是洋布縫製的。許多人都購買新紡織機，舊織布機雖有，但已爲數不多。各種鐵器大部分都是機器製造的，鐵絲則完全是機器製造的，但是種田的方法却如十年前一樣不曾更改。

我家和過去一樣，沒有什麼變動。但我伯祖父那一股却變動很大，他們的田地變賣了很多，所餘已經不足維生。結果，年輕力壯者都去當兵。我親眼看到經濟貧困下的政治措施。內戰是貧窮的原因，也是貧窮的結果。人民越窮，越得向軍中去找職業——當兵。兵越多，國家越窮。我叔祖的兒子，在鄉下無以維生，於是當了兵。有些一去不回，有些音信皆無。若干年後，有的回來了，說他們升了官，升了個什麼中尉、上尉的。

家父於一九二三年夏去世。我哥哥和弟弟親自負責殯殮。但我却面臨一個問題：我們應否請和尚念經。當時我剛離開哥大半年，我認爲請和尚念經完全是迷信。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如果不念經，我的親戚故舊會以爲我捨不得錢。於是我對哥哥和弟弟說，依我的意見，我原不想省錢，但可以用這筆錢來修繕我家附近的一座廟宇，利用廟宇來辦一所學校。他倆接受了我的建議。是年冬，我回家給父親上坟時，鄉里和親友沒有人認爲我的決定是不當的。因此，我認爲我是在鄉間做了一個進步榜樣。

若干年後，大約是五六年以後，我姐姐到北平去看我，我們談到家務。她突然問我：「弟弟，你還記得葉奶奶嗎？」我說：「我記得很清楚。」「喲！」她說：「你該曉得，她在我家住了許多年，你小

的時候，她照顧過你的。」「是的，」我說：「不錯，她近來如何？」「啊，她死了，但大約在他死的一年前，她有時自言自語，有時對別人說。」我問：「她說些什麼？」「啊，她說的很奇怪，她的口氣好像我們的父親。」「她說：『崳山（我哥哥的名字），你錯啦。不管怎麼說你是老大，你應該請和尚給我念經，你居然沒有在意，現在弄得我的鬼魂飄蕩無依，無法轉世。』另一次她說：『泉清（我的乳名）你也錯了，因爲你也反對念經。不過，我倒高興你這樣做。因爲我還沒有離開這個世界，我可以照顧你們，替你們消災解難。』弟弟，你說這是什麼意思？爲什麼她在去世的一年前說這些話？」根據我的分析，而且我認爲我的分析是正確的，這是因爲鄉下人在禮貌上不願公開批評我們不給父親念經的事，但另一方面心理却感到不舒服，認爲我們違背了傳統。他們無法反對，改變我們。但這件事又無法令他們心平氣和。他們認爲我的違反傳統的擧措是野蠻的，無論如何都不該那樣做。於是我即刻寄錢回家給父親念經。從此我就沒有再聽說父親回來對我們說什麼了。

學校並未正式供奉我的父親，祇是大家了解那所學校的創辦是紀念一位故世的人。事實上，我們也沒有設置供桌和任何可供祭祀的東西。我們祇是把那所破廟稍事修葺而已。我們聘老師並告訴左鄰右舍，從那時起，就有一位老師住在廟裏，所有年輕人都可以免費上學。那是一所日校，類此情形過去不是沒有過，祇不過不是節下念經的錢興學而已。

一九一二年元月當我離國時，我連中學都沒畢業。我的國學基礎很差。去國十幾年，令我更感荒疏。顯然的，我的第一步工作是應該先充實自己。我從六歲時在鄉間所讀的書開始溫習，重讀四書五經。我並不想死記這些經文，但反複高聲朗誦的結果，大部分過去所學又重入我的記憶。我繼續研究文章和詩詞以及其它適合我研讀的書籍。我首先閱讀宋人司馬光的「資治通鑑」。

在中文方面，我回國後發現有一個變化。很多定期刊物已經改用白話，也就是一般人所用的口語。

而不再用中國古書上的古典文字。換句話說，中文第一次成爲活潑的語言，而不再是過去若干世紀的呆板文字。此一變化，首先使國文教學簡單容易。就基本閱讀和寫作說，無疑的，白話也比文言容易，祇是形式和表現方式問題尚待努力而已。可是學起來却方便多了。

在美研究時，我對中國外交極感興趣。那時有關中國外交的標準書籍是莫斯（H.B. Morse）的三卷「中國國際關係」(International Relatinos of the Chinese Empire)。該書是依據英國藍皮書和美國對外關係叢書寫成的。就英、美兩方資料說，莫斯的書是無懈可擊的。但，事實上，僅憑兩國資料是寫不出傑出的外交著作的。因此，莫斯的著作觀點是片面的。他對參加鴉片戰爭及英法聯軍和談的中國人士的描述是模糊不清的。這些人當時對問題的看法究竟如何？他們提出過意見嗎？十九世紀中國的外交觀點如何？這些問題當我在南開開課時都令我感到困擾。我想根據中國書面資料，來研究中國外交史。

蒐集中國資料是無止境的。出我意料之外，資料非常豐富。在努力蒐集時，會發生連鎖作用，由甲引出乙，由公開資料引出非公開資料。由官方資料，如給皇上的奏摺，會引出非官方的資料，如朋友間的信函，甚至家信。雖然我在哥大研究時曾立志盡量蒐集編纂此類歷史資料，但我最終的目的還是研究中國史。如今面對這一連串的有趣問題和豐富的資料，使我不得不決定先開始整編資料。

當外界獲悉我對清代歷史文獻有趣時，各方鑑定家和收藏家都來和我接頭。透過一位朋友介紹，某君帶來大批資料。這批資料原標題爲「籌辦夷務始末」，實則可稱之爲「中國外交文獻史」。就我所見這份資料，幾乎包括了滿清皇帝所發的每項命令，大臣們所有的奏摺以及各地大臣向皇帝奏請有關中國外交事務的資料。我發現這簡直是一座寶庫。因而急於要爲南開圖書館弄到這份資料。但物主開價三千銀元，南開實在買不起。在結束這段掌故之前，我要插進一段後話。緣於我從南開轉到清華時，我可以

自由支配經費購買書籍和資料。我立志要完成我的願望，首先要買上述那份資料。但，事實竟有出人意料者，我到北平清華任教不久，常赴故宮博物院。有一天，和某保管人閒談，他拿出一份上述資料故宮本給我看。經我鑑定，證明故宮本才是原本，而前述的私人本乃是抄本。我立刻建議故宮博物院當局將它影印。後來博物院採納了我的建議，發行影印本，每套一百銀元。那份抄本，經此一來，竟敵不上影印本的價值。

若干週後，美國某大學圖書館採購人打電話給我，徵求我對那份私人抄本的意見。我感到很爲難。因爲抄本是我朋友的，我既不想買他的，就不該擋他的財路。但另一方面我是一個大學教授，實在不應該建議美國大學圖書館出那麼高的代價去買一套抄本。於是我回答對方：我與此事有利害關係，不便建議，請原諒。對方對我的答覆反應如何不得而知，但據我所知，他們大約花了四千美金買下那套抄本。至今還保存在某大學的大廳中。這不過是搜求珍本書籍和資料的許多趣談中的一件而已。

天津和北平知道此類趣事的人很多，如果你喜歡聽，他們都能津津樂道。舉個例子說吧！有關李鴻章的資料在他代表清廷參加一八九六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禮以前是齊全的，但自此以後有五年資料，也就是說從一八九六至一九〇〇年是沒有的。我對這件事很感興趣。所幸，在平津當年李氏的舊部很多。有的作過他的助手，有的作過他的秘書。一有機會和他們晤談，我就把話題引到這件事上去。他們對此有很多解釋。玆將當時認爲最可靠最富戲劇性的一種敍述於後：

負責編纂李氏資料的是著名學者吳汝綸，吳是保定蓮池書院山長。當年李氏手稿都送到保定蓮池書院去。由木工鐫刻字版，以備印刷。後來，有些駐京的俄國使團人員到保定去，買通字版保管人，把一八九六至一九〇〇年的字版全部毀掉。我們可以說那是一種早期的間諜行爲。因爲李氏晚年與俄國駐京使團工作密切。一八九八年他與帝俄簽訂過「中俄密約」。一八九八年後與帝俄談判過租借旅大以及同

意帝俄在東北建築鐵路事。俄方文獻，如聯共革命後所公佈的，載有一八九八年俄國財長維特（Count Witte）爲了完成上述交涉曾予李鴻章五十萬盧布賄賂事。沙皇政府雅不欲此一不名譽事公之於世，這是可以想見的，所以才設法把中國這部分資料毀掉。我希望有一天我們能够再發現這五年資料，或是原稿或是木版。這樣，有關李鴻章的資料就齊全了。

研究外交文獻六年使我成了這方面的專家。

當時有兩件事，均須於最短期內完成。其一是中文的學習；其二是研究十九世紀中國國際關係。此外還有一些其他事情也似乎非常重要。其中之一是要了解中國社會及經濟的實質。這些都不是書本上找得到的。是否我應該將中國的社會和經濟與中世紀的歐洲社會和經濟相比較呢？若然，則我是以不了解的東西與不了解的東西相比。此舉將毫無所得。於是我決定與學生們對學校附近的一個鄉村進行調查研究。我們研究的方法很簡單，甚至可以說是很天眞。這是何廉博士和其經濟系同僚開始中國統計調查工作之前的事。我要學生們下鄉去接觸當地人，調查他們一天賺多少錢，用什麼方法，如何生活，住什麼房子，吃什麼東西，穿什麼衣服。學生們回來都說無法進行。鄉下人不和他們談，他們彼此無法溝通。我感到很奇怪。我決定帶幾個學生自己去。有些學生比我還天眞。他們到鄉村，手裏拿着紙筆。雖然他們沒有把問題一一記下，但他們却滿腦子都是問題，希望鄉下人回答。他們想寫下答案，撰寫一篇適於大學教室用的報告。當然，這引起村民的懷疑。鄉下人懷疑這些年輕傢伙來幹什麼？他們是蒐集徵稅資料的還是間諜？我要學生們不要帶紙筆，祇是到鄉下隨便走走，遇有賣茶的地方就停下來。坐下來泡一杯，大家彼此談談。一旦有黃包車伕或是農人來了，我們就設法和他們談起來。經過長時期的接觸，漸漸就能深入鄉村隱秘。我雖不相信對經濟和鄉村社會有什麼深入的了解，但我們却淸楚的觀察出某些事物的眞象。我們可以看到鄉下人的生活和大學生的完全不同。鄉下人全神貫注於一件事，說穿了，就是

尊敬長輩和未受教育的人尊敬受過教育的人的道理。到鄉下，我們能迅卽感到鄉人的禮貌、尊敬。他們賺錢吃飯。他們謀生手段，都是沿襲了他們的先人，很少改變。人人都有禮貌，每人都懂得一點點晚輩體恤最窮的人和最被忽視的人。也可以淸楚看出鄉人的努力、勤儉，以及家人間彼此的熱誠。

在學校裏，我們自然常談到鄉村、城市和國家。事實上我們對此都有很多迷惑。經過像一九一一年那樣的革命，我們採用了一部現代憲法，其中有國會，有總統選舉，我們認爲中國從此一步登天了。但是，革命已經過去十年，較之一九一一年的情形毫無進步。國會，誰還記得國會？誰對國會議員有一點點敬意？憲法，我們能對有槍桿子的人說：「你這樣做是違憲的」嗎？他對你說的根本不了解。另一方面。我們又遇到許多其它令人困擾的問題。例如：那個昏瞶無知的山東省長，擁有三十個姨太太還嫌不够，他居然也出錢印行一套精美的孔夫子經典，他爲什麼要如此？江蘇省長遺囑將他遺產大部捐給南開大學，借用當時一般人的口吻說：「張伯苓是怎麼使他着迷的？」吳佩孚將軍要他的弟兄崇拜武聖關公，又是爲了什麼？以上種種都令我們大惑不解。

另一個令人迷惑的人物是「基督將軍」馮玉祥，他是道地的基督徒，深得中國教會方面及靑年會幹事們的讚譽。他治軍紀律嚴明，秋毫無犯。但，馮將軍有許多怪癖。在中國西部有些紀念碑，是唐代豎立紀念楊貴妃的，陝西有個華淸池，據說楊貴妃常去沐浴。池邊有一個長橈子據說她也坐過。驪山、寶塔、樓台、殿閣據說也是她遊息之處。馮將軍憎惡羅曼斯，特別是楊貴妃的羅曼斯。於是他把華淸池的長橈子、寶塔都刻上孔夫子的道德格言，要人們遠離酒色。這眞是旣莊嚴又可笑。雖然中國倫理觀念看不起楊貴妃，但將道德格言刻在楊貴妃坐過的橈子上，就中國的審美觀念言，也是不倫不類的。下面再敍述一段馮將軍的怪行。有時他會充當理髮師替士兵們理髮。某次，大公報發行人胡政之告訴我一段馮在開封的趣事。馮曾任河南省督軍，開封是河南的省會。胡拜訪馮，馮延胡入內室。傾談時馮出示一幀他

要給士兵剃頭，也絕無拍照的必要；如果一定要拍照，也用不着出示給採訪的記者。」這又是一件不倫不類的事，令人大惑不解。

在天津，我有一位朋友，他最了解軍人。他就是名地質學家丁文江（在君）。我常問他：「這些人搞政治會產生什麼好結果？」他責備我說：「廷黻，你不懂軍人。你沒有資格責備他們，我了解他們，他們很多是我的朋友，我可以告訴你。如果他們中任何一個有你那樣教育程度，他們一定可以，而且絕對可以比你對國家有貢獻。」他說這些軍人的天賦都很高，糟糕的是他們沒受多少教育。有一次，我問他：「那個自封爲大總統的曹錕怎麼樣？他憑什麼能當大總統？」文江說：「讓我告訴你一件事，若干年前，曹錕檢閱他駐在保定的軍隊，在他走過士兵行列時，發現有一名士兵在啕泣。曹停下來問他：『你怎麼了？爲什麼哭？』士兵說他剛接到家信，說他爸爸死了。他遠在軍隊，無法回家奔喪。曹說：『不要哭，不要哭。給你五十塊大洋，回家葬你父親去好啦，盡完孝道再回來當兵。』」他又繼續說：「如果閣下是那名士兵，遇到這種類型的長官，你是不是也和他對曹錕的感受一樣？你能不忠於他嗎？你能不感恩圖報於他嗎？你能不覺得他是個可依靠的人嗎？軍隊，我們可以說它是第二個家。」

另一個新聞人物是孫傳芳將軍。他一度控制了長江下游五省。他是一個典型但相當開明的軍人。他委丁文江博士任淞滬商埠督辦公署全權總辦，負責執行大上海計劃。孫是東南大學的贊助人。在孫氏贊助下，幾年工夫，該校成爲中國最好大學之一。

我急於了解我自己的國家，回國之初，爲此我曾到中國各地旅行。我也注意有關國家問題的各種出版物，我急於獻身國家，但我深知離國那麼久，尤其我離國的時候才十六歲，實在提不出有價值的意見。因此，我在南開時大部時間都用於研究。但到我離開南開之前，已經不能自持，終於寫了一篇文章。

這是我在南開任教授時第一篇，也是僅有的一篇文章。該文由「現代評論」發表。「現代評論」的編輯人和撰稿人大部均係平津的大學教授。文中所討論的是關於中國統一問題。我提出兩個基本而重要的觀念。首先，我認為統一是中國富强的第一個步驟。不統一，一切都談不到。不統一，一切資源都浪費於內戰。第二，我認為中國的統一，和其他國家一樣，可以透過政治力量和軍事力量的合作而達成。任何國家和人民均不能單靠武力而完成國家統一。同時，如果沒有武力作後盾，任何國家也不能建立一個為世界各國所尊重的政府。我想：我所說的都是普通道理，但我的同事大部分都認為我過份强調了軍人在中國統一中的地位，實非始料之所及。我的朋友們急於透過憲政會議和裁軍會議途徑尋求一種和平統一辦法。所以祇有少數人同意我的見解。但我堅信：中國人必須懂得一面採用適當政策一面運用適當有效的軍事力量，雙管齊下，國家才能富强。

我在南開任教時，適逢國民革命軍北伐，北伐途中，國民革命軍的部隊在山東與日本軍隊發生衝突。日本志在破壞中國統一，軍事衝突發生於一九二八年夏季，地點在濟南。衝突結果，全國各大城市發起抵制日貨運動。

在天津，南開大學的學生起來領導抵制日貨運動。聲言不買日貨是最有效的報復手段，要求國人都不要買。並且通知售賣日貨的商店關門。此一運動是有利國家的愛國行動。但是，售賣日貨的商人原本做的是合法生意，因此，我認為要商人關門乾受意外的損失是不公平的。我建議學運領導人：應該改採比較公平的辦法。我建議學生到售賣日貨的商店，詳細清點它的存貨，作個正確的登記。然後，可以徵收日貨所有人愛國捐。繳過捐後，可以出售日貨，再把出售日貨的價款轉購國貨。學生們認為我的建議很合實際，面面俱到。一星期左右，天津所有的學生都動員調查日貨。調查過後，學生團體送給每家商店一份清單，載明應繳愛國捐數目。指示商人到指定銀行繳款。一旦商人繳了款，就可以出賣剩餘日貨

。此種方法全國各地很快採行，各地學生紛起效尤。天津一地所收的愛國捐就有五十萬元。

收到的愛國捐做什麼用呢？這倒是個問題。我建議成立一個工業研究機構，訓練出一批人員去教導手藝人改善他們的產品。我認爲大部分手藝人都不懂化學，都不會使用簡單機械，假如我們在城裏設立一個工業研究機構，物色一批人擔任指導，就可以將所有的製作人送去受訓。例如：天津盛產醬油，醬油的主要成份是大豆，依照舊法，大豆發酵的過程需要半年。因此，投資人就要負擔六個月的利息。我請南開及其他地方的化工人員研究一套加速發酵方法，以減輕投資人利息的負擔。當時在天津有一個做辣醬油的人，每個月他要負擔約等於他資本額百分之十的借貸利息。用某種化學方法，可以促成發酵過程加快，省掉一半時間。同樣的，木材、竹子打成紙漿的過程也需要很長時間。我想：難道我們就不能想出一套用化學方法縮短生產過程的方法嗎？經過和各方人士接談，證明知識份子可以循此途徑爲中國生產方面提出貢獻。於是我們建議用愛國捐創辦一個工業研究所。至於負責人，正好，何廉博士堪當斯任。許多朋友勸他辭去南開大學及其他學校的教職，出任所長。當這個研究機構成立時，許多其他人士的看法不同，他們認爲應該用這批錢在天津辦個毛紡廠。其實平津一帶已經有很多毛紡廠。再增加一個也起不了什麼作用。我們認爲：將來如果不抵制日貨，在公平競爭的情況下，國貨無法和日貨競爭。祇有用現代科學和技術生產方法才能提高國貨的品質。一旦我們的產品水準提高，就無需再抵制日貨了。這兩種看法是彼此衝突的。反對我們的人有政治力量作後盾，而我們沒有。盡管我們努力，但終於失敗。我們的研究機構被迫關閉。至於毛織廠，我聽說他們利用愛國捐買了外國一個舊工廠的破機器，一直都沒有開工。結果，天津北平方面一點好處都沒有得到。此次經驗令我們感到很不愉快。

第十一章 國內遊歷（一九二三—一九二九）

北平

我在南開教了六年半書，在此期間，我經常到北平去。北平當時予我的印象很難捉摸。因爲印象很混雜。

北平，當我第一眼看到時，就不禁對自己驚呼：「北平眞能代表中國偉大的過去。北平證明中國過去是偉大的，看到北平使我感到生爲中國人實在値得驕傲。」北平的壯觀是不待言的：城門、城牆，宮殿，筆直的大街，樣樣都說明它的偉大。從街道和外貌看，北平是和諧、平衡、相稱、和正直。就磚、石、木材所能具體表現的文明而言，北平可以說是具體的表現了所有的中國文明。

在經過前門時，我的同室朋友，也是我第一次赴平時招待我的居停主人李先生，敲敲我的膀說：「每個初到北平的人都應該在前門樓子前叩頭。」誠如他所說的，我不僅願意在前門樓子前叩頭，幾乎在北平每座有紀念性的建築物前我都願意叩頭。樣樣東西都令我感到新奇滿足。

但，過了兩三天，另外一種感覺突然發生了。北平拉長了統治者和被統治者間的距離。不錯，北平是偉大莊嚴的，但這是天子特有的偉大莊嚴。北平是皇帝所在地，言外之意，國家就是皇帝的私產。北平的天壇就說明天子君父的特性。在人類發展的特殊過程中天壇代表奉祀，天壇發揮了多方面作用——

技術的、政治的和宗教的。但是今天每個中國人都不禁要問：北平所代表的文明是否能夠保存？是否應該保存？

西方文學家描寫中國、談論中國，就好像埃及學家描寫、談論埃及一樣。西方陳列館展覽從龍門、雲岡各地弄來的佛像和佛像頭顱。全世界似乎都認爲中國的過去是過去。現在的中國文明是一種陳列館和圖書館的文明。我們中國人是否應該把北平城當作一個大陳列館、大展覽室以供中外旅行者參觀？或是當作學者研究的安靜處所？中國在建築方面的發展路線是否應該按照北平的形式繼續發展下去？或是改採新的科學方式？建築北平協和醫學院、燕京大學以及國立北平圖書館的一批人認爲他們可以按照原來的發展路線發展下去，只需略加更改即可。所以協和、燕大和國立北平圖書館的建築是中國宮殿式的。另一方面，建築北大、北京大飯店、六國大飯店的一批人無視於北平的歷史，他們認爲該應採用西方的直線型。因此北大、北京大飯店、六國大飯店的房子就和他們在天津、上海所建築的一樣是直線型的。我首次抵平所引起的問題沒有人能夠給我回答。歷史，祇有歷史能夠解答這個問題。

由於皇帝地位崇高而莊嚴，人民地位就要低下而謙卑。人到北平，上述兩種情形都可以見到。北平的土著，具有任何地方人所沒有的謙恭態度。他們處事謙恭、客氣。無論是拉黃包車的、賣麵的、賣饅頭的、賣燒餅的……無不如此。由於宮廷對於藝術和手藝或眞或假的了解，謙恭的北平人不僅繁榮了他們的小生意，而且，在各方面，也提供了一般的生活藝術。對那些認爲生活就是享受的人說，北平實在是個好地方。但對那些認爲生活就是要建設工廠，改善國家，救全世界的人說，北平實在不是個理想城市，至少一九二〇年我所見到的北平是如此的。

在北平，前代帝王貴冑的財富，依稀還可從其所留下的紀念建築中看到，在其他方面則甚少能夠看出了。有閒階級不僅藏起他們的財富，甚至他們的嗜好，特殊技能和知識也不願爲人所知。你要從高聳

的院牆偷看進去，才能見到院內可愛的景色，你要和對方聊上幾個小時，才會發現他是某一方面的行家。

某次，一位學者和地方人士請我吃晚飯，早到的人坐下來吃茶、嗑瓜子，談論各種題材，包括天氣、滿洲溜冰方法以及元代的北京城。我根據西方觀念衡量，眞不曉得爲什麼他們一直不開飯。後來，一個年紀相當大貌似小商人的人走進來。他頭不梳，穿一件黑色緞馬褂，上面沾滿塵土和油垢，黑色棉襖外面罩一件藍色大衫。下擺拖到地下足有一寸多長。我很不屑他的外貌和舉止。他抵達不久，開飯了。我因爲很餓，盡量吃東西不暇他顧。幾道菜過後，我突然發覺那個「小商人」正講古羅馬城的紀念門。他指出希臘的紀念門和羅馬的有什麼不同。接着，他又突然把話題轉到明陵上，然後又談到西安。後來，談話內容轉到音樂，「小商人」認爲最好的歌劇院是米蘭的斯卡拉（La Scala）歌劇院。後來，他又告訴我們孔廟的樂器如何演奏，何以中國音樂單調而憂傷。無疑地他是一位古蹟、名勝、音樂、戲劇……的名家。事後我問主人他是誰？主人告訴我他就是清代名臣曾國藩的孫子。

十年以後，我和幾個學生在英國北部度假，遇到葛累（Grey）大夫，義和團之亂時期他正在中國，在北平擔任英國公使館醫生。我將那天吃飯的情形告訴他，他講給我另一段有趣的故事。有一天，他正騎驢到哈德門街，一輛黃包車從巷子裏衝出來，驚了他的驢子，幾乎沒有把他摔下來。他很生氣，揮拳就打那個拉黃包車的。這時，乘客舉手攔阻說：「你不能這樣。」對方說一口流俐的牛津腔英語，使他大吃一驚。葛累抬眼端詳一下對方。另一件使他吃驚的是對方衣衫襤褸，貌似落魄之徒。經過詢問，他才知道那位乘客是曾國藩的後人，正是我在朋友家晚餐席上遇到的那位「小商人」。他們很快成了朋友。經過葛累的介紹，曾居然成爲英國駐華公使朱爾典（Sir John Jordan）爵士的莫逆，朱爾典靠他才能把北平歷史、藝術和光榮的過去解釋給赴平的英國人。

對我個人說，北平還有一個吸引我的地方：故宮博物院有數以噸計的歷史文獻，大部分都是清代資料，也有明代的。北平城中許多老家庭的後人，滿人和漢人，常把他們先人的各種手稿廉價出售。每次到故宮博物院都會有新的發現。如果你對近三百年中國史有興趣，欲想知道一些以前學者所不知道的事，並不困難。在這方面，正如在其它方面一樣，很容易使人成名。

西安

當年在中國國內旅行是很困難的，不僅因為交通工具慢、不方便、太貴，而且萑苻不靖，盜匪橫行。

當時劉鎭華將軍任陝西省長，在西安創辦西北大學，劉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他本人對高等教育有極大興趣，一方面是他欲藉辦學校博取開明進步之名。一九二五年春，他派代表至平津，聘請著名學者暑期至該校演講。此舉極為聰明，對一所新成立的學校極有用處。我想到西安及其附近各地遊歷，因為西安是歷史名城，漢唐兩代建都於此。與我同行的尚有其他十六名學者，在省長衞兵護衞下，從北平搭車至鄭州。從鄭州轉車到陝州（河南陝縣），陝州當時是隴海路西部的終點。在陝州我們改搭兩條帆船溯黃河而上，黃河偉大的景色朗然入目，令我感到興奮。我希望親眼看看這條所謂「中國之患」的大河的自然風貌。我們逆風逆流而上。每條船上有幾名船伕。他們都是脚踩河底，因為當時水深不及三尺。儘管他們努力拖拉，頭一天我們僅走了五里多路。到一個縣府所在地，省長侍衞請當地縣長每船再增派八名船伕。河流湍急，事實上，那是一條小的急流，水從大岩石和小石子上流過。有些地方，泥很深，幾乎可以說是一片泥漿。沿岸的村落和居民貧窮得幾乎無法形容。我實在想不到中國會有那麼窮的人，他們竟然赤身露體穿不上褲子。河南岸，屬於河南省的地界，是一片不毛之地。北岸屬於山西，常常可

以看到綠樹。我們希望船伕把船停在北岸，如此，我們可以看看山西。但，船伕告訴我們山西省長閻錫山，不准非山西的船隻接近他的勢力範圍。一九二五年，中國顯然又回到了戰國的割據時代。

從陝州至潼關是六十里，要走四天五夜。潼關是一個戰略上的要路咽喉。在古代，據說一夫當關萬夫莫入。實際上，潼關東部爲高山所阻，在黃河沿岸只有一個小口子，往來的人都要從小口子經過，所以非常險要。過了潼關，我們進入古中國的中心地帶。從潼關到西安有公路。潼關守備司令爲我們準備一輛汽車。公路坎坷難行，車不時停下來。

途中，遠遠的可以看見一座巨坟，那可能是秦始皇的陵墓。據記載，秦始皇死後曾經建築了許多陵寢，以免後代人發現他的眞坟。但，人們都相信，他所有的坟都被盜墓人掘過了。

在途中另一個地方，我們看到高聳的華山山峯和低窪的山谷，有人告訴我們：古時有個巨人想在華山開個口子，他右手抓住山的一面，脚跟抵住山的另一面，一發勁，就將華山分爲兩半，中間成了山谷。

華山是中國的西嶽，代表了中國西北過去的美麗和偉大。華山以外，我們所能看到的就祇有禿山、乾河、帶病的農夫、土房、白骨、野狗。我看見有許多圓石子散佈田間。據說，那是農人們爲了通風才散佈的。又有人說，肥料貴，人口稀，交通困難，農人們多數廢耕，有些田地每三年才種一次。一個人在北平會想到恢復中國過去的偉大，在陝西，會相信那是中國歷史上偉大時代的所在地。

後來我到北非時，曾感到奇怪：爲甚麼地中海南岸的阿拉伯國家，過去文明那樣進步，如今却遠落於地中海北岸的國家之後。我對中國的西北也常興起類似的感覺。

二次大戰期間，我在政府機構任職，由於職務上方便，對於志願獻身爲陝西省修理境內秦漢時代遺留下來灌溉系統的工程人員盡量施以援手。盡管當時軍事第一，一切與抗戰無關的預算均被剔除，但我

們仍將修補灌溉體系的費用設法編進預算，終整個抗戰時期從未中輟。

西安城，如果近看，的確可以顯出過去的偉大。城牆和鐘鼓樓都可以看出帝王之都的氣象。市內大街既寬且直，實在具有都市氣派。市外兩里半處是大小雁塔，那是玄奘一千年前譯經的所在。塔中記載玄奘住在雁塔，雁塔當時屬西京管轄。想像中，西安在唐代一定是很偉大的城市。

省教育廳的院中，牆上有五匹雕刻的石馬，是從唐太宗的陵上移來的。太宗是唐代的第二個皇帝，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他有六匹心愛的名駒，號稱六駿，在他死前，曾命名家將駿馬雕刻下來，遺囑死後將雕刻的馬列於他的陵外。一千多年來，那六匹石馬都站在山邊。一九二五年前不久，美國博物館的一個大膽蒐集家，偷偷的將雕刻的六駿藏在草中，裝上汽車，想運往美國。偷馬的車隊塵土飛揚，引起當地居民的注意，車隊在潼關被截住五輛，仍有一輛漏網，因而有一匹馬的雕像被運往費城本雪維尼亞大學博物館。我是少數看過六匹馬形的人之一。我在其他地方見過的中國動物雕刻家，多將駿馬的圖形雕在窗子上，完全是模仿之作，沒有特色。這六匹馬是一位懂馬愛馬的名匠或是藝術大家雕刻的，不僅外形美，其飛奔姿態尤其令人難以描述。它們使我窺見了中國健壯活潑的一面。

每個到西安遊歷的人，都要參觀碑林。所謂碑林乃是歷代重要石碑集中之地。中國整個西北的石碑中在那兒，的確可以稱爲碑林。如果按年代排列，可以從漢代一直排到近代。石碑代表各方面人物，其中有皇帝、武士、政治家、詩人、外國教士、和尚、道士。我們在碑林又見到了中國文明。事實上，如果這些碑不集中到一起，大部分都會遺失。

在西安我遇到馬里蘭州巴提摩的瓦格涅（Wagoner）夫婦，他曾擔任青年會工作。瓦格涅夫人對年輕孩子們很好，抽出時間擔任很多西安社團的顧問。她具有美國人那股幹勁，從美國帶一架鋼琴經過千山萬水到西安。冬天，她們圍爐取暖，他們從距西安六十里的煤礦買煤，用人背到西安。假如我記憶

不錯的話，一九二五年西安的煤每噸爲美金三十元。隴海路從陝州延到西安後，煤價每噸跌至美金四元。

在西北大學夏令營演講是很辛苦的。那兒的學生比平津的年紀大，像人面獅身像似的坐在教室裏，他們太沒有禮貌，不是喧鬧就是打盹。我簡直弄不淸楚，他們是否還知道有我這個人在。

演講人中有魯迅（周樹人），他後來成爲名小說家，「支持」中國共產黨。一九二五年我們還聞不出他有什麼共產味道。他曾出版過一本「中國小說史略」。書中舖陳的全是舊說，很少有新義，據我所知，他在西安所講的仍爲他那本書中的舊套。他有點兒瘸，走起路來慢吞吞的。他和我們相處不僅很客氣，甚至可以說有點膽怯。有一天我看到他和一群孩子們在一起玩一門青銅造的玩具砲。他告訴我，如果把一個小石子放在適當的位置上，可以彈出二十碼遠，像彈弓一樣。他說那門玩具砲可能是唐代設計的，但他買時價錢很低，所以他不相信那是唐代的東西。我問他爲什不相信？他說：「如果我一定說是唐代的古物，別人就一定說它不是。如果我一開始說它可能不是，就不會引起爭論了。」在鑑定古物方面，他倒是個不與人爭的人。人們絕不會料到他居然是一個文學與政治紛爭中的重要人物。

劉省長在我們要離西安時安排我們去逛華山。華山地區有土匪，他派了三十名衞隊。當地的縣長爲了進一步保障我們的安全，又加派了三十名警察，爬山時，前一段坐轎子，下轎後祇有靠步行，有時甚至用到我們的雙手。在「猴兒攏」（Monkey Swing）我們要從一座山峯沿着一條鐵鍊爬到另一座山峯。還有一個地方，爲了到一個高僧住過的岩洞，我們要從岩石邊上爬行，抓住嵌在岩石中的鐵鍊子，通過一條人工鑿出的小徑。山本身有五座峯，像人的五指。每座峯頂都有一座廟宇。我們在一個廟中進早餐。飯後，又爬另一座山峯，在第二峯的廟中吃中飯。略事休息，我們又爬，當晚住在另一座山峯的廟中。如果說風景和大自然眞能幫助我們淨化心胸、超塵絕俗、淡薄名利，使我們趨於完美的話，那麼

，華山應該是最佳的所在了。

上海、杭州、南京

一九二七年春，國民黨在長江下游獲得勝利，在南京成立一個新政府。暑期到來我和何廉博士決定到中國的中部去遊歷。

我們發現中國的老百姓對革命的反應非常不同。在杭州西湖有個船伕告訴我說，他對革命很失望。他說：曾經有人告訴過他，革命一旦到來，米價會跌。「現在此地的革命軍比兩個月以前多，」他說：「可是米價却比過去貴。」在上海和南京，國共的衝突很激烈。但老百姓搞不清楚誰是共產黨誰不是共產黨。就是搞政治的和軍人也弄不清楚。到處充滿了懷疑和猜測。在國民黨之內也很不和協，人與人，派系與派系之間，紛爭不已。很少有人急於執行國父的主張。革命份子大多數想營求地位爭取工作崗位。朋友們能夠詳細告訴我某人屬於某派。這對我說實在是太複雜，令我無法了解和記憶。

我們第一次到新國都南京，我還記得，首先入目的是病馬拖着破車，農人們就在城中種菜種稻子，水塘、沼澤、牛場的廟宇、光禿禿的小山、高低不平塵土飛揚的大街、破爛的店舖。南京城好像很蕭條。圍繞這些破敗景象的是高聳的城牆，它好似嘲笑人們的愚蠢和不幸。南京的朋友們所談的也是共產和反共產的問題。外國人則打趣中國的軍隊，說他們的將軍說話太多，士兵無紀律，營養不良，槍械不統一，有來復槍、有手榴彈、有手槍、有機關槍，還有雨傘。

上海和南京到處是宣傳品。報紙上充滿了口號和三民主義的長文。學生，從小學到大學，倒蠻有勁頭。他們遊行、示威、演說，參加革命。在政府或黨中獲得位置的朋友們帶我去看他們的老板。我希望他們和我談些土地改革、工業發展、銀行國有、國父理想，以及中國的其他各方面問題。這些題目祇有在報

紙上討論，革命的大人物先生們却不討論這些，他們都忙於其他的事去了。我當時對新政府的外交政策很有興趣。有人告訴我說：主持接收膠濟鐵路談判的王正廷可能出任外交部長。當時我們那一代受過高等教育的青年人都把他當作新領袖。我見過他好幾次。在上海，我希望能從他那裏獲得新政府對外關係的眞正意向。我記得很清楚，我赴法租界他家去拜訪他。我和何廉博士於上午十時到他家會客室，屋中座無虛席。我們在候見時，又有許多新客人到來。直至十一點半王博士才露面。他滿手都是名片，顯然的，他事先已排好了接見的次序。他念一下名字，看看那個人，站着和他談幾句話。不久他已接見過所有的訪客。他們幾乎都是求差使的。王博士要某人再去找另外的人想辦法，要某人再等幾天，告訴某人他的工作已經安排好了。到接見我們時，其他人都走光了。我想他一定很疲倦，討厭接見我們。爲使他輕鬆起見，我開門見山先告訴他：我們不是來找工作的。他大笑，坐下來和我們談。我說：我們聽說他將出任外交部長，我們願意聽聽他的外交政策。「外交政策，」他說：「很簡單，我們要廢除不平等條約，打倒帝國主義。」換句話說，他答覆我們的就是當時的流行口號。我告訴他：可能他不願意把外交政策告訴一些和他不熟的人，如果他的眞意如此，我們是可以諒解的，不會勉强他。但，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希望他能說得具體一點。當然，所有不平等條約均應廢除。我想：廢除不平等條約並不是中國外交部長最困難的工作。當時中國最大的外交問題，我認爲是「東北問題」。他所面對的問題是：一面廢除不平等條約；一面要維持某些國際友善關係，以解決東北問題。王博士細心聽我發表意見，但對我的意見未加可否。

革命工作，在打倒北洋軍閥及廢除清朝皇帝方面，到一九二七年夏季已經大部完成。至於統一，建立新政府，實現國父理想則尙未開始。

東北

所有上過國際關係課的學生都知道我國東三省是遠東的風暴中心。南開中學和南開大學有許多學生是來自東北各省的。何廉博士和朱偰（Chu Hsiao）都對山東河北農民移居東北以及東北地區的國際貿易問題感到極大興趣。地質學家曾經估計過東北地區的煤鐵資源，指出：中國如果要成爲工業化國家，一定要依靠東北的礦藏。因此，南開校長張伯苓於一九二八年夏發起一次東北研究旅行。皇姑屯事件（大元帥張作霖被日本地雷炸死）後不久，我們到瀋陽。因此，政治情況很緊張。事實上，東北正陷於極深的危機中，其嚴重情形遠超過我們當時的想像。張作霖控制東北約二十年，他沒有讀過書，但所有見過他的人都稱贊他精力充沛，聰明過人。不管怎麼說，事實上，他左右的人都很能幹，均有行政天才。當時中國任何地方的經濟情況，都不如張作霖統治下的東北。

在瀋陽，張作霖的兒子張學良，一般人都稱他爲「少帥」，在接待我們時表示非常悲痛，他當時打嗎啡，身體瘦弱，面色蒼白，精神緊張。從瀋陽我們乘火車至吉林，吉林位於松花江畔。吉林人的笑貌、溫柔和美麗令我們想起了江浙。在日本壓迫下，從吉林至朝鮮東北角正修築一條鐵路。我們和一群測量工程人員到東部六十里以外的一個地方。在那裏我第一次看到中國廣袤的土地，茂密的森林。有人小聲告訴我日本的陰謀計畫。那裏有恐懼，也有仇恨。

我們從吉林再到長春，住在山本（Yamato）旅社。日本已經控制了那裏。翌晨我們赴哈爾濱。哈爾濱是中國東部鐵路幹線上的大都市。那裏有寬濶的廣場、圓環、筆直的大馬路，一看就知道這是受了俄國的影響。哈爾濱的工商業均甚發達，另一方面也有政治陰謀和賣淫。那兒有中俄合璧的奢侈；有俄國歌劇，美國爵士樂和中國的胡琴。

布爾塞維克在俄國革命後，中國收回一半中東鐵路。其他如沿途的地方政府機構，沿途的電信機構，路邊的狹長地區等沙皇從滿淸手中竊奪的權益也已經收回。爲了控制並管理最近收回的權益，中國政府成立了所謂哈爾濱特區。一九二八年的行政長官是張煥相將軍。他是東北地區中國最重要領袖之一。張有一個野心，要將哈爾濱變成一個純中國都市。他利用中東鐵路的利潤創辦了好多所中小學，校舍都是中國宮殿式的。他計畫將分散的哈爾濱工科、商科、法科等學院合併成一所最具規模的大學。他建立一座孔廟，其外觀之壯麗要超過俄國的教堂。在張氏治理下，哈爾濱特區已經向所有的外國居民收稅，甚至包括了日本人。當初日本人根據治外法權拒絕繳納。張氏定期公佈稅單，說明何人繳稅何人不繳。此舉，引起各國人對日本人的不滿。最後，日本人也祇好讓步，繳納稅款了。

說到繳稅事，我曾和美國駐哈爾濱領事漢生先生（我想應該是叫漢生）談過。我問他要美國居民向中國政府納稅有無困難，他說，因爲哈爾濱的美國居民要有更好的街道，更好的電訊設施，更好的衞生環境以及更多的安全防護，因此，沒有理由不繳稅。事實上，總領事漢生已使美國僑民在哈爾濱起了示範作用。

沈鴻烈將軍當時成立一個船隊，在松花江上行駛。他有一個造船廠，能够造船和修船，由一位留美工程師主其事。

在哈爾濱，我們透過一位南開校友的介紹，見到當地的商業領袖。他們都是暴發戶。商會會長是一個身體魁梧的山東人，他當年由山東到東北做苦力，現在他已有八千萬元的財產。我們去參觀修築鐵路工程，鐵路起於松花江北岸，正對着哈爾濱，向北方修築。負責修築的人是誰，如今已不復記憶，但他那股熱誠幹勁我還記得很淸楚。當我們問他鐵路的經費來源時，他說：「這條路是靠它自己建築的。」他解釋說，當初他祇得到很小的一筆款子，利用這筆錢他先修了二十里，開始營運後，載運大豆，業績

非常好。農人們大批移居北方，開墾了更多的土地，也生產了更多的大豆。事實上，這些人都相當的明瞭，鐵路什麼時候要延長了，要延長到什麼地方，於是他們就將大豆儲存在那兒，待鐵路延長到那裏，就交給鐵路局託運。鐵路延長的速度是相當驚人的。

從哈爾濱我們到黑龍江省會齊齊哈爾，黑省教育廳長是南開畢業生。經過他的介紹，我們會見了許多政府官員。和在哈爾濱一樣，一般所談的都是經濟發展，特別是修築鐵路的偉大計畫。

歸途，我們換了一條新鐵路，該路橫貫黑龍江省西部。我們看到一望無垠的大地，幾乎是沒有人烟。到了一個地方，我仔細請敎一位省府秘書：「誰保護我們？土地是誰的？」他說：「這些地都是萬福麟將軍的。」他用手指一下火車兩旁的土地。過了半小時我又問他同一個問題，他的答案也是相同的。那天晚上，我們住在鐵路旁的一個小鎭上。我看到鎭上有電燈，這當然令我吃驚不止。店主告訴我電燈廠是萬將軍建立的。「好啊！」我說：「如果像你們這樣的小鎭萬將軍都設法供電，他一定是個大大的好人。」「是的，是的，但是他不論我們需要不需要，每家都收電費，而且收費的標準也是他自己訂的。」店主回答說。這實在是一種發展經濟的新方法。

東北研究旅行中，我發現很多地方都用上述的方法籌辦地方事業。大豆出口是由政府銀行統籌辦理的，事實上，政府銀行起先就是張作霖的私人企業，後來成爲張少帥的私人企業。酒廠、典當業以及麵粉廠等都是如此的。表面上是公開的，私底下張大帥和他的部下是將東北的財富進了他們的私囊。不過，東北人民的生活却較中國其他各地的老百姓好得多，這不僅是地方政府比別處好，也是因爲東北是一個新開發的富庶地區。

我們聽說老帥的得力助手是楊宇霆。據說他負責東北的開發和東北的外交事務。因此，我希望有機會和楊談談。出乎意料的，居然沒有人願意居中介紹。有一天，有人示意我，如果我眞想見楊，祇要直

接打電話到楊的家中卽可。我很懷疑，因爲我想像他那樣地位的人物不會那樣容易就見到。但當我離開瀋陽的前一日，因爲還有餘暇，我想打一次電話也無害處。早餐過後，我立卽打電話。楊的秘書告訴我楊卽刻就可以接見我。時間是七點多鐘。這麼早就接見客人，他確是個不凡的人。

我出示名片後，楊立刻接見我。我們談了一小時。他問我都參觀過什麼地方。我把參觀的大致情形告訴他，他說明當時正在發展中的許多企業其背後的眞正目的。他對東北有一個偉大的計畫，主要是在交通方面。他想建立兩條鐵路幹線，都是以葫蘆島爲終點。其一，建於東北的東北部，在瀋陽穿過南滿鐵路，經過吉林省會永吉，延伸至吉林省的東北角。另一條是從葫蘆島一直向北，沿蒙古邊境及整個黑龍江省。此一計畫，據楊解釋，不僅可以開發北滿，而且可以鼓勵日本，步中國之後塵，進入俄國的勢力範圍。困難是在南滿。因爲新路線中有一條是與南滿路平行的，而另一條路要在瀋陽穿過南滿路。楊進一步指出：「在築路初期，這些鐵路表面上看是南滿的支線。過些時，我們就日以繼夜的建立某些連接路線，把許多支線連接到一起，成爲一條獨立的幹線。」

我告訴他，據我了解日本人對鐵路管理很有效率，我擔心中國鐵路不能和他們競爭。他一點都不擔心。他說他可以降低運費，並可用增加地稅的方法來彌補虧損。東北鐵路所運的貨物主要的是大豆，如果對農民的運費降低，再徵收較高的地稅是相當公平的。再說，他可以以出口大豆的收入來彌補，因爲大豆出口是政府統籌辦理的。

楊的結論極爲精明，令我解除對日本的顧慮。早晚他們之間是要攤牌的。東北不能獨自對抗日本，中央政府對他們的幫助既不能確定也不會充足。我向楊表示我的關切。他認爲我的所見很對，他又繼續說，東北的既定政策是避免和日本公開衝突。他的策略是不阻止日本擴大他的經濟利益。他說，事實上，他讓日本從他所創辦的企業中去獲得好處。他的目的是要比日本進步快，日本邁一步，他一定要邁兩

步。中國內地移民到東北的人數每年約一百萬，時間對中國是有利的。東北應否是民國的一部分他認爲不足重視。事實上，中央政府對東北的統治權也祇是有名無實。楊不願表示忠於南京政府，因恐此舉觸怒日本。在我們長談結束時，楊說：「我知道你們關內人都以爲你們自己是愛國的，而我們關外人是不愛國的。其實這是大錯特錯的。我們和你們一樣的愛國。東北是我們的；中國人一天天的多起來。日本最低限度不能反對我們在東北辦教育，創立中國學校。日本最低限度不能反對我們發展農業。日本將高與我們增加農業生產。在許多方面中日雙方的利益是並行不悖的。不錯，在某些方面，我們彼此間是有衝突的。你們關內的同胞祇會搖旗吶喊，放言高論。我要提醒你們，這種舉動是危險的。如果你們使東北與日本公開對壘，恐怕不待關內一兵一卒出關來解救我們，日本已經予我們致命的一擊了。你們沒有力量予我們軍事援助，也不必促使我們和日本公開衝突。」楊的一篇大道理雖然令人感到不快，但却很令人感動。

當我們在東北時，瀋陽謠傳楊與少帥之間不睦。因爲此事牽涉到兩位最高領導人間的內在關係，我不願討論此事。楊了解我對此事的關切，他自己却先談及此事。「我知道，」他說：「大家都懷疑我在大帥去世後，要做東北首屈一指的領導人。我是親自看漢卿長大的。我是忠於張家的。我要效法周公輔佐成王的先例。我要和周公一樣將來交出權力。」漢卿是少帥的號。盡管楊表示了他的忠心，但在我們晤談後三週他被少帥給槍斃了。

楊引用周公和成王的故事來說明他與少帥間的關係，似乎是很不妥的。三千年前，有一個國王駕崩，他年少的兒子繼承了王位。新王的叔叔周公攝政。據中國歷史傳說，周公盡忠職守。待新王成年後，周公還政於新王。這是中國熟知的一段故事。但是我想楊用此一故事來作比喻是不適當的，因爲少帥張漢卿雖然被稱爲少帥，彼時已年滿三十。他不能用周公對他侄子的方式來對待少帥那樣年紀的人。此種

比喩，我想，不免暴露了楊的傲慢態度。至於他對東北的中日關係的分析，我倒感到是對的、是高明的。

一九二八年夏，東北形勢漸漸轉變得對中國有利。這是毫無疑問的。山東河北的農民有很多移居到東北各省。俄國已經停止前進，盡量設法固守沙皇時代給它留下的特惠和權利。當地政府盡速建築鐵路。有些地方由日本在經費和技術方面給予支持，有些地方日本秘密或公開予以反對。葫蘆島築港工程已經開始。東北大豆正大量出口。在國際貿易方面，東北是中國僅有的出超地區。東北當時是一片好景，人人樂觀。

張作霖原係東北一名土匪。他在與北方軍閥週旋過程中表現了他的絕頂聰明。他能對人用而不疑，因之，他的部下也能善盡厥責盡忠於他。但是，他的出身和他的封建政治意識使他與知識份子間產生距離。我就不大喜歡他，但我在旅途中聽到一段傳聞，這段傳聞使我又減低了對他的反感。傳聞是這樣的：有一次張作霖到旅順大連向日本作官式訪問。日本人乘機向張氏誇示日本在旅大兩港的成就。「看過我們日本人在旅大的成就後，」日本人說：「你們一定不想收回旅大了。」「正好相反，」張大帥回答說：「我今天看過後，就更想收回來。」從這件事看，老帥也是愛國的。

東北其他政界領袖也是愛國的。我對他們的愛國熱忱絕不懷疑。中國其他各地的領袖亦復如此。中國在一九二八年有足够的愛國份子。問題是：單憑愛國熱忱是無法阻遏一流强權侵略的。二十世紀是民族愛國主義盛行的時代。人人都是愛國的。所不同的是各國間工業、敎育、衞生和福利事業發展的程度不同而已。

如以上述各項衡量，東北的政治措施，乃至全中國的政治措施都是不够的。軍政兩界的愛國份子都認爲兵工廠、鐵路、出超的貿易是强國的條件。但是，他們忽略了健康、受過敎育、能做事的人民才是

强國的基本條件。一九二八年的東北，卽使是本身財政困難，又受到日本的干擾，地方政府在敎育和保健方面還是做了很多事。擴大政府壟斷的範圍，增加了對工商界的一般法令規定。因此，東北人民盡管較其他地區的人生活優裕，但也感到不滿。所以，東北雖云富庶，居然也出現了盜匪，甚至打進很多縣城。我們走到任何地方，都要小心土匪。當我們參觀吉林東部鐵路修建工程時，他們告訴我們在任何地方都不要停留十分鐘以上，否則，就可能被土匪綁票。在哈爾濱他們不要我們出城。在四平街我們住在一個糧商家，房頂上，大門前都有荷槍實彈的哨兵。東北，正如一九二八年中國其他地方一樣，具有繁榮社會的農業工業資源。但地方當局未能充分加以利用。

參觀中國各地，我們不僅用我們的耳朶和眼睛，而且要用我們追根究底的好奇心。不論到什麼地方都要問：「這地方五百年前是怎樣的？一千年前，兩千年前，甚至更早的時期是怎麼樣的？這一省、這一縣是如何設立的？過去曾經重要而美麗，今日是否應該如此荒涼，甚至成爲廢墟？這一省在一千年前爲什麼是偉大的？在中國各省發展方面，何以某些省份進步快，某些省份落後？何以有的省份在某一時期很進步後來又遠落他省之後？」如果中國太平，交通便利，我要旅行全國，率領一群歷史家、地理學家，以便在旅途中討論中國各省歷代發展情形。

無疑的，中國正致力於保存其固有的歷史文化。在民族文化方面，目前的中國是古代中國的延續。在這方面，中國與希臘、羅馬、埃及、巴比倫以及大部分阿拉伯國家截然不同。

原始的中國，也就是說大約三千年以前的中國，侷促於黃河中部地區。中國向四方擴展的經過是一部偉大的歷史故事。各地區是如何納入中國版圖的，有些已經渺不可知。就以我們湖南爲例：它是什麼時候成爲中國一部分的？它是否因爲戰爭才納入中國版圖的？不是的。是根據條約約嗎？也不是的。它是漸漸的，經過幾千年的時間才成爲中國的一部分，其確定的時間已不可考。事實上，它是由中國其他

地區的農民移往湖南谿谷地區，漸漸使谿谷地區人口稠密起來，把土著擠到山上去，才漸次形成的。湖南以外，中國還有很多其他土著地區，早已具有規模。長江兩岸是舊時的楚國的地方，很早就建立了國家，國號是楚，與中國北方各國爭雄。長江口一帶，卽今之江蘇省，也早就建立國家，國號是吳。江以南，卽今之浙江和福建，爲過去之越地，也早已建立國家，與群雄爭霸。

我們不防檢查一下中國的方言，就可知道。上海以北和以西的地區說的是普通話，也就是所謂的國語，廣東以北和以西的地區，也說普通話。何以中國的方言祇流行於東南沿海各省？據我推測：當中原人口進入沿海地區時，當地的土著人一定是已經相當開化了，無論在人數上和文明方面均佔優勢，於是中原古代的語言和當地土著的語言混合的結果就成爲當地的方言。

在中國發展過程中，有一個因素對中國是有利的。此一因素卽居民中的種族差異不甚顯著。可以說在衆多的世界人口中，中國的種族意識是最薄弱的。因爲在發展過程中，若干世紀以來，我們都是自己的種族和自己的種族混合。因此，中國人的種族意識淡，文化意識濃。

第十二章　清華時期（一九二九—一九三四）

一九〇七年，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總統退回部分庚子賠款，中美雙方協議，決定將該款部分用於中國在美留學生，部分在中國創辦一所學校，造就學生異日留美。於是，創辦了清華。它是一所留美學生的預備學校（隸屬外交部）。隨着時間的演進，清華後來改成一所正式大學。一九二八年，又改爲國立，自此，祇派少數畢業生赴美深造。

一九二九年五月，清華大學校長羅家倫約我擔任該校歷史系主任。五年中（從一九二九年夏至一九三四年夏），我一直在清華認眞授課。抵清華後一年半，我成爲評議會中一員。這段期間，對清華和我自己的生命都很重要，同時那段時間也是內戰與偉大抗日戰爭中間的一段空檔。這是自一九一一年革命以來中國僅有的一段比較和平與團結的時期。內政大部恢復了，中央，各省都恢復了。工商業正在復甦，鐵路逐漸修復，公路修築的很多。這段短暫的時間充分說明了中國人在平時進步的能力。

清華校園在北平城郊，外觀很美。清華的土地，在帝制時期是一位滿清皇族的。原來的建築是古老而莊嚴的，大約建於十八、九世紀。在這塊古老土地上建立一所新式的學校，對於建築物的一致性很少有人去考慮，至少在最初幾年是如此的。有些學校早期建築物是臨時性的，祇能用來作學生宿舍。其他的是留美學建築的回國學生們設計的，他們抄襲了歐美的形式，合而爲一。大學後面，是圓明園（帝王的夏宮）的遺址，該園毀於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車額爾金（Lord Elgin）和格洛（Baron Gros）的手裏

。園內佔地幾百畝，有假山和人工湖。其中景物係由意大利建築師設計，意國建築師於十八世紀前五十年應乾隆皇帝之聘到中國來。當我在圓明園廢墟上漫步時，仍可看到大理石柱子、殘破的雕像、亭台樓閣、水池、人工湖的遺跡。漫步其間，令人不禁興起許多感想。我一方面認爲十七、十八，以及十九世紀早期的帝王實在是太奢侈太浪費了；另一方面認爲英法聯軍將該園毀爲廢墟也未免太野蠻，太殘忍了。現在清華大學在這座故園廢址上創立了，我衷心祈禱，祈求中國歷史中的新時代來臨，希望清華能促成這個新時代的早日降臨。

清華改成國立，預算編在教育部預算中。和其他大學一樣，每年經費由國庫撥給。除了政府所撥的經費外，清華另一個經費來源是退回的庚款，在當時每年可有四十萬元。美方按年繼續撥付，於是經費越積越多。就經費說，清華的確是中國大學中的天之驕子，它利用這些錢建築了圖書館、化驗室、大禮堂、宿舍，教職員住宅，選派優秀學生出國深造，並從國外聘請著名學者來校任教。在短短的幾年時間，清華已經發展爲全國數一數二的學府。

清華的經費也有濫用的地方。一批年輕的清華教職員，他們滿腦袋裝的都是美國的偉大學府，他們要使清華成爲美國大學的翻版。我是清華的評議委員，對許多校務均有參預最後決定的機會，因此，我常反對新建計畫。有時，我反對增加建築，有時我提議兩三個系共用一座樓。我常提醒我的清華同事：我們是在創辦一所大學，不是建造一座宮殿。很幸運，由於學生日增，總算使我們超建的建築物也派上了用場。

清華有兩項重要措施是值得稱道的。清華是一所國立大學，教職員待遇與其它同級大學是一樣的，因此，它無法聘到傑出的學者任教。爲此，評議會想出一個辦法。就待遇的標準說，清華是按照教育部規定的，但清華另外規定有休假，並可供給休假旅費；上課鐘點少，較其他大學進修的時間多；圖書館

、化驗室的經費也比其他學校充足。如果一個人爲了拿薪水，就不必到淸華，但是如果爲了硏究、寫作、進修，他就會到淸華來。此外根據淸華評議會所擬的規定，淸華可以資助學者進修深造。以上規定，使淸華建立一種看不見，但却極有效力的延攬人才的制度。在那段時日中，我們能够從其它大學中挖來著名學者，他們來淸華不是因爲待遇優厚，而是爲了作學問。

另一項措施也是非常重要的。欲想在中國創辦一所大學，某些地方可以學外國，但有些地方必須要自己想辦法。在自然科學方面，中國雖然沒有什麼成就，但世界各國在物理、數學、生物、化學等方面的成就，中國都可以抄襲使用。可是在人文學和社會科學方面，我們所遭遇的問題就和其它國家不一樣了。卽以政府組織爲例，中國留美學生往往都熟讀政治思想、比較政府和地方政府等書籍。他們學成回國後可以在大學開課，像美國學者在大學中一樣敎授英國、法國、德國或意大利政府。但是却沒有一位中國學者能够敎授中國政府，因爲美國大學中沒有這門課。再以市政爲例：當時在淸華有一位敎授，敎倫敦、巴黎、芝加哥和紐約市政，但他對天津、北平、上海等市的施政情形却一無所知。再讓我們看看政治思想方面。有一段時間，淸華有三位敎授都能敎政治思想，他們能從最早的柏拉圖講到當代的拉斯基，但却沒有一個能講授中國政治思想演進情形的。換句話說，就以上情形論，淸華所敎育的學生是要他們成爲美國的領導人物，而不是要他們成爲中國的棟樑之才。

有些淸華敎授認爲這種情形是滑稽的。這個情形雖然我們個人沒有責任，但我們一直認爲這是個問題。最後，我們提議設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提議任何擔任社會科學的敎授，如果他想要放棄原有西方國家的課程改授中國方面的課程，都可以減少他授課的時數，增加硏究及實地考察等等方面的補助。如此一來，經過三兩年時間，他就可以敎授中國政治思想、中國政府或中國經濟史等課程了。

歷史系也遭遇到類似的問題。留美學生沒有從美國學到中國歷史，卽使他們想學也無從學起。在大

多數西方國家中，大部分歷史已經經過科學的澈底的研究過若干個世紀了，因此，他們可以有一套能為大家共同接受的歷史知識。但在中國却不然。我們有豐富的資料，但除了日期和姓名之外却沒有一種大家都認為正確的綜合歷史資料。在過去，人們無法了解整個中國歷史。他祇能成為某一特殊時代或某一本書的專家。每個人都或多或少要重複前人的研究工作，而不是繼續前人的研究工作。因此，時間被浪費了。

我在清華，一開始，想找一位能教漢代歷史的學者，當我提出此一擬議時大家都認為楊先生（按：即楊樹達）是最適當的人選，因為他是最偉大的漢史權威。他曉得各種版本的前漢書和後漢書。他對各種版本眞僞的鑑定，以及章句解釋可以說無出其右者。他是這兩本古書的最高權威。但他教了一年以後，如果有人問他：「楊教授，你能給學生和我正確扼要的講一講漢代四百年間都發生過什麼事，漢代重要政治、社會和經濟變化如何嗎？」他會說：「我從未想過這些。書中沒有討論過這類問題。」本來，版本鑑定的目的是要找到一本權威書籍，某一本書其所以能有價值是因為它能使我們獲悉某一時期、某一階段我們國家的實際情形。但是這個目的反而被人漸漸給忘記了。人們變成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了。此種研究歷史的方法在現在已經落伍，不能再繼續下去。我們不能再把時間繼續浪費在這方面。

漸漸的，我認為我應該放棄這批舊學者。我要把他們當作我個人的老師。我希望他們能在我身邊，以便請教，另一方面我希望能有一批新人來教歷史。在教書時，他們能夠告訴我們中國從什麼地方發源，又向何處發展，最後定居在什麼地方。我不聲不響的引進一批年輕教授代替原來的老教授。一點麻煩都沒有。我予新人充份的時間。我說：「現在，努力吧，準備開一門課，那麼，就是清史吧，你有興趣嗎？你知道清代的大問題嗎？努力吧，我會供給你參考書、助理人員和時間。同時，為了生活，你也必

須教一點其它課程。你願意教甚麼都可以，但你必須在兩三年時間內準備開一門新課。」我引導這批年輕教授開始使用一套新方法，一點也沒有引起麻煩和反對。如果不是因爲戰爭爆發，我們能循此途徑繼續努力下去的話，我堅信：在十或二十年之內清華的歷史系一定是一個名符其實的、全國惟一無二的歷史系。

對這些政治及社會科學的觀念，同寅們常常交換意見。很幸運，校長和評議會都同意我們的作法。因此，清華擬訂一套適合中國學生的課程。如果有人有興趣比較一下清華一九二九年與一九三七年的異同，他一定會發現在課程方面有很大的改變。此擧，我認爲是對中國教育的一大貢獻。我一直爲此感到快樂，因爲我在這方面曾略盡棉薄。

爲了行政和教學的需要，清華設四個院：文、理、法、工。法學院內有經濟、政治、社會、法律等系。在戰前，我就已經看出，理工逐漸抬頭，而文法漸趨沒落。甚至我們在文法學院教書的人也都認爲這種傾向是對的，因爲我們深知中國需要自然科學和工程學。我們絕不想去與自然科學爭長短，更不想阻止其發展。然而，在校內却存有衝突，這種衝突不是在課業研究方面而是在專門程度方面。自然科學家和工程學家們希望高度專門化，他們希望學生在入校第一年中就開始接受專門課程。我們教文學和社會科學的同寅却希望晚一點開始專門課程，要多授一些普通課程。結果，經過一番折衷妥協，才算解決。但是結果雙方都認爲不滿意。無可諱言的，清華在戰前比一般美國大學在專門化方面要認眞得多。

雖然清華不想受政治干擾，但政客們則不願清華置身事外。當時一般人似乎有一種想法，認爲欲想控制政治就必須先控制教育。有些人甚至認爲老師和統治者應該是一個人才對。也有人認爲控制一所大學就意味着控制了許多任命權。傳統的中國觀念，認爲教書與作官兩者之間是不易清楚劃分的。中國過去教書的人轉任官吏可能比美國律師轉任官吏還要方便得多。因此，戰前的清華是有遭到政治干預的危險的。

校長羅家倫是國民黨忠實黨員，同時他也是教育界優秀的學者。雖然他忠於國民黨，把國民黨的三民主義訂爲課程，但他畢竟是個好人，是個好學者，所以他不想把清華變成任何一黨的附屬品。一九三〇年春，當北方軍閥閻錫山和馮玉祥反對中央時（按、卽中原大戰），有一個時期，看起來好像他們就要成功了。此一成功遠景使某些閻氏左右的學者煽動一次學潮反對羅校長。清華教授中有些是不滿羅的，因爲他是個國民黨員。他們認爲羅的辦學政治色彩太濃，不適合他們的胃口。再者羅校長過去和清華沒有歷史淵源，因此也使他遭到不利。此外，他是一個在各方面都喜歡展露才華的人，此種個性使他得罪了很多教授。所以當反羅運動一開始，多數教授都袖手旁觀，不支持他。一九三〇年的清華學運。使羅校長離開清華。

羅離清華後，反對派提名一位名叫喬萬選的人擔任校長。這個選擇就政治觀點說是相當聰明的，因爲喬先生是閻錫山的同鄉，大家認爲他一定能獲得這位北方新領袖的賞識。此外，喬又是清華畢業生，大家以爲他必定能改弦易轍，不走羅的老路。但事實上大出意料，學生和教授都對喬某不滿。戰爭終止，閻馮失敗，這位短命的清華校長也就不見了。閻馮倒戈失敗，中央獲勝，中央認爲應該物色一個比較接近黨而願意宣傳黨的政策的人來主持清華。在選擇時，中央方面對清華情況以及中國教育界的心理估計錯誤。清華教授和學生很有禮貌的向中央表示，對其所提人選（按：卽吳南軒）無法接受。拘於面子，中央政府收回成命，最後發表梅貽琦爲清華校長。梅自一九一五年起卽在清華任教。一九二八年任清華在美學生監督，深得清華各方人士尊敬。清華在他領導下不再是個政治皮球，步上了正軌。

前面已經說過，因爲工業研究所的事我曾和天津國民黨黨部之間存有芥蒂。現在，我又和國民黨中央鬧得不睦。因爲錯誤報導說我是反對清華校長黨提名人選的主謀。我雖然反對國民黨的提名人選，但事實上我並非主謀，因爲事實上無此必要。清華同寅並不想反對國民黨，但也不希望清華成爲政黨的附屬品。

梅貽琦長清華後，我們都能安心工作。對我個人說，清華五年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歲月。我乘便可以接觸故宮博物院的檔案。有一段時間，我們有好些人在故宮博物院抄錄檔案，把未公佈的重要文件抄錄下來。故宮中收藏的最重要檔案是淸代軍機處的。自十八世紀三十年代起至淸代終止爲止，軍機處是大淸皇帝的眞正秘書處。該處人員管理檔案非常制度化，每天來文均由收發登記，這些來文主要的是中央各部及地方首長的奏摺。此外，對皇帝批覆的奏摺也有專人登記。每件檔案都詳細登錄日期及摘要。這種簡單小心處理檔案的制度，對滿淸政府說實在是一種光榮。

由於革命和武裝政變在北平接二連三的發生，有些老衙門的檔案均被棄置，無人管理。有些檔案在北平當廢紙賣。我爲淸華成噸購買。淸華圖書館所存的資料大部分都是淸朝軍機處和海軍方面的資料。

研究淸代以前中國歷史，學者可以有很多書目提要作參考，但研究淸代歷史則不然。當然，我們可以閱讀一些有關的書刊，可是有許多文學作品，私人和小出版商印的五花八門的紀錄，却不能指給我們方向。起初，我常去琉璃廠舊書店去找我所需要的資料。漸漸的，書店老板把我當作好顧客，開始到淸華來找我。在這段時期，我按計畫購買書籍。每屆週三，從上午九時至十二時，我接待琉璃廠的書商。他們到圖書館中我的書房來，每人先給我一張作者及書名的目錄，我可以從目錄中找出我有興趣的書籍。如果某一本書可能對我有價值，我把它送到圖書館當局審查、估價。書商在走廊上排成一排每人都帶着他們要賣的書，這樣成了一個慣例。有時他們知道我所需要的書而他們自己又沒有，他們就寫信通知全國有往來的同行，代我去搜求。

任何一位學者，一旦到了北平，就會染上搜集舊書的癖好。這種癖好很有傳染性。有一次，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先生要我陪他去一位私人收藏家那裏。我們在一起有一小時。他監視我，我監視他。我們找資料時，他問我對那一方面特別有興趣。我找到兩本小册子，第一本是「文祥年譜」。文係淸

代外交界的巨擘。第二本是有關鴉片買賣的書籍。袁先生對這兩本書似乎都不大有興趣，我私下很高興。我們分手後，他回北平圖書館，我回俱樂部，當他遠離我後，我又轉回去買那兩本書，但當我半小時後回到那裏向書主購買時，書主告訴我袁先生已經捷足先登把那兩本書買走了。

中國第一位駐英公使郭嵩燾，是十九世紀最有名氣的人物之一。大家祇知他在外交界的職務，很少有人知道他做過僧格林沁的秘書。僧格林沁於一八五九年曾在大沽抵禦英法聯軍的進犯。遠在英法聯軍進犯的當時，郭就建議他的上司僧格林沁，不要仇視外國人，應該談判通商條約。後來，他代理廣東巡撫時（一八六三——一八六六）就不准潮州人拒絕與外人往來。他的政策是要中國在國際上尋求和平、繁榮……而不要閉關自守。與他同時代比較進步的人士，已經有少數人準備接受外國武器、輪船、甚至鐵路，但郭某較他們更進步，他進而主張採用某些西方的政治、經濟措施。惜乎中外雙方人士均未重視他的識見。他的論文集幫助我們了解他的思想和他所處的時代。我獲悉他有很多未公開的日記。因爲郭是湖南人，所以我在寫家信時，就常提到這件事，希望弄到他的日記。有一天，家兄寫信告訴我他遇到一個湘潭雜貨商，他是郭的孫子。我立即寫信要他去查問，看看他家是否還存有他祖父的日記。我哥哥回信說日記就在那個雜貨商的手裏，而且他願以一千元代價出售。這簡直是天大好消息。我立即打電報給家兄，要他儘快把它買下。不幸，好多郭家的人都要分沾利益，有些反對出賣這份遺產，結果，買賣不成，日記仍存郭家，後來結果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曾國藩的文集，中間很明顯的有殘缺之處，我一直想把它補全。祇要是我認爲與曾家稍有關連的人不論路途如何遙遠我都去拜會他。多少次我均徒勞無功。直至一九三八年，南京政府撤退後，我在漢口有一天獲悉有三百封曾氏親筆函在坊間出售。索價每封三元。我立即表示如果對方願將三百封全部出售給我，我願每封出價五元，但是，此一消息迅即在漢口湖南名人圈中傳佈出去，他們都想保存一些偉大

同鄉的墨寶；以至我功敗垂成。抗日戰爭中期，漢口將陷落時，湖南人上演一幕爭奪曾氏書函的趣劇。後來，大家同意，將書函分開。我分到一些曾國藩致他弟弟曾國荃的信函，其內容爲對太平天國戰役中包圍並收復南京者。我很幸運，我分到的一份很有內容，因爲分信的人都祗注重書法的好壞，不大重視信中的內容。我約定將內容有關包圍南京的部分都分給我。我希望祗將未公佈過的信分給我。同鄉們答應我的要求，我很高興告訴大家，分給我的信都是精選的，這些信使我們對曾國藩及其弟弟的性格有新的了解。不幸，當我離開大陸時，一件突發的變故，以致未能將上述信函帶出，被遺在上海，它們的命運如何？我就不得而知了。

清華五年實在是夠刺激的，可以說我是發現一個新大陸——中國近代史。我努力工作，有時因爲得到偉大的發現而高興，有時因爲遇到想不到的困難而失望。我繼續研究中國外交史，同時又出版兩卷編纂資料（「中國近代外交史資料輯要」）。我的興趣越來越廣泛，我又對近百年來社會及經濟變化發生興趣。大多數人把這方面的研究工作看成一塊沒有肉的乾骨頭，認爲食之無味，而我却認爲棄之可惜，在此我不準備多說，祇想敍述一些回憶。

研究歷史的結果修正了固有的觀念。清末一百年間處理中國事務的領導人，不論滿漢，並非像過去出版物所渲染的全是壞得不可救藥的。當我在雜誌上發表我的見解時，各方反應不一。有人認爲我太偏向滿清，有人說我無禮，居然冒險去批評傳統上已經被承認的英雄人物。在民族主義革命高潮時期，欲想喚醒國人注意當時事實和情況，指出錯誤並非全在外國人一方，這眞是不可想像的。但我相信中國與列强之間早期的談判大部分都是錯誤的鬧劇，也就是說我們根本不了解情況。

因爲我是個教授，所以我的文章在政界也引起過不少小風波。後來，當我到政府任公職時，我想欲撰寫一些歷史題目的文章，或發表專題演講。這種情形又引起相當的麻煩。舉個例子：一九四二年係南

京條約一百週年。我發表一次演講，講詞用中英文在重慶發表。立法院長孫科博士在黨中央會議中引用了我的講詞，並且表示同意我的看法，一個與孫感情不睦的人攻擊我是英國帝國主義者的辯護人。該案竟至呈請蔣委員長核奪，蔣認爲學者的演講和寫作應該自由，黨方不必過問我的文章。

有的反應是從大西洋對岸來的。有一次，詹森（Nelson Johnson）公使（後來升任大使）託亞那波里斯（Annapolis）海軍學院阿倫（Allen）教授向我徵詢意見，問我鴉片戰爭時艦隊司令克爾奈（Kearny）的行動如何？有人告訴我說阿倫教授是受命於克家要他寫一篇克爾奈傳記。問題在克氏是否首倡中國門戶開放。正巧中國當時有一部分資料（那時尚未發表）對克爾奈於鴉片戰爭時在中國沿海的活動情形透露一線曙光，我的結論是：他並非是門戶開放政策的首倡者。我將備忘錄發表於「中國社會政治科學評論」上，當時我是該刊編輯，此事對我說，到此已經完結了。後來，哥倫比亞大學裴克（Cyrus H. Peake）博士告訴我一件很有趣的下文。有一天，哥大圖書管理員出示給裴克一本上面登着我文章的「中國社會政治科學評論」要他注意上面別人加的旁註，以及被剪走的部分。館員認爲一定是中國學生剪的，要他調查一下究竟是誰幹的。不久裴克博士獲悉紐約市立圖書館已經抓到那個破壞書刊的人。此人不是別人，正是克爾奈的後人。

我在清華時期，並不鼓勵學生讀歷史。因爲我深慮歷史系的學生沒出路。歷史系畢業生雖然可以到中學去教書，但是待遇低，圖書設備差，不利進修。學習歷史以備從政之用，此一見解倒是深獲我心。在過去，不分中外，許多歷史學家均能身居政府要津卽其適例。一旦有學生申請入歷史系，我都給他們澆冷水。我提醒他們讀歷史一定會受窮很久。我也要他們曉得研究歷史除非發現眞僞，不會成名。另一方面，雖然清華歷史系一直沒有很多學生，但，我很高興，少數優秀青年我都鼓勵他們進了研究院，研究中國學者一向忽略的問題。就我所知，一九三〇年我們中國尚沒有日本、蘇俄、蒙古、西藏、泰國及越

南歷史專家。一旦我發現一個青年，認爲他可以研究上述某一國歷史的話，我就說服他在研究院學習相關的語文。如果他在研究院成績好，我就設法推薦他到國外去深造。

例如：我鼓勵王信忠 (Wang Hsia-Chung) 去學日本史。因爲他在清華利用中、日、以及英、美資料寫過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外交關係的論文。他到東京帝大研究。日本方面起初認爲中國大學不會有學生到日本去研究日本史，但王信忠申請並通過了特別考試。他在東京研究兩年，回到清華任講師。

另一個例子是朱謙雲 (Chu ching-yun) ，他研究蘇聯歷史。他從中英庚款委員會得到一份獎學金，到倫敦斯拉夫語學校 (School of Slavonic Studies) 去研究。後來他又入達帕脫 (Dorpct) 大學。爲了能在蘇聯多住幾年，他擔任中央社駐莫斯科記者。

後來又有邵循正 (Shao cheng-chung) ，清華畢業後爲了準備將來研究蒙古史而赴巴黎研究波斯和阿拉伯語。

宋廸夏 (Sung Ti-Hsia) 的例子也很特殊。他在政治系畢業後，又申請入歷史系。我對他在學校的情形曾留心過，而且對他多少有些成見。從我對他勸阻的言談中，他知道我反對他再入歷史系。他單刀直入的說：「我知道我已浪費很多時間，但我是確實可以讀得很好的。我一定要好好讀，請讓我試試。」我勉強答應了他。爲使他及早回頭起見，我指定他個難題，要他研究領事裁判權以前中國境內涉外的民刑案件。在宋君以前曾經有人就法律觀點和歷史觀點研究過這個問題。但是，從來沒有人想逐案去蒐集有關的中國資料，找出中國官員在國內如何處理外人案件或涉外案件。宋興冲冲的研究此一專題。當他研究完成時，無疑的，成了中國治外法權方面的權威。但就他所蒐集的資料而論，我發現他的論文中還遺漏了一件重要的案子。我要他設法把它補進去。我告訴他：此種增補工作是很有價值的，如果能作的好，我可以同時用英文和中文將他的論文發表。他對我的意見感到非常高興。但，不久戰爭開始，

宋就開始他的流亡生活了。若干年後，他到我行政院政務處長辦公室來看我，見面後，我立刻問他是否完成我所建議的增補工作。他卽時承認在他流亡的途中已經把原稿遺失了。我斥退他，要他以後永遠不要再來見我。不久以後，我輾轉聽說他開始酗酒，終致客死在四川的一個小鎮上。

清華予我足够的資料和時間從事研究工作。那裏也有許多益友和同事。在我教過的學生中，每年我都發現有些人他們的生活與我息息相關，他們的生活也成爲我自己生活的一部分。除了上述情形外，清華座落北平西山脚下，是個消閒靜養的好地方。我們打網球、游泳、滑水、騎馬、打獵，尤其有興趣的是旅行野餐。從校園騎驢很快就可以到頤和園、玉泉山、香山八大處。九、十月間，每天都是風和日麗，我每天下午都帶孩子到上述各處去遊玩。我最大的孩子大寶頗具長姊風範，爲人爽快，有相當的外交手腕。二寶多情善感。三寶喜歡嬉戲，自由奔放，對父母的管敎不甚注意。因爲他身體健壯，所以整天在外面跑。四寶在家中是最受寵愛的。他一定要牽着我的手，他要人抱的時候，就一定要抱他。我欣賞寶塔、松樹、玉泉山的清流、圓明園的漫步、廟內溫和、兇惡的神像和成羣的小孩子。

一九二九年我到清華任敎時，校中約有五百名學生。五年後，人數增加了一倍。每年錄取的學生約佔報考的十分之一。一般水準和入校比率自然都很高。學生們大多數都是一本正經的；他們深深了解對國家的責任，知道擠進清華大門之不易。祇有極少數是例外，我敢肯定的說，不會超過百分之二、三。

在知識份子佔多數的國家中，學者普遍受到社會尊重，學生在政治運動中自然也會扮演重要角色。在中國，自漢代以來卽是如此的。新的民主理論祇是强調了學生在中國的政治地位而已。在過去的五十年，教育和革命是分不開的。每個政治領袖都要靠學生起家。每個政黨都要爭取學生。由於中國對現代政治組織和宣傳鼓動方法不太熟悉，不能妥善運用，因此，在政治方面所表現者也和其他方面一樣，西方的民主政治的弊端首先傳進中國。顯而易見的，政治領袖、煽動家，幕後的政治團體的作法都爲學生

政治家所左右。

中國大學教授欲想對學生們提出政治性建議是很困難的。我們是否應該建議那些熱衷政治的青年，要他們犧牲一切，去醉心政治，去推翻某個政府或打倒某派？又是否應該告訴他們救國不是一蹴而卽的，需要很長時間，要他們安心讀書，以應未來的需要？在混亂的中國，這些問題都不是一個單純的答案所能解答的。事實上，當政治風潮剛開始時，具有說服力的勸告還有效果，一旦風潮發展到某個階段，教授們的話就沒有用了。每逢風潮，學生們的心中也是矛盾的。他們一面喜歡風潮的刺激，一面也想要讀書。中國大學受外界影響淪爲政治劇場，其程度如何，要看相關影響力量的消長而定。如果說學校辦得好，能够啓發學生的求知慾，就會產生一種力量，使學生少受外界干擾，安心求學。反之，他們就會捲入政潮，荒廢學業。因此，中國大學在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如何，也代表了學生的好壞。基於此種理由，中國最壞的大學就是我們所謂的「野鷄大學」。它們很少注意教育問題，專門去搞煽動、演說、運動，去擁護某一方面或去反對某一方面。所以，一旦報上登出中國學生在某地鬧風潮了，我們就會認爲參加的人一定是「野鷄大學」的學生。

第十三章 「九一八事變」與「獨立評論」

瀋陽事變（日本稱「九一八事變」爲「瀋陽事變」）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發生於瀋陽城外，是遠東有史以來最大的事變。駐在我國東北的部分日本軍隊，即所謂關東軍，秘密計劃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夜開始行動，佔領東北。當時瀋陽城內外駐守的中國軍隊毫無準備，悉被解除武裝。東北行政中心——瀋陽——兵不双血爲日軍佔領。日軍佔領瀋陽後，進而又佔領了整個東北三省。從東北又向中國內地擴展。數年以後，又從中國把戰爭擴大到東南亞，包括印尼、菲律賓、越南、寮國、星馬、緬甸和泰國，直至澳洲邊緣。向東擴展，到了珍珠港。

「事變」之發展所以如此深遠，實因集合許多條件而促成。

第一、是中國國力和民族意識覺醒的程度不能相稱。像中國這樣落後的國家雖然不能在短期內躋身於現代强國之林，但在短期內喚起民族意識，認淸國家主權，爭取國際大家庭中平等地位和尊重還是可以辦到的。我們堅決要求國際地位平等，但是我們沒有支持此種要求的國力。假如這種情形反過來，也就是說我們在國力發展方面遠較民族意識的發展快，則九一八事變也許就不會發生了，即使發生，日本方面也不會那樣爲所欲爲。

第二、是日本領土擴張論抬頭的結果。九一八事變時，日本也正如大多數其他國家一樣，陷於經濟不景氣中。工廠關閉了，國際市場沒有了，失業的人很多。經濟情況予好戰份子和極端份子以採取激烈

行動的藉口。面對整個世界經濟不景氣，所有國家都設法控制國內市場，排斥日貨。日本主戰論者利用世界資源分配不公及「有」資源國家加緊排斥日貨的事實爲藉口。另一方面，「有」資源的國家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即銳意保持和平，共同努力控制世界市場和原料。日本有見及此，自然要籌謀對策。他們認爲：日本如果不能從西方列强控制下的落後地區分一杯羹，就祇有犧牲中國，在亞洲北部去建立他們的帝國。

日本人認爲佔領我們東北是很公道的。他們認爲他們並非從中國人手中攫奪東北，而是從蘇俄手中拿到東北的。他們認爲：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間的日俄戰爭如果日本戰敗的話，東北勢將成爲沙皇帝國的一部分。結果日本戰勝了，東北自然應該歸他們。他們進一步認爲：日俄戰後東北重歸中國版圖那實在是因爲國際間的嫉忌和中國的外交陰謀有以致之，事後中國非但不與日本合作，反而阻止日本發展，而且更重申中國的主權。

東三省的重要性是中日双方都承認的。我們都知道東北的農工業在中國均居最重要地位。同時，我們對日本人的態度一向也是看不起的。日本人一直未曾受到中國人的尊重。在過去若干世紀，我們一直把日本人當作「侏儒」，認爲日本人少、地小、文化低。一八九五年日本戰敗中國，對中國人說實在是個大震盪。中國人把那次失敗當作從未有過的奇恥大辱。三十年後，日本在東北非法築路、駐兵、控制重要港口，實際上就是控制了東北的經濟命脈，中國人認爲：日本在中國所作所爲對中國都是侮辱和侵略。這就是中國人對中日兩國在東北衝突的看法。

當時中日双方均缺乏政治手腕，以致無法籌劃出有利双方的經濟發展計劃，解除日本侵略中國的經濟因素。中日兩國主戰的報紙，一致渲染：如果中國富了，日本一定會窮；反之，如果日本富了，中國也一定會窮。双方沒有合作的餘地。

九一八事變之前，中國輿論着重在反對不平等條約上。經過研究和實地觀察，我當時認為東北問題不易解決，因此我以為應該格外注意才對，我認為除非中日双方小心、聰明，否則，就會發生巨變。關於此點，我很謹愼，當時不願表示先見之明，所以也不願預測「事變」的性質、時間和地點。迨九一八事變發生，我也和其他的人一樣感到震驚。我應該再補充一句，當時我對調整中日衝突關係還沒有詳細的腹案，我仍在摸索，想要找出一個双方均能獲益的辦法。

我一向不怕日本，我認為：就中日兩國而言，中國弱，日本强不過是暫時現象。我曉得日本有裝備精良的陸海空軍，有訓練有素的士兵和有效率的官員。軍隊的後面，他們有最愛國、最勤奮、最儉樸、最守紀律的國民。盡管日本有上述的優點，我却不認為她對我國會構成永久的威脅。我相信時間是對中國有利的。沒有强國的基本根據地，任何人都不能建立、保持一個偉大帝國。因此，我對九一八事變的主要想法是爭取時間。

上述想法，可能是一廂情願的。但我對北大、燕大、清華學生們演講時，却一直以這種想法作為基本理論，我一直認為九一八事變是地方性的。

一九三一年冬，外交部長顧維鈞博士提議將東北南部的錦州附近地區劃為中立區，隔開中日双方的軍隊。我贊成他的建議，此舉可使衝突緊張形勢不致蔓延。當燕大校務長司徒雷登約我到燕大演講時，我極力支持顧氏主張。講完後，燕大名敎授陸志韋 (Lu Chih-Wei) 起立代表敎職員及學生聯合會發言。經過簡短的說明，他提議燕大師生通電全國，反對設立中立區。政治系主任徐淑希 (Hsu Shu-hsi) 也贊成他的提議。司徒雷登校務長將提案付諸表決。我從台上看到一片手海，心中不免沮喪。我當時覺得我是在對戰爭的狂熱者從事一場艱苦的作戰。

全國學生一致要求抗戰。他們到南京向中央政府請願，鐵路為之受阻。主戰情緒發展的邏輯是很簡

單的。日本佔領中國領土，中國必須要抵抗，卽使是戰敗、戰死都在所不惜。失地是可恥的，不戰而失地更是永遠洗刷不掉的恥辱。

當時日本主政的是民政黨。我和華盛頓史汀生（Stimson）國務卿一樣，都把信心寄望於民政黨。一九二七年夏，當我在東京研究時，我曾見過日本外相幣原（Baron Shidehara），我與他在華盛頓會議中也見過面。他曾表示：他和他的政府決定與中國保持和平，不干涉中國內部的統一。一九三一年冬，有一位朋友告訴我，幣原於那年夏天就曾要求當時中國駐日公使汪榮寶，回南京向政府報告。「告訴你們政府」，幣原說：「一個大事變就要發生了。除非中日双方政府謹愼處理，双方均將被毀。盡速和我來解決。但，我一定要佔一些便宜。如果你的政府不肯讓步，我的政府必然會垮台，而後任將較我更甚，會要求無厭。」事實上，整個七、八兩個月，幣原一直都急於尋求談判的機會，而南京和東北方面都盡量設法避免。明瞭對方所使用的策略後，我不禁感到我們的政府措置失當。而且也越發使我相信日本民政黨的政府是急欲將九一八事變地方化的。

所有反對中央政府的政客和軍人，毫無例外的，一致要求立卽對日作戰。此種現象不禁令我深思。我認爲愛國並不是反對中央政府者的專利。顯然的，反對派這樣做法有兩個前提。其一，在中國政爭中反對派已經無可挽救的敗給蔣委員長了。其二，日本軍隊可能抄了蔣的後路。愛國口號在最不愛國的動機下喊出來。雖然學生和老百姓大部分是眞正愛國的，但我深知有些是受政客幕後操縱的。活動費送到北平，大部分用在少數學生身上。此種情形更使我要去努力阻止全面戰爭。

中國人對中立地區的擬議不是冷漠就是堅決反對，因此，蓄意佔領東北的日本關東軍，乃無視於日皇對中立地區的指示。大批日軍迅卽滲入平津地區。日本的侵略立卽影響到平津兩市的大學學生。我們曉得：欲想獲得和平，保持和平，必須要中日双方努力才能有效，但現在日本方面要侵略，因此，我們

也祇有漸漸轉而主張備戰了。

清華教授集中住在三處。我住在北院。北院七號是葉企蓀和陳岱蓀，他倆那裡成了非正式的俱樂部。有很多朋友住在那裡，其中包括哲學系的金岳霖，政治系的張奚若和錢端升，物理系的薩本棟和周培元。我和其他許多人常於飯後到七號去聊天。我們爭論和戰問題，無盡無休。每個人都曉得戰爭的困難，但祇有我一個人是公開而誠意的主張維持和平的。不過我也不敢相信和平可以廉價取得。我和他們都主張從速準備，以應付可能發生的戰爭。爲了使學生準備作戰，許多教授也改變了他們的授課內容。

在那段時間裡，我每週到北大去授課一次。因爲編「中國社會政治科學評論」，我常到城內總社去。透過這些關係，我一直和城內一些朋友們有接觸。現在我已不記得是那一位發起的，在清華俱樂部舉行一次晚餐，當日出席的有胡適、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灝、陶孟和、任鴻雋、任夫人陳衡哲、張奚若和吳憲。席間曾討論到知識份子在國難時期所能盡的責任問題。我提議辦個週刊，討論並提出中國所面對的問題。陶孟和第一個就給我澆冷水。陶曾編過若干年「時代評論」，深知出版週刊的各種困難。他警告在座諸君，不可掉以輕心，不加思索的冒險嘗試。胡適也反對我的想法，祇是沒有陶那樣激烈而已。他曾編過一個叫做「播種者」（The Endeavor）的期刊，在五四運動時期曾發行了若干年。他說：他的經驗使他不敢輕易創辦一個新刊物。他的話令我很洩氣；因爲當時在座的人一致都認爲不辦刊物則已，設使要辦，則編務方面非胡莫屬。因爲我對辦週刊毫無經驗，我想我應該接受這些有經驗的人的意見。

過了一週，任家約我和另一些人到他們家中去吃飯。我又提出辦刊物的想法，他們又和過去一樣表示反對。但出我意料的，丁文江倡議：爲了測量一下我們的熱誠，不妨先來籌募辦刊物的經費。「辦刊物很容易，」他說：「但能繼續維持下去是困難的，除非我們能够共同負責。否則，整個重擔就會落到編輯一個人的肩上。」他提議我們每人每月捐助收入的百分之五。如果沒有足够的財政上的支持，我們

可以放棄這個計劃，把捐款發還，如果有人來支持，我們就可以詳細計劃出版問題。假如我記憶不錯的話，丁當時決定經費總數最低不得少於八百銀元。丁的建議對我說似乎是太嚴苛了，但我還是同意了，在座的其他人也未反對。

從那時起，我們每週聚會一次。起初是討論發行日期問題，接着是準備出刊。丁又提議我們應該約請一位銀行家來加入我們的陣營。所有捐款、保管及財務上的事務都請他偏勞。丁介紹竹垚生(Chu yao-sen)先生，大家欣然同意。幾週過去了，捐款也都交進來。大家提出好幾個刊物的名稱，最後選用了胡適先生所提的「獨立評論」。我們成立一個編輯委員會，委員三人，由胡適總其事。我和丁文江協助編務。

當我寫這本回憶錄時，手邊已經連一本「獨立評論」都沒有了。「獨立評論」創刊於一九三二年春，第一期印了兩千本。初期的「獨立評論」是相當簡陋的，但比我們所預期的要好得多。第二期我們發行了三千本。半年後，已經無需繼續捐助，可以自力更生了。一年之內，發行數字升到八千本，兩年之內，達到一萬五千本。我們不僅不收津貼，也不接受大幅廣告。終「獨立評論」時期，社中祇用一個小職員，負責發行事務，月薪六十元。

在輿論方面，「獨立評論」成了當時著名的刊物。「獨立評論」不對某項專題作有系統的討論，也不刊登知名之士請託的稿件。大家每週聚餐一次，討論時事，但不作結論。我們不僅對外界是獨立的，即是同寅彼此間也互不干擾。我們討論時都了解彼此不同之點，有時大家的觀點也會自然趨於一致。有時，外邊作者會發現「獨立評論」是眞正獨立而尊重別人意見的。「獨立評論」實在是一個公開的園地，每個人都可以用它發表自己的意見。

「獨立評論」的讀者，大部分都是大學生。其次是公務員，再次是開明的商人。令我感到意外的是有些青年軍官也一直看「獨立評論」。其後幾年，我發現有許多人是從「獨立評論」認識我的，而非從

我花費多年心血所寫成的歷史著作中認識我的。

「獨立評論」同寅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傅斯年。他也和其他人一樣，爲「獨立評論」花了許多時間撰稿。他有豐富的歷史知識。一旦他撰寫一篇稿子，就好像是集合了四千年的歷史經驗似的。他把文章重要內容摘出來登在前面，此舉成爲出版界的創舉。令許多朋友吃驚的是他的文章不僅能引起讀者知識上的共鳴，而且也能引起他們心靈上的共鳴。能夠引發最深的情感，也能使某些人感到莫大的嫌惡。

在未辦「獨立評論」前，我對丁文江沒有深切的認識。但經過「獨立評論」在一起共事後，我開始尊敬他、愛戴他。他是一位職業的地質學家，並曾創辦過地質調查所，成爲中國最負盛名的科學研究機構，當孫傳芳控制長江下游各省時，對他曾畀以建設大上海的重任。多年來他一直研究中國陸軍種種問題。孫傳芳失敗後，丁任北平附近一所煤礦的經理。在「獨立評論」同寅中，他對國際形勢知道的最透澈。他不僅多才多藝，而且實事求是。

辦一個刊物需要花費很多人的力量，「獨立評論」的成功，無疑的，胡適貢獻最大。他的朋友和熟人一致認爲他是個最能吸引人的人。幽默、細心、聰明。談話時，態度和藹，富理性。他反對教條主義，對一些莫名其妙的人却特別有耐性，如果根據以上兩點認爲他處事沒有原則的話，那可能是大錯特錯了。他對自己的信念，堅定不移，在他漫長而多采的人生中，曾有若干時期受到最高的推崇，也有若干次被人認爲落伍和膚淺。有時他表現了無比的勇氣，有時他也會因爲某事或某人而與人論戰。但是，終其一生，他都是主張自由、民主和實用的。

我不想對胡適多加讚揚。我想談一談我與他的不同之處，有些我已經在「獨立評論」上發表過，其他是不言而喻的。我認爲他對自由議會政府的想法太天眞。他似乎對許多民主國家幕後的貪汚、腐化、浪費、愚蠢、冷漠不欲深入了解。對批評十九世紀自由主義的浪潮也不重視。就在北平，好多國會議員

就曾把選票賣給無知、枉法的曹錕，選他作中國的大總統。湖南，在趙恒惕任主席時，就曾頒佈過省憲。省議會開會時，議員都把時間浪費在爭權奪利上，致使人民感到厭惡，認爲有它反而不如沒有它。這類事實胡適認爲無所謂。他認爲民主的弊端能用更民主的方法去防止。

馬克斯的經濟史觀無疑的是不切實際的，但胡適幾乎是忽略了經濟問題。對我說，中國人的貧困是個迫不及待需要解決的問題，因此，我認爲應該在經濟方面即刻採取行動，而無需等待中國政治的民主。我認爲經濟應該先於政治。在經濟方面我認爲有兩件工作要做：其一，利用現代科學和技術從事生產運輸。其二，社會化或公平的分配財富。我認爲憲法和議會之有無是次要問題。創造更多的財富，平均分配對我才是最重要的。我從未認爲胡適反對向繁榮方向發展經濟，同時，我也希望他從未懷疑我反對政治民主。我倆的不同點不是原則問題，乃是輕重緩急問題。

「獨立評論」上曾經刊載過許多關於中國統一問題的文章。在這方面，我認爲我與胡適也有不同之處。他似乎認爲中國可以、而且應該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方式來統一。我認爲除非已經有了最低限度的統一基礎，否則，這種會議不會有太大的成就。武力對國家發展的重要性如何？也是我倆意見相左的所在。我認爲必須武力和政策配合才能使國家統一，但他似乎認爲，如果我了解不錯的話，用武力統一是無用的，也是不必要的。

因爲「獨立評論」創辦於九一八事變後，自然其中會有許多討論到和戰以及國聯是否可以信賴的文章。「獨立評論」同寅中沒有人主張立即對日作戰的。在這一點上，大家的主張是一致的。當時天津益世報編輯羅隆基，發表了一篇轟傳一時的文章，題目是「槍口朝外，不可對內」。文中大意是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我在「獨立評論」上爲文答覆羅氏，略謂：倉促對日作戰將遭失敗，現代化的戰爭需要長期準備，然後全國總動員。社中同寅對我的主張均未表示異議。

但，丁文江略有不同。他進一步認爲中國需要來個普拉斯特立託維斯克（Brest-Litovsk）式的條約。（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一日，俄國革命推翻沙皇後，爲謀保持布爾塞維克新政權，蘇俄政府於是年十二月派加拉罕等人前往普拉斯特立託維斯克與德國擧行和談。一九一八年三月與德國簽訂投降式和約。——譯者。）此一倡議自然是主張中國抄襲列寧於革命成功後爲爭取對德和平所使用的策略，使中國付出相當代價。文江的結論是爲了和平不惜任何代價。他相信中國在軍事、政治和經濟各方面準備的都不够，不足以應付對日戰爭。在軍事方面，他一直認爲中國沒有訓練有素的軍官。他常說，在中國所有工作中，他最有興趣的是軍校校長，一旦做了校長他可以訓練出一批新軍官。當然，他更了解，中國在造兵方面也相當落伍，除了來福槍和輕機槍外，尙不能生產新式重武器。在政治和經濟方面，他深悉中國地方割據的情形。他認爲中央政府不能利用全國資源。他特別指出中國經濟的不足。在太平年間，生產正常，糧食僅能自給。一旦氣候失調或境內爆發大規模內戰，中國就須從國外購進大批糧食。丁堅信欲想贏得戰爭，必須要軍事與經濟並重。他時常要我們注意東北的事實。在東北已經有一支中國最大、裝備最精良的地方部隊，但是日本並未遭到强勁抵抗，輕而易擧的就佔領了東北。東北情形如此，中國其它地方又將如何呢？這是他常常談到的問題。

中國當時的情況是這樣的：人民在理智方面，都曉得國家沒有作戰準備，但在情感方面，大多數均主張早日抗戰。戰爭氣氛彌漫全國。關於這種情形，胡適博士一再的說：「和比戰難」。在當時，也就是說在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三年間，中國人誰能使中國對日本議和？胡適的論點對丁文江不惜任何代價爭取和平的主張可謂是有力的答覆。回顧一下「獨立評論」整個過去歷史，我敢說丁文江當時那篇文章證明了最大的勇氣和最大的知識份子的眞誠。我也敢說胡適博士對和平之困難表現了一個眞正政治家的了解。

和這些人在一起，常常和他們討論時事，我可以感到文江胸中的激憤，也可感到胡適心中的憂傷。胡的朋友們似乎都覺得很奇怪，他沒有像文江那樣公開主張和平；因為胡適認為文江不免有些「烏托邦」。問題是：當時除了這種「烏托邦」的意見外還能有什麼其他的意見呢！

顯然的，主戰者一天天增加。我也清楚看出中日雙方都邁向災難。日子一天天過去，自由人士在日本越來越失勢，迷信武力的主戰者越來越抬頭。在中國，反政府份子利用純潔的人民愛國熱狂，呼籲作戰，而政府拿不出辦法以緩和人民的情緒。我認為一項偉大的改革和建設計畫或可代替人民主戰的情緒，但是政府無力及此。我想「獨立評論」的同事們的看法都是如此的，只是有時他們表示出來，有時不表示而已。

雖然我們都支持國聯，但在一九三二年間我們却沒有人眞正寄望國聯能採取什麼有效措施。厲行和平的意願，如果說曾經有過的話，也於一九三二年日內瓦會議中消失了。胡適除了尊重國聯賴以存在的高尚理想外，還希望我們不要隨便討論國聯處理東北爭端的事。傅斯年對李頓調查團的姑息做法極為憤慨，因為那種姑息很明顯的除了犧牲原則以外將毫無所穫。至於我，我認為已經有很多國家正千方百計想要搞垮國聯，如果說李頓調查團想要再挨日本一記耳光的話，中國又何必去阻止他呢。

「獨立評論」的同寅從未有人夢想中國可以從外國得到援助以對抗日本的侵略。我們曉得在某些國家中可能有某些人某些團體是同情中國的，但我們也知道僅是同情是不濟事的。中國有些人認為蘇聯可能和中國結成聯盟。為了要與蘇聯結盟，他們要求中國恢復對蘇外交關係。「獨立評論」贊成他們的主張，但並不幻想蘇軍會對日本作戰。我們祇是認為中蘇保持正常外交關係是應該的事。很奇怪，在中國，特別是在「獨立評論」同寅中，從來沒有人想到英美兩國會武裝干涉的。我們似乎認為美國已決心不再作戰。英國也同美國一樣，希望和平。此外，有些保守黨黨員認為年輕的民族主義的中國應該受點折磨。

一九三一年，英美的保守份子，不惜任何代價醉心於昔日左傾的和平理論。就好像資本主義也有意要充份證明一下資本主義者能支持世界和平似的。相反的，所有國家中的左派份子却澈底改變了他們自己。遠在一九一八以及一九一八年以後的幾年中，共黨份子和社會主義份子揭發了戰爭的眞面目，使他們自己成爲全世界最愛和平的人。到了一九三〇年，左傾份子一改昔日主張，反而要求戰爭。越左傾越好戰。這種轉變，無疑的說明了我們在防止戰爭與維護和平方面努力得不够。因爲「獨立評論」必須要討論某些有關人的問題，所以迄未對和戰問題予以論列。我們深知，在人類的歷史過程中，每一個階段，每一個階級都與戰爭和建國有關，對我們說，戰爭似乎是一種病，屆至目前爲止，我們還沒有發明一種可以醫治它的特效藥。

雖然「獨立評論」同寅間都了解彼此見解不同，但外界却把我們看成是一體的，有些人甚至認爲我們正在成立一個新政黨。這種看法當然是毫無根據的。但外界人士却認爲我們的立場是一致的。

我們之間，除了經常爲「獨立評論」撰稿者外，很多人不時爲天津「大公報」撰稿。我們與「大公報」間從來沒有默契，更談不上正式的合作，但事實上是共守相同原則的。

我在「獨立評論」和「大公報」上所發表的文章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其中包括蔣委員長。一九三三年夏季，他約我到長江中部避暑勝地牯嶺去談話。促成此事的是「大公報」的發行人吳鼎昌和蔣的親信幹部錢昌照，吳是「大公報」的創辦人，也是蔣的密友，對蔣極有影響力。錢一再表示他對發展中國天然資源極有與趣，當時正與翁文灝計畫中國工業化問題。錢當時是蔣親信中比較年輕的一個。因爲他們兩人都未說明是誰安排我和蔣見面的，所以我認爲是他們二人共同安排的。

屆至一九三三年，我已回國整整十年。在這段期間，我從未進過衙門。對任何身居要津的朋友也從未請他們幫過忙。我對政治的態度是很正常的。我認爲政治並不是專爲金錢和榮耀。對我說，政治祇是

一種工作，我認爲它和教書一樣的淸高。湊巧我很喜歡淸華的工作，而且想寫一本近百年中國史。我希望它能在中國學術界奠定我的久永地位。當蔣約我時我欣然接受，這倒不是我要棄學從政，實在是因爲我希望會見一位偉人。在他那方面，我想他祇不過是表示一下對學者的敬意，了解一下政府以外人士對其政策的看法而已。事實上，他是正在全國設法發掘才智之士。一旦時期成熟，他就安排與這些人見面。

因爲何廉博士也是被約見者之一，於是我倆同上牯嶺。我們在那裏停留了一週，曾與蔣會晤好幾次。第一次見面祇是禮貌上的。他很客氣的說，湖南是出大人物的地方，因爲他知道我與何廉都是湖南人。當然，在談話時他已深悉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的大名。爲了回答他的恭維，我說：雖然湖南過去出了一些偉人，但是現在的中國偉人却多出自浙江。

蔣的樸實生活令我深受感動。他在牯嶺住的是一棟樸素無華的房子，門牌正好是十三號。盡管他的許多外國朋友勸他換個號碼，但他一直都不相信那種洋迷信。他的態度極爲得體，使我旣不感到拘束也不致完全放縱。很明顯的，他對財富和虛名都不看在眼中。我們也可以淸楚的看出他有堅强的意志，對於重要工作，能够全力以赴。

在我們第二次見面時，他的秘書拿着紙筆，顯然的他是準備紀錄我們談話的內容。我們被延入就座，奉茶後，他提出一個問題：「你們對當前國家大事有何意見？」我認爲他問此一問題的目的是要我發表意見。我談了約二十分鐘中國統一問題。首先，我提出正確結合政策和武力的理論。然後，我又說明，中國地區遼濶，風俗各異，統一工作不妨分成若干階段進行。第一先建立一個眞正核心地區，其行政要優於其他不直接屬於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區。我又進一步說明：因爲日本已經表示對華政策趨於積極，所以中日之間遲早難免一戰，中國必須早作準備。我們應該爭取時間，但有些事往往無法控制。中國政

治家們必須認淸對日戰爭會使中國自然而然的達到統一。在對外戰爭中，愛國心和中央政府的統治力量一定會增加。他全神貫注的聽我講，一直沒有打斷我的話頭；也沒有用微笑或是皺眉來表示好惡。當我要離開時，他表示希望我再多留幾天，以便再談一次。

過了一天，他約我去吃午飯。那次午飯除了蔣的秘書外祇有吳鼎昌一人在座。席間，吳先生提議最好談一些外界對政府的批評。委員長要我坦白的講，不要有顧忌。我說有些人對中央政府感到失望。他們希望中央政府的行政能够更有效率，希望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區生活情況更能改善。但是改善生活不是一蹴而幾的。有些人把中央政府控制省份和非中央控制省份的生活情況拿來比較，認爲中央政府控制地區不太好。他立即問我人們認爲那一個非中央控制的省份比中央控制的省份更有行政效率。我告訴他，因爲我沒有到過那些省份，我不能根據人們看法來下判斷。我所說的祇是根據傳聞。就以山東來說，在韓復榘那様頭腦簡單的人統治下，據說也比浙江的秩序好，比浙江更繁榮。他雖然懷疑傳聞的正確性，但仍認爲我所說的都很重要，認爲中央政府控制下的各省應該改善。

一九三三年秋，中國駐蘇大使顏惠慶博士回國。當時流行一個傳說，大意是說如果中國抵抗日本，蘇聯願予中國武器援助。因此，大家都推測顏對政府述職的內容如何如何。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精衞約我到南京一談。在南京我與交通部長顧孟餘、外交部次長唐有壬、交通部次長、汪的機要秘書曾仲鳴共進晚餐。在此之前我曾見過汪兩次。一次是在南開時他去演講。那次演講非常成功，口才好，內容精采。第二次是在國難會議時期，會議是汪召集的，於一九三三年春在洛陽當年吳佩孚練兵的營房中舉行。

以人而論，汪是很有吸引力的。但他主持洛陽國難會議，講了好多次話，我仍不能獲悉他的眞意所在。我曉得他是反對抗日的。然而，在他任行政院長之前，他的手下也曾發動過學生要求對日作戰，以

增加政府的困難。政客們爲了爭權會做出許多奇怪的事，但是用和戰問題當作手段，我認爲是絕對不可饒恕的。我們「獨立評論」的同寅於獲悉汪氏出長行政院時曾在一次晚餐席上坦率指出此一任命對中國的不利。我自己曾致力於阻止提前對日作戰。汪爲了他個人理由也不願對日作戰。但是他在野時拼命煽動戰爭，一旦掌權時又要大家維持和平，似乎是缺乏愛國心和對國家的眞誠。

飯後我問汪，顏對蘇聯有何意見。汪立時回答我說就是爲了此事所以才找我來商量。他告訴我，顏向他建議：政府可以用公民投票的方式讓人民去決定和戰問題。汪問我是否同意顏的意見。我回答說如果政府已經準備作戰，想要製造一個海內外人民要求作戰的印象，不妨舉行一次公民投票，否則，我認爲此舉不免幼稚。汪表示贊同我的看法。我問他顏是否帶回蘇方承諾，一旦中日開戰，蘇聯予我援助。汪告訴我顏並未帶回此種承諾。

我認爲汪可能是曲解了顏惠慶大使的報告，因爲顏是我國最有經驗的外交官，我認爲他不致提此幼稚建議。爲了國家利益，我希望能保持他的聲望。我回到清華，迅卽求敎於我的同事顏的好友錢端升先生，問他汪所說的是否正確，如果不錯，我問他可否到天津勸阻顏不要再提這種建議。錢和我一樣，也認爲顏所提的建議不妥。他前往天津。歸來後，他告訴我他已順利完成任務。顏的確提過那個建議，而且答應以後不再提起。

一九三四年初，蔣委員長從南昌行營電約我前往，見面後我感到很難過，因爲蔣問我的問題和汪一樣。我從報紙上獲悉顏已經晉謁過委員長。顯然的，他已乘機又向蔣提出同一建議。自然，我同答覆汪一樣回答了蔣。晚飯時，黃郛和蔣鼎文也在座，蔣問我對當時全國熱烈討論的憲法草案有何意見。憲法草案的重點是中國應該採行美國的總統制，而不採行法國的內閣制。我很清楚，一旦新憲法草案實行，總統一職非蔣莫屬。問題是：蔣公於獲得最高行政權後再擔任軍隊最高統帥是否合適？我個人認爲是不

合適的，因此，我也就照實表示了我的看法。我又說：憲法不能完全依據理論，須要根據經驗。因為我們在中國不能確知何種制度適合中國環境，所以採行一種新憲法徒然增加政治緊張而已。當時所行的臨時約法與我們所可能草擬出來的新憲法就好壞論不會有出入。我認為最好是不要修改它。同席的黃郛先生，是一位老政治家。他的經驗當然要比我豐富。我說完後，深感自己魯莽，居然沒有讓他先發表意見。但出人意料的，他却熱烈支持我的看法。當我告別蔣時，他問我將來有何打算。我說我準備休假時到歐洲去，特別是到英、德兩國去考察。我準備到倫敦英國外交部及普魯士和德國檔案處去找一些資料，以便開始著述。他要我行前再去看他。

蔣在南昌的行營，可以說是當時中國眞正的首都。江西剿匪工作行將完畢，中央軍正追剿流竄至貴州、雲南、四川的殘匪。中央政府的政治力量正隨軍事的進展而擴展。剿匪事實上等於變相的統一。軍事行動之外，行營更致力於政治、財經措施。為了上述工作，創立了農民銀行。中央公開表示：剿匪工作是七分政治、三分軍事。從報紙上我們獲悉行營秘書長楊永泰和江西省主席熊式輝正協助蔣計劃政治和經濟。因為僅僅要我在某些特殊問題方面表示意見，兼以我對政治不感興趣，於是我盡速離開南昌。

西方作家看中國這一段歷史可以說完全是受了共黨的影響，認為中共從江西流竄到延安是「長征」。「長征」一詞具有英雄氣概。即使他們的逃竄有幾分英雄色彩，但是西方作家却不該忽略了他們的「長征」乃是中央軍追剿的結果。其流竄一事就政治觀點說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中央政府因為追剿共匪而擴大了控制和影響區域，包括中國的西南部。第二、以西南為根據地，使中央能夠對日長期抗戰。

在這段時期中，有一段時間共匪暫時控制了我的家鄉湖南省地區。從我弟弟的信中獲悉共匪在我家鄉叛亂的詳情。地主的土地被沒收分給沒有土地的人。鄉人暫時沒有抵抗，結果因「革命」而得到好處的都是其他省份的外鄉人，沒有一個是附近的人。本地人，無論是地主或佃農都沒得到好處。他們認為

他們是被征服，是被外地人騎在頭上作威作福。最後，地主和佃農聯合起來，以本鄉人反對外來人的心情，把共匪的措施又恢復原狀。一切事又和過去一樣。地主收回他們的土地，佃農和過去一樣仍舊耕種他們原來耕種的土地。鄉下人認爲革命是一場惡夢。

在我與蔣委員長多次談話中，我曾向他建議，在剿匪時應該向農民明白表示，如果他們需要自己有土地，中央政府一定可以幫助他們得到。但是如果農民在土地要求外一定要支持共匪的話，中央一定不能容許。事實進展的比我們計畫的快。共匪在江西的軍事組織在中央尚未採取任何解決土地問題的措施以前就已經崩潰了。共匪離開後，地主回來，農民對他以前的地主說：「大叔，我眞願意你回來，你走以後我一直小心照管着你的土地。」

第十四章　赴俄考察與歐洲之旅（一九三四—一九三五）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德國公開一些關於戰爭起源的秘密外交文件。凡爾賽條約把整個挑起戰禍的責任委之於德國。然而，德國偉大的出版物「大政治報」（Die Grosse Politik）由許多學養深厚的學者撰稿，除了剖白德皇政府對戰爭所應負的責任外，還對一九一四年以前的世界外交情形有所說明。德國這種公開秘密文件的擧措，使英、法、和蘇聯也起而效尤。透過此種擧措，世界歷史家在戰後十五年內能够寫出自普法之戰以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正確的世界政治史。在公佈資料時，各國政府不僅幫了歷史科學很大的忙，而且也啓發了世界專家們的意見。

我對這些公開資料極感興趣，特別是有關遠東部分的。在這方面，德國、蘇聯和法國的資料中有極豐富的材料，英國資料是令人失望的，因爲其中沒有日俄戰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有關遠東的資料。

除了蘇聯政府公佈的文件外，俄國學者們還發行一本名叫「紅色檔案」（Red Archive）的刊物，其中有許多關於沙皇政府在遠東的外交文件。我曾將它們譯成英文在「中國社會政治科學評論」上發表。這些文件雖然替我解決了許多問題，同樣的，也引起了許多新問題，而且我對這方面資料的需要越來越殷切。有人告訴我說，在莫斯科蘇俄政府成立了中央檔案室，把檔案公開給世界學者。我找蘇俄大使館接洽，要求赴蘇，到中央檔案室去研究。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Bogomalov）很興奮的答覆我他絕對盡量替我設法，爭取使用資料的許可。他要我詳細指明我所需要的資料。我提出一張明細表，其中包括

：⑴關於一八五〇年繆拉維耶夫（Muraviev）在阿穆爾河（黑龍江）一帶的活動資料；⑵關於義納鐵耶夫（Ignatiev）一八六〇年在北京的資料；⑶一八七〇至一八八五年有關中亞的各項資料；⑷有關一八八五至一八九四年朝鮮的資料；⑸一九〇〇至一九〇一年間有關我國東北的資料。關於我準備赴蘇旅行的事，除了鮑格莫洛夫大使外，我還拜晤了好幾位他的部下，他們也都對我很有禮貌。暑期來臨，我不僅拿到護照，而且也獲得對方的許可，我可以接觸所有我所需要的資料。

除了蘇聯的文件外，使我特別感到興趣的是英國檔案處（British Public Record Office）的資料。雖然英國政府對外交函件及使領館的報告的公佈一向是相當自由的，我認爲還是有很多的遺漏。最重要的一項遺漏是一八八五至一八九四年英國在朝鮮的外交工作情形。從我所蒐集的李鴻章的資料中，我獲悉英國在那段期間內曾經支持過李在朝鮮的前進政策。除非我從英國方面得到反證，我認爲在朝鮮紛爭中大英帝國是和中國携手的。英國政策的目標是阻止蘇俄滲入朝鮮。當一八九四年九月中日之戰爆發時，英國宣告中立，沒有參加對日作戰。英國這種搖擺不定的政策，我認爲似乎充份說明了李鴻章在他逝世前六年所表現的對沙皇政府盲目而堅定的信任。我想我可以利用英國檔案處的資料，花費部分假期時間，澈底研究一下中日之戰前十年英國在遠東的政策。

一般的說，研究中國近百年的外交關係，在一八八四年以前祇需仔細研究中國文書資料就够了。但在一八八四年以後，則需中外資料並重。早期的作者寫到一八八五以前的時代，都是按照西方的方法和西方的資料而不涉獵中國的資料。這就是一八八五年以前的時代需要重新研究重新撰寫的原因。一八八五年以後的情況稍有不同。在更近的期間中，西方和中國有些新文件出現，有助於歷史的編寫。

一九三四年六月中旬，學校放假，我急於前往歐洲。但是，我想起了蔣委員長年初在南昌時對我說的話，在我離國前應該先去看他。我不知道他在說話時認眞的程度如何，我不想製造一種印象，爭取好

感，或是爲了將來的政治前途與他建立一些關係。我先訂了横越西伯利亞的火車票，預計七月中旬動身。大約離平的前五天，我接到蔣委員長的電報，要我再到牯嶺去見他。我把車票往後延了一個星期。

當我在牯嶺見到蔣委員長時，他想知道我的計畫，他要我盡可能把時間用在蘇聯。他希望我能測探中蘇兩國合作的可能性。此外，他要我研究蘇聯的情況。他所用的字眼很籠統，實在說起來，似乎有些不明確。我想他不作明確指示是有理由的。他希望我從事初步了解。如果我進行得順利，他會採取適當的行動。在當時，如果請他作更明確的指示，我認爲是不適當的。但是，由於這件事是很機密的，我認爲他似乎應該選一位經驗比我更豐富，比我更能獲得他信任的人去擔任。我告訴他如此重要工作由我來擔任一定不會得到實際效果，因爲這不是學術研究工作。他立即了解我的困難，他告訴我他會和蘇聯大使鮑格莫洛夫聯絡，此擧可令蘇聯政府獲悉他對我的信任。

爲了在滿洲里車站搭西伯利亞特快車，我要經過日本控制的東北。透過一位朋友的介紹，我告訴日本大使館我要經過東北去蘇聯。我沒有請求任何優待。沿途日本機關也沒有找任何麻煩。

在火車上我遇到威爾・洛澤斯（Will Rogers）及他的太太和兩個孩子。我們迅即成爲朋友，談論了各方面問題。洛夫人對蘇聯人極感興趣。當他看到窮孩子們在車站時，他就對他先生說：「威爾，把這匣巧克力打開，給這些孩子們一些。」威爾依言而行。沿途我們看到很多强壯的蘇聯婦女工作。在較大的車站，火車要澈底洗刷，這些工作完全由婦女擔任。洛夫人不明白爲什麼蘇聯要他們的女同胞來擔任這種吃力的工作。威爾先生突然得到靈感。他隨時將他在西伯利亞途中捕捉到的靈感撰成新聞稿發往「紐約時報」。有一天，他的兒子給我看一頁他寫的稿子，上面寫着：「一個中國人了不起。兩個中國人平庸。三個中國人沒有用。問題是他們不知道如何合作。我在車上遇到一個中國人，他很了不起，我要向羅斯福總統推薦他作顧問。」

抵莫斯科的第二天，代理大使吳南如參事告訴我美國大使蒲立德（William C. Bullitt）急於要和我談談。因爲，鮑格莫洛夫已經告訴蒲立德我要在莫斯科停留一段時間。我曉得蒲立德是最先主張美蘇建立正常關係的人。早在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時期，他就深獲威爾遜總統及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的信任，派他到蘇聯。從那時起他即不斷要求美國承認蘇聯政府。基於他的背景和地位，我想他一定能告訴我很多有關蘇聯的事物。於是我欣然接受他的約請。

我們首次見面時，蒲立德省却一切客套，立即開門見山說明約我的目的。他對促成中蘇進一步友好關係，特別是交通電訊方面的極感興趣，他主張蘇聯的中亞細亞、中國的新疆，和四川間應該修一條鐵路。我對他的偉大構想感到很吃驚。我不知他何以有此想法，我不曉得從蘇聯修一條鐵路通到中國的大後方，其重要性何在。我的確從無此種想法，我認爲在當時（一九三四年秋）其他的人也不會有此想法。我對這一地區的地理環境不太了解，但我告訴他，我認爲他的構想的路線山巒太多，築路非常困難。他令他的隨員拿一份地圖來，查看一下實際情況。我們發現的確是山地太多。他感到很失望。接着，他又提議開闢另一個交通線，經過蒙古。他提議以庫倫爲中間站開闢一條空運航線。我告訴他中國與蒙古之間關係非常不融洽，一旦有戰爭，中國恐怕無法控制。由於蒲立德所提的兩項建議我認爲似乎均欠實際，因此我認爲他是個不着邊際的人。

我們會面時，我對蒲立德說我對中蘇進一步建立友好關係也非常感興趣，我急於要先了解情況，爲達此一目的，我需要獲得蘇方的認可。他很高興，立即要安排在他的大使館中邀宴蘇聯外長李維諾夫（Maxim Litvinov）或次長史托莫尼亞可夫（Stomoniakov）。他的話令我很出意料，簡直不知所措。我想以他對外交的經驗以及對蘇聯的知識，他一定知道什麼是最好的方式，另一方面，我曉得蘇聯願意和中國直接談判。中國最令蘇聯不滿的是做美國的保護國或衞星國。我應該坦白向他說明我的看法。因

此，我對他的作法很不以爲然。

中飯前我與蒲立德先生見面。我越想越擔心。吃完飯我即刻去看吳南如，請他去看蘇聯外交部長。在當時，即使是吳先生，我都不能告訴他我所擔任的工作性質。我請他安排我和李維諾夫或是史托莫尼亞可夫直接見面，要他不必過問我和蘇聯政府所談的內容。我急需他能搶在蒲立德之前爲我安排見面，因爲我確認如果直接和蘇聯當局談判，不使第三者介入，尤其是美國人介入，可能更順利。吳先生很好，完全依照我的意思辦理。

他安排與我會面的是次長史托莫尼亞可夫。我先問對方，蘇聯是否希望進一步和中國建立友好關係。史說他的政府早已表示此一願望，現在的問題是：中國需不需要與蘇聯進一步建立友好關係的問題。當時我解釋說，國民黨與蘇聯之間密切合作了一個短時期後，雙方關係破裂。我不想詳述這段歷史，更不想討論雙方的誰是誰非。我祇想知道一件事：蘇聯是否因爲過去的種種而不願意建立未來的進一步友好關係。史立即回答說：蘇聯方面認爲過去的已經過去。他對過去的一切不願表示意見，不過他向我保證，蘇聯的政策是絕對重視現在和未來的。我說，由於我們中國人認爲蘇聯絕不會放棄其既定計劃，所以我們也希望蘇聯政府能同意中國按照其自己的方式發展其政治經濟組織。史認爲我的話非常坦率。他提醒我說：蘇聯和法國、土耳其等資本主義國家在外交方面非常友善。「我們蘇聯」，他說：「從未夢想法國或土耳其會成爲共產國家，我們也希望法國和土耳其的朋友不要僅僅爲了我們希望和他們建立友好關係就希望我們放棄共產主義。凱末爾有時在土耳其殺共產黨人的頭。盡管我們對此不以爲然，但是你可以看出來，我們和土耳其仍然保持很好的關係。」他繼續表示：一旦蘇聯政府要與中國建立進一步關係的話，那個中國一定是蔣介石統治的中國。會晤結束時他說：「我們是現實主義者。我們希望中國强大、統一，而且必須是蔣介石所統治的中國。」

會面後，我認爲初步試探的階段已經過去。我向蔣委員長提出詳細報告，並且建議仔細計劃開創將來的局面。蔣委員長覆電甚表嘉許。同時我把蒲立德的建議會晤也取銷了。當他要安排我們見面時，我告訴他事已過去。對我說，我的政治任務已經完成。我認爲我已自由，可以去研究歷史和觀光了。

我對莫斯科的印象很好。當我看到蘇聯人民生活很困苦時，我就感到充滿了希望和進取的氣氛。我看歌劇，欣賞蘇聯的戲院。我住在薩伏依（Savoy）旅社，那裡的生活雖不豪華，但還算過得去。蘇聯人對我似乎很友善。但其他外國人對蘇聯的情況反應却是各式各樣的。有一天，我在旅館電梯中遇見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他曾在美、英、德等國家研究圖書管理。他發現蘇聯沒有一件事是對的。吃的東西、他室內的沙發、床、旅館的沐浴設施他都不滿意。至於圖書管理，他認爲蘇聯圖書管理制度簡直是笑話。他發現莫斯科的中央圖書館的工作人數比華盛頓國會圖書館的多一倍，但是工作却祇有國會圖書館的一半。我是從西部進蘇聯的，我發現蘇聯情況和我想像的差不多。關於蘇聯印象的好壞，我認爲要看一個人從那個方向進入蘇聯而定。

在莫斯科我住了三個月，我個人沒有受到任何限制，我可以參觀許多機構，隨便和很多蘇聯人談話。很明顯的，蘇聯最高當局正以偉大方法從事許多偉大工作。實際上，工作是參差不齊的。有一次，我去參觀一個訓練機構，訓練人民將來到工廠中去作工。負責人告訴我說蘇聯大多數的村民從未使用過機械，因此，在他們到工廠工作前需要給予初步訓練。此一想法予我極大興趣，因爲中國農民同樣的也不善用機械。訓練機構很大，工作也很繁雜。首先是訓練農民們使用鐵鎚。他們告訴我說普通蘇聯農民在用右手持鐵鎚鎚擊釘子時，都不敢用左手拿釘子，怕鎚到手。他們已經設計出一套辦法來克復這種心理恐懼。其中包括在釘子上加個把手。第一支釘子上加上十寸長的把手，第二支釘子上加上九寸把手，第三支釘子上加上八寸把手。一旦農民被訓練得能够正確的鎚在釘子頭上，就可以去掉釘子上的把手。我

看見釘子上配着尺寸不同的把手。由於這種方法很妙，使我禁不住大笑。任何一國的人，在習慣用手工作之後，而不敢用手去握一根釘子，實在令人難以想像。我雖然不敢說對蘇聯農民有特別了解，但我了解我國農民使用鐵鎚鎚釘子的事並不稀奇。而且也不會恐懼。我認爲這種訓練方法一定是一個幼稚的共產黨工人受了馬克思教條的宣傳的傑作。這是階級意識的笑話。我想中、蘇兩國都有很多這樣的理論家。

我和蘇聯歷史學家談過很多次。他們告訴我史達林對各校所用的歷史教科書不滿意。他抱怨書中沒有內容。年輕的一代，用這種書訓練，要他們明瞭每件事都是資本家壓迫工人。爲什麼拿破崙要進攻俄國？是法國資本家爲了要利用俄國的工人，才促使拿破崙進攻的。蒙古人爲什麼要進攻俄國？是因爲蒙古資本家要尋找原料、市場和勞工。羅馬人爲什麼要壓迫猶太人？是因爲羅馬資本家的工廠想要利用猶太的工人。歷史課程經過如此的教條式的編寫，使俄國年輕人對彼得大帝和凱塞琳大帝的成就毫無所知。他們不知道此一橫跨歐亞兩洲的大國是什麼時候、如何建立的。他們告訴我說史達林對空談已經感到不耐煩，但是歷史家仍然不敢寫出有內容的歷史。最後，他們設法要歷史學家按照他們自己的意思去寫教科書的內容，由共產黨委派理論專家去寫緒言和結論。當時我們中國也在修訂教科書。因爲我們書中宣傳的程度不像蘇聯，所以揭穿事實眞象也比較容易。蘇聯歷史學家所遭遇的困難使我很感興趣，我一直注意蘇聯新歷史課本的編寫。若干年後我看到一本。我發現這本書是按新方法寫的。其中有些章節很平常，和任何國家的歷史教科書一樣。緒言和結論是共黨的教條和闡明列寧、史達林對蘇聯人民偉大的貢獻。第一章敘述的是歷史哲學，最後一章摘要敘述布爾塞維克革命歷史。自然，史達林所扮演的角色和列寧一樣重要。托洛茨基甚至提都沒提一下。如果我是當時的俄國人，我可能會追隨史達林而不追隨托洛茨基。我認爲史達林比較實際。但是要全世界人相信托洛茨基對革命沒有貢獻，一切革命事業都是

列寧和史達林幹的，實在是一片謊言。

在莫斯科有些共產黨人向我表示他們希望中國蘇維埃化。他們說話時的神情好似中國已經充份具備了蘇維埃化的條件。我知道中國共產黨在江西某些地區已經搞過蘇維埃制度。爲了使這些蘇聯人知道中國的眞正情況，我坦白告訴他們：祇有用顯微鏡才能找到中國蘇維埃化的條件。他們認爲我若非無知就是替國民黨宣傳。

在莫斯科和列寧格勒我會晤了許多蘇聯的中國通。他們一致譴責那些阻止對日作戰的中國人，說他們是漢奸，讚揚主張作戰的人，認爲他們是愛國份子。我告訴他們我比他們更信仰馬克思，因爲我同意馬克思的說法：愛國主義和戰爭是資本主義的產物。

當時蘇聯學者正忙於虛構一套理論，證明祇有工人是愛他們祖國的，資本家、地主和商人都是漢奸。蘇聯學者自詡他們通曉中國歷史，他們認爲整個中國歷史都說明了地主如何破壞反抗外國入侵的戰爭。

例如有一天下午，蘇聯漢學家約我出席他們的圓桌會議，討論問題。出席者有一位名叫米夫(Mif)的紳士。我認爲他有波斯血統，但他却加入了蘇聯共黨。他以偉大的中國歷史學者自況。他曾寫過一本有關中國十七世紀革命的書，指出在那時的革命中，有一位中國將軍，他是地主成份，曾向滿洲人請求軍事援助。這就是滿洲人入主中原建立一個新王朝的原因。中國農民曾經反抗過滿人的入侵。根據這段故事，那位先生建立了他的理論基礎：中國農民是愛國的，所有的地主都是漢奸。這眞是滑稽到極點。

盡管蘇聯對戰爭和帝國主義時時能創造出各種理論，但我們知道直至一九三四年所有的蘇聯人仍以莫斯科和彼得大帝所建立的帝國爲榮。史達林統治下的蘇聯仍然和大彼得脫離不了關係。在列寧格勒觀光幾天後，我在遊客簿上寫了以下的話：「史達林是大彼得的繼承人。」導遊小姐讀了我寫的話時感到

非常吃驚。他懇求我把內容改一下。她說除非我改一下，否則她一定會有麻煩。我告訴她，上面有我的簽名，一切責任由我負。兩年後，我發現蘇聯對大彼得有一種新的禮讚。小說、戲劇和電影一致讚美歌頌大彼得。我必須要說明，在我寫那句話時我很少考慮到大彼得的武功，我比較重視的是他使俄國和俄國人進步的決心。

我有好幾次到教堂去，要親自看看蘇聯人對共黨反宗教運動的反應如何。莫斯科和列寧格勒較大的教堂已經被關閉或改作其他用途了；但偏僻地方的小教堂仍然有人去做禮拜。做禮拜的人女多於男，老多於少。但我也看到有少數人的年齡是在二三十歲之間的。更令我驚異的是這些上教堂的人的熱誠和信仰的程度。

當然，我急於要了解的是共黨革命後使蘇聯人民在生活方面與過去有什麼不同。我所得到的答案很不一致。有些人說革命後人民的生活不論城鄉已經大大改善了。另一批人告訴我，人民生活情況比過去還不如。我的問題本來是個難題。外國觀察家很容易失掉重點。例如：大部分美國遊客會說，因爲蘇聯人生活情況比美國相差很多，所以蘇聯革命一定是失敗的。這種比較可以說完全沒有把握住重點。我們不應該用兩個國家來作比較。我認爲我們應該比較一下革命前與革命後蘇聯工農階級生活的好壞。應該比較蘇聯兩個時代的發展，而不應該用蘇聯與其他國家相比較。我一直都是依照上述原則去找答案的，但是沒有結果。

我到外面遊覽了好多次，一方面是因爲我對蘇聯有興趣，一方面是要打發時間。雖然離平時我得到蘇聯大使館保證，可以接觸我所提出的表列歷史資料，但我發現當我抵莫斯科時，那裡簡直沒有人知道這回事。我祇有再查問，結果蘇聯外交部在一位股長的抽屜裡找到我的資料表。他告訴我：他即刻將我的表送到中央檔案處，以後我可以直接找中央檔案處接頭。中央檔案處的人最初回答我說，他們還沒有

收到明細表；後來，又說我所指定的資料分散在各處，集中需要時間；再後，又說資料找不到。我等了兩個月，對方才給我一些外交禮儀方面的資料，如中國高級官員的名片、賀年片、備忘錄一類的東西，毫無價值。

一九〇〇年蘇軍佔領瀋陽時，曾從瀋陽掠走一批滿文資料，我和袁同禮對這批資料非常有興趣，當加拉罕一九二〇年任駐華大使時，他曾致力中蘇進一步友好工作，當時他曾答應北平中國學者把該批資料還給中國。但是是項允諾一直沒有兌現。我們知道那批資料存在聖巴錫爾（St. Basil）教堂對面紅場歷史博物館中。我們很希望收回那批資料，但是得不到圓滿的答覆。

當我搭車赴法國時，一位美國朋友介紹我認識一位美國工業界大亨，他是到蘇聯觀光的，和我同車。車在蘇聯境內時，他一直說「多美妙的國家，多美妙的國家。」迨我們到了波蘭境內，那位美國人說：「該死的，我眞不該來，我們去喝杯咖啡吧。」

我在美國念書時，就獲悉許多有關德國的事。兩次世界大戰中間的時期，德國商人、學者、傳教士和外交人員在中國未受治外法權和租界的保護。因此對中德之間的友誼很有助益。住在中國的幾位德國朋友他們優良的性格和態度，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我急於親自去到德國看個究竟。

德國城市和鄉村既清潔又有秩序，這是我在任何地方都沒有見到過的。整個國家井井有條。車上和旅館服務人員禮貌週到，服務熱心。

當我抵柏林時，納粹官員們盛大歡迎我，對我非常客氣。何以對我如此，我不知道。是把我當作一個受歡迎的人物嗎？是因為我在中國有影響力嗎？抑或是他們知道我和蔣委員長有些私人關係呢？不管是什麼原因，他們的確使我停留在德國的三個月感到非常愉快。

一九三四年冬至一九三五年，我似乎在德國感到相當自由。我可以在任何報攤上買到倫敦、巴黎發

行的書刊，只有左傾的「工人日報」(Daily Worker) 和「人道報」(Humanite) 二者例外。我接觸了很多年輕的納粹工人，雖然他們對希特勒熱誠，但對我以開玩笑口吻的談話仍然很願意聽。他們也時常爲他們自己種種放聲大笑。在柏林有一個中德文化協會。其中有一位秘書是芝加哥大學哲學博士，不知是誰把他介紹給我的，當我在德期間由他擔任嚮導。雖然他表示忠於希特勒和納粹，但他也承認他們犯了很多錯誤，並且對將來也表示有隱憂。如果他是受命向我宣傳納粹思想的話，他的確是很稱職的。

我聽過一次有關中國的演講，演講人傅朗克 (Otto Franke) 是一位傑出的德國漢學家，若干年前，曾在漢口任兩湖總督張之洞的顧問。傅朗克當時任柏林大學名譽教授。他演講的第一個重點是介紹秦統一中國以前四百年間中國偉大的思想家。他認爲中國當時的文化足可媲美希臘柏里克里斯(Pericles)時代。第二個重點是向聽衆說明秦國統一及控制中國的措施，如焚書坑儒等等。最後他說中國在秦以後可以說成了文化沙漠。我的翻譯人員把這些重點小聲講給我聽，我感到他實在是臉皮厚到極點，强不知以爲知。柏林大學聽衆對他的演講却很欣賞。

我曾應約到出版協會演講。朋友們警告我，如果我要用英語，一定會使希特勒治下的德國人感到不快。但我不能用德語。如果用國語再譯成德語我認爲太浪費時間。我決心用英語冒一下險。演講時，我一開始就說，如果我用德語演講，你們聽了可能認爲我是說印度斯坦語；爲了避免誤解，我還是用英語。室中聽衆反應的很好，順利解決了這個問題。

我演講的內容着重於中國的政經問題。最後我想闡述一下中國未來在政經方面所遵循的途徑。簡言之，我認爲中國經濟應該採取混合制度，某些企業應該由政府經營，其它的開放民營。政治方面，我告訴德國人說，中國可以，而且一定會再成爲一個偉大國家，在國際上具有崇高的地位，但是並不想建立一個大帝國。在悠久的中國歷史過程中，中國曾經作過許多種嘗試，包括建立大帝國。但中國詩人對於

唐代的開疆闢土，豐功偉業並不歌頌，反而有許多慘痛的描述。我們中國人對建立大帝國的確有豐富的經驗，但却堅定認爲建立帝國或是佔領其他人的土地是人類的謬想。我的講詞譯成德文並且印刷出來。據朋友們告訴我，傳佈很廣。

戈林（Herman Goering）當時正推行他的四年經濟發展計畫，目標是戰時能自給自足。年輕的納粹份子在我觀光時一直陪着我，他時常問我對四年計畫的看法如何，我對是項計畫認識不够，無法判斷，但我告訴他們如果德國想要建立一條經濟長城，將是一種自殺行爲。同行的納粹份子有些點頭稱是。

希特勒曾發起一個鼓勵生育的運動。有一天我和八名納粹在一起討論，討論中曾談及控制生育問題。我告訴他們我認爲中國絕對應該控制生育，至於德國控制生育與否，自然是德國人的事。但是，如果德國政府盡力鼓勵生育，則其爲德國人民要求更大的生存空間就更沒有理由了。接着，我又問在座的每個人有幾個孩子。他們每個人有三個。我自己已有四個。很明顯，他們和我一樣都沒有澈底實行我的意見。

德國取悅於日本已經很久了。當我在柏林時，我在一家電影院看過一部名叫「今日日本」的電影片。那是一部由納粹協助拍成的日本宣傳片。談到德國與中日關係的問題，德國人的意見非常紛歧。主張親中國的人是從經濟方面着眼，主張親日的人是着重於政治。我對我的德國朋友們說：就德國說中日友誼是不能同時並存的。少數和我接近的人表示悲觀，其他的人乾脆避開這個問題不談。

當我在德時，前德國駐非總督及駐日大使蘇爾夫（Solf）博士在「柏林人日報」(Berliner Tagebalatt）上發表一篇文章，爲日本佔領我國東北作辯護。中國駐德公使向德國外交部提出抗議，旅居柏林的中國僑民也表示抗議。德國的中國朋友極感爲難。最後希望我寫一篇反駁的文章，編者答應在蘇

爾夫文章同一版面刊登。惟一的條件是要我不能攻擊蘇博士本人。此一事件卽在各言其是的情形下解決。

德國宣傳部長戈培爾博士約見我。我們談了二十分鐘。談話中他向我介紹希特勒治下德國將在德國及全世界推行的文化理想。他的話像機關槍一樣掃過來。戈培爾在德國人中可能是一位偉大宣傳家，但談到文化，我認爲他很幼稚。

我也見過魯森柏（Herr Alfred Rosenbery），他被譽爲納粹偉大的思想家。他談到他的著作「二十世紀的傳奇」（The Myth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這本書在柏林所有書店中永久陳列着。我曾看過，但是含意太深，文法太難，它給我的印象如此而已。

在我和德國一般納粹份子接觸時，我發現很多善良而通情達理的人。當我見到地位較高的納粹份子時，我又發現他們不近人情，非德國化。一九三四年冬至一九三五年，我所遇見的德國人都恐懼戰爭，渴望和平。希特勒最後如何將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轉變成一個戰爭狂的國家，我一直未能找出他所用的方法。我記得有一夜我在柏林大學一位教授家中。有一段時間他離開客廳去接電話；我祇好和他的太太談天。我偶然問她，是不是德國人認爲又要打世界大戰了。她說她無法回答，同時反問我其他國家人如何想法。我告訴她：各國人民都渴望和平，但國與國間却有嚴重的衝突。我認爲未來的一切是很難說的。我說這些話本是不經心的，目的不過是使談話不要中斷而已，但她却淚洒胸襟了。迨教授回來見她太太正在哭泣，令我很感尷尬。那位好心腸主婦說我對他說可能又要打世界大戰了。教授並未表示反對，僅僅安慰他的太太說不會打仗而已。

納粹黨本身當時正忙於辦多令救濟。他們正從事一項勸募寒衣運動。我到一處分發舊衣服中心去參觀。勸募到的舊衣服經過清洗、修補、熨燙，再按尺寸分類掛起來。主事者先替請領人量好尺寸，然後

拿一套給他試。申請人也可以用粉筆記下他所需要的衣服種類，然後領一張單子，等以後有了再去憑單領取。

我在納粹爲貧民辦的廉價餐廳中吃過一次飯。他們給我一道胡椒洋山芋燒肉（不是豬肉、牛肉，也不是羊肉），量非常多。餐廳負責人是一個女的，她走到我的桌前，告訴我說，她從報紙上獲悉有個獵隊回柏林，帶回很多獵到的野生動物，她請他們捐些野味給餐廳，他們答應了，於是她就燒給顧客吃。我認爲她實在是一位忠於職守的人。廳內整理得非常清潔而有秩序。

在菠茨坦（Potsdam）附近我看過一所供工人食宿的勞工營，其中工人都是從其他地方來的青年，在柏林挖掘水溝。其中一位青年對我說，他以前是銀行的書記，已經失業一段時間。自從到營中當工人，生活正常，吃的好，終日與其他青年爲伍，努力工作，使他的生活又有了新希望。我看到青年們工作。他們工具很優良，並有人擔任技術指導。他們告訴我，柏林市政府早就計劃開那條水溝，但因沒有經費，所以一延再延。我和勞工營的負責人坐下來談，問他水溝計劃的財務方面問題。很明顯，納粹爲了使勞工營保持舒適及效率實在所費不貲。

若干年後當我從政時，蔣委員長交給我一份呈文，上呈文的人也到過菠茨坦那座勞工營。呈文中說，中國也應該仿照德國成立類似的勞工組織，容納那些穿長衫、失業的善良青年。我請上呈文的人到我辦公室一談，我發現他雖深受菠茨坦勞工營工作的影響，但他並未想到經費問題。後來，有人計劃實行一項志願體力勞動計劃，對象是部分穿長衫的人。但，仍然沒有提出具體辦法。該計劃中沒有提到技術指導，沒有適當經費，沒有合用的工具。結果是挫了工作人員、政府和社會的銳氣。

一九三四年間，德國大力推行「寓健康於快樂」運動（Strength through joy）。這是由納粹領導份子策劃藉以保持士氣的一種運動。他們對此運動進行得極爲澈底有效，一如作戰和作工。政府和黨

分發了廉價的戲票要人們去看戲，組織許多遠足隊請人們去遠足，舉行運動會要大家來參加。此外，納粹黨又對工作特別優異的工人酬以假日旅行，要他們到避暑勝地或公海旅行。一天，幾個納粹工人帶我到一座啤酒廠，然後又去一座香烟廠。納粹官員在這批工人中要選出兩名去遊亞述爾群島。他告訴我當選所需的條件很多，如服務期間的長短、家庭人口的多少、工作成績的優劣等等。最重要的是外表長的要像北歐人，因爲，每個到國外去的工人一定要能代表德國的種族。在香烟廠，納粹黨負責人選了一名女孩子，然後要我去選另一個。他們說他們要看看我能否看出北歐人的特點。他們對我選的人似乎還滿意。當然，「寓健康於快樂」運動是爲了達到某種政治目的的一項聰明辦法。德國人，由於他們大多數心理天眞，所以也不掩飾他們的眞正動機。但，實際上這是很好的。在中國，父母、老師以及官方均認爲所有的遊樂都是無益的，因此都戴上一層嚴肅的假面具。而事實人們不是背地爲非作歹，就是爲窮緊張所苦。

當我在德國時，曾物色願意來中國任教的傑出學者。布爾塞維克革命後，部分俄國科學家流落到外國。許多國家，尤其是美國因此獲益不少。在德國，希特勒也使許多知識份子，尤其是猶太籍知識份子的生活感到不舒服。倭鏗（Hermann Ouckeu）是國際著名的歷史學家，在我遊德國時已被迫從柏林大學退休。雖然外國學者認爲他的著作太國家主義化，但希特勒政府却認爲太自由。在此情形下，我想我能爲清華延攬到一批德國優秀學者。結果我失望了，因爲我所要請的人，已經爲英、美、加、法等國捷足先登搶先聘定了。

後來，我還是約到一位傑出的年輕猶太人，他曾在倫敦和巴黎任職於「柏林人日報」，他的雙親在文化界極負盛名。這位年輕人後來到清華教德文。他的太太是亞利安族，因爲嫁給他被認爲搞混血統背叛種族。她欲想來中國非常困難。我有幸能幫她的忙。我和中國駐柏林公使商量，他答應幫忙。後來，

她終於如願以償拿到護照來到中國。

另外我又與德國大學簽訂一項交換學生協定。根據是項協定清華與德國大學每年可以交換兩名學生。我回國的第二年，兩名漂亮而年輕的德國學生出現在清華校園，他們在清華學工。我很驚訝，德國人居然到中國來學工。他們到清華不久，就去看我約來的那位猶太人，用非正式的口吻威脅他，要他辭職。我那位猶太朋友把經過告訴我。我立刻請工學院長告訴那兩名德國學生，納粹對種族歧視的教條在中國是不適用的。如果說有人要離開清華，絕不是猶太人，而是那些具有種族歧視的人。此一警告很有力量，以後一直未再發生問題。這兩個年輕人到清華的眞正目的並非是想學工，而是想要知道當時中國所需要的機器。他們是替德國機械製造商蒐集情報的。

關於這方面我願敍述一下清華的日本學生。他們在清華讀書也有一個特殊目的。其中有一個選我中國外交史課的。正巧該課前段所授的完全是中國與西方國家間的外交關係。他們天天聽廣東通商、鴉片戰爭、早期的各種條約、英法聯軍……等等，沒有聽到一點有關日本的東西，非常失望。兩個月後，這兩個年輕日本人就不再來上課了。他倆與那兩個德國學生一樣，是到清華來蒐集情報的。他們想要知道有關中日外交關係的授課內容。

我於一九三五年三月初赴英。最初的目標是研究及摘錄未公佈的有關中國資料，特別是一八八五年至一八九五年間的。資料主管當局所能予我的方便都給我了。不幸，英國外交部的資料僅僅公開到一八八五年。我希望把公開的期限展延到一八九五。好幾位英國歷史學家都幫我忙，但一切努力均歸失敗。因爲一八八五年以前有些未公開的資料也相當重要，所以我每天都在國家檔案室 (Public Record Office) 花掉好幾小時抄錄及拍照資料。我替清華圖書館共複製了大約三百份文書資料。後來，因爲怕戰爭爆發，我把這些英國資料連同我爲清華購買的其他歷史文獻一併送往漢口去保存。迨戰爭眞的爆發

時，學校當局又把這些資料運到距重慶約十五里的北碚。很不幸，正好被一顆日本炸彈炸中，化爲烏有了。

我會晤過的英國學者有韋伯斯特（C. K. Webster）教授、泰奈（R. H. Tawney）教授和鮑威爾（Eileen E. Power）教授，他們早年都到清華訪問過。泰奈教授是來從事一項社會經濟調查。當他在中國調查工作將完成時，我們請他到中國社會政治科學學會來演講。我曾讀過他許多關於歐洲經濟史的著作，他的思想很接近費邊主義。在他演講前，我私底下對自己說，大概他要替多病的中國開一張費邊主義的藥方了。但在他演講時，却根本未提到費邊主義，也未讚揚英國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泰奈教授對中國問題的看法不但新穎而且毫無偏見。我一直認爲他的著作「中國土地與勞工」（Land and Labour in China）對那時中國社會經濟問題而言是一本了不起的著述。書中除了許多其他的寶貴意見外，他建議中國政府首先應該建立一個行政有效的中心區。我從他的書中擷取這種觀念，盡量在「獨立評論」及與中國政界人士談話時予以闡揚。我同時想將全書譯成中文。迨我到英國時，我當然想再見到他了。

在韋伯斯特教授來中國參加太平洋學會之前，他過去在哈佛、倫敦大學的學生以及和他在會議中相識的中國人就對我熱烈推崇他的人格和學識。我發現這些事先義務宣傳者的宣傳，對他來說，可以說一點都不過火。在清華我爲他安排的宴會上，我們彼此之間就好像多年老友似的。他離開後，所有中國客人都說：「他不是英國人，他是道地的美國人。」英國朋友們一旦聽到這句話可能會感到不快。事實上他一點都不拘泥。他坦白扼要的表達他的意見，絕沒有英國人那種吞吞吐吐的矜持習慣。和許多到中國訪問的英國人在一起本是很麻煩的，他們往往令我們感到他們不是普通人。當我在倫敦時，韋伯斯特教授約我到倫敦大學和占丹公司（Chatham House）去演講。在占丹公司演講時，我對中國統一以及蔣

委員長的地位略抒己見。我講的不太好，但是當時擔任主席的韋伯斯特教授却將我四十分鐘的演講做了一個扼要的總結，費時僅五分鐘，使聽衆完全明白我的意思。我對他非常感激。

鮑威爾小姐在北平住過好幾個月。她的學識及爲人都深獲我心。從任何方面看她都是一位典型的新知識份子。我班上的女生都發誓要作個中國的鮑威爾。在倫敦時，我發現她的英國朋友也和中國人一樣，都喜歡她。

在短暫的留英時期中，有一項重大的收穫，那就是會見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教授。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他每年印發一份記錄、分析世界大事的資料（「國際事務調查」—譯者）。他的語文造詣和觀察力都很出衆，對我來說，他簡直就是阿克吞（Lcrd Acton）第二。他的學識的確淵博。但，一個人從事這樣廣泛的調查工作，自然在極細微的地方，也難免有疏漏的地方。詳讀湯恩比的著述，特別注意其中關於中國及遠東部分，我發現不僅事實正確，而且了解的也極深刻。我是在鮑威爾小姐的宴會中遇見他的。大家都談論他的不朽之作「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該書證明他對各期歷史均甚熟稔，正如「國際事務調查」能證明他對當代各國有充份的了解一樣。他的智慧實在是英國和二十世紀的一項光榮。

我首次訪英是在一九三五年春。起初我討厭倫敦。倫敦多霧多烟，令人感到不快。我也不喜歡倫敦人。他們單調而古板。我想用針戳戳他們，看看他們是不是有血。我對住過的幾家旅館也討厭。房子古老，取暖設備不足，窗子噼拍亂響。我認爲倫敦最好是遭一場天火，燒它個片瓦無存，重新來過。迨停留數週後，我漸漸對某些事物發生好感，我認爲我已經變成倫敦的一部分，倫敦也成了我的一部分。所有行動困難和旅館內的不方便感覺，都一掃而空。

我對英國的經驗和對福建鐵觀音茶的經驗完全一樣。有一次，朋友送給我一小盒鐵觀音，並且講了

許多鐵觀音的好處，說那盒鐵觀音是珍品。他又教給我怎樣泡、如何喝。我急於要嚐一下。當我把它泡給朋友們喝的時候，我想一定會博得讚賞，但是初嚐起來，不僅感到稀鬆平常而且還略帶苦味。於是祇好不去理它，轉換話題和朋友們去談別的。但當我談話時，我的朋友們有的說：「嗯，這種茶並不壞。」有的說：「嘿，這種茶味道很醇。」不久，大家都要求再泡一杯。我發現中國人到英國後的印象也與喝鐵觀音一樣，開始時，很失望，漸漸的，有點喜歡，最後就熱愛它了。

我到過倫敦郊外許多地方。其中之一是牛津，那兒的古代遺風和我家鄉的一樣，但也無碍於現代的生活。我們中國人無法避免新舊兩個極端。有時候人們認爲我們先人思想已經完全成熟，因此，我們現在這一代用不到多批評。有時人們認爲現在什麼都不對勁，這完全是過去人們思想行動錯誤所造成的。過去是一條束縛的鐵鍊，我們必須把它掙脫。但英國人與我們不同，他們知道如何嘲笑偉大的過去，同時也知道如何珍視過去。

我也遊覽過梅洛斯大教堂(Melrose Abbey)。這所要傾倒的大教堂外貌較直立完好的教堂還美。有一件事最令我感到困惑，我不明白何以英美人不注意教堂內外氣氛的不調和。很明顯的，他們完全漠視了這種不調和。他們禮拜日去到教堂作禮拜，平時做事。兩者在他們精神中沒有任何牴觸。人類的精神本來是超時間的。就精神方面說原子時代的人和石器時代的人實質上是一樣的。因此，即使是古老的西伯利亞黃教也能給現代的保皇黨、董事長或是好萊塢明星做某些宗教儀式。

我在蘇格蘭附近一家旅社住了一夜，我發現那裡的客人大部分均爲上了年紀的女人。晚餐後，我的同伴王博士到休息室去看報。有好幾位婦女在那兒吃咖啡，悄悄談話。天正下雨，否則我們一定出去了。過了一會兒，我開始與她們攀談，其中有一位提出一個問題：「中國老祖母整天做什麼？」我說我的祖母已經超過八十高齡，她仍繼續管教他的兒子、媳婦、孫子、孫女，我又進一步描述我的古老家庭中

的和協。「好啊，」其中一位老婦人說，「這樣的確好極了。我們的孩子都不要和我們住在一起，即使我們免費供應他們膳宿他們都不幹。我們對於孫輩最多不過有時抱一抱而已。你瞧，這座旅館就是我們老年人的家。」

九月間，我回到清華，替「獨立評論」寫了一些稿子。我指出現時世界中意識形態的衝突的可怕情形。共黨及納粹的極權主義思想對我似乎太積極，相反的，自由主義又太鬆懈。有一段時間，似乎全世界都傾向自由主義。十九世紀中，法國竭力反對君主政治的復活及敎會統治。哈普斯堡皇室（Hapsburgs）及德國霍亨索倫王室（Hohenzollerns）治下的國家，盡管不願意，也都採行了某種憲法，這種憲法在一八八〇年一定會受到咒詛。但到了二十世紀，頑固的獨裁政權，如沙皇的俄國，土耳其帝國，日本帝國和滿淸帝國都在新領導者領導之下盡量設法步大西洋沿岸人們的後塵。迨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人們突然認爲自由主義是一個卑鄙的陷穽。蘇聯豎立一個新的典型。不過，我向「獨立評論」讀者保證，盡管自由主義推行困難，有些地方不合時宜，但是最後勝利還是屬於它的。

我在文章中也喚起人們要注意蘇聯與納粹德國間的相似性。我認爲它們相似之處較它們不同的地方更值得我們注意。尤有進者，我相信：雖然史達林羡慕德國科技的進步，但希特勒也一定羡慕史達林控制方法的成功。主要的，我是告訴「獨立評論」讀者要他們知道希特勒是想要用共產黨的策略去反對共產主義。希特勒可能遭遇的困難是他自己不能够有節制。

第十五章　行政院政務處長時期（一九三五—一九三六）

一九三五年秋，清華開學不久，二伯電告我說祖母去世了，希望我能回家奔喪。正巧這時蔣委員長也約我去南京。我匆匆趕到南京，向他口頭報告在歐情形，然後返家奔喪。從南京到漢口我搭一架單引擎三座水陸兩用飛機——中國最早的民航機。從漢口搭火車至長沙，從長沙僱了一輛汽車，因此我可以在三小時之內趕到老家，車費三十六元。搭便車的還有我九堂弟和他的太太，另外還有一大批行李。一九二三年時這段路要走五天，還不能有人搭便車。

一反家父去世時的情形，我決定給祖母唸經。葬禮一切細節均由二伯作主。雖然他是無神論者，但他也不想違反傳統。喪事辦的很風光，大約用掉三百元。爲此，賣了三十畝家田。

所有與我們有關的人都參加了喪禮。一連三天，我家都供他們膳食。從早至晚，靈堂都擠滿了人。每桌八人，每四十分鐘開一次席，輪番招待。在那段日子裏，我們依照佛敎儀式在祖先堂念經。親友祭奠的祭禮有八十份，完全依照俗禮規定，每份都附一篇祭文。整個喪禮可以說極盡人間的豪華和精神上的安慰。我感到每位戚友都認爲我們蔣家作得對。在鄉間，祇有在婚喪和建造房子三方面誇富。荒亂年間，爲了避免盜匪的覬覦，人們可以不蓋房子。但是婚喪大事不論在那種情況下都是不能馬虎的。

喪事過後，祖母的靈柩抬到墓地，送行的行列長達一里路。不僅有幡、旗和鼓樂，而且還有軍樂和儀隊。當時有好多親戚都參加了軍隊，有一位甚至做了少將旅長。棺木下葬。陰宅是劉先生和二伯費了

十年工夫所選的佳城。據劉先生說，此一佳城足可使蔣家享受四十年餘蔭。

葬禮過後，我和哥哥去看劉先生。他很客氣，招待我們吃中飯，席間他不停的談到祖母的墓地。他的話摻雜一些易經和妖言。我對他說的簡直無法了解，祇好閉口不談。最後我對他說：「劉伯伯，閒話少說，請您告訴我們那塊地究竟有什麼好處。」他說：「歐！好得不得了。在未來的二十年中，你們蔣家還要繼續發達。」我問他二十年後的情形如何。他說：「二十年後可以一直保持原來的樣子。」於是我又追問他：「四十年後又如何呢？」他回答說：「超過了四十年我就不敢說了。」這是他的禮貌，因為他不願談及四十年後我們可能敗家的事。

盡了作孫子的責任後我又回到清華。此時時局緊張，戰雲瀰漫，誰也不敢說戰爭什麼時候會爆發。清華隨時都有被夷為平地的可能。日本在平津地區已經有妥善佈置，因而對其侵略準備行為也不掩飾。雖然我們照常上課，但也知道來日無多了。每系都將值錢的書籍和儀器打包南運。我們討論清華戰時在什麼地方好。有些人認為西安很適當。我提議遷往湖南，因為我認為日本的侵略絕不會遠及湖南。尤有進者，湖南盛產稻穀，即使日本想要封鎖中國，清華教職員和學生也不致挨餓。學校當局採納了我的建議，在長沙設立了一所戰時清華。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翁文灝從南京電告我，說蔣委員長要立刻見我。當我抵南京時，翁肯定的告訴我我將即將出任行政院院長，要我擔任他的政務處長。我根本不知道有政務處這一組織，翁給我一份組織法參考。就組織法規定而言，政務處什麼都管，也什麼都不管。

行政院是中國最高的行政單位。由於蔣委員長兼任院長，所以需要秘書人員輔佐他。秘書人員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以秘書長為首，下有秘書十名。另一部分以政務處長為首，下有參事十名。就理論說，秘書長是協助院長執行政務的，而政務處長是替院長擬訂政策的。易言之，一個要注意法令與慣例，

一個要注意行政的效果。雖然理論如此，但事實上兩部分人員都是在一起辦公的。在作決定時，雙方不僅都要顧到程序和法令，而且要彼此注意，以免產生不利於對方的政治效果。

第二，所有中央各部會、省及特別市的重大事務都要經行政院通過，各部長、省主席及特別市市長的公文都要呈行政院院長。秘書人員要幫助院長處理這些事務，代他分勞。公文往往由秘書長或處長念給院長聽。特殊重大事件，要爲院長先作摘要。秘書長和政務處長都是次長階級，均能出席院會。

當翁帶我到委員長南京郊外湯山官邸去見他時，我仍未決定我應該如何答覆他。事實上，他也並未讓我答覆。他祇給我一個命令。我們落座後，委員長說：「好，我想翁博士已經把我的計畫告訴你了。你的意思如何？」「我沒有經驗，」我回答，「我不知道如何做法。」「你能，」他說：「從工作中吸取經驗。不工作永遠得不到經驗。」他一面對我說，一面拿起筆來寫了一道手諭：「派蔣廷黻爲行政院政務處長」。我告訴他我須返清華，結束那方面事務。「啊，不，」他說，「這次我上任，一定要帶所有人員一同上任，清華那方面由我替你電告校長好了。」

於是，我被內定爲政務處長。翁文灝被內定爲秘書長，他比我年長，不論在經驗方面或是聲望方面，都是我的老大哥。雖然我們在公事上是平行的，但很顯然的，他是院中秘書人員中的首領。我一開始就決定把政務處作爲翁的附屬單位，盡量採納他的意見。

我和翁的任命消息一旦傳開，一般的反應都認爲是學者從政。

行政院於一九三五年多改組，人們賦予新行政院許多稱號。有人稱之爲「行動內閣」，因爲它包括許多經驗豐富而幹練的人才，如精於理財的吳鼎昌，擔任實業部長；中國銀行傑出的總經理張嘉璈擔任鐵道部長等等。也有人稱它是「政學系內閣」的，因爲吳、張二人被認爲是政學系的。政學系的首領據說是張羣，當時任外交部長。也有人稱它是「人才內閣」的。因爲，不論人們怎麼評論他們的政治淵源

，而張羣、吳鼎昌、張嘉璈等人畢竟都是能員，這是誰都不能否認的。除了這些人外，還有王世杰擔任教育部長。

宣誓就職日期預計是星期一，星期日我們和委員長共進晚餐共商宣佈政策事宜。那時，人們最注意的是對日和戰問題。經討論後獲得結論：我們必須要光榮的和平。大家認爲不可輕言戰爭，應該繼續爲和平努力。委員長與其他一些出席人都明白表示和平要有一定限度。一旦有需要，行政院必須領導全國軍民作重大犧牲。我提議應該從事一項復興發展計畫，以爲備戰或鼓舞士氣之用。我認爲一旦全國人民看到行政院從事大規模修建鐵路，發展工業，改良農業，他們就會信任政府。負責財政的人員認爲我的建議可能增加開支，最後演成通貨膨脹。尤有進者，還可能引起用錢的慾望和胃口，以致無法滿足。

反對復興發展計畫最兇的，竟是鐵道部長張嘉璈，實在令我感到驚異。財政部長孔祥熙對他立即表示感謝。孔說他已盡力注意預算，如果再追加預算，財政部實在不勝負擔。實業部長吳鼎昌也表示同樣看法。我眞不解，「行動內閣」的人何以如此怕行動？這些人身處政治狂流中，居然想用普通的手法去避免戰爭，令人殊不可解。我認爲：他們不曉得主戰的情緒已經達到頂點，如果不用非常方法，戰爭是無法避免的。我知道這些說話的人都是主和反戰的。他們的行動使我明瞭，他們除了避免戰爭之外當時實在不準備作任何事。

星期一，蔣院長率政院同寅宣誓就職。首次院會於星期二舉行。我清楚記得，會議開始前，大家都急待委員長的訓話。他說：「我們替政府物色一個人應該像替女兒選女婿一樣。」那次訓話，表情和內容都令全體感到很大的驚異。委員長詳加解說。他譴責過去的情形，他認爲每次行政院改組，各部人事都要變動，這是不對的。「我要看幾個月，」他說：「看看誰稱職誰不稱職。過幾個月，你們可以根據這個原則有效調整，但在開始時，我們必須盡力和現在各部中的人共同努力。」此一指示以後成爲人事行

政上的一個準則。

帝制時期的中國，用人幾乎都是沿用考試原則，所有政府人員都要透過各級考試。一九一一年，民國締造，此種傳統辦法不再沿用。理由很簡單，因爲科學廢除了。基於此種基本變化，各部工作人員已經不再是考試的優勝者，而是被委派的。每次行政院改組就意味着各部人事澈底更換。自委員長那次宣佈後，各部長認爲在接任伊始就更動人事是不適宜的。

考試院成立後，人事制度開始變更。考試院是國父對中國的一大貢獻。雖然當時人們不了解，但它的確使中國政府從基本上改觀。依照新制度，公務員可以分成若干類。人們可以參加考試。考試有高普之別。高考及格者可以擔任高級公務員，普考及格者，可以擔任中下級公務員。依照公務員任用法，公務員依法受到保障，主管的好惡不能決定他們的去留。隨着時間的演進，各部人員中經過考試的越來越多。部長能够控制的位置越來越少。大家漸漸承認部中工作人員（至少是某種人員），需要有相當的學經歷。有效的政府要靠有經驗有學養的人員，不能靠人員對主管的順從。漸漸的，人們認爲各部人員是爲國家服務的，並非是替部長私人服務的。最後，各部人事公開，不再對某個特定人効忠。這種變化是積漸的，但却極有效力。研究中國政府的人一定承認此一變化的重要性。

首次院會後，經過人事問題的討論，委員長已經了解院會的性質。他希望出席的人越少越好。他希望討論的內容僅限於眞正重要的問題。他告訴他的屬下：他希望他們能澈底自由討論，因爲他認爲行政院不是客氣的地方，不是空談的地方。

我到行政院後席未暇暖，學生就來請願，要求對日作戰。因爲學生赴京請願，交通又一度受阻。僅僅請求作戰，我們並不害怕。我們擔心的是恐怕有居心叵測份子秘密用語言或行動在學生與憲兵隊之間製造事端。一旦引起衝突造成流血事件，野心份子就會藉機發動輿論反對政府。因此，行政院嚴令鐵路

當局不得載運學生至南京。同時，我們再派幹員去說服已經首途的學生。政務處十名參事中有一位是端木愷，他原是一位律師，極有口才，也曾搞過學運。他僕僕於京滬路上，到處向學生們大聲疾呼。有一次，委員長選了一天要接見全國各大學學生代表，說明他的政策並表示願意採納學生們的建議。翁和我都認爲：假如我們不能解決學潮，其他的事就更不要提了。我們採取的措施終於控制了學運。

學生們返回學校後，鐵路恢復暢通。有時教授及學生代表到南京。委員長集體接見他們；其他政院同寅再分批會見他們。我們暗地安排，要學生親自去參觀，看看我們備戰的情形。此舉，使他們一方面認爲政府給他們面子，一方面滿足他們的愛國心，於是他們都如願而償的離開首都。

公務上的困擾之外，我又來了私務上的災難。當我在政府作「大官」的消息傳到湖南老家後，許多親戚都要求差事。求差函電雪片飛來。我請住在長沙的哥哥阻止他們南來。我請他告訴他們：任何人我都不能幫忙，如果他們眞來南京，我絕不招待他們。如果他們已經到長沙，願意回家，沒有路費的話，可以供給他們從長沙回家的路費。我認爲他們要我給他們弄一份差事的念頭是錯誤的；這完全是傳統的觀念。就親戚關係說，我不幫他們忙，是欠了他們人情。但就公務員說，我不能把公職作爲禮物，酬應私人。我認爲把來南京的路費送給一些有需要的親戚這是我盡了私人義務，且對公家毫無損失。我的決定使他們大失所望，但大多數都接受了錢，返回故鄉。

儘管我的哥哥在長沙勸阻，但我弟弟的小舅子還是到南京來了。他高中畢業，自忖可以弄個一官半職。爲了信守我的諾言，我拒絕見他，背地裏找個人借給他回家的路費。但是我對另一位族人却未能如此峻拒。這位族人就是在鄉間和在湘潭教過我國文的蔣老先生。他希望我幫他弄個縣缺。此一請求實在難以拒絕，但我告訴他國家名器不當作爲私人禮物。他可以向我要求我私人所能辦到的其他的事，但是不能要求官職。我像父親對兒子一樣解釋給他聽。我告訴他，如果在錢的方面有困難，我一定盡力幫忙

。他已屆退休之年。我可以要我家送給他所需的食米，但我不能替他弄一個官。他認爲我是個忘恩負義的人。但是經過多次直接和間接的解釋，他也祇好回湖南了。

從我擔任公職開始，就沒有引用過私人。親戚們均深悉此情，沒有任何親戚憑藉我的力量獲得官職。

撇開品德方面不談，從另一個角度看，我認爲我的作法也是相當聰明的。如果我在開始時粗心大意，恐怕找我求職的人要大排長龍了。他們的食宿也會成爲我永遠擺脫不了的問題。如果我都替他們安置一份差事，他們一定會給我帶來許多麻煩，以致影響我的工作。我的目的是從政，而且要在不受私人影響下從政。

因爲我沒有私心和家庭關係牽累，所以我做事可以沒有顧慮。援引私人結黨營私是不智、不實際的。我惟一要出賣的是我的智慧和努力工作的願望。根據這種意念，我認爲循一般方法處理事務會令我一無所成。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做，雖然也可能失敗，但是將來不會使我感到遺憾。於是我決定按照我自己的意思去做，摒除一切應酬。當大家發現我的生活就是如此，並非不懂禮貌，或對某人有好惡時，他們祇有接受既成事實，把我當作一個怪人。

在第二次院會中，委員長命翁文灝檢查各省市縣行政工作，予以督促。令我檢查中央政府行政工作。這是一項繁重的工作。因爲我從政經驗不足，我認爲當務之急是首先要對應作的工作分出輕重緩急。我從政的前三個月，主要是研究中央政府，擬訂一套改革計劃。此一工作因爲限於篇幅不能詳述，祇能在此略提一提。

首先我提議改善交通電信組織。當時我們有鐵道部和交通部，兩部都管公路。此外，我們有經濟委員會，負責築路事宜。我發現有許多新路應該修築，有些鐵路是平行的，有些鐵路是與公路平行的。太

沒有計劃。因爲鐵路、船和公路都缺乏經費，所以調整所有運輸體系，我感到是絕對必要的。

例如，當時大家對空運都不太關心，沒有興趣，而發展空運却爲當務之急。我把這些當作改善的對象，建議把鐵道部改爲運輸部，主管鐵路、空運、公路，而交通部主管郵政、電報、電話等業務。如此，可免架床叠屋之弊。

有一天，鐵道部長張嘉璈告訴我，他想籌款買一批快船，航行於上海漢口之間。他所構想的航線，與平漢和粵漢兩路有關。我問他爲什麼不接辦已有的招商局？他回答說，此舉會與交通部牴觸，因爲招商局屬交通部。同時，如果將招商局改隸鐵道部，他一定要接收一批濫船和一大批冗員。他不想找麻煩，想從頭做起。

爲了改革中央政府行政，我曾建議取消經濟委員會和建設委員會。上述兩委員會不僅彼此間職掌重複，而且與其它機構也有重複之處。

中國以農立國，但却沒有農業部。中央政府有關農民的工作劃歸實業部。我認爲政府對農民應該予以更好的照顧，對此問題我研究了好幾個禮拜。其中牽涉的問題很廣，必須要同時解決。舉其要者如農作物及畜類改良、灌溉及水土保持、造林、改良農具、肥料、防止病蟲害……等均應着手進行。這需要一大筆經費，但據我判斷，這是一筆很好的投資。即使從狹義的財政觀點看，這都是有利可圖的，因爲投資到農民身上，一定會增加土地稅。我認爲用現代科學和技術幫助農民，可以增加生產，並可改善他們的生活。因此，我建議應該成立農林部。

我想建議集中管理辦公用品。我請行政效率委員會研究有關辦公用品問題，委員會提出好幾份報告，暴露許多可笑的事實。例如：許多政府單位購買維納斯牌鉛筆，有的每支七毛五，有的居然高到兩元一枝。茶葉的數量、品質和價錢也出入很大。我想要建議集中管理所有政府機構的公用物品，但我沒有

這樣做，因為我想在其他建議方面爭取支持的關係。

依照國父遺教，中央政府的行政院是執行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所擬定的政策的。行政院週二院會中較重要的決定，都要送到中政會週三的會議中通過。有一次，星期二晚上我接到委員長電話，大意是要我出席次日晨間的中政會，說明內蒙半自治問題。這次出席使我有機會了解政院與中政會之間的關係。內蒙半自治案已經列入中政會議程。我向蔣院長報告說我不是中政會人員，他告訴我這沒有關係。

晨九時前我抵會場，一位穿制服的人員在入口處擋住我。我表明身份說明來意。他說他並不是不准我進去，是因為我違反了新生活運動。他提醒我那天是新生活運動週年紀念。我問他我違反了什麼規定。他輕輕的從我襯衣領子上取下一件東西。我發現那是一條洗衣店的號碼籤，因為我趕着來開會所以沒有注意到。我不禁自言自語說：「嗯，這的確是個神聖的地方，我一定要特別注意。」

出席會議的大約有二十五人至三十人。委員長任主席。討論事項很多，三分之二時間用於討論行政院院會所提議案，委員長桌上堆着一疊文件，他逐頁宣讀，與會人員逐案討論。當討論到綏遠、察哈爾等省問題時，費時很久。有些人言及康熙、乾隆處理內蒙的成功事績，也有些人談到日本在內蒙地區煽動叛變情形，另一批人依據國父遺教講述有關少數民族的權利。討論過程很雜亂。因為意見多，所以沒有具體的方案。我聽了一陣，簡直搞不清楚與會人員對行政院通過的政策究竟是同意還是不同意。迄十二時，委員長宣佈：「本案交行政院斟辦較合適。」

儘管我對此一國家最高決策機構衷心尊重，但對這種徒具形式的議事程序也不禁好笑。第一，中政會的執掌大部分與行政院重複。第二，中政會人員討論此類問題，其了解程度遠不如行政院人員。他們的經驗一般的說都很差。第三，行政院起草提案的人員大部分都不能出席中政會，因此對提案沒有說明、辯護的機會。很明顯的，我認為行政院與中政會的關係應予調整。

我所要提的建議簡單易行。中政會與行政院秘書間要保持密切聯繫，中政會討論提案時，有關部會首長親自出席。好些朋友勸我不要多事，少惹麻煩。

委員長要我盡速提出改革中央政府的意見。首先我口頭向他報告我的擬議。他很高興，要我正式提出建議。當我草擬建議時，南京有很多議論。也有些人要我把建議中的某某部分刪除。吳鼎昌不希望把農業工作從他的實業部中劃出去。張嘉璈請我不要讓他背上招商局的包袱。經濟委員會秘書長秦汾告訴我：經濟委員會做了很多事，不該裁撤。建設委員會的人告訴我：該會是張靜江先生的靈魂。張與國父有莫逆之交，也是委員長的好友，所以建設委員會不能裁撤。最後，連翁文灝都勸我不可操之過急。顯然的，有些政治壓力加到他的身上，因為大家都認為他對我有影響力。我對所有的反對者說，我要把建議呈給行政院長，時機成熟，他會徵詢大家意見的，屆時大家可以提出反對意見。因為反對者越來越多，我想最好是盡速提出報告，以免夜長夢多。一九三六年二月底建議稿完成後呈上去。我滿懷熱望期待它的結果。但結果令我大吃一驚。三月底，委員長命我和翁對調工作。翁負責改革中央政府，我負責地方行政改革。我認為院長對我欠公道，不採納我的建議，甚至連告訴我一聲都沒有。但是一年以後當我在莫斯科時，聽說鐵道和交通兩部真的合併了，經濟委員會和建設委員會也真的一併裁撤了。

這些變動產生了一些怪現象。我實在不知道其中的底蘊。這些變動與我當初的構想完全不同。例如，新成立的農林部實際上祇是紙上談兵。前後幾任部長都是軍人，為了酬庸他們的功勞給他們一份閒差事。他們毫無農業經驗。我真後悔當初提出改革建議。我認為當初反對我的人實在比我有遠見。

但我與翁對調工作的事却是不折不扣的。人們認為翁文灝負責中央政府改革工作，至少他們可以放心了。如果換了我，說不定又會提出某些新的改革方案。

當時我頗失望，由於失望，我對新工作（改革地方行政工作），不甚積極。我想：如果我不小心，

可能又是一次「庸人自擾」。從另一方面說，我認爲這樣也好，使我對當時省、市……的行政工作能有個認識。我認爲我應該把工作分成若干方面，交給適當的人仔細去研究。五六月間，我開始物色對地方行政有經驗者或曾發表過有關地方行政著作者。我要在六個月之內擬出一套標準改革研究項目，以備專題報告之用。夏季來臨，二十多名學者和有地方行政經驗人員到各省市去進行他們的研究調查工作。

當時的地方行政組織有三層：最上一層是省和特別行政區。省的數目隨時而異。滿清時代，有十八省。當時滿洲是特別行政區，最高行政官是一位滿洲將軍。另一個特別行政區是蒙古，最高行政官是蒙古王爺，清廷間或派人輔佐。第三個特別行政區是西藏。雖然中央政府不派人參加地方行政工作，但依照法律和傳統，該區的某些工作仍須清廷最後批准。我們可以稱西藏是半自治區，因爲西藏較滿洲和蒙古更具獨立性。其它散處中國四週的獨立地區也和中國有特殊關係。我們稱之爲屬國，如果把屬國當作中國的殖民地那就大錯特錯了。了不起我們祇能稱這些國是衛星國。屬國更換國王時，新王一定要得到中國皇帝的同意，否則，就是不合法。歷代各屬國均派團進京進貢。皇帝爲了獎勵他們，每次都賞賜大批禮物。就禮物與貢品的價値說，皇帝是蝕本的。如果說某一屬國發生動亂，也可以請求中國皇帝派兵敉平內亂，恢復秩序。此種請求從未受到中國皇帝拒絕。此外，中國政府在這些屬國不駐兵，也不派官員。祇要是屬國太平無事，事實上等於完全自治。

這種情況在過去從未詳細研究過。這與其他的君主制度國家（如英國），是不相同的。中國對屬國很少用軍事、政治、經濟去控制。但在另一方面，如果說此種宗主與從屬關係完全無所謂也是不對的。中國從未把任何一個屬國合併，納入中國版圖。近三百年來，中國也未再致力擴張其領土，僅致力於睦鄰。祇有在爲了保持和平秩序有必要時才去控制域外的地區。總之，中國不欲任何外力經過衛星國家而接觸到中國。在保衛邊疆方面，的確是爲了他自身的安全，很少考慮到疆域的大小問題。

在我受命籌劃地方行政改革之際，屬國的制度早已不存了，滿洲的地位也變了，省份增加了，但是一般的行政區劃，仍然沿用清代遺規。每省劃成五至六個行政區。每個行政區再劃成九或十個縣。行政區是地方政府中間的一層，縣是更下一層的地方行政組織。

在考慮調整地方政府時，第一個問題是我們應否繼續行政區的制度。行政區是滿清時代創設的，當時認爲省太大，省主席（當時稱巡撫）無法監督幾十個縣，所以省與縣之間設置一個行政區衙門。可是行政區衙門是非常不健全的，它的職掌很含混，也沒有相當的執行機構。但是如果我們取銷行政區這一級地方政府，則省級政府的負擔勢必加重。因此，如果取銷行政區，則需要將省區縮小，增加省主席人數。此擧還有另一個好處，當時情形是有些省份太大，在財政與軍事方面足可據地自雄，對抗中央。如果省區劃小，中央政府可予省政府更大的自治權，不必擔心他們不服從中央。

其次是關於縣的問題。每省均有省委員會，由委員若干人組成，如：民、財、敎、建等。這些省府委員相當於中央各部部長。現在，我們認爲縣也應該有類似的人員處理有關業務。過去的縣府組織太簡單，以致不能應合時代需要。我不想說得太詳細。事實上，直至我從莫斯科回來第二次重任政務處長時，我才開始改革工作。

當時，除以上工作外，委員長還要我與蘇聯大使館保持密切聯繫，密切注意中蘇兩國關係的發展。

一九三六年六月間，外交部長張群報告駐蘇大使顏惠慶堅決請辭。

那年，正式院會改在週二上午擧行，非正式會議（俗稱小型院會）於週五下午在委員長官邸擧行。小型院會中祇有孔祥熙、張群、吳鼎昌、張嘉璈、王世杰、何應欽、翁文灝和我出席。秘書及書記人員均不得列席。六月底某次會議中，外交部長張群提名吳鼎昌、顧維鈞及外交部次長徐謨等人出任駐蘇大使：孔祥熙又增提了王正廷。會中討論上述提名人選究竟何人適當。最後，委員長轉身對我說：「廷黻

，你願意去莫斯科嗎？」他不等我回答，繼續說：「你考慮一下，三天內答覆我。」出席者對委員長的提名均表贊成。最熱烈的是吳鼎昌。

不久，翁文灝來看我，他說委員長極盼我能接受任命，出任斯職。作爲我的朋友，翁警告我說：那是個費力不討好的工作。但他勸我接受。我告訴他如果能讓我多考慮一些時間，可能公私都能有益。

我在南京繼續工作。因爲溽暑炎熱，經決定政府下級人員留京辦事，部次長級可以輪流到牯嶺休假一個月。翁決定七月休假，我決定在八月。因爲委員長整個暑期均在牯嶺，所以院會也決定在該地舉行。此種措施，原是權宜之計。事實上，很不方便，特別是牯嶺與南京間長途電話不暢通時爲然。

一九三六年夏，行政院作了很多重大決定，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徵收所得稅。財政部所擬所得稅法，係吸取了西方國家過去的經驗，稅率是累進的。由於中國歷來一般人們都習於隱匿收入和財產，所以是項稅法很難推行。隱匿收入和財產的目的不僅是爲了逃稅，另一個目的是怕被敲詐、勒索、搶刼。

在過去，很少有人在地契上用眞名的，多半是用假名，刻一個圖章，以代簽名。結果，一個人可以有很多個圖章，有很多個名字。在中國，有些縣份地籍册子上的名字比全縣實有的人數還多。同樣的，一個人將款存在銀行裏，也可以不用眞名，刻一個化名圖章做印信。也可以用化名創立公司行號擔任股東。

如果利用很多名字就能隱瞞一個人的眞正收入，則所謂累進稅率者不過是徒具虛名而已。當所得稅法草案呈到行政院時，實業部長吳鼎昌立卽指出其中的缺點。爲了克復缺點，吳建議行政院應該向立法院提出法案，規定全國人民衹能用一個名字置產收入。衹有這一個名字才是合法的。吳建議：凡是不按上述規定的，法律不予保障。換句話說，假名下的財產政府可以沒收，別人也可以占有。會中很多人都認爲吳的意見太難實行。認爲應該增加其他附款，以策安全。爲了滿足那些反對者，又增加了一項附款

，規定人們可以用化名置產，但化名與眞名應同時在政府登記。依此規定，財產所有人可以財不露白，而直接稅局又可知道他的實際收入情形。

我認爲：吳的財產登記法案，實在是中國財政革新中的一大進步。因而我盡力促其實現。雖然我到處遊說，搞公共關係，但我發現輿論方面多不支持。各大報紙對此均不置評。

在結束此事之前，我要把話扯遠一點。是年秋季來臨，我離開行政院，前往莫斯科。待一九三八年春我再回行政院時，我第一件事就問起上述的財產姓名法案。令我非常沮喪，我發現該法案仍擱置在立法院。我想向有關立委提出鄭重備忘錄，責他們怠忽職守。處中參事建議我，認爲此舉不切實際，最好還是重新來過。爲了避免院與院間的不協調，我接受了他們的建議。後來，財產姓名法草案，終於完成立法程序。我認爲我打了一次大勝仗。事實上，該法依然未能破除我國的舊傳統。一個國家沒有健全的所得稅制度，在戰時等於自動解除武裝。我認爲中國當時就是如此的。

任何一個國家均不能將其政府全部職掌毫無遺漏的列入憲法，任何一個政黨都不能夠澈底實現它的競選諾言。實際上，政府永遠是受人和環境的影響，受政府人員勤惰的影響。總之，政府的重點是政策、人、組織，以及國內外相關的因素。政府如同一個有很多支流的大河，在不同的時空中從來不會發生完全相同的情形。我當時雖是政府一員，但如果自謂對一九三六年中國行政有澈底了解，那眞是愚不可及了。中國政府實在太大、太複雜，任何一個人都無法瞭解它的全貌。不過，爲了供將來參考，我願在此談一談我當時所了解的中國行政工作。

行政院院長辦公廳辦公人員約有三百人，其中三分之二都是書記人員。六十位是半書記半專門人員。二十名是專門人員，他們的知識與經驗堪供決策參考。辦公廳每天收文平均約九百件，發文約五百件。收發文中有百分之五需要我過目，百分之五中，祇有三分之一需要加註意見。其他需要我簽字的，由

一位參事替我代簽，蓋我的橡皮簽章。翁文灝埋首於辦公桌上的時間比我多，每天看的公文較我多。我和翁所處理的公文，祇有五分之一需要呈院長核奪。

辦公人員分三科。一件來文（可能是電報、函件、便箋、呈文……），首先由主管科處理，半專門的辦公人員註明日期，有關法令，有時簽註指覆意見。接着主管科將原文加簽呈送到主管組。每組由一位較高級秘書或參事兼任組長，負責審查主管科的簽註意見。如果他同意主管科意見，祇要簽個名就可以了，如果他要修改，就需再加簽條。

經過科組處理過的公文，送給持有我簽章的參事。他要決定那些呈我過目，那些蓋章後退回主管科歸檔或答覆。翁文灝是由一位高級秘書替他擔任類似的工作。

我開始進行政院時對科組人員工作的好壞，很少表示意見。我認爲他們都是官僚，後來，出我意料的，我發現科員們能以清楚、簡練而恰當的文字，將極複雜的問題扼要的敍明，他們都能奉公守法，謹愼任事。不過他們處理公務的方式是完全遵循往例。很少有人去冒險改弦更張的。我很感謝他們，因爲他們的簽條提示我知道過去類似的事務是如何處理的。不過也有很多謠傳，說政府機關貪污腐化的，也有批評科員太保守、太拘泥小節、太好玩手段的。據說一個有經驗的科員能够鑽法律條文的漏洞，用油腔滑調的方法改變了公文的原意而不爲人覺察。就這些批評說，祇有很少數是對的。如果有人肯研究一下所有政府機關科員的簽條，一定會發現大多數都是公正的。根據我在行政院的經驗，我敢說我們中國並不缺乏使政治發揮效率的人才。

雖然科員忠於例行公事而且平均都很稱職，但組裏的人員却參差不齊。有些怕負責任，遇事草草了事。另一批人搖擺不定，不是舞文弄墨，就是亂搞一通。行政院中有些參事和高級秘書人員却是嚴肅、正派、很有政治才幹的。他們默默中的貢獻雖然不爲人知，但却是不折不扣的。

中國行政工作的困難很多。有些我已在院長辦公廳中親自體驗過了。第一，中國語言很不方便，直到現在我們還未發明高速抄寫和複印的技術和機械。於是所有的文件就不得不用手繕寫。電話是很好的傳達工具，但在一九三六以前，尚未被廣泛利用。有一天，碰巧我看到一份有關國歌的呈文。有一個童子軍團向行政院院長辦公廳詢問是否能夠買到印好的國歌詞譜。行政院正式將原案交教育部。教育部又分令許多出版公司。行政院等了兩個月，才接到教育部的答覆，說明它沒有找到印歌譜的出版商。行政院再正式答覆那個童子軍團。我問科組人員：類此事件可否用電話來處理，他們說：可以是可以，但是不習慣。

第二，公文處理的方式像寶塔一樣。按規定：處理公務時科不能直接對外，祇有最高級單位始可對外。結果，所有公文都要在這個寶塔中的每一層中旅行一遍。雖然利用圖章的代批制度可以減少一兩個層次，但在理論上，每件公文，不論性質如何，都應該由寶塔的最下一層，循序送到最上一層，再由最上一層送回最下一層。

對這種緩慢而無效率的官僚政治，人們有很多抱怨。其所以緩慢，第一是因爲語言文字，第二是因爲寶塔式的公文處理方法。這不是某個人的錯誤，也不是因爲辦事人員的懶惰。因爲一件公文從擬辦、敍稿、呈閱畫行、到繕發，整個過程需要很長的時間。但是，改善是有可能的。我認爲這並不是絕症。在談到我第二次任職行政院時，我將提出我的改革意見。

另一項不良行政程序也很浪費時間。依法，祇有行政院長才能對省主席及特別市長發佈命令。如果教育部長要省教育廳長辦某事，他必須先請院長命令省主席，再由省主席轉令教育廳長。如果衛生署長要某特別市市政府採取某項緊急防疫措施，他不能直接命令市府衛生局長，必須先呈請行政院，命令有關市長，再由市長轉令衛生局長。本來過去有一段時間中央各部長是可以直接命令省市有關單位的。但

其弊端是中央各部命令往往互相牴觸。以教育部長為例，他命令教育廳長增設學校，但可能財政部長卻命令財政廳長不得增加開支。為了避免中央各部命令互相牴觸起見，經省市長要求，行政院核准，祇有行政院始可命令各省及特別市政府。此一改革，並未收到預期效果。

地方行政中不如理想的地方還很多。最重要的是中央政府於制定政策時，很少事先徵詢省市首長的意見。雖然政府對輿論的態度逐漸改進，但中央政府部分官員仍然不願公開討論。其實，我們不應將許多政務視為機密，認為不能公開。其次，省市首長所接到的行政院命令，都是一些死板的法令規章，命令的主旨祇有靠揣測才能明瞭。這是由於官員們的習慣和政府的性質所使然。

其實，中央政府對地方政府的困難是相當了解的。中央政府人員有些出身於省市，因而他們有省市的行政經驗。盡管有時他們外表好似找地方政府的麻煩，但事實上他們還是體諒地方政府困難的。但各省市的情況不同，某一命令適合於甲地未必適合於乙地。尤有進者，如果某一項工作中央和地方都有困難的話，中央人員當然是先顧自己，而把困難留給地方政府自己設法去克復。因此，中央政府命令地方政府作某項工作時，往往不指示具體可行的辦法。

我進行政院不久，有一次看到桌子上有一份安徽省主席劉鎮華的呈文，文中詳述過去三個月他們接到的命令，並且詳細說明執行這些命令所需的經費。他又說明他沒有可以運用的經費。如果他要執行上級命令，只有兩個途徑可循：一是請中央撥發專款；另一個是准許他增稅或發行地方公債。他謙恭的請求行政院長指示他如何辦理。呈文用語非常客氣，但是一點效用都沒有。中央政府人員事先毫不考慮下級執行機構的困難，而任意發布命令，此種情形令我很感意外。我把劉主席的呈文列入政院會議議程。討論結果，有些工作撥發了專款，有些經決議取銷。

政府人員都喜歡責難別人。互相指責是常見的事，此種情形在中央與省市政府間尤其風行。中央政

府人員怒責地方政府人員無能，反過來，地方政府人員也抱怨中央政府人員漫不經心，沒有頭腦。

雖然中央各部會與行政院之間的關係與地方政府一樣，但前者在首都，且能出席政院院會參加制定政策，所以，一般的說，待遇較後者為優。但他們也並不全是快樂的。他們永遠要求加薪。政院對此要求，或完全拒絕，或僅僅增加少許。他們永遠認為工作太重，要求增加員額。政府對此一概拒絕。每個重要部會都認為他的工作是最重要的，為了澈底完成重要任務起見，必須要增加職掌和權力。我在行政院最棘手的工作就是調解部會間的權限之爭。

在財政工作方面，我的基本原則是請院長支持財政部長。我認為：除非院長如此，則財政部長將成為衆矢之的。因此，有些事我比財政部長本人還要賣力氣，大家認為我實在是個傻瓜。好幾位朋友都勸我放棄上述的原則，因為省下錢是公家的，得罪人是私人的。然而，在那段時間中，不僅可以看出我的見解正確，而且也可以看出我的為人公平。當時人們都很討厭我，但我敢說沒有一個人把我當作他私人的敵人。

調處部與部間爭論及協調有關部會間共同的工作，需要召開很多會議。設使所爭論的問題非常重要，就需要我或是翁文灝擔任主席。否則，就要派一位參事或高級秘書任主席。在會議中，我們彼此討論，直至我們達到協議為止，有時我們找不到滿意的解決辦法，祇得將問題提出院會或請院長作最後決定，但這種情形不多。

需要政院決定的政務，雖然法律已有明文規定，但是也有相當彈性。翁文灝的主要工作是排會議議程，使院會對議程中的重要事項予以適當的討論。同時為了執行政院決議而發佈適當的指令。

議程印在一本油印的册子上，內容分兩類：普通的和機密的。每類之前都附有報告。依法，只有某些事始可向行政院報告。報告後面是討論事項，其中大部分是各部會提案。行政院會議大部分都是討論

此類事項。討論開始是由提案的部會首長宣讀提案的原文。如果翁和我有意見，於讀完時我們立刻把意見附加到提案原文上。簽意見時要很小心。我們可以採取以下各種方式：我們可以簽：經過仔細考慮，建議採納原提案；我們也可以簽：由於本案祇注意到某方面問題，忽略了其他方面，因此，本案應予修正；我們也可以簽：基於法律及政治原因，本案應予重新考慮。後一種簽法當然是客套，實際上，就是否決了原提案。

我們附加的意見條，受到相當的重視。因爲提案者祇考慮到他一己的目的與利益，而我們却能照顧全局，考慮到其它部會的觀點。尤有進者，因爲原議案往往是冗長不堪的，而我們的意見條却提出其中重點。此種方式使閱讀者心理上有好感。行政院會議，往往時間很短，因此，都歡迎我們簡潔的意見條。有時，院長和與會各部會首長看到提案長達四五頁，而我們的意見條祇有短短的幾行，就說：「祇念一下附簽的意見條就好了」。如果提案者接受我們所簽附的意見，一切自然順利通過。如果提案者不同意，我們彼此之間就會有一場口頭辯論。

就某種意義說，實際上是我們的簽條左右了中國的政治。但是，我們可以保證，絕對沒有濫用權力的地方。有時我們要先請示院長，然後再加簽。有時，對案情不够了解，我們根本就不簽意見。

在院會中，因爲每個與會的人均有機會發言，而時間有限，發言人絕不可浪費時間，言詞要清楚，簡單扼要，而且要爭取他人的好感。所有的話都是講給院長聽的，因爲最後的決定不是表決的，而是由院長個人決行的。依照法律和傳統，中國行政院的部會首長頗似美國的國務卿，而不像英國的閣員。

第十六章　出使莫斯科（一九三六—一九三七）

當我出使蘇聯的消息公佈後，各方都寄予厚望。朋友、公私團體，予我一連串的招待。每次聚會中，大家都希望我、要求我能設法使蘇軍與我並肩作戰，抵抗日本侵略。他們相信我一定能進行此一重要工作，他們希望，不僅是進行，而且一定要完成此一工作。這些聚會中所表現的，反應出一般人的情緒。輿論日漸主戰；而且認為蘇聯會介入我們的抗日戰爭。這有很多理由。

雖然中日兩國政府盡力製造談判氣氛，但在中國的日本軍隊卻繼續向中國政府和人民揮動他們的鐵拳。因為日本不願減輕中國對日本的仇恨，很自然的，中國的輿論也祇有主戰一途了。

蘇聯駐我國大使鮑格莫洛夫（Bogomolov）很巧妙的煽動了這種戰爭熱狂。他與中國領袖、政府方面的和民間方面的，頻頻接觸，示意蘇聯準備予中國所需要的援助。他慷慨承諾，特別是對民間領袖，更是滿口應承。雖然他對政府人員說話比較謹慎，但也獲得相當的成功，使他們都寄望於蘇聯的援助。我的任命正式公佈後，鮑格莫洛夫用極肯定的口吻告訴我，蘇聯甚至可以接受建議，訂立互助條約，他並沒有談到互不侵犯條約。

很明顯，鮑格莫洛夫希望中國盡速對日作戰。他還表示：蘇聯可以，而且也應該給予中國實際軍事援助。我當時，甚至直到現在，我都不相信他是蓄意欺騙中國的；不過我當時，甚至直到現在，我也懷疑蘇聯政府會授權給他，對中國政府作超出互不侵犯條約的承諾。他對蘇聯介入遠東戰爭有他自己的理

子找到證據。

由，而且盡量想要達到他的目的。我猜想鮑格莫洛夫和他的同志是認爲日蘇在遠東的戰爭能够使史達林垮臺。我對自己的猜測雖未證實，但也未獲反證。我在此處予以說明，其目的是希望日後學者們能想法子找到證據。

一九三五年，中國發生了所謂「統一戰線運動」，此一運動有兩個目的：其一，停止中國反共運動；其二，對日作戰。中國所有的反政府人物，軍事的和政治的，都參加了統一戰線。大多數加入者都是爲了愛國，少數人是想要打倒蔣委員長，阻止中國統一。統一戰線公開宣佈　中國一旦表示需要，蘇聯會立卽準備對日作戰。

盡管有鮑格莫洛夫的保證和統一戰線的叫喊，但我對蘇聯的援助並不寄予厚望。我認爲：蘇聯似乎盡可能的在保持和平，因爲他需要在和平中完成他國內偉大的建設。根據一九三四年訪蘇時所得的印象，我相信蘇聯可以從保持和平中得到更大的利益。

然而，蘇聯東西兩方都受威脅。一九三六年，我還不能肯定究竟是德國還是日本誰先對蘇聯下手。我認爲史達林一定認爲德國的威脅甚於日本，因爲蘇聯在歐洲的地區較之亞洲地區尤其重要的原故，卽使日本能够佔領了西伯利亞和烏拉爾一帶，蘇聯還是一個强國；但是，一旦德國佔領了蘇聯歐洲的領土，蘇聯的根本就動搖了。這兩條戰線的重要性可以從蘇聯的駐軍情形清楚看出來。蘇聯在歐亞兩線的駐軍人數是三比一，此一事實卽可說明重點之所在。

因爲上述的輕重關係，我們中國人不能希冀蘇聯犧牲自身利益來幫助中國。不過，蘇聯面對自己的危險，一定急於爭取友邦的援助倒是眞的。因此，我對出使蘇聯一事，是將成功的希望建立在蘇聯自身的需要上，而非建立在蘇聯的慷慨上。在呈委員長的秘密報告中我曾指出：中國與幾個國家（包括蘇聯）結盟的機會比中蘇兩國單獨聯盟的可能性大。我們在考慮中國需要時，必須同時要考慮蘇聯的需要，

否則，外交是無從進行的。實際上，我所提的建議乃是成立一個反日聯盟。對中國說，與日本作戰乃是生死交關的事。我建議中國要傾全力以赴。我認爲：根據蘇聯的力量估計，他最多祇能提供百分之三十的力量。尤有進者，我很淸楚，蘇聯的援助程度還要視英美的援助情形而定。我並未把法國計算在內，並不是我不希望法國援助，因爲我認爲法國必須將其全部力量集中在歐洲之故。

我並未異想天開認爲中國，乃至於我個人，就可以組織一個反日大聯盟。卽使各方面都答應合作也是困難萬分的。我對自己的構想並不樂觀，但與蘇聯單獨結盟，我認爲似乎毫無希望。我的報告除了委員長外祇有翁文灝看到過。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一日我離上海，二十五日夜抵海參崴。我本想在海蘭泡能停留一下，因爲蘇聯遠東軍區司令布魯轍（V.K. Blüecher，按卽加倫將軍）將軍的司令部在那裏，委員長要我轉送一幀簽名照給他。但，蘇聯駐海參崴的外交部代表告訴我，蘇聯政府希望我能按時趕到莫斯科，以便出席紅場的革命紀念會，列車長已接到命令，要盡快把我送到莫斯科。因此，我祇有打消拜訪布魯轍將軍的念頭。事實上，雖然我於十一月七日趕到莫斯科，但爲時已晚，仍然沒有趕上紅場慶祝大典。

駐在莫斯科的外交團體成了蘇聯大海中的孤島。蘇聯嚴禁人民與外國外交人員來往。此種情形所產生的結果，是使外交人員彼此間越來越親密。他們好像成了一個大家庭。外交團體普遍反蘇。對蘇聯的政策以及其種種措施沒有一個人稱贊的。如果蘇聯政府殷懃招待我們，大家會說：「何必多此一擧。」如果屋頂漏水，水龍頭不管用，大家都認爲是蘇聯沒有行政效率。那些對沙皇時代俄國有一知半解的外交官常常向我描述舊時燦爛的文明和人民的幸福。他們一再警告我不要去上共產黨的大當。

當時蘇聯報上連篇累牘的都登的是西班牙內戰的消息。十一月七日革命紀念會中所喊的口號也都表

示同情並保證支持西班牙國內的「民主」黨派。西班牙內戰的孤兒被收養了，許多是蘇聯人自己的。蘇聯對西班牙的事有如此高的興趣，令我感到不解，使我要探聽更多的消息。我所得到的回答非常不同。

有一種說法是說蘇聯想要在西歐挑起一場大戰，於是英、法、德、義均會捲入，他們既傾全力於歐洲，就無暇顧到蘇聯了。另一種說法是說史達林遭到了困難。據說事實上史達林並不是像一般人所想像的那樣的獨裁者。他必須對國內外的意見予以相當顧慮。如果他不管西班牙國內的鬪爭，蘇聯的共產黨就會譴責他沒有遵照列寧的路線，其他國家的共黨份子也會對第三國際失去信心，不再將莫斯科當作世界共產主義的聖地。處於這些情況下，史達林對西班牙共和政府至少要予以象徵性的援助。但為了避免開罪英、法，他也不敢予以有效援助。

有人進一步認為：某些蘇聯駐西班牙和西歐的外交人員有意在西班牙煽動革命，以使蘇聯陷身其中，因而造成一個巨大的國際動亂，藉機來動搖史達林的統治地位。那些希望蘇聯保存實力以待異日對付德國的人，均對克里姆林宮的作法表示悲哀。據說蘇聯在西班牙的政策已經開罪了法國人，嚴重的影響了法蘇互助協定，使法國祇有完全信賴英國。也有人說，檢討蘇聯在西班牙的政策，法國發現他與衞星國之間越來越不協調，因此使他開始認為與德國建立關係可能更符合他的利益。

抵莫斯科不久，蘇聯外交部邀請外交團到布爾什 (Bolshoi) 戲院去觀賞歌劇「卡門」(Carmen)。卡門的音樂是法國情調的，故事是西班牙的。法國大使考朗德(Robert Coulondre) 對李維諾夫幽默的說：「嘿！李維諾夫先生，你拿法國、西班牙的東西來招待我們哪。」英國駐蘇大使契爾斯頓(Lord Chilston) 竟然向李維諾夫告罪，中途退席離去。不久庫倫德也提前退席。這時，李維諾夫算是抓住了機會，他說：「至少在交際應酬方面，法國也用不到以英國馬首是瞻吧。」

我到莫斯科不久，戴維斯 (Joseph Davis)出任美國駐蘇大使。我們很快成為朋友。雖然美國是世

界上最資本主義的國家，但戴維斯還是發現了蘇聯有很多可以稱道的長處。不過，他也向大家表明，他認爲自由主義是最好的政策。甚至他發現蘇聯的生活方式是可厭的。有一天，當我拜訪他時，我發現在我們談話時，他不停的用鉛筆擊打桌子，很像中國和尙敲木魚念經。看到這種情形，使我有些不解，後來他告訴我這是防止蘇聯特務「格別烏」（GPU）錄音和竊聽的最好辦法。盡管戴維斯已經派美國的電訊專家檢查過美國大使館，但他仍不敢確信墻中沒有蘇聯秘密佈置的竊聽、錄音設備。我對蘇聯是否在中國大使館佈置錄音、竊聽設備問題不想去偵破，因爲我相信在這方面我不是蘇聯特務的對手。戴維斯和我很想在不受特務及竊聽設備干擾的情形下，自由自在的在一起談。起初，我們想可以在乘汽車時談，但我倆都不敢確定我們的司機是否是特務。最後，我倆決定去旅行，但當我們下車時，馬上就有四名特務朋友跟上我們。

我決心不使蘇聯特務擾亂我平靜的思想。我深知：我對蘇聯的社會和經濟情況沒有資格去批評。因爲：第一，我對蘇聯了解的不够；第二，我自己國家的情況也糟到極點。尤有進者，有些和我接觸過的蘇聯領導份子都予我相當良好的印象。例如：加里寧（M.I.Kalinin），蘇聯名義上的領袖，在我第一次到莫斯科時我們就會過面，而且一起乾過杯。他的態度很民主，不分尊卑階級，待人一視同仁。在向他呈遞國書時，我對他和李維諾夫表明我不大喜歡錯綜複雜的外交。加立刻安撫我說：「不必擔心，我們都不是職業外交家。如果搞外交，那是因爲事實的需要。以我說，我很喜歡按照我自己的路子去辦外交。」過去，他當過銅匠。很明顯，他曾讀過很多有關中國的書籍，對於我國的資源非常清楚。除了對未來中國表示信心之外，他又很和藹的說：「我們蘇聯人希望中國富强，越强越好。」

我常與李維諾夫晤面，有時爲公，有時爲交際。如今當我回想起當年在莫斯科時，我認爲李維諾夫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中最偉大的歐洲政治家。可能是他率直而銳敏的個性，令我對他激賞。

我出使蘇聯是有固定目的的，因此，盡速開始我的眞正工作。我對李維諾夫說，我是受命協商中蘇兩國進一步關係的。開始時他說，他要等鮑格莫洛夫回來，事實上，鮑格莫洛夫已於我抵莫斯科的第二週返抵莫斯科。蘇聯政府在考慮與中國建立進一步關係時需要就商於蘇聯駐中國大使，我認爲這也是合理的。但，鮑格莫洛夫回國是出席全國代表大會的。直至十二月初，我們才開始正式談判。

鮑格莫洛夫在莫斯科也和在中國時一樣不斷的煽動中蘇建立進一步關係。我告訴他：中國對單純的中蘇互不侵犯條約沒有興趣，因爲這種條約不足以符合蘇聯的眞正需要。顯然的，兩國都不會擔心受到對方的侵略。我們不需要互不侵犯條約，我們需要的是積極互相援助的條約。鮑氏同意我的見解。他說他的政府將有限度的採納我的意見。他的回答似乎非常誠懇。我問他如果德國進攻蘇聯，是否能迫蘇聯從遠東撤退軍事力量。他認爲不會。我問他：蘇法盟約對此是否有影響。因爲我認爲法國可能切望蘇聯將其全力置於歐洲。鮑格莫洛夫說，法蘇條約對蘇聯在遠東的行動並無限制。

當我與李維諾夫開始談判時，我發現他與鮑格莫洛夫的看法不同。李表示，一旦中日開戰，他對中國不作任何軍事援助的承諾，因爲：第一，蘇聯必須西線絕對優先；第二，蘇聯援助中國的承諾會引起西歐的懷疑，使蘇聯遭到更大的困難。尤有進者，他指出：遠東的局勢需要英美的合作。如果蘇聯表示積極希望中日開戰，必將減弱英美對中國的同情。蘇聯決不能走在英美的前頭。不過，李維諾夫要我相信，如果其他列强同意，蘇聯也決不落後。

事實上，李維諾夫對局勢的分析幾乎與我不謀而合。他最大限度是同意締結一項互不侵犯條約，基此條約蘇聯將貸款給中國購買蘇聯軍事裝備。他提議條約談判的地點要在南京不在莫斯科。因爲我認爲這種條約沒有重要性，也不想在莫斯科談判。

從李維諾夫對我個人的談話中以及根據我自己對情勢的了解，我認爲互助條約式的中蘇聯盟已經毫

無可能。我將結果報告給委員長，並建議應按我以前建議的路線採取行動，進行與多數國家締盟。我擔心國內其他人士會執着蘇聯準備對日作戰的觀念。因此，在報告中，我進一步建議應該派遣其他官員，特別是孫科，盡速到莫斯科來，親自了解一下與蘇聯締結軍事聯盟的可能性。

後來，戴維斯自願說服李維諾夫與中國締結較互不侵犯條約更進一步的條約。有一天早上大約十一時左右，戴維斯問我是否可以與他共進午餐，因爲他有一些很重要的消息要告訴我。午餐前我趕到美國大使館。落坐後，飲料上來，戴維斯說：「今天早晨我和李維諾夫爭論的很兇。」戴與李爭論的焦點是那一國（蘇聯或美國），應該首先軍事援助中國。我聆聽了戴維斯與李維諾夫的談話內容後說：「你們雙方都對，也都不對，我認爲你們兩國應該同時採取行動。」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我的館員和他們的太太於晚餐後在客廳開聽廣播時，突然有人要我不要說話，注意廣播。我們聽到蔣委員長在西安爲張學良部隊所劫持的消息，此一廣播令我們感到震驚。午夜我的一位秘書呈給我一份外交部電報，電報內容與廣播相同，另外又說張學良要求停止勦共立即對日宣戰。次晨，我又接到一份較詳細的電報，是由孔祥熙和翁文灝聯名拍給我的。孔於蔣被劫持後代理行政院長。電報中說，空軍偵察西安地區的結果，發現張學良已在西安各處升起紅旗。同時要我請求蘇聯出面協助平安釋放委員長。

「消息報」和「眞理報」，均以顯著地位刊登西安事變消息。他們對中國表示很友善，說明中國面對國際上的危機，一定要團結統一，而且祇有委員長能領導全國。如果改換我來寫這篇新聞稿的話，恐怕也不會比他們的更好。但在結尾時，蘇聯記者對西安事變的解釋却是莫名其妙的。文中說：張學良是和汪精衞合作的。我熟知他們二人。他們的政治見解，南轅北轍。汪不惜任何代價換取日本和平，而張則希望立卽對日作戰。我認爲：蘇聯既然想找藉口打擊汪精衞，似乎不能，也不應該採取這種手段，應

該改選一個更好的題目。我認爲莫斯科對西安事變用不着解釋。拐彎抹角的提出一個四不像的解釋，非但減低了人們對報導的信任程度，甚至會引起對蘇聯的懷疑。我將蘇方報紙的報導詳細電告南京，但有意將汪幕後策動西安事變的報導略掉。我請外交部將我的電文盡量公佈。我希望張學良及其同黨能知道莫斯科方面並不支持他們的行動。

塔斯社將兩篇新聞稿一字不易的發到中國，該社也希望中國報紙能够刊登。其目的無非說明張學良、統一戰線以及共產黨都不應該加害委員長。

南京當局未能察覺莫斯科的眞正企圖。懷疑汪精衛對西安事變的解釋有幕後動機，於是將蘇方電稿壓住不發。

那天早上十一時鮑格莫洛夫過訪。他對西安事變一事表示與我一樣，感到吃驚。他問我：如果我看過「消息報」和「眞理報」的兩篇報導，而事實也確是如此的話，我的想法如何？我表示對那兩篇報導非常贊佩，不過我提醒他報導中說汪精衞策動西安事變是不聰明的，也不眞實。他說，因爲太匆促，所以編輯可能弄錯，不過他很欣慰我能了解那兩篇報導的眞正意思。

在陰霾沉沉愁雲四塞中，中國靜待進一步的發展。命令雪片飛來，要我盡量在莫斯科設法要蘇聯協助，促使張學良釋放委員長。此種任務不僅困難而且也很微妙。我怎麼向蘇聯當局說？中國政治領袖在本國國土內爲自己的軍隊刼持，蘇聯能作什麼？我去見李維諾夫，向他要求說，因爲張學良及其同黨都很信任蘇聯，如果他能表示一下意見，對事變的解決必然很有幫助。他回答說：蘇聯政府與張之間沒有任何關係；蘇方所能作的祇有報導事變的眞象；他所能作的已經作了。李維諾夫抱怨蘇聯的友善意圖非但未被中國政府接受，反而招來懷疑。他告訴我他已訓令蘇聯代理駐華大使向中國外交部提出强硬抗議。我提醒他：張學良的確有位代表駐在莫斯科，我將名字告訴他。我又向他解釋：中國所以不發表塔斯社

的新聞稿實在是因爲怕引起麻煩。

過不幾天，我又接到南京的命令，再去見李維諾夫。這一次李很憤激，因爲京滬一帶謠傳西安事變的發生是蘇聯煽動共產黨，共產黨又煽動張學良，因而發生的。我倆在那天會晤中爭辯的很激烈。當李知道我是接到南京政府命令才去找他幫忙時，他立卽提出抗議，認爲中國政府不該懷疑蘇聯策動西安事變。他斷然說：蘇聯政府與張學良間絕無關係；我告訴他：張是第三國際所孕育的統一戰線份子。他對我的話未加辯駁，但却咆哮起來：「我們不是第三國際的主人。」「你過去已經這樣說過了，李維諾夫先生。」我回答他說，「但是全世界都不相信，我們有理由認爲第三國際是執行蘇聯政策的機構。」愛相信不相信，」他最後說：「我還是說莫斯科對第三國際的行動不負責任。」

現在，西安事變的解決已成歷史。我對解決的內幕一概不知。迄今，我得到兩個結論：其一，西安事變促成中日之戰提早爆發。不論南京官方如何解釋，日方認爲委員長如果不答應實施張學良的統一抗日主張，張是不會釋放他的。其二，西安事變的解決意味着中國將獨自抗日。蘇聯希望遠東爆發戰爭。此種戰爭將使日本陷入泥淖，解除日本進攻蘇聯的隱憂。一旦此一目標達到，蘇聯在外交戰略上則予中國有限度的援助，其援助數量僅僅使中國能繼續抗戰。換言之，不論西安事變的原因如何，但却非常符合蘇聯的利益。我必須再說一句，我不能證明西安事變是蘇聯策劃的。

西安事變過後，我派一名專人返國，携帶一件呈委員長的秘密呈文，文中大意是建議請孫科到莫斯科從事一項特殊任務。此一建議的動機是因爲我認爲中日之戰卽將爆發，雖然中國衷心盼望蘇聯介入，但蘇聯必盡量設法置身事外。我想：如果孫科能先來看看情形，必然對我的看法極有幫助。但委員長基於他個人的理由，對我的建議未予採納。

當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戰爭眞正爆發時，蘇聯對中國在外交及軍事物資供給方面都表現得較英

美各國慷慨。我在蘇聯購買武器也未遭到困難。在日內瓦國際聯盟辯論遠東戰爭時，或在布魯塞爾列強所舉行的特別會議中，李維諾夫也特別支持中國。在上述兩種場合中他都和中國採取一致行動。倒是與英美代表們打交道時還有或多或少的困難。美國對中國與日本生死存亡的戰爭，究竟能予多大的援助是無法肯定的，要受許多條件的影響。當時，我對他們的袖手倒無所謂，眞正使我不安的是他們不斷的設法使蘇聯置身事外，英美對蘇聯在日內瓦及布魯塞爾任何談判中所表現的都認爲是要不得的。我認爲這實在是沒有遠見。

戰爭爆發，蘇聯答應供應武器後，我國派楊杰將軍爲團長，前往莫斯科商談購買武器事宜。蘇聯將楊安置在莫斯科郊外一所官長俱樂部中，目的是對楊的任務盡量保密。楊將軍自認：他本人非但是個偉大戰略家，而且也是個外交魔術師。有一次，當我去倫敦去看孔祥熙時（當時孔代表中國參加英皇加冕典禮），楊將軍要我對路透社發表聲明，意謂蘇軍將於兩週內對日開戰。我告訴他我不能作這種毫無根據的聲明，並且請敎他：如果發表這種聲明，有什麼眞正的好處？他認爲我是個十足笨蛋，無法了解他的謀略。他說：一旦日本看到這種聲明，他們就會先發制人，主動進攻蘇聯，蘇聯也就會抵抗日本，日蘇就眞打起來了。

從他與蘇聯國防部長伏洛希洛夫元帥的談話中，楊獲得（或許是想當然的）蘇方的承諾，一旦日本佔領南京，蘇軍將對日作戰，他對我說他已將他偉大的外交成就電告委員長。我對他豐富的幻想力感到震驚。我電請委員長注意，請他不要完全採信楊的報告，否則會吃大虧。南京卽將陷落之前，委員長爲事實所迫，曾以個人名義致電史達林，要求給予軍事援助。他的要求卽是以楊杰所說的伏洛希洛夫的諾言爲基礎。該電發出前未徵求我的意見，我也不悉內情，直至李維諾夫把史達林的答覆交給我，我才知道。我建議李：關於軍援的問題過去既然以另一條路線彼此聯繫，頂好一仍舊貫，無需透過我。李堅持要

我傳遞史的答覆，因爲他認爲過去的路線不可靠。在答覆中史坦白指出：他和蘇聯官員從無類似的承諾。同時，史更講了很多蘇聯不能對日作戰的理由。

一九三七年冬是我最感困難的一個冬天。因爲楊將軍呈給委員長的電文中充滿了希望和信心，而我的電文中却表示非常失望。南京陷落前不久，德國大使陶德曼（Oscar P. Trautman）出面調停中日衝突。孔祥熙將日本和平條件電告華盛頓王正廷和倫敦顧維鈞及我本人，徵求我們的意見。我回答說：和平問題應多方面考慮，祇有中央政府才能照顧全局，正確決定。我身爲駐蘇大使，僅能從蘇聯角度看問題。不過，我敢肯定：除非日本先對蘇聯下手，蘇方不會對日作戰。中央在決定和戰大計時，對此情況，應予參考。

外交部長王寵惠在國防最高會議秘密會議中宣讀我的電文。事後有人告訴我說孫科曾譴責我，說我誤解蘇聯的意圖。也許還有其他理由，我被調回。一九三八年初，孫科以特使身份被派往莫斯科，親歷其境後，他才知道我對蘇聯意圖的說明並未錯誤。

一九三七年冬季，我國政府對蘇聯又採取另一條外交路線。國民黨元老李石曾從巴黎到莫斯科。他對我說，他是委員長、孔祥熙和宋子文三人共同請他到莫斯科的，但當我向外交部詢問李的身份時，外交部又加否認。在中國政府服務有一種困難，一些地位高的人雖無合法身份而去介入公務，結果責任分散，增加許多無謂煩擾。

李抵莫斯科之初，很客氣的向我說明他的計劃和意圖。因爲他許多年來在法國和許多激進社會黨的領袖有密切關係，特別是赫禮歐（Edouard Herrior）和德爾司（Yvon Delbos），他們當時都是法國統一戰線政府中的重要份子。他告訴我說，他這些朋友不僅急於加强法蘇之間關係，也急於加强促進中法和中蘇關係。法國外交部長曾訓令駐莫斯科的考朗德（Coulondre）儘量設法幫助李與蘇聯政府

打交道。就個性論，李是個純理論無政府主義者；我們可以稱他是中國的克魯泡特金。爲了推行他的素食主義，曾在巴黎開過豆腐店，也曾在里昂辦過一所特殊中法大學，規定學生每天要以一半時間從事身體勞動。戰前若干年中，他與赫禮歐共同努力國際知識份子合作運動。他在北平曾辦過北京大學、北平研究院和中法大學，教授法國各派哲學思想。他的父親（李鴻藻）是光緒帝的重臣。我在清華時曾與他見過好幾次面。無論公開演講或私下談話他都不是一個健者。他抵莫斯科後，我一直注意他對蘇聯政府所產生的作用。

李告訴我，他希望先見到考朗德，然後再見李維諾夫。我忠告他，法國大使並不同情法國統一戰線，並不重視赫禮歐和德爾司。因爲李將哲學和外交混爲一談，所以雅不欲接受我的忠告。他繼續努力下去，他告訴考朗德有關他國際知識份子合作運動的夢想，他說透過這種合作運動，他和他的朋友可以使世界和平。考用譏諷而有禮貌的口吻答覆他說：「你的哲學是幾世紀以後的事，我們的外交是要解決當前的問題。」

在我陪李去見李維諾夫之前，我告訴他法蘇互助條約已成具文，即將廢除。當時莫斯科認爲巴黎那些意志薄弱、心腸軟的官員們已經沒有用處。莫斯科寧願一批像傍卡累（Raymond Poincaré）、巴吞（Jean Louis Barthon）那樣較嚴肅的人來執政。我認爲李應該以一個中國老政治家的身份與李維諾夫談話，不必提到自己的其他淵源。我的忠告因爲不合他的哲學，他又沒有採納。

李與李維諾夫談了許多他對世界問題的一般看法。所談主要問題是以中、法、蘇三國爲第一個三角同盟，推行國際知識份子合作運動。爲了適應時代要求，三國必須共同對付日本，迨談到當前的政治問題時，李維諾夫已經忍無可忍。他說：「李先生，作爲中國友人，我坦白告訴你：法國不能幫助中國，也不希望幫助中國。不僅如此，法國也不希望蘇聯幫助中國。」

當我赴莫斯科前，委員長夫人曾告訴我說委員長希望他滯留在俄國的長公子經國能回國。他的長公子於一九二五年赴蘇，自那時開始，他便一直留在蘇聯。

在我和蘇俄外交部次長史脫尼可夫初期會晤中，有一次我提到委員長的長公子，並表示：極願知其下落，如能代爲查詢，感激之至。他認爲很困難，不過他答應試一試。

一九三七年某夜，當我和部屬們閒談時，有人報告我說有客來訪，但於未見我本人前，不願透露姓名。當我接見他時，他立卽告訴我他就是蔣經國。我很高興。在我還未來得及問他計畫和意圖前，他說：「你認爲我父親希望我回國嗎？」我告訴他，委員長渴望他能回國。他說他沒有護照、沒有錢。我請他不必擔心，我會爲他安排一切。接着他又說：他已與一位俄國小姐結婚，而且已經有了一個孩子。我肯定告訴他，委員長不會介意此事。接着他又問是否應該給委員長及夫人帶一些禮物。最後，我幫他選了一套烏拉爾黑色大理石製的桌上小裝飾品送給委員長，一件波斯羊皮外套送給夫人。

幾天過後，他們夫婦到大使館來，和我共進晚餐。經國夫人是一位金髮美人，外表很嫻靜。經國先生告訴我他對中國未來的抱負。我勸告他，請他在回國後一年內不要提出他的理想，盡量了解中國的問題以及導致這些問題的原因，然後再提出解決的辦法。

直到我回國以後很久，我才曉得事情的發展情形。我從友人處獲悉，不僅是委員長，就是經國先生的朋友們也都歡迎他歸來。我獲悉他孜孜不倦的研究中國問題，不輕易發表意見。後來，我到江西去看他，當時他在贛南任行政督察專員。他約我到他家吃飯，我發現他的夫人國語已經講得很流利，完全依照中國舊傳統接待客人。他盡力造福百姓，作風民主，操守廉潔，實在是一位標準的官員。

在莫斯科，某日，有一位衣衰襤褸、沉默寡言的人來看我。經我再三詰問，才知道他是屈武，是故監察院長于右任先生的女婿。他對我說，他於一九二五年或一九二六年到莫斯科，國共分裂後，蘇聯懷

疑他是反革命分子。他做了十年苦工，最後被送去挖白海隧道。他過去沒有幹過吃力的工作，他感到在北極非常吃不消。蘇聯負責官員發覺他雖然是一名工人，但却有相當的教育水準，因此叫他作鼓舞同夥犯人士氣的工作，他們指示他要和其他犯人混在一起，告訴那些犯人，如果在刑期中好好工作，一定會釋放他們，讓他們恢復正常生活。他十年來，一直把這些話講給其他犯人聽。當他刑期屆滿時，看守人員告訴他可以自由時，他反而哭起來，因爲他不知道何去何從。蘇聯人派他任正式監獄管理員，待遇相當好。但，當他獲悉中國已經對日作戰時，他急於返國，想參加偉大的抗日戰爭。蘇方幫助他到莫斯科，他找我幫忙找他岳父要錢和護照，以便回國。我告訴他，一切都無問題，我會替他安排，要他一星期內再來見我。

過了三週他才來大使館。他說上次我們見面後他決定要去看場電影。因爲電影要半小時後放映，他想要藉機看一下新建的地下鐵路。當他閒逛時，治安人員懷疑他是間諜，把他逮捕了。治安人員費了三個禮拜時間清查他的資料，才弄清楚。我告訴他，這段期間要特別小心，我在三天內可以將車票替他準備好。到約定時間，他又不見面。因爲他離開大使館後到一家大百貨公司的貨窗前去看裡面擺的物品，因而又被逮捕。這次清查他的資料，警方祇用了一個禮拜。

一九三七年，莫斯科的恐怖氣氛較一九三四年更甚。我目擊彼雅可夫（Piatkov）、梭科木可夫（Sokolmkov）和拉迪克（Radek）的審訊。我也聽到有關杜哈切夫斯基（Tuthachevski）元帥的謠言。我親眼看見他於五月出現紅場閱兵，再被任命代表蘇聯赴倫敦參加英王加冕典禮，最後在莫斯科被處死刑。我發現再想和蘇聯人接觸已不可能。清黨的浪潮洶湧澎湃。報上滿載着托派份子陰謀的消息。我個人的結論是：（但我未向任何人宣佈）史達林發現强大的反抗力量反對他，爲了爭取廣泛的支持去消滅反對勢力，才給他的政敵濫加帽子。反對史達林是眞的，但是說他們犯罪則是虛構的。

邱吉爾創出「鐵幕」一詞，用以說明蘇聯對消息的嚴密封鎖。盡管蘇聯政府在防止消息外洩方面較其他任何國家成功，但其控制也非絕對有效。就是中國大使館有時也能獲得蘇聯所不欲透露的消息。至於那些組織健全、人員衆多的其他各國大使館就更不必說了。

我抵莫斯科不久，外交部通知我新疆有一個代表團到蘇聯洽談借款事宜。我奉命抗議此事，並蒐集有關情報。我正式向史脫尼可夫提出交涉。我們談話的內容遍及整個中亞問題，在中亞，蘇聯幫助「新疆王」盛世才奪得政權，推行莫斯科所欲推行的政策。史說蘇聯政策是很純正的。他說，祇要新疆是中國的，蘇聯不必擔心。但是如果有任何帝國主義想揷足其間，蘇聯一定要首先下手。我說中國也是一樣，不希望帝國主義從新疆進入中國。我希望在最近的將來，新疆不再是中蘇兩國衝突的焦點，而是中蘇友誼的橋樑。雖然我的聲明雙方都很滿意，但我却未能從他那裡蒐集到新疆代表團的情報。史否認有代表團這回事。我說代表團的目的可能是做生意，因此，可能與商業部有來往，和外交部不大有往來。他堅決的說，即使是商業代表團，他也絕對會知道。他既不知道，所以絕對不會有。

經向莫斯科各方查詢，我獲悉代表團的性質及其在莫斯科活動情形。後來，我邀請代表團全體人員出席大使館的宴會。

一九三七年冬，蘇聯政府決定召回鮑格莫洛夫，派奧萊斯基（UganoffOralsky）爲駐華大使。我外交部對奧的背景急需進一步了解，此項資料蘇聯大使館既不願意也不能提供。碰巧羅馬一家廣播電臺透露：奧萊斯基不是別人，他就是蘇聯前國防部副部長史米洛夫（Smirov），他在新任命未發表前任新疆廸化的副領事。這位新任命的大使，我當然知道他曾擔任過駐中國的副領事，但是若說他曾任蘇聯國防部副部長，似乎令我難以置信。我想：副部長的照片一定可以蒐集得到。經過好幾天的尋找，我的一位秘書終於找到一張史米洛夫的照片，照片載在蘇聯官方的陸軍刊物「紅星」上。照片下面印有小傳

，事實上，他在蘇聯是一位重要人物。原來史米洛夫先生就是奧萊斯基先生，我的部下很容易的予以證明，此事令我感到非常滿意。

據報導：鮑格莫洛夫大使和布魯轍將軍以及許多其他部下於一九三八年左右都遭到清算。如果報導不虛的話（我希望它不虛），他們的眞正罪名一定是想將蘇聯拖進遠東的戰禍中。

我對蘇聯的軍力極有興趣。德國駐蘇武官科特寧（Koestring）將軍曾提供給我最可靠的估計。他一再對我說：蘇軍力量不可低估，否則，有一天，它將使世界震驚的。另一個可靠的估計是美國駐蘇武官法莫威爾（Faymonville）上校，我認爲他是一位偉大的社會哲學家。英法兩國武官均認爲蘇聯軍人的勇敢不够。

當我任職莫斯科時，正如一九三四年我訪問莫斯科時情形一樣，我又目覩工業化運動和人民生活水準的降低。原因是史達林集中力量搞國防。軍人吃、穿、住比較好，正如軍火工廠在機械、工具、原料、工程師等方面比較其它工廠優先一樣。在戰爭未爆發以前，蘇聯已成爲一座大軍營和一座大兵工廠。蘇聯五年計畫的成就可以說對人民生活並沒有多大改善，主要的是作軍事上的準備。

革命本身有其發展的規律，這是革命領導人所無法預見和控制的，同時也超過了現代科學知識的範圍。我們不否認列寧及其同志當年曾有造福人民的願望，但在一九三〇年，史達林却動員所有的人力和資源在準備戰爭。世界上一般人，特別是史達林的同路人一定都認爲史達林有遠見，執行政策時有幹勁，其結果是直到現在，共產主義在戰爭方面較和平方面的成就大。這種發展情形，我並不完全歸咎於史達林個人；原因很多。第一，在偉大的國際社會中有些事實阻碍；曲解了國際的發展。其次，我認爲在人類潛意識中也有某種隱藏的力量，驅使人類去從事摧毀人類的工作。

我承認在蘇聯革命的當時，我是同情的。但我也承認當我在一九三八年初離開蘇聯時，我的內心却

充滿了不安。

不論蘇聯革命在歷史上具有何種意義，有一件事我是可以肯定的；中國必須在外交政策方面將與蘇聯建立友善關係當作首務。在進行此項工作過程中，中國要消除自己的偏見。此項工作本身就够困難的了，更不要說再受到西歐和北美反蘇的影響了。

問題是：蘇聯能否讓中國單獨依照他自己的傳統和特殊環境需要去發展。

第十七章　戰爭的考驗

我於一九三八年元月離開莫斯科，經巴黎、馬賽、地中海、紅海、印度洋、新加坡、西貢、昆明回國。我隨卽前往漢口，當時漢口等於中國實際的首都。軍事前途暗淡，一般官員都很沮喪，但是一般人民却是勇往直前，生活清苦，工作勤奮。

二月底抵漢口。使我感到意外的是蔣委員長的抗戰勇氣和決心。他旣不樂觀也不悲觀。軍事倥傯，一面忙於指揮軍事，一面又處理政務。他被推爲國民黨總裁，汪精衞副之。他集中全力去改革黨務。有一次我在中央黨部紀念週上聽他訓話。他嚴斥那些不稱職的黨工人員。他要中央黨部人員首先以身作則。此外，他又成立了青年團及參政會，吸引黨外人士，以擴大政治基礎。目覩這些措施，我認爲蔣委員長此舉的目的部分是爲了革新黨政，部分是在鼓舞士氣。一旦人們努力工作，他們就沒有時間去悲觀。是否蔣委員長本身也這樣想，我就不知道了。

蔣委員長集大權於一身的程度令我也感到驚異。當時汪精衞在黨中地位是僅次於他的副總裁，他也對每個有關人員承認此一事實。但汪的副總裁並不意味着可以代他行使權力，汪的副總裁僅意味着是向蔣委員長個人負責。這種關係從另一方面看也很淸楚，汪在行政院沒有地位，行政院的院長是孔祥熙。換句話說，汪不能干涉行政院的事務。

在南京時我與汪曾有數面之緣。此次在漢口我發現他對這種貶抑有些怨恨。

行政院長孔祥熙博士邀我重作馮婦，再作行政院政務處處長。他說：他一直懸缺以待。我認爲他不過是一種官場客套，用不到認眞。尤有進者，我急於返湖南，去看看我的孩子。她在我出使莫斯科期間，一直和我哥哥留在家鄉。同時我也想了解一下一般湖南人對戰爭的看法究竟如何。在戰爭中湖南扮演了一個重要角色，不僅徵調了大批壯丁，而且還有相當數量的人志願入伍。

在湖南，軍事和一般經濟的發展已經使老百姓充份就業，不再有失業的情形。工資提高了，物價也開始上漲。小康之家抱怨他們不能掌握長工，一反過去的情形，長工已經能不再倚賴地主，因而受人尊重，家鄉的人都欣喜他們的米和桐油的價格較過去漲了一些。一九三八年春的湖南，正沐浴在戰時繁榮中。

一九三八年湖南的經濟情況可以說是整個戰時中國的典型。艱苦的是薪水階級，主要的是政府公務員和敎員。在戰區，當然所有的人都很艱苦。戰區以外的地區，除了薪水階級以外還不太感到經濟的壓力。

由於封鎖，中國經濟又恢復了舊時代的情況。女人又搬出她們的紡車，洗洗乾淨，開始用手紡線。用煤油燈的人家改用桐油燈。抽紙烟的人改抽水烟。家機布代替了機織布。就一般人說，他們寧願回到舊時代。

當我在湖南旅行時，當時的經濟部次長何廉博士電告我：孔院長要他到湖南設法說服我出任政院政務處長。爲了不使他受風霜之苦，我提前返漢口。孔院長的誠意使我無法峻拒。他說蔣委員長都請我作政務處長，他若不請豈不是不禮貌。他又說：因爲我接受了委員長的任命，如果不接受他的邀請就是「不賞臉」。他的說詞，令我無法拒絕。一九三八年五月，我又返行政院重作馮婦。

當時的行政院秘書長是魏道明，翁文灝已轉任經濟部長。在此之前我還沒有見過魏道明先生。我的

工作要與他密切配合，否則，一旦不協調就會引起極大的不幸。這時，我仍視孔院長的約請不過是一種官場客套，我認爲用不到眞正去賣力氣，所以我決定避免責任，希望有一天能擔任其他工作。

七月間，武漢保衞戰開始。七月二十日，我搭機赴戰時的首都重慶，因爲孔院長和魏秘書長留在漢口，我是重慶方面行政院高級官員，於是許多聯絡工作和行政責任就落到我的肩上，這實在是違反了我的意願。

在我赴渝前一天，蔣委員長的秘書電告我，要我當晚與委員長共進晚餐。我從漢口渡江至武昌，在輪渡上遇到張群將軍，他也應邀出席當日的晚宴。我們共同推測當天晚上的情形。當時日本軍隊已經與蘇俄遠東軍布魯轍的部隊在朝鮮邊境發生武裝衝突（卽張鼓峯事件——譯者）。此種衝突的意義報紙上已有很多報導。有人認爲這就是我們大家所盼望已久的日俄戰爭。張將軍認爲：當日晚宴的討論主題可能就是張鼓峯事件，他猜測：由於我新從蘇聯回來，委員長可能要我發表意見。

蔣委員長的晚餐一向非常節儉，戰時較平時尤甚。晚餐後，他說他要在當晚討論張鼓峯事件。大公報主筆張季鸞首先發言。他認爲張鼓峯事件一定就是新日俄戰爭的開始。許多人都發言贊同他的看法。有一位先生爲了强調樂觀的遠景，甚至宣稱日本財政將於九月崩潰。在委員長面前表示意見往往有不同的幕後動機。有些是堅信自己的看法的，有些是揣度委員長的意思，附和討好的。當晚發言的情形，也大致如此。

許多人發過言後，委員長轉身對我說：「廷黻，你對蘇聯很了解。你分析一下張鼓峯事件。」我回答說：「我認爲那祇是一次邊界衝突，起於雙方的帶兵官，並非雙方政府事先命令他們開戰的。就布魯轍本人說，我認爲他的行動不僅未受到上級命令，而且可能是違反上級規定的。」當我發言時，所有以前發言的人都反對我，認爲我不智。但委員長却在討論結束時說：「廷黻說的對，散會吧。我們要自己

努力，就當作張鼓峯事件沒有發生。」如果說他對蘇聯直接軍事援助曾經存有任何幻想的話，他一定是放棄這種幻想而面對殘酷事實的第一人。

中日戰事爆發之前，委員長慎重避免任何刺激日方的行動。他比別人更淸楚對日戰爭的嚴重性，無論是物資方面的或是人員方面的。戰爭一旦開始，他從未表示他要接受日方所提的和平條件。當一九三八年秋日本佔領武漢時，日本首相近衞文麿（Prince Konoye Fumimaro）曾發動一次和平攻勢。他發表一項聲明，表面上對中國人民和日本軍閥雙方面面俱到。我認爲當時我國應該由負責的政治家發表一項答覆，使日本某些人相信我們中國人是溫和穩健的，我們的抗戰純粹是出於自衞的，我建議孔院長，我認爲由他答覆最爲妥切。他同意我的建議，但先要得到委員長的批准。我起草一份答覆文稿，將它拍發給正在前方指揮軍事的委員長。擬議中文件發表的方式是將它當作一篇行政院總理紀念週中的演詞。直至紀念週舉行時，委員長的批示仍未到達。孔院長仍然照預定計劃，宣讀了那篇文件。下午二時左右，委員長的批示才到：不要發表那個文件。

後來，委員長發表一項聲明，聲明中他嘲笑了近衞文麿。他說日本欲想停戰，就退出整個中國。就我個人說，我認爲這項聲明用不到那樣嚴重。後來有一次與委員長在午餐席上討論問題，他要出席者對那篇聲明發表意見，我將我的意見坦率的說出來。迄今，當我回憶那次討論時，我認爲就細節說我的批評是對的，但就整個政策說，委員長是對的。因爲委員長聲明的目的是要激起全國的士氣。他認爲在那個軍事節節失利的非常時期來談和，一旦失敗，必致影響士氣。卽使和談能夠成功，也祇能達成一種不利於中國的和平。

中國乃至於全世界直至今日，仍不知道蔣委員長在八年抗戰期間一柱擎天的力量。

在重慶主和最力的是汪精衞和他的同黨。政府由漢口遷重慶後，委員長到前方指揮軍事，因此他最

後才到重慶。在預計委員長抵渝那天，汪派人到我的旅館告訴我汪希望能立刻見到我。當我抵達他的官邸時，汪與他的太太陳璧君同時出迎。他告訴我：他想盡早爭取最佳時機請求委員長對日談判，他並且說，他有某些德國和義大利的路線，透過這些路線可以進行談判。我回答說：如果對於和戰重大問題有意見應該直接向委員長詳細坦述，這是絕對正確的。不過我又接着說：我深信：比和戰問題更重要的是統一問題。統一作戰或統一言和，中國才能有辦法。如果分裂，無論是戰是和都會失敗。如果我所言不虛，則最後的決定一定要取決於委員長，因爲他一身獨繫國家團結的重任。當我發表意見時，我發現汪雖然深受感動，但他的太太幾乎是怒不可遏。當談到與日本政府接觸的路線時，我向汪建議：不要利用他的德、義關係，因爲中國人多數認爲德、義是日本的同黨，任何透過德、義的談判不論其實質如何，都被認爲是對中國不利的。我說我認爲如果可能的話，可以利用其它國家；如果不可能，寧可直接談判。汪認爲我的意見不切實際。當我辭出時，他說，待他見過委員長後再盡速召見我。當天汪與其他人員到機場去迎接委員長。汪隨蔣到官邸討論甚久。我下班後一直在旅館中等候汪的消息，一直等了三天才召我前往。當我到他官邸時，我發現他正在垂頭喪氣。他告訴我委員長澈底反對他的意見。「既然如此，」我說：「我們一定要服從。」幾天後，汪離重慶前往法屬越南。從越南前往南京，成立了他的傀儡政權。這件事完全出乎我的預料。雖然我一直對他未寄以厚望，但我確曾認爲像他那樣文化背景和有革命歷史的人實在不該去從事違反國家民族利益的叛行。我認爲：汪的叛國行爲也許是有原則的，也許是爲了滿足一己的私慾，但他太太却完全是爲了滿足一己的虛榮心。汪之走上叛國之路可能是她將滿足虛榮心的要求與汪的政治原則相結合。這種做法，合了他們雙方的胃口。

戰時重慶最大的困難是政府無法將中國僅有的貧乏資源集中使用到戰爭上。重慶時代國民黨及政府所發表的最重要指示是：「抗戰建國」。現代化戰爭很容易解釋爲包括所有的活動。在重慶有許多人爲

了强調他們所屬機關的重要性，於是把「抗戰」一詞擴大解釋。一旦把「建國」增列爲首務，於是有如黃河開閘板一樣，人力物力就被分散了。

戰時行政上有一項重大措施，即所謂新縣制。一九三九年政府在此一制度上花費了許多時間。報紙上，對這一制度曾有很多佳評。依此制度，每鄉要設立衞生所，要增設學校，同時要增加縣府的工作人員。我請財政部提出經費增加的正確數字。我發現新縣制制度要比過去的制度在經費方面增加一倍。最熱心推行新縣制的是張群將軍，他是當時國防最高會議的秘書長兼行政院副院長。我對他指出：此種制度戰時財政將無法負擔。尤有進者，很明顯的，即使我們能夠籌到經費，我們也很難物色到所需的人才來擔任新增設的職位。在一次圓桌討論會上，我代表行政院出席，席間我見到起草新縣制的人員，我盡量誠懇請求他們，希望能將錢和人力集中用到抗戰上。他們對我的請求無動於衷。我雖然打了敗仗，我仍建議將此制度修改，分期推行。我建議分五期進行，每年實行五分之一縣份。起草委員會堅持立即全面實行。最後他們勝利了。但是，他們的勝利變成紙上談兵，因爲中央政府沒有經費推行。事實上，祇是增設了許多沒有工作的新機構。當我獲悉事實眞象時，我了解何以在我反對新縣制時財政部未予我有力的支持。原來財政部人員比我聰明，他們一開始就知道新縣制不過是紙上談兵，不會實施。

因爲新縣制是道地的政府工作，所以我曾深入研究。一項新措施在立法時，人們都很認眞。一旦立法完成人們就把它淡忘了。政府中公文往來的確很多，但詳細計畫却很少，至於談到努力不懈的去實施改革，那就越發的少了。

爲了熟習各省的情況，一九四〇年春，我到湖南、江西、浙江、廣東和廣西去視察一次。陪我同行的有吳景超（Wu Ching Chao），他是一位社會學家，多年來一直任翁文灝的主要助手。另外還有崔禮（Tsui Li）先生，他是一位公共財政專家，曾在英國倫敦經濟研究所研究，當時他是財政部高級秘

書，另外還有內政部的魏景南(Wei Ching Nieh)。我們乘汽車行經一千五百公里。我很照顧司機，司機也很謹愼。我們走完全程，經過日本轟炸地區和盜匪出沒的地區崎嶇坎坷的道路，車子一直都沒有拋錨。

首先，我們發現每個地方都有健全的自給自足經濟，工資和物價都很好。生產者努力去工作，重新檢起他們過去的手工業，耕種他們過去廢耕的土地。城市和鄉村間的苦難的境遇已經減輕了。有些戰時都市如衡陽、贛縣、衢縣、金華、桂林等都相當繁榮。在福建一個小鎮上，當地人對我們說：生活比過去好。在平時，每十天殺一頭豬，鳴鑼通知，請大家來買新鮮豬肉。戰後經濟繁榮了，每天都要殺豬，所以也用不到再鳴鑼了。很明顯的，人們由於他們自己的努力，並非根據政府的曉諭和規定，而解決了他們的供求問題，當然也有些官員認為這種繁榮是他們智慧所產生的結果。

第二、我們發現一般人普遍抱怨徵兵。我家鄉的人和我以前南開、淸華的學生告訴我一些徵兵者令人難以置信的罪行。結果，雖然鄉村損失了一百名生產者，而前線最多只能增加二十五名戰鬥員。年輕人盡量利用機會從營房或行軍途中逃亡。在我們返重慶的途中，我們遇到負責兵役的主管，他也是去視察的。他不相信我們的所見所聞，相反的，他來了一套粉飾太平的說法。我回到重慶後，主張把徵兵的數目減少一半，將薪餉增加一倍。我認為軍隊需要戰力，國家也需要生產。但軍政部長何應欽將軍却認為我神經不正常。

第三、我們發現中央政府大部分改革方案均原封未動，變成具文。地方政府經費不足。更重要的是：它們缺乏訓練有素的人員。政府的少數農業實驗所，連普通的農人都看不起。劃為造林的山地光禿禿的，祇有一塊木頭牌子或是一塊石碑，孤立在那裡，表示那兒曾經植過樹。衞生所不是雙門緊閉就是沒有適當的人員和設備。有一個實行新縣制的模範縣，縣中的模範小學，教室中僅有的一扇窗子被一塊黑板遮擋着。我問老師：為什麼不把黑板移到別處，讓它擋着窗子。他當着省主席回答說：因為它一向都

擋在那裡。最出人意料的是：所有的省主席、省委和縣長都以全副精力推行新縣制，而結果却完全失敗。

整個視察旅行中我們會見的省主席最有精力的是福建省的陳儀。他堅信國家社會主義，他也設法在福建實現他的理想。他控制商業和分配。他的公家機構取代私人的商業組織。他推行嚴格的文官制度，並盡力祛除徇私主義和族閥主義。他倡辦田賦徵實。他的廉潔和苦幹實在是沒話說。祇要是他能替福建做的，不論有多大犧牲他都傾全力以赴。但他在當時的省主席中是最不得人緣的。他的奇特的辦法，政府控制和各項規定，手下辦事人員的無能，對既得利益者無可避免的損害，這些都是使別人反對他的原因。我們在報告中支持他的理想，同時我本人在中央也極力替他辯護。但，中央於一九四二年却准他辭職了。

最富哲學氣息的主席是江西主席熊式輝。爲了推行衞生、農業、教育工作起見，他在試驗許多共匪曾經試過的鄉鎮制度。他雖然努力，但江西人仍然表示很冷淡。在我們視察時，熊主席正創辦一所大學。該校預計訓練一批較有效率的公務員和領導人。根據柏拉圖的理想，他希望能提高政府人員的教育水準。他不憚其詳的闡述他的理想，並且急於實現他的理想。他要我擔任他的新大學校長。他說：大學校長的地位事實上是與省主席平行的。在決定中國命運的戰時，我認爲他的計劃是不合時宜的。我建議他不可操之過急。

最困難的省份是革命發源地的廣東。如果說有人想要找出革命氣息和封建傳統能够並存的地方，那麼，廣東就是最佳的所在。族閥主義和貪污腐化達到極點。一九四〇年，省主席對這種環境簡直束手無策。省中有力份子對軍中和政府的位置都要推薦人，不論他們推薦的人員如何無能，如何貪污腐化，省主席都要買他們的賬。

十多年來，湖南一直是一個正常省份。它的自然富源和衆多的人口使它能够保持相當程度的獨立和自給自足。因此，官方的苛捐雜稅較少。人們的健康和敎育程度優於其它的省份。當日本進攻湖南時，湖南人踴躍輸將，向軍隊提供了大批物資和勞力。一九三九年間，國軍在湖南奏捷。當時的湖南省主席是有名的「長沙虎」薛岳將軍，他的廣東部下很巧妙的在湖南搜刮了一陣。他是僅有的一位抗議我們視察報告的省主席。我們在報告中除了其他方面不論，曾指出省府用於公共衞生方面的錢還不到預算的百分之一。薛主席在一封譴責我們偏見的電文中引用事實說：他已在七月份增加二十五萬元公共衞生經費，證明他對人民福利的重視。我向委員長說明：我對湖南的視察報告是根據五月份的情況，即使現在薛主席增撥款項，其數目對湖南人的保健說，仍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的。委員長笑笑說：「你該知道，你們的報告正在發生效果中」。

廣西省素有模範之譽。我們發現廣西省府很清潔，人員工作努力，雖然很窮，很落後，過去秩序不好，但現在却治安良好。一九四〇年間，廣西生活水準仍然比鄰省湖南低。我們發現，這種情況主要的是因爲自然資源的貧乏，不是人謀不臧。我們提出一些建設性的批評，主要是說省府過去太貪多嚼不爛，因此，它的資源人力，和經費太分散了。我們請中央進一步支持廣西。廣西巨頭之一白崇禧在我們的報告上附加說明後寄往桂林，請廣西省主席黃旭初仔細參考。

一九四〇年七月我們結束西南各省視察旅行。此時，日本正瘋狂轟炸重慶。我們回到重慶時，因爲空襲，被困在一所郊外的房子裡。當我們要渡江時，輪渡已經燬於轟炸。我自己的房子也被炸光。事後他們告訴我：他們祇找到我的一條氈子，被炸成碎片掛在電線桿子上。

我回到辦公室時，看到一件敎育部的提案，等我處理。該提案是要在戰時中國地區實行五年義務敎育。行政院秘書長魏道明雅不欲拂敎育部陳立夫部長的意思，於是要我想辦法去阻止。對於平時都沒有

實行的義務教育制度，欲想在戰時實行，我實在不敢想像。教育，特別是小學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但在艱苦的戰時推行此一制度顯非適機。起初，我想把教育部的提案壓一壓，但我想此種方法對個性極强的陳部長恐怕不行。有一次我偶然和軍政部長閒談，我獲悉因爲財政困難，有些軍事單位已經三個月沒發餉了。事有湊巧，星期三孔祥熙病了，委員長親自主持院會。我將陳部長提案和未來五年支出明細表一併置於主席桌上。委員長於宣讀這些文件後，指示義務教育留待勝利後再辦。陳部長一再陳明理由，均未達到目的。後來他讓步，請求院會部分採納他的提案。委員長回答說：這種工作，政府絕不可以分批去實施。

由於戰爭拖下去，財經問題越來越嚴重越複雜。固定稅收減少了：鹽稅減少了百分之七十五，工業稅減少了百分之八十，土地稅減少了百分之五十强。中國領土祇賸下一半，而且是較落後的一半。雖然我自從一九三八年五月就側身於中央機構，一直幹到勝利爲止，但直至現在我執筆撰寫本稿時爲止，我還不知道我們當時是如何渡過上述財經難關的。

一般的說，變化往往出人意料。戰前，中國對敵國最普通的辦法是抵制它的貨物。在重慶最初的兩年雖在政府急需物資時，政府和人民仍然奮力抵制日貨，不僅是抵制日貨，就連所謂傀儡物資也包括在內。這種作法無異自殺。盡管我國缺乏紗和布，但人們認爲去購買日本或傀儡政權的棉紗是不愛國的。此種物資缺乏情形因走私者突破日本封鎖線走私一些物資而稍稍減輕，使大後方人民可以獲得一些生活必需品。

所有現代國家在戰時都是實行配給制的。因此，有些人（中國人和外國人）建議中國實行配給制。當時試驗過各種不同的配給方法，有的以地區爲準，有的以物品爲準，但沒有一個獲得良好效果的。配給在中國是個理想，沒有任何實質的基礎。一旦所生產的大部分食物和衣服被生產者自己消費掉，不再

上市，政府就沒有辦法了。比較進步國家的經濟像水管子中的水一樣，中國的經濟却像雨水似的，一落地就被吸收了。如果水在管子裡流，控制者可以開閉自如，但是水洒到地上却無法控制。西方國家直至他們生產和分配合理化後才實行配給制，這絕非偶然。中國經濟情況是害了配給過敏症，因爲中國還沒有實施配給制度所必需的行政組織。於是配給制度的試行利少弊多，引起許多官僚政治的害處。

出我意料的，我與戰時財政工作結了不解緣。一九四一年，經決定：所有的稅均由中央政府徵收，土地稅，改收實物（卽所謂田賦徵實—譯者）。此種變動所造成的結果是各省失去了財政上的自治權，中央政府要撥給預算。當時，中國希望從英、美兩國借到大批貸款以資挹注。英國銀行總裁尼美爾（Otto Niemeyer）和歌瑞德（Grady）先生，分別代表英、美政府到中國來了解中國財政情況。他們表示：除非中國編造出一九四二年可行的預算，想像中的貸款是不會來的。在過去，許多中央機關都爭取編造預算的權利；但在一九四一年，各機關凜於事實上的困難，昔日爭權的機關都彼此互推，慷慨出讓他們的權利。因此，我受命起草預算。

歌瑞德先生祇在重慶停留一個短期間，但尼美爾先生一直等到預算完成並付諸實施才離開。是年冬季，尼美爾和我幾乎每天都在協商。我認爲他是一位很了不起的財政專家，人聰明，也是一位好朋友。

一開始，尼美爾先生鄭重其事的說：我編的預算絕對不能超過一百二十億元。如果我編的預算能不超過此數，他就建議英、美兩方貸款。我立刻告訴他：卽使他是中國的財經霸王，也無法編出這種預算。我答應他，我可以在書面上照他的意思編。但我指出：我希望提出一個眞實的預算，既能適合戰時需要又能爲政府所遵行。我估計一九四二年的支出約在一百六十至一百七十億之間。雖然尼美爾對我的估計未加反對，但他堅持我應盡力不使它超過一百二十億。

編列預算的困難並不在尼美爾方面。在編列時，我們要一個單位一個單位去審查。待整個預算編好

，總數稍稍超過一百六十億。尼美爾先生很客氣的說：他認爲我是盡到力量了，他準備建議貸款給中國。

編預算時最大的困難是和各省政府聯繫。在一九四一年以前，省府有他們自己的收入，自己編預算。很多省主席都是亨字號人物，都能幕後左右中央政府。尤有進者，各省情況不同。沒有一個能適合於所有省府情況的原則或公式能供我參考。前此若干年的數字是不適用的。各省的支出一向是不均衡的，不僅各省間如此，就是同一省份在不同業務方面也是如此的。例如：有的省份將其收入百分之五以上用於公共衞生，但有的省份祇用百分之二點五。很明顯的，我應該使其合理化。但時間無多，我必須、而且也祇能在短短的時期內編成。我沒有說明我用什麼方法使各省開支合理化，因爲我從經驗中發現，在應合時代要求時理論往往比實際更易引起爭議。

出我意料的，一九四二年各省預算在中央並未引起激烈的爭論就通過了。同樣出我意料的，所有省主席都譴責我所編列的預算。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有十四位省主席到重慶出席一個國民黨召開的會議。他們藉機向委員長訴苦。他指示他們到行政院和我舉行圓桌會議，討論此事，由他自己親自主持。因爲坐位關係，甘肅省主席谷正倫第一個發言。他抱怨：甘肅全省預算三千九百萬元絕對不够。委員長要我說明。我說一九四二年預算對每個單位說都是很困難的，不論是省是部，因此，我不敢肯定三千九百萬之數對甘肅說是否够，但是現年度甘肅省府自己編列的預算，全部支出僅僅才一千六百萬元。我所編的甘肅省預算大約較本年度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是各省中增加最多的。我所以如此做，是因爲我曉得甘肅是最窮的省份，急需中央政府支持。我說明後，委員長和谷主席都沒有再說話。

第二位發言的是廣西省的黃旭初。他說因爲廣西又大又窮，省主席難幹，八千八百萬的預算顯然不够。我回答說：我知道廣西省主席在未來一年中會有極大的困難，但廣西在南方各省中生活是最好的。

東部鄰省廣東預算是八千四百萬；北部鄰省湖南是七千八百萬；西部鄰省貴州是六千萬。經我說明後，委員長和黃主席也沒有話說了。

第三個發言的是浙江省主席黃紹竑。浙江是委員長的老家。黃主席指出：我將甘肅省預算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而浙江僅僅增加百分之二十三，是增加最少的一省。我承認此一事實。但我請委員長注意：盡管浙江預算增加的百分比最小，但浙江的預算數字仍然高居第二位，僅次於四川。就人口、地區和經濟情況說，浙江都不應該居於第二位。如果中央政府要省預算國家化的話，浙江省的預算，事實上還應該再核減。不過，我還是把浙江的預算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三，因為我知道減少浙江的支出需要一段時間。如果操之過急，必定使省主席遭遇無法克服的困難。問題是浙江在過去超支太多。我忠告黃主席：浙江在未來若干年內預算百分比都將是增加最少的。聽過我的說明後，委員長認為我編列的很公平。

輪到江西省主席熊式輝發言時。他說：他和我的看法距離不太大，他可以和我私下協調解決。以後所有其他省主席均仿傚熊主席的做法不再發言。委員長在結束會議時說：「我認為的確沒有什麼可爭議的，預算照原案通過。」

會後，熊主席到我辦公室說：他縮短了討論時間，有功於我，實在應該給江西增加一點預算。

當預算在國防最高會議中討論時，浙江省黃主席的朋友們都替我講話。但考試院長戴季陶發表意見說：對浙江的預算編的不公平。糧食部長徐堪支持戴的意見，他提議：由於整個預算不便增加，可以用變通方法撥給浙江省府一筆錢轉用於省內各縣。這時，委員長說：他已經詳細看過浙江的預算，他認為用不到再改了。他又進一步說：他認為把指定用於縣的款項撥給省府尤其是不合適的。如果此一建議付諸實行，無異是薄於縣而厚於省了。

說到中央各部，對我最不滿的是交通部。當時中國對外僅有一條交通線須要經過緬甸。經過長期的

爭論和商討，決定在雲南修一條鐵路，連接緬甸。我以爲如果決定付諸實施，就要全力以赴。所以我提議先擱置其他鐵路建設工作，集中全力修築滇緬路。但交通部長張嘉璈要同時把湘桂路延長到貴州，並且要從西安將隴海路延長。在我草擬的預算中，爲了修築到緬甸的鐵路我曾編列了八千萬元，但對延長鐵路却沒有編列一文錢。張部長提議把我編的預算一半用於修築通往緬甸的鐵路，分一半用於延長其它路線。由於委員長和孔祥熙支持我，預算案未被修改，但張部長立卽展開有力的遊說。利用中國人愛妥協的天性，最後他終於將修緬甸鐵路的預算弄走一部分去延長其它的兩條鐵路。這兩條路對抗戰說都毫無貢獻。

新嘉坡陷落後，我認爲英國的力量已不足以保住仰光，因此我建議委員長修築緬甸鐵路的工作應該立卽停止，因此，可以節省下七千萬元。開始時委員長是同意我的建議的。但是緬甸鐵路建設局局長曾養甫利用委員長巡視昆明之便，說服委員長繼續撥款修築。委員長電令我：停修緬甸鐵路的命令暫勿發佈。於是又白花費了三個多月的工夫。

珍珠港事件後，經濟部長翁文灝請求特別撥款七千萬元在重慶建設一座新鍊鋼廠。當我看到他的呈文時，我很贊成，因爲我認爲戰時增加鋼的產量顯然是很必要的。爲了確定我的立場，我去看兵工署長俞大維將軍。出我意料的，俞先生反對此一計畫。他說：因爲原料、燃料、技術工人，在重慶都受到嚴格的限制，增加新鋼廠祇不過是轉移現有工廠的人力和原料而已。他又進一步說：軍隊需要的是特種鋼，新廠不能鍊。經與俞氏晤談後，我改變了我對翁氏提案的看法。當院會辯論此一提案時，孔祥熙欲想平息大家的爭議，他一開始先對翁的忠於職守大加讚賞，接着說明財政部的困難。然後，轉身向我，也誇讚了幾句。他就好像調處兩個人間的爭端一樣。最後他說：「因爲你們一方要撥七千萬，另一方認爲一分錢都不能撥，我不偏袒你們任何一方。我決定撥四千萬。」

對大多數類似的事，孔先生的決定是聰明的。但對我說，我却希望他：要幹就撥給翁七千萬，要不幹就採納我的意見一文不撥。因爲七千萬還可以生產一些鋼材，四千萬就等於白白浪費。抗戰時期中國的妥協精神往往就導致上述的結果。實際上，這都是因爲中國人缺乏在一個時期內集中力量從事一件事的習性所造成的結果。雖然人們口頭上叫「軍事第一」，但他們心裡却想從事許多與戰爭毫無關係的事。

我們常聽人說委員長喜歡那些唯唯諾諾的人。我知道：委員長左右的人，的確有些本身根本就沒有定見，有些卽使有，又深恐委員長對某事事先已經有了腹案，一旦自己的意見說出來不合於委員長的腹案，豈不尷尬？因此乾脆就不發表意見。不過，我聽人說過，也曾有人向委員長進過逆耳忠言的。談到我自己的情形，祇有一次是例外，那就是答覆近衞文麿聲明的那一次，他沒有接受我的意見。至於他對我所發表的不合他意的意見，是否表示過不快，我就不知道了。

當蔣委員長於一九四二年二月間携夫人訪印度時，他們對甘地和尼赫魯所領導的反英運動表示了同情。印度的動亂仍在繼續發展中，英國政府認爲應該加强控制。中國輿論自然支持印度獨立。宣傳部長王世杰請各報基於政治立場不要發表反英言論。有一段時間輿論界不再談論印度問題。黨政兩方人員對王的政策都不以爲然，群起反對。有一天，委員長招待我們吃午飯。我一進官邸就發現氣氛很緊張。過去委員長都是在飯後才討論問題。但是那天他却要我們在飯前先聚攏到餐桌四週。我們坐好後他立卽宣佈：「今天我們來討論印度問題。」

一位黨國元老開始發言，他說：國民黨是個革命的政黨，多年來一直反對帝國主義侵略。他又進一步說：不論結果如何，中國必須支持印度的民族主義運動。繼起發言者年齡較長，但地位較次，他譴責帝國主義，特別是英國帝國主義。他略謂：壓迫亞洲人民已經成爲英國傳統的一部分，他主張要對英國

採取强硬行動，但是却沒有提出行動方法。

第三位發言者譴責宣傳部的新聞政策。他說鎭壓親印的報紙言論對中國和國民黨都是不值得的。這時張群想替王講幾句話，但委員長阻住他。其他人員發言後，我問：是否我可以說幾句話？委員長允許我發言。首先我請全體出席人注意一個事實：盡管大家說了很多，但沒有一個人提出可行的辦法。我認爲我們實際能夠做到的，才是眞正能夠幫助印度的。在當時，我們僅僅能充當一個中間人。要充當中間人，中國就不能得罪英印任何一方。任何譴責都或多或少的對於居間調停有損害。我建議宣傳部應該讓報界自由討論，但要請他們注意：盡量避免趨於極端。當我發言時，有些出席人認爲我是重慶政界最大的傻瓜。我坐下後，會場中一片沉寂。後來委員長結論說：「我們照廷黻的意見做。」

次日，重慶所有的報紙都報導了印度情況。有些報導的尺度不僅超過了宣傳部所允許的，而且也超過我所預料的。報界對印度突然的報導，而且內容相同，此一事實使駐重慶的外交記者誤認爲中國政府已經採取了反英政策。他們的結論雖然不對，但他們却有報紙爲證。當記者們要向他們總社發稿時，我國新聞檢查機構祇好查扣。當時，我是政府每週記者招待會的發言人。當我到宣傳部國際宣傳處處長董顯光的辦公室時，我發現他外表很緊張。他告訴我：外國記者宣佈他們要從重慶撤退，因爲我們查扣了他們的電稿。當我見到那些記者時，我將在委員長午餐席上的建議的事作個簡單說明。中外記者對我的說明都感到很滿意。新聞稿的遲發並不影響他們的報紙，但對中國說却有很大好處。當天晚上十點鐘，一位中國報紙的編輯電告我：新聞檢查人員禁止中國報紙發佈外國記者已經被允許拍發的電稿。

人們對政府組織和人事的批評很多。這種批評，在我國也和其他國家一樣，祇有部分是公正的。我個人認爲：盡管政府官員的道德水準應該提高，他們的知識水準同樣的也需要提高。側身政府的人中存心克盡厥職的，固然遠較一般人想像的爲多，但政府官員中具有現代眼光的却遠較大家想像的爲少。

我經常在行政院及各委員會傾聽討論時，忙裡偸閒去猜測發言人的思想背景。我很容易猜出他們的教育背景是德國、日本、法國、英國或是美國的。這些老知識份子的通病是想將文字當作事實和政策。如果你告訴他們說這種想法是落伍的，他們就會感到不快。從某個角度看，他們的不快也是有道理的，因爲他們認爲他們的文字本身就很有名堂。當然，喜歡推敲文字，舉世皆然，這是政治推銷術中極重要的一部分。不過在中國却濫用了這種習慣。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的問題是觀念問題，而不是從政者存心如此的。

在這方面，我想引用兩段插曲：其中一段是瑣碎小事，另一個却相當重要。第一件：在重慶電力非常缺乏。燈光昏暗，但即使昏暗的電燈也是有限制的。在院會中我提議採取日光節約時間，每年四月一日將鐘撥快一小時。孔祥熙博士第一個表示反對。他說他從未聽過這種辦法。他不明白人如何可以任意將時間提前或錯後。他說他同意提早辦公時間，但他不同意隨便將鐘撥快。徐堪部長極力支持孔的意見，他譴責我干擾時間，破壞自然。後來，美國人提出了相同的建議，出人意料的又被採納了。

第二段插曲是有關公文程序的。在前述章節中我曾將中國政府譬喻爲寶塔。依法，所有的文件都要由最下一層逐級呈到最上一層，然後再由最上一層退回最下一層。此種處理程序當然是很浪費時間的，同時還產生另外一種弊端：那就是冲淡了每個人的責任感。大家都處理了文件，至於一件工作是否已經做了、做得是否好倒沒有人關懷了。他們眞正注意的是公文的遣詞用字是否得當，繕寫字體是否秀麗、印章蓋的是否端正。

公文程序困擾我很多年。我曉得這是中國官場傳統中主要部分，因此，即使是些許的改革我都小心從事。其實建立一個共同意識從事實際改革並不困難。但是，欲想令人接受却是困難的。草擬改革辦法我倒不怕，但是推行起來却是困難的。我像淘金者一樣，極於找出一句可以形容公文改革的恰當詞句。

突然間來了靈感，終於想出來了：「分層負責」。這句話很典雅，而且也其來有自，甚至可以說來自孔子。我將這句話就教於許多朋友，他們都認爲不錯。後來蔣委員長在一次談到權責的講話中也使用了這句話。他可能是自己想出的，也可能是從我的朋友那兒聽來的。他對分層負責一詞的使用，對我實在是一大鼓勵。於是我自己對自己說：現在終於可以將中國的政府機構變成工作單位了。我要爲此工作而努力。改革方案最後終於提出院會。院會由孔祥熙主持，議案引起非常激烈的爭辯。實際上，等於引起一次政院危機。孔不願接受這個議案。徐堪支持他。前福建省主席，當時的行政院秘書長陳儀將軍公然譴責他們。他的發言雖欠聰明但却熱誠，因爲他認爲孔、徐的反對是不忠於委員長的。他說：他在行政院已經看到過很多類似的事情，對國家領袖的命令和意願祇有口頭上的應付。孔、徐二人都痛恨陳的指責。當時改革方案的討論一變而成爲人身的攻擊。事情演變的結果，不離中國一般的老套。第三者出面打圓場，最後使所有有關的人都保住了面子。

從表面看，我的計劃是被採納了，但實際上成了具文。這並不全是因爲道德上的原因，而是因爲人們對此缺乏了解。欲使改革計劃順利推行，還要配以其它方面的改革。首先分層負責需要機關首長先決定他所主持的單位要作些什麼工作。然後，必須再將工作固定的分配給各科室。預先籌劃政府機關重要工作是很吃力的，這要比頭痛醫頭脚痛醫脚，遇事臨時應付一下，然後推到其它單位的作法困難得多。第二，如果眞正要授權給科室主管的話，即使是相當有限度的授權，他們的人選也要深獲上級的信任。於是在人選的物色方面也會較一般情況要小心得多。在過去，即使某一人不稱職也沒有多大關係，因爲他不過是一個「公事必須經過的桌子」。

這種積弊的來源是很久遠的。幾世紀來，中國的知識份子都是耍筆桿，他們肩不能擔手不能提。在學校他們學的是紹興師爺那一套。他們認爲：一旦把公文寫好，工作就完了。這種積弊大部分還保留

到現在。

像中國這樣古老的國家應該把聰明用在研究人類心理和實際管理人方面。就私人關係方面說，我認爲中國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文化水準。但在公共生活方面，我却不敢說已經達到理想地步。中國的政治領袖當然也知道人類都有追求權力和財富的天性。在過去，有許多皇帝，他們曾利用這種天性得到某種程度的成功。不過，文化的傳統似乎使具有野心的人對財富的追求較權力的追求更爲熱衷。同時，在中國對人的管理一向是依靠道德理想主義的。歷代的領袖人物都高唱犧牲精神和無條件忠於長官。此種做法，如果不斷予以强調，就人性好的一面說，可以得到某種程度的成功。但是也有危險和限度。理想主義可能成爲空口說白話，也可能被現實的想法所代替。理想主義也可能被當作復古運動的藉口。欲想使理想主義的說法有效，就必須搬出歷史上的英雄和聖人來作榜樣，但是他們當時行爲的動機在我國的歷史中又沒有正確的記載。過去國民黨的作風就是反對揭露中國英雄聖人的短處，他們忘記了，除非我們能揭過去的短，我們就不能更進步，就不能生活得更理想。

中國政治領袖們在建國時很少利用人類好工作的本性。我們都想有機會去做一己的工作，追尋工作圓滿完成的滿足。當然，政府應該予其工作人員以實質的酬勞。雖然人生不完全是爲了麵包，但是沒有麵包他們是不能生存的。爲了使人們努力工作，倒也用不着給以過份的諾言。因爲國民黨要建立一個半社會主義化的國家（我完全贊成），所以就要較過去更努力，去引發人類的工作天性，使他們參加工作。建立一個社會使其中男女在公私生活方面都能夠有足夠的機會去發展、滿足他們工作的天性，是中國政治家們的首務，我敢大膽的說這也是每個國家政治家的主要工作。目前，人類已不再完全追求權力和金錢，因此，文明的進步應該依靠人在工作中的自尊。



傳記文學叢刊四十八

蔣廷黻回憶錄

定價新臺幣一百元

英文口述稿：蔣廷黻
譯者：謝鍾璉
編輯者：傳記文學雜誌社
出版者：傳記文學出版社
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三〇號四樓之一
臺北市郵政信箱1之36號
郵政儲金劃撥帳戶第三六九一號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二月一日再版
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〇七一九號